
超越民主
lyouport共创组

超越民主

1. 序
    1. 关于本项目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2. 关于本书
    3. 关于本站 - 一期工程“超越民主”
    4. 超越民主 -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
2.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1. 民主是直接的
    2. 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3. 从民主到自由
    4. 超越权术，超越民主
    5. 写在1月6日国会暴动之后
    6. 民主：爱国的诱惑
    7.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8. 打破共识现实：从同意的政治到革命的诱惑
    9. 让我们谈谈民主，“真正的民主”
    10. 历史重演：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 特朗普的法西斯卷土重来
    11. 在全球化之后，在加速的内卷和后增长时代，推动升维斗争
3. Category 2 实践
    1. “结束吧!/Gotovo je!” —— 对斯洛文尼亚直接民主的思考
    2. 无政府主义革命：披荆斩棘
    3. 做一个无法被代表的人
    4. “不要亲手开倒车!” - 波斯尼亚的直接民主实验和第二轮噩梦
    5. 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6. 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
4. Category 3 纸条

1. 不“民豆”
2. 颜色革命
3. 成瘾物品
4. 权力败坏了最好的人
5. 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
6. 摆脱自由派女权
7. 城头大王旗
8. 美国大选和“左右”政治
9. 虚无主义
10. 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11. 如何清除法西斯蟑螂
12. 你反对的是统治本身还是某个独裁者？你厌恶的是独裁行为还是被“谁”采取的独裁行为？
13. 关于AI
14. 失败的向量 —— 乌克兰和香港的共同点
15. 回复提问：「德国选举中是否有与中国变革直接相关的议题/看点？」
16. 不论您是哪种“主义者”，都应该能理解的基本局势
17. 转帖：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18. 回复提问：「新的一年开始，是否有新的 “维稳方向”？可能是什么？」
19. 回复：关于关税（贸易战）- 粉黑纠缠蒙蔽了整个反动时代
20. 权威
21. 回复关于马斯克组党：所谓的“第三势力”并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东西
22. 不是“个人问题”

5.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1. 他们可以通过给你选票来堵住你的嘴
2. 我说“海外民运不行”只是在客观陈述
3. 专业人员如何摆脱政治冷感的陷阱以站到民主一边？
4. 乐观情景，反对派的分裂，和民主战略
5. 那些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
6. 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
7. 特朗普的2024总统任期对罗贾瓦意味着什么？
8. 多数决定制是一种粗糙的算法
9. 海外民运和狮子舞
10. 当冷战重来遇到民主危机

11. 大转型开启 - “中产阶级不行了”
12. 转帖：写在方济各之后，“三战”之前
13. 【转帖】恐怖作为统治手段…‘官不聊生’、社会暴力、事故频发的背后
14. 关于“民主”，美俄中，内战，和未来
15. 冲破中产改良主义幻觉，走进变革时代
16. 细胞总是知道…

6. 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1. 你反对的是统治本身还是某个独裁者？你厌恶的是独裁行为还是被“谁”采取的独裁行为？
2. 关于AI
3. 为什么技术有利于暴政？ — — 一场你必须参与的政治斗争
4. 无形的极权主义
5. 剥削压迫、血汗工厂、强迫劳动、生态破坏 …… 高科技背后的现代奴隶制
6. 不要坐以待毙！您可以做这八件事来阻止ICE
7. 第一次妥协就是最后一次妥协
8. 极右翼、左翼，和选举政治陷阱 - 终结新纳粹时代的路经
9. 不要无所作为，不要等待 - 犹太无政府主义者介绍反法西斯经验
10. 其实，冲在前面才安全:采取攻势反暴政
11. 新法西斯时代，警惕实用主义者的“存在即真理”
12. 从旧时代的灰烬中破土而出 - 反革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重生
13. 回复：关于关税（贸易战）- 粉黑纠缠蒙蔽了整个反动时代
14. 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
15. 美国的权威和美式民主
16. 冲破数字时代的性压抑 - 七夕2025：面对新法西斯世界，唤醒身体
17. 斩断AI法西斯主义

[image]
[image]

关于本项目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

2024年的这个10月是IYP的10岁生日，本项目将以转型作品 - 一个新起点 - 作为生日蛋糕，与所有热心于进步事业的华语朋友分享！

Hi，朋友！您正在访问的是IYP（*iyouport*）的新项目 Initiatives & Tactics。本项目由一系列站点组成，侧重战略倡议和战术策划，以前线实战需求来组织知识；其中每个站点引领单独议题/项目工程/倡议。它们将分别逐步实现，并持续更新。

机遇与挑战

在《天安门起义35周年》的开篇我们提到："百年不遇的机会…就快来了"。这不是某种修辞，它就是字面意思。重大且难得的机会窗口正在临近，但是，要想让它有利于自由解放的革命前景（而不至于导致跌入更恶劣的深渊，如这位朋友所言），就需要进步派革命者具有超凡的智慧和创造力、敏锐的感知意识和能动性、踏实审慎的行为风格和基层实力，换句话说，需要政治专业性水平。

从根本上说，政治竞争比拼的不是思想理论，而是组织机器。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相。对反对派来说，人们不会因为您更诚实、您说的对、您很讲道理或者很有魅力，而跟随和支持您 —— 这些品质都很有用，只是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不是决胜加分项；人们支持您的最关键理由在于：对您的方法的有效性的预期 —— 旧政权的组织结构已经造成了很多问题，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和感知这些问题；但如果

没有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能很好的解决那些问题并展示其自身的前途，人们将继续留在原地不论有多难受。反之，谁能提供具有成效的新组织机器，人们就会跟上去。

传统的异议人士认为反抗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起来，制定"正确"的立场（通过揭露现政权的谎言和错误等等），并在适当的时刻以超凡的魅力共同站出来表达这一立场。嗯 ... 对于改良派异议来说，这可能是比较标准的做法。但如果是反对派的话，照这样做就太天真了，因为这不会带来变革。除非你能建设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基础设施，否则您的努力对现政权及其依赖的结构没有冲击力（即便它自己倒台了，你我也无法控制接下来的局面）。

组织能力在政治斗争中至关重要。当前的进步派政治运动（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一个主要弱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用组织过程填充基础设施方面的技能水平比较低。要赢得斗争，就必须提高这些技能。

必需承认，在专制政权的严厉镇压打击之下，在高度缺乏政治实践的情况下，政治意识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在过去两三年中被突击性地"复政治化"的人们不可能立刻获得相关经验（也没有获取渠道），所以对新生代"是否成熟"的批评从根本上就是不恰当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责任也在于那些曾经走在前列的老一代活动人士，他们（本该）深知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而他们没有或没机会积极传授自己的经验，（甚至其中还有人把经验当作资历资本私藏起来），加之流量经济的诱惑，不仅助长了前线社区本来就暗藏的等级制度，也导致很多年轻人把精力浪费在了能效极低的表面功夫上。

很多旧的做法是非常短视的，但只有当您对前景有足够的了解，且知道如何抵达那里时，才能分辨哪些是烟花，哪些是砖瓦。

任何选举都会过去，炒作终将平息，但建设政治基础设施和培养组织技能的任务必需持续。大国选举绝不是这个世界未来的全部决定性因

素。如果说围观和讨论选举能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正是为了传承反抗斗争的经验和反思精神，延续革命的火种。

这就是本项目发起的原因。

面对当前的局势，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既能为那些今天只完成了一半革命的人提供彻底革命的机会，也能为他们提供抓住机会的勇气。所有那些被压迫、被剥削、被摧残、被竞争绑上永无休止的跑步机的奴隶们、怒火中烧却束手无策的囚徒们，我们需要一起探索一条通往新世界的路径，这种全新的激进主义就是我们的代步工具。

您绝不是唯一一个在寻找出路的人。您从不孤单。我们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 一直都在。甚至其中一些人已经遥遥领先地接近了那个新世界，他们会在那里等我们，庆祝我们的到来。我想让你知道，你我曾经的每一分抗争 —— 不论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 —— 都不是白费的，相反它们美丽、高贵、绝对的必要，是我们走向自由解放的跬步。

[image]

以下是一个简要说明关于本项目出现的形式，以及它未来可能如何成长。

项目说明

如上，为了能在帮助弥补缺失方面尽一份力量，上个月里我们组织了一些讨论和学习，最终商定了本项目的“一期工程”。以下是对此的说明。

一、当我们谈论“倡导模式”时，大家提及的“环境问题”

1、互联网信息过载、嘈杂无绪；志愿译者积极性高但不系统，过于分散化，缺乏组织和战略性部署。

2、公司网络平台的算法暴政令思考者厌恶；很多“热点议题”虽然有学习价值，但“周期极短”，且受审查和商业需求甚至“主流化”的多重控制，难以深入探讨，受其影响的学习者更多感觉被拖累。同时，为数不少的私密交流空间并没能从关系结构层面清除等级制度残余，议题也缺乏专注，甚至组织管理不善，导致最终要么沉默、要么出现无意义的极化和冲突。

3、企业媒体垄断全球抗议活动的报道，其滤镜筛除了绝大部分值得未来反抗者学习的经验和技巧。

4、激进派/进步派理论在华语区流行度较低；且信息流通与名人效应的相关性很高，“陌生”作者的思想可能难以推动。

5、初学者经常感觉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前辈推荐的书目要么过于生涩难啃，要么太过学术与“眼下的实际问题”距离较远。

6、随着经济下行，统治者加强了社会控制，更多前线工作者转入地下，亲密团队缩小并分散化、彼此隔离。大家需要一个能汇集零散的深度思考、保持受关注议题的聚焦和扩展空间，并同时保护积极的贡献者尽可能匿名安全的“枢纽”。

7、更激烈的变革窗口正在接近这片土地，但目前本土的准备工作还远远不足。充满热情的无政府主义社区正在主动发育，在各种层面上展开倡导、探讨和实践，但总体上比较孤立，距离成为竞争性解决方案的目标还较远。

本项目的设计方式旨在缓解以上问题。

二、我们对解决方案的尝试

1、要记得，您并不需要所有信息，尤其是那些被操纵的所谓‘热门消息’；相反，是它们需要您。

所以，请利用它们 —— 时刻谨记您的需求，将知识点组织成网络，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促进思考。类似Personal wiki、Obsidian等知识库软件，以及本项目采用的Notion，都能有很好的帮助。如果您有自己的亲密团队或者正在与积极人士合作，请先统一战略，以便有计划和有针对性地组织知识。

2、IYP正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努力汇聚来自华语区的深度思考。如您所知，那些在企业公司平台上可能不容易获得能见度的有用思考，我们认为是它们（而不是喧闹的“网红”）更能体现我们的同道的“水准”。

至于革命派团队的管理，的确有一些经验方法，本项目将在未来介绍它们（作为“战术”的一部分）。

3、我们在努力提供无政府主义角度的局势观察和分析，分享全球无政府主义社区的经验和创意。您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不要追求“战胜”企业媒体，那不仅不可能也没什么意义（它们控制游戏规则，而我们需要冲破规则）；我们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同道，扩充反抗者阵营。

4、本项目第一期工程为知名理论家和活动家的作品留出了较大比重（并且来自美国的作者偏多，以体现“美国大选”不只有主流媒体呈现的那些，也绝不局限于投票箱）。并且我们为来自华语区的反馈留出了专门的板块，以拉近中国的实地。

5、本项目中涉及到很多基础理论的书籍和资料，我们已经将相关书目的 Z-Library下载链接嵌入到文中，根据上下文内容您将更容易抓住阅读要点，并构想理论的用例。

6、所有合作都是匿名的。所有反馈来稿也都是匿名的。**IYP**不持有任

何参与者的可识别性信息。以及，本项目明年的新计划中将包含专门讲述安全问题的站点。

7、无政府主义革命社区的流行口号包括："The Secret Is to Begin"。我们和您一样都在"做"中学习。当我们分享经验教训时、当我们为解决近似问题展开直接行动时、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遭受的侵害和威胁来自同一个系统时，"我们"便将形成，并在一起。

希望本项目能帮助您感受到同志社区的存在，感受归属、温暖、支持和力量，更好的是，获得灵感、能力和成长。

[image]

三、本项目的要点和小提示

1、不能让流量经济的垃圾和操纵式宣传系统占据脑容量，为冷静沉稳的思考开辟空间。我们通过一系列基于中国前线社区需求的实用项目来鼓励更深入的探讨、示范、和创新构想，从而增加本项目的可延展性和深入基层的粘性。

2、采取数据库形式以便将知识系统化，帮助独立学习者改善碎片和嘈杂的数字媒介知识信息环境。一方面文档内部嵌入了非常多的链接，有利于将思考引向深层；另方面文档间以议题标签为节点形成结构，方便查阅、横向探索和专题实践项目的研发。

3、本项目并不是"制作一些内容以供___"，而是通过与积极的华语朋友一起思考"当前的需求和可能的补充"，来实践合作的共进。

4、本项目并非普通的"投稿" —— 我们既不征稿也不会依照普通媒体的方式进行审核，也不会原地形成论坛；本项目仅作为学习资源的枢纽，没有联合不同倡议和社区的计划（以帮助参与的各方维护需要的基本安全性水平）。任何社区团队都可以取用本项目的资源，不论是简单的复制转储还是对其进行可视化再生产或者扩展，添加您自己的论述和想法、实践经验和新的洞见等等，都是欢迎的。

5、本项目可被作为现有或未来变革政治论坛和前线自主教育项目的孵化器；可桥接和扩展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的信息商店，以及，藉此引导更多亲密空间的发生。

本项目是独立的，**IYP**不控制和/或影响任何衍生项目，并声明对未来发生的任何使用方式免责。

6、希望您可以通过亲自阅读来体验文字背后蕴含的思想和力量，更好的是由此找到创造力的突破口。不建议使用AI摘要，因为最好的AI工具也只能摘取文字要点，而我们制作本项目的目标远远超越纸面所能呈现的。

7、反对“正确答案”，尤其非常反对声称“永远正确”的答案。解放斗争中一路都在思考，不断辩论、不断创造、不断进取。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特征是鼓励更多人积极的参与进来，而不是服从指挥。在这里没有人是“领袖”，但每一种创意都可能成为新的成核点。iyp一直都在与大家一起学习，并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带动更多潜在的同道，扩充直接行动的参与阵容。

好了，就是这样！**Now It's Your Turn.**

[image]

附 iYouPort 旧址 ——

- 备份站点：iyouport.substack.com
- Telegram：t.me/iyouport
- 免费书籍和时政Post：patreon.com/iyouport

- 区块链备份站点：**matters.town/@iyouport**
- 长毛象：@iyp_iyouport@m.cmx.im
- Twitter：@iyouport_news
- Z-Library: zh.singlelogin.re/s/iyouport

列表 ——

隐身保护： https://start.me/p/xbYXdR/iyp-1

监视资本主义： https://start.me/p/RMQrDD/iyp-2

媒体、心理战和信息战： https://start.me/p/nRBzO9/iyp-3

中美高堡奇人和地缘政治： https://start.me/p/aL8RrM/iyp-4

直接行动战术/原理/经验/工具： https://start.me/p/1kod2L/iyp-direct-action-5

Feed（独立“媒体”/反媒体资源）：https://start.me/p/ADmbkr/feed

关于本书

本书内容来自于站点:

https://iyouport.notion.site/iYouPort-Initiatives-Tactics-Phase-I-aa93a0b99cb94c81aa3177827785beb2

随着站点内容的增多，本书可能每半年到一年出一个新版。

阅读建议：

- 在离线的设备或虚拟机上阅读
- 和原版网页比对后再阅读，电子书的排版和网页不完全一致，且不包含视频和pdf
- 多用目录

隐私与安全告知：

意外联网的可能。简单理解epub/mobi/azw文件是包含一系列网页文件的zip压缩包。如果网页文件中有外链的图片，您的阅读软件就会自动联网下载它。虽然本书特地剔除了需联网加载的资源，但不排除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如果您的网络环境不安全，请离线阅读。

功能受限/缺失：

- 网页内嵌的视频、音频、pdf、epub、社交媒体引用在本书中都将无法使用
- 少量图片缺失。随书附上缺失的图片链接。
- 部分阅读软件可能无法正常显示动图。
- 本书是从网页自动转换的，因此可能有少量结构特殊的网页视觉效果不佳。

本书缺少的图片

==================================

回复关于马斯克组党：所谓的“第三势力”并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东西

1e71802e3321821e8d8f818d9a3c60ec.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不论您是哪种“主义者”，都应该能理解的基本局势 7171802e332182f7aa1381c617c602a7.html

图片链接:%25E5%2590%2588%25E4%25BD%259C %25E5%25A4%25B4%25E5%2583%258F.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5%90%88%E4%BD%9C %E5%A4%B4%E5%83%8F.jpg

＝＝＝＝＝＝＝＝＝＝＝＝＝＝＝＝＝＝＝＝＝＝＝＝＝＝＝＝＝＝＝＝＝＝

颜色革命 c4e1802e3321823380c38183674d3f92.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转帖：写在方济各之后，“三战”之前 ba71802e332183efb3df81c52b94f620.html

图片链接:%25E5%2590%2588%25E4%25BD%259C %25E5%25A4%25B4%25E5%2583%258F.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5%90%88%E4%BD%9C %E5%A4%B4%E5%83%8F.jpg

＝＝＝＝＝＝＝＝＝＝＝＝＝＝＝＝＝＝＝＝＝＝＝＝＝＝＝＝＝＝＝＝＝＝

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35f1802e332183bea146018c14eb3461.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无形的极权主义 90b1802e332182618d82811a39bc3be8.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关于“民主”，美俄中，内战，和未来 2a11802e3321834a85a1815279b23b93.html

图片链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wp-content/uploads/2025/07/特朗普（中）威胁要将马斯克（右）和马马达尼驱逐出美国并取消其公民身份（通讯社）-1751521526.webp?resize＝770%2C513&quality＝80

＝＝＝＝＝＝＝＝＝＝＝＝＝＝＝＝＝＝＝＝＝＝＝＝＝＝＝＝＝＝＝＝＝＝＝

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48d1802e33218304bc9081f327764533.html

图片链接:https://www.philosophytalk.org/sites/default/files/styles/large_blog__900x400_/public/cropped-anarchy_0.jpg

＝＝＝＝＝＝＝＝＝＝＝＝＝＝＝＝＝＝＝＝＝＝＝＝＝＝＝＝＝＝＝＝＝＝＝

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 e821802e3321832ba00d819c58e9a6b2.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 e131802e332183b9829a01c2aef8bdc7.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细胞总是知道… 92d1802e33218210bef401a247336d79.html

图片链接:%25E5%2590%2588%25E4%25BD%259C
%25E5%25A4%25B4%25E5%2583%258F.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5%90%88%E4%BD%9C
%E5%A4%B4%E5%83%8F.jpg

＝＝＝＝＝＝＝＝＝＝＝＝＝＝＝＝＝＝＝＝＝＝＝＝＝＝＝＝＝＝＝＝＝＝

那些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
fef1802e332182e1a5f181953d5e1e5b.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

你反对的是统治本身还是某个独裁者？你厌恶的是独裁行为还是被“谁”采取的独裁行为？
90a1802e332182c4a7b681849ff9e972.html

图片链接:%25E6%2588%2598%25E4%25BA%2589.jpg

本地图片文件名:%E6%88%98%E4%BA%89.jpg

[image]
[image]

关于本站 - 一期工程“超越民主”

正在观选吗？希望能在民主政治相关的话题讨论中脱颖而出？热心于进步事业吗？追求自由解放？…… 如果是，本项目希望您知道，不必与无知者生闷气，不必失望懊恼，事实上您可以且值得去做的事情比看起来的多得多。

欢迎来到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一期工程“超越民主”。这里有一点点关于本站的简要说明。

说明

1、希望您可以通过亲自阅读来体验文字背后蕴含的思想和力量，更好的是，由此找到创造力的突破口，这是类似AI摘要服务无法帮您做到的事，也是本项目的重点目标之一。

2、采取数据库形式是为将知识系统化，以帮助独立学习者改善碎片和嘈杂的数字媒介知识信息环境。一方面文档内部嵌入了非常多的链接，以帮助将思考引向深层；另方面文档间以议题标签为节点形成结构，方便查阅，支持横向探索，和专题实践项目的研发。

3、反对“正确答案”，尤其反对声称“永远正确”的答案。解放斗争中一路都在思考，不断辩论、不断创造、不断升级。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特征是鼓励更多人积极的参与进来，而不是服从指挥。在这里没有人是“领袖”，但每一种创意都可能成为新的成核点。iyp一直都在与大家一起学习，并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带动更多潜在的同道，扩充直接行动的参与阵容。

4、本站汇集了各种认真思考的进步派变革思想，倾向于最激进且踏实的设想，以解决现有问题的能力和可行性为导向，兼顾创新结构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不论其是否“纯粹”的无政府主义 —— 提供参考价值；并就实践经验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 —— 帮未来者少走点弯路。

5、搜索引擎在右上角，可全站搜索任何关键词（如果您在移动端，点击‘三横’按钮后可见；Web端直接可见）。

6、如果您有帐户，可以通过点按“创建副本”将本项目一键拷贝到您自己的私人分区中，在那里可以对其进行任何修改和再创作，或者将其下载为您所需要的格式，再将其导入到您想要的合作平台/站点中。但请注意，这样做之后，您的私人编辑不会对本站产生影响；同时，未来本站的编辑更新将有别于您下载的初始版本。具体操作方法和其他可用功能，请进入“Help”查看Notion提供的教程。

7、您正在进入的是一个起点。前途是无限的。我们一直都在。

仅此。更多空间等待您的探索！

[image]

本站结构

点击按钮查看简介：

本项目一期工程“超越民主”列表版概览

[image]
[image]

超越民主 -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

如果不理解现在的社会错在什么地方，就不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

Initiatives & Tactics 项目是一个站点网络/资源库，您正在进入本网络的其中一个站点分支。 从这里 看到总述。

本项目总站将是一个单独的结构图式站点，它目前尚未上线；上线后地址将出现在这个位置。

Recent Updates

-
-
-
-
-
-

……

[image]

转帖：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整个世界，或者至少是位于大西洋两岸和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相当一部分世界，正在进入全球反应的展开阶段。“萌芽”阶段始于2007年的普京和慕尼黑；“成熟”反应阶段则始于2025年的特朗普和慕尼黑（如此前所描述的）。总体上可以说，整个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在抵制，抵制得精疲力尽，却正因如此，现在才会出现这样如此大的补偿性反应热潮：抵抗失败相当于“失去”时间。

那些对特朗普和普京的风格和举止感到震惊的人应该记住，我们目前面对/应对的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打过疫苗”后的反应。在一两百年前，类似的局势过程都伴随着一系列的血腥革命，就像深层地壳动态导致的大地震那样席卷各大洲。如今，至少在目前的开始阶段，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因为打了百年的疫苗，这个疫苗就是，选举政治。

如果此前的一般假设是正确的（见这里，一定程度上还有这里），那么这里可以做出三点补充性的假设/说明，以预测这一内容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将如何体现：

1. 必须重申，右翼浪潮只是纯粹的破坏，这里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东西。在政治行动领域，右翼浪潮本身不会产生任何“新世界” —— 因为在右翼这里，顾名思义，“新世界”就是旧世界，未来就是过去，最好的起重机就是推土机，他们认为时代的意义不在于创造，而在于修正、平整、制动。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反动的时代会随之结束。

2. 特朗普（和之前的普京一样）都是反动的导火索，但都不是原因。他俩都是暗流抛向政治表面的一块碎片。反动时代极有可能比特朗普的政治时代持续得更久，尽管他下台后媒体的热闹程度会下降，于是在被

媒体操控的公众的感官里可能没那么太吸睛了，但事实上一切都在持续中。除非特朗普在反动计划的最初阶段出现意外（类似政治暗杀那类情况），也就是在反动计划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动力之前他的政治就结束了，才能让上述算法失效。

3. 特朗普主义（不只有特朗普本人）最不可能的后果就是回归旧常态。对特朗普主义的否定将是人们在反动年代里发明的某种新现实 —— 就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对选举政治的反思、对统治的反思、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束后的替代系统的热切构想。在这一阶段里，反思很可能是建设性力量的唯一职责；而当行动的时刻到来时，新思想将被快速付诸实践。

那么，反动时代会持续多久？在历史上的同类情况下，一次修复的尝试以及其可能性的失败需要一代到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认为历史动力学可信的话，那么，历史时间正在加速，现在向某种新范式的过渡可能会比以前快得多。当然，主观因素也很可能介入 —— 尤其是反统治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预示性政治实验和主动革命，它们会像防波堤一样切断正在崛起的反动浪潮，使其无法全面展开。当然还有其他突发的可能性，都在此框架内。但不论如何，问题的本质不会改变，那就是 —— 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不管喜不喜欢，所有人都在走向“新”的常态。一些中国人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有太多幻觉，尤其应该尽快清醒。

[image]关于本项目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image]关于本站 - 一期工程“超越民主”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 **2024**
  [image] 超越民主 - iYouPort - Initiatives & Tactics ＜Phase I＞

- **2025**

- 2026

  🎉 敬请期待！

[image]

© 2014-2024 iYouPort Ⓐ 使用说明详见介绍页

[image]
☘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 of Posts**	11
[image]	**Posts**	, [image]民主是直接的, [image]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image]从民主到自由, [image]超越权术，超越民主, [image]写在1月6日国会暴动之后, [image]民主：爱国的诱惑, [image]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image]打破共识现实：从同意的政治到革命的诱惑, [image]让我们谈谈民主，“真正的民主”, [image]历史重演：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 特朗普的法西斯卷土重来, 在全球化之后，在加速的内卷和后增长时代，推动升维斗争
[image]	说明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它不是意识形态。这一区别很重要 —— 理论意味着你掌握想法，意识形态意味着想法掌握你。不论哪种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自由主义、客观主义、还是其他什么）都是在规则名义下对个体的毁灭，这些规则通常为某些统治精英服务。这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相悖。 无政府主义其实很简单，它基于一种信仰，即：人无须生活在权威之下，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相信，以合作而不是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自下而上的秩序、用

爱和真诚编织的关系结构、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孤独和边缘的世界，是可能的。
为实现这一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将始终与任何形式的压迫性支配性的制度作斗争，不论那些制度叫什么名字 —— 识其本质，而非冠名或标签。目标清晰脚步坚定，是本站理论部分希望您共鸣的价值观，相比下术语的使用不是重要的。

[image]
[image]

民主是直接的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16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代议制 协商 参与 反统治 大会 无政府主义 权力 直接民主 自主 自由 选举 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iyp

> "一个民族一旦有了自己的代表，它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 卢梭

[image]

如今，词语似乎就像零钱一样被随手乱抛。

“民主”也不例外。

从国际或者超国家组织到某些国家、再到技术界，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称“民主化”的要求。许多人认为，“民主是好政府的标准”；还有人声称，"更多"、"更好" 或者“参与式的民主” 才是解决我们困境的良方。这些善意的但同时也是被误导了的观点的核心是一份真实的愿景：拿回我们对生活的控制权。

鉴于当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种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些隐藏的、往往还是遥远的事件和机构 —— 几乎无法描述，更不用说面对了 —— 在决定着我们是否工作、是否能喝上干净的水、是否有栖身之所。大多数人都觉得生活不如意；许多人只是抱怨 "政府"或 "公司"，但除此之外，社会苦难的根源被掩盖得如此之深，甚至表面上看

起来还挺友好：从"关怀"资本主义的本杰瑞甜筒冰淇淋到今天的诸多“绿色"版本，从西方超级大国的"人道主义"干预、到"我们可以相信变革"的总统任期。

由于真正的原因似乎无法触及、无法理解，一些人倾向于将责任推卸给假想的目标：个体而非机构、人民而非权势。替罪羊的名单特么长：从穆斯林、黑人、犹太人，到移民、非二元，等等等等。抨击那些像我们自己一样没什么权力的人要容易得多。对可见的 "他者" 的仇恨取代了针对看似无形的压迫性体系的社会斗争。对社区的渴望 —— 那种能让我们把握自己的生活，与他人分享，共同建设愿景的地方 —— 在世界各地被扭曲为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分裂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仇恨犯罪、自杀式爆炸、和种族灭绝。社群不再意味着对自我和社会的丰富认识；它被变成了一个渺小的 “我们" 与另一个渺小的 “他们" 之间的殊死搏斗，而统治的车轮碾过我们所有人。无权者践踏无权者，而权势者基本上毫发无伤。

我们只能做出一些糟糕的选择，而所有选项都是当权者为我们设定下的。齐泽克称之为 "双重勒索"。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南斯拉夫问题上使用了这一概念： "如果你反对北约的打击，你就是支持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法西斯政权；如果你反对米洛舍维奇，你就是支持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秩序”。全球经济衰退似乎需要民族国家的干预；侵犯人权似乎需要国际监管机构；如果从伦理的角度来看，正确的答案完全不在这幅图景之中，那又怎么样？当人类面临死亡或气候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时，所有这些都是空谈。至少从政府官员到新闻评论员再到普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image]

除了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呈现给我们的选项之外，就连大部分左翼人士也看不到挽救失控世界的其他 "现实" 选择。有鉴于此，左派的视野缩小到了所谓的 “可以实现的目标” 上：非政府组织或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的国际决策机构，或者全球南方国家的左倾国家元首、或者全球北方国家的巴拉克·奥巴马，再或者纠正和“绿化”资本主义的错误…… 在现行体制下，这些要求和其他要求都是最起码的要求。然而，它们与任何形式的解放性回应都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只是以“人民”的名义存在而已。因此，被冠以民主之名的仅仅是代表权，而“进步人士”和左翼人士在这种预先包装好的定义范围内所能倡导的“最好的民主”，也只不过是一个从根本上存在缺陷的制度的改良版。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一旦有了自己的代表，它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代议制 "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他人；从本质上讲，它假定一些人应该拥有权力，而其他许多人则不该拥有。没有平等分配给所有人的权力，我们就相当于放弃了与其他人一起有意义地塑造社会的能力。我们放弃了自主决定的能力，也就放弃了自由。因此，无论领导人多么“开明”，他们也都是在以暴君的姿态进行统治，因为我们 —— “人民” —— 屈从于他们的决定。

这并不是说代议制政府与更为专制的统治形式具有任何可比性。一个没能兑现普遍人权承诺的代议制显然也比一个根本不做这样承诺的专制政府更可取。然而，即使是最仁慈的代议制，也必然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与资本主义一样，国家的结构本身就包含着“不发展就灭亡”的要求。资本主义的目的是 —— 事实上，必须是 —— "不停地追求利润"。利润的驱动力和权力的驱动力必然必须是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目的本身。因为没有这些驱动力，就没有资本主义和国家；这些 "目标"是它们内在构成的一部分。因此，这两个经常相互联系的剥削和统治体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身的存在，否则它们就无法实现其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此，无论国家做什么，都必须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当然，有时国家的利益与不同群体或人民的利益不谋而合，甚至可能与正义或同情等概念相重叠。但这些重合绝不是国家顺利运作的核心，甚至不是必要条件。它们只是国家不断维护、巩固和加强其权力的工具性垫脚石。

因为，无论喜欢与否，所有国家都不得不努力争取垄断权力。米哈伊尔·巴枯宁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写道："在经济领域消灭和吞没小型甚至中型资本 ... 而有利于庞大资本 ... 的竞争，同样也在国家层面发挥着作用，导致中小型国家因帝国的利益而被摧毁和吞并”。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国家必须 "吞噬他人，以免自身被吞噬。" 这种夺权游戏几乎必然会趋向于集权、霸权，以及日益复杂的指挥、强制和控制手段。显然，在这种权力垄断的追求中，总会有被支配的主体。

因此，作为制度化的统治体系，国家和资本都是不可控的。它们也不可能被修补或变得良善。因此，任何接受民族国家和/或资本主义条

款的左派或“进步主义”活动的号召最终都只能是这样： "没有代表就没有剥削！没有代表就没有统治！"

而直接民主则与国家和资本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作为 "人民的统治"（民主的词源 dēmokratía），民主的底层逻辑本质上是不断创造自由的运动。而自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在最好的代议制中也必然被抛弃。

直接民主的反对者一般都是当权者，这并非巧合。每当人民 —— 那些被剥夺了权利、丧失了权力、甚至忍饥挨饿的“大多数”人 —— 发表意见时，通常需要一场革命才能完成关于民主价值的 "对话"。因此，作为一种直接的治理形式，民主对于那些希望统治他人的小集团来说，只能是一种威胁：无论他们是君主、贵族、独裁者，还是像美国这样的联邦政府。

[image]

事实上，我们忘记了民主在过去的伟大革命（包括美国革命）中曾经找到过其激进的优势。鉴于美国被奉为民主“灯塔”，我们似乎尤其应该回顾一下那些在美国革命中英勇奋战却最终惨败的激进民主。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在他的同名著作中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我们有希望对抗统治本身，我们就需要接手这项未竟事业 —— 为 "自由城市中的自由生活” 而奋斗，而不是接受 “国家" 作为唯一的制度形式。

这并不意味着与美国建国有关的众多不公正现象应该被忽视，或者用一个特别恰当的词来说，应该被粉饰。原住民、黑人、妇女和其他人曾经（并且现在经常继续）遭受剥削、残暴对待、和/或谋杀的事实，并不仅仅是创建美国这一历史事件的配角。任何争取直接民主的运动都必须处理好这种压迫与美国革命的解放时刻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待这场革命，并且要问：它在哪些方面是一种进步？它是否提供了新自由的曙光，而我们最终应该将这些自由扩展到每个人？与所有伟大的现代革命一样，美国革命催生了一种基于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联盟的面对面集会的政治。

“美国的民主政体是在真正的社区生活中发展起来的”，约翰·杜威在

《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指出，"乡镇或一些不大的地区是政治单位，城镇会议是政治媒介，道路、学校、社区和平是政治目标”。他们摆脱了旧世界权威的束缚，决定在《五月花号公约》中重新制定社会规则。该公约以及后来的其他许多契约都被认为是每个人对其社区的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承诺，这种承诺最初源于新发现的平等主义宗教价值观。这种想法逐渐流行起来，许多新英格兰村庄起草了自己的章程，并通过城镇会议将直接民主制度化，公民定期举行聚会，决定社区的公共政策和需求。

参与社区的辩论、审议和决策成为了充实而充满活力的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为殖民者（尽管大多数是男性，而且是定居者）提供了日后支持其革命的经验和制度，而且还提供了值得为之奋斗的自由的具体形式。因此，他们努力维护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先是与英国人争夺独立，后来又在他们之间争夺相互竞争的治理形式。当然，最终的宪法建立的是联邦共和制，而不是直接民主制。但在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城镇大会、邦联大会和民兵一次又一次地行使他们既有的自我管理权，或者在法律和法外机构中受阻时创造新的权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激进。

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继承了这种直接民主的自我教育，即使只是在模糊的回声中，如新罕布什尔州的 "不自由，毋宁死” 格言、或佛蒙特州一年一度的 "城镇会议日"。可以说这些制度和文化的碎片蕴含着许多人仍然珍视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它们继续在基层自治和自上而下的代表权之间制造着一种非常真实的紧张关系 —— 作为现代革命者，我们需要在这种紧张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这种价值观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共鸣。自由主义左派：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乌托邦社区和劳工组织实验，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权运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美洲印第安人、激进女权主义者和非二元解放运动为争取社会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对参与式民主的要求； 到20世纪70年代反核运动中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亲密团队和小组代表会组织；再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大规模直接行动。无论是原则还是实践，美国的反权威左派都是富有创造性和活力的，尤其是在战后时期。我们挑战多种 "主义"，质疑旧有的特权和危险的排斥。我们在自己的组织内创造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几乎强制要求内部民主进程，尽管并不总是奏效。我们非常擅长组织从示威到反体

制的一切活动。

这并不是要把自由主义左派过去或现在的工作浪漫化；而是要指出，我们并不乏对这个国家诞生时所依据的价值观的追求。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都是忽视了政治本身，也就是忽视了自由需要一个有保障的场所。

冲撞乐队（The Clash）多年前曾唱过 "rebels dancing on air,”（指非常开心），而我们的政治斗争似乎也是以此为蓝本的。我们可能会在街头、大楼占领期间、在我们的信息商店、在我们的集体会议上感到自由或强大，但那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而且往往是私下的感觉。它让我们能够参与政治，比如对公共政策做出反应、反对、反驳，甚至试图在公共政策之外开展工作。但它并不能让我们从事政治活动，比如制定公共政策本身。它只是让我们从那些不喜欢的东西中暂时脱离出来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解放出来”。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指出：

> 「解放和自由不是同一件事。当然，解放是一种基本需要：人们需要免于伤害、饥饿和仇恨。但解放与自由相去甚远。如果我们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如果我们要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自由地" 自我发展 —— 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

正如阿伦特所补充的那样，"[解放]甚至无法把握，更不用说实现作为自由基础的革命的核心理念了。

革命的问题变成了： 影响整个社会的决策是在哪里做出的？因为这就是权力所在。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重新发现在所有革命中自发产生的 "失落的宝藏” —— 地方理事会，以及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形式 —— 作为为每个人建立权力场所的基础。因为只有当我们所有人都有平等且持续的机会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空间（政治领域）时，自由才有机会站稳脚跟。

孟德斯鸠是对美国革命者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他在其巨著《论

法的精神》中试图探讨 "政治自由的宪法"。然而，孟德斯鸠的观念更为宽泛，触及了权力的本质。问题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没有限制的权力。或者按照孟德斯鸠的概念，问题在于权力本身被视为目的了。权力需要永远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自由需要成为对权力的限制。托马斯·潘恩就在《人的权利》一书中向美国革命提出了这一观点："旧制度下的政府是为扩大自身利益而行使权力；新制度下的政府则是为社会共同利益而授权"。

如果自由是社会的目标，那么权力就必须横向掌握。我们必须同时是规则制定者和规则遵守者，否则"统治者VS.臣民"的制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如果要让自由与权力共存，我们就必须平等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分享政治权力才能维持自由，而这种分享是通过政治体制实现的。权力不应被垄断，而应分配给我们所有人，从而让我们的各种 "权力"（理性、说服、决策等权力）得以绽放。这就是创造性的权力，而不是支配性的权力。

当然，直接民主的制度化只能保证自由社会的最基本条件。自由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新的统治形式可能总是会抬头。然而，就最低限度而言，直接民主制度开辟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聚集在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中；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有机会说服别人，也有机会被别人说服；在这个空间里，任何讨论或决定都不会被掩盖，都可以被重新审视、问责或反思。直接民主作为一种真正开放的决策机制，其基本价值包括平等、多样性、合作和尊重人的价值 —— 当我们开始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联合大会中自我管理我们的社区、经济和社会时，这些价值才有望成为自由伦理的基石。

作为一种实践，直接民主需要学习。作为一项原则，它必须成为所有决策的基础。作为一种制度，必须为之奋斗。它不会在一夜之间神奇地出现。相反，正如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所说，它将在 "使我们的共和国民主化，使我们的民主激进化" 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出现。

我们必须将政治注入我们所有的政治活动。现在是呼唤第二次 "美国革命" 的时候了，但这一次，是 打破民族国家束缚 的革命，是推倒国界、推翻主子的革命，是将自由意志主义自治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的革命，是充分赋予所有人以民主权利的革命。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重新认识民主这个词本身 —— 民主绝不是某种“更好的代表制”，相反，它是一种直接重塑人类世界的激进进程。

□

By 美国布鲁克林活动家，辛迪·米尔斯坦

[image]
[image]

无政府主义与民主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17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协商 国家 投票 无政府主义 横向联合 民主 社会结构 等级制 策略 预示性政治
[image] 编辑	[image]iyp

> "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在政府之下都没有民主或自由。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民的直接民主是唯一的自由和自治" —— 洛伦佐·科姆博

- Table of Contents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的批判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策方法
结论

[image]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运动，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统治和剥削，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合作为基础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认为，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代之以通过横向自由联合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组织结构和决策方式。

资本主义和国家都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决策权从上向下流动。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基础是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分化，少数人垄断决策权并发布命令，多数人缺乏真正的决策权，最终必须服从于上级的命令。

相比之下，横向社会结构是指人们集体自我管理，平等地共同决策的组织形态。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没有至高无上的主子，也没有卑躬屈膝的臣民。

现代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将无政府主义描述为 “没有国家的民主”。美国作家和活动家洛伦佐·科姆博（Lorenzo Kom'boa Ervin）于1993年指出："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在政府之下都没有民主或自由。

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民的直接民主是唯一的自由和自治"。在这一立场上最著名的倡导者或许可以说是大卫·格雷伯了。2013年，格雷伯表示 "无政府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民主"；相反，它将 "核心民主原则发挥到了极致"，并提出应通过 "去除等级制度的直接民主的形式” 来做出集体决策。格雷伯所说的 “民主" 是指任何基于 "充分与平等参与"的"集体协商”制度。

[image]

对直接民主的认可并不是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的普遍立场。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与民主不相容，或至少有别于民主。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民主意味着“人民”或多数人的统治，而无政府主义则主张废除一切统治制度。“无政府主义”一词本身源于古希腊文 anarchos，意思是没有统治者。在民主制度下，通过制度化的强制机制，如法律、军队、警察和监狱，在特定领土内对每个人强制执行决策。民主的捍卫者认为这种强制执行是合法的，因为决策是“民主做出的”，比如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决策过程。由于这种强制执行与无政府主义对自由结社的自治主义承诺不符，因此无政府主义并不主张民主。

主张“没有国家的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本身也赞成自由结社的自治主义。例如，格雷伯主张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只建立那些无需通过不断的暴力威胁来强制执行的相互关系"。因此，他反对任何 "有能力……召唤武装人员出现并说 '我不在乎你对此有什么意见；闭嘴，照我说的做'" 的决策系统。有鉴于此，我所研究的不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倡导相同的立场。他们都主张集体决策的方法，其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他们都认为这应该通过自愿联合来实现，反对通过制度化的强制

机制（如法律或警察）将决策强加于拒绝接受决策的人。他们只是对这些制度是否应被称为“民主”存在分歧，因为他们使用了不同的定义。

在这些辩论中，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会诉诸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他们所谓的“民主”这一事实。不幸的是，这些对无政府主义历史的诉求往往有点含糊不清，因为人们只关注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的词语，而不是他们的思想。本文不仅要解释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写了哪些关于民主的内容，还要解释他们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我本人不认为仅仅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就可以直接用来解决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的争论。我只是希望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深入了解，可以有助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以更富有成效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

[image]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的批判

历史上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只用 "民主"一词来指称政府制度的形式，这种制度至少在纸面上是以“人民”或“多数人的统治”为基础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写道："无政府主义者不接受多数人的政府（民主），就像他们不接受少数人的政府（贵族制、寡头政治或一个阶级或政党的独裁），也不接受一个人的政府（专制、君主制或个人独裁）一样"。马拉泰斯塔并没有发明这些定义。他只是在重复所谓 “西方" 政治理论中对不同政府形式的标准定义。在早期的理论家，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那里，也可以找到对多数人政府、少数人政府和单个人政府的同样的区分。这些关于不同政体的标准定义源自古希腊，包括希罗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最有名的民主政体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民主的雅典，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在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大会上以多数制做出的。政府的主要官员通过抽签随机选出。与此同时大多数人 —— 妇女、奴隶、儿童和外国人 —— 都被排除在外，在大会中没有决策权。现代的活动家倾向于认为，5世纪雅典的例子表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真正的民主是直接的民主。这样做是错误的。正如雷克斯塔德所言，在古希腊，"民主"一词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决策制度。古希腊人不像现代人这样把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进行区别；相反，他们认为一个城市只有在由其公民或至少是大多数公民统治的情况下才是民主的。

因此，只要是建立在公民集体自治基础上的城市，哪怕它们具有根本不同决策制度，也都可以被视为民主政体。

举例来说，亚里士多德不仅将公民在集会上辩论并直接投票做决策的城市称为 "民主的"；他还用 “民主"一词来指代公民仅选举掌握决策权的政府官员，然后让这些政府官员承担责任的城市制度。尽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通过抽签选拔官员是一种“民主方法”，而通过投票选拔官员是一种贵族或寡头统治方法，但他还是这样定义了。原因在于，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在确定一个城市的宪法标签时，关键问题是由哪一伙人统治。如果一个城市是由大多数市民统治的，而这些市民又是穷人 —— 即他们并不拥有很多财产，那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个城市就是“民主制”的，而与实现这种统治的决策机制无关。现代人当然可以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选举代表的公民是否能真正统治城市的观点，不过这种分歧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古希腊，"民主"一词并不仅仅指我们所说的直接民主。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民主"一词逐渐被用来指由属于政党的民选代表组成的议会所统治的政府。这些政府自称是 “人民意志的体现”。应该牢记的是，这些“民主政府”最初并非建立在普选的基础上。代表最初由成年男性有产阶级的选举产生 —— 所谓“合格选民”，他们在人口中只占少数。经过几十年的自下而上的斗争，选举权逐渐扩大到包括大多数或所有成年男子，然后，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扩大到了包括所有成年男子和妇女。在选举权逐步扩大的同时，统治者一直在试图阻止真正的普选权，比如富有的财产所有者拥有多票而非一票，再或者如美国那样阻止黑人登记投票，等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者撰文批判 "民主" 时，他们关注的是资产阶级议会的代议制民主，而不是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

历史上无政府主义对民主的批判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无政府主义者一开始就认为“人民的政府”是不可能的。民主捍卫者所说的 “人民"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真正存在。一个国家的实际人口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的，他们有着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想法、需求和愿望。如果人们永远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一致的 "人民意志"。只会有不同阶层人民的多种互不相容的意愿。政府的决定是通过法律和暴力执法者（如警察或法官）强加给国内每个人的。因此，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以 “人民" 这一抽象概念的名义将多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人的政体（马拉泰斯塔，1995年，77-8）。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种政府制度，理由是它与自由不兼容。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自由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受到支配。正如亚历山大·柏克曼所写，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你是完全自由的，其他人也享有平等的自由，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权强迫或强制他人，因为任何形式的胁迫都是对你的自由的干涉"（Berkman 2003, 156）。主张这一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说暴力总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当有必要建立或保护所有人的平等自由时，如自卫或推翻统治阶级时，暴力就是合法的。(马拉泰斯塔，2014，187-91）。然而政府的暴力远不止于此，因为它们是有权力并声称拥有专属权利通过武力将其意志强加给特定领土内所有人的机构。

无论政府是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统治，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这种统治形式。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鲁奇·加里尼的话说，即使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 是 "一种缓和的暴政形式，它仍然代表着对自由的剥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 "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我们渴望在结社自由的范围内实现个人自治，实现思想、生活、发展和境遇的独立，免受暴力、任性和多数人以及各种形式的少数人的统治"。在反对多数人统治的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多数人往往是错误的，他们的观点可能是有害的（马拉泰斯塔，2015）。例如，在一个仇视同性恋和酷儿的社会中，多数人的政府会制定压迫同性恋者的法律。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现代国家是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为，现代国家是由政治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和经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体制。这包括自诩为"民主"的政府。1873年，米哈伊尔·巴枯宁写道：

>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银行投机 ...... 与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格外般配。这种最新的国家形式基于虚假的民意的伪主权，据说是由人民的伪代表在虚假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表达出来的，它结合了其成功所需的两个主要条件：国家集权，以及主权人民对统治他们的知识分子少数派的实际服从，后者声称"代表"人民，但却无一例外地剥削人民」。（Bakunin 1990, 13）

有鉴于此，巴枯宁认为：

> 「君主制与最民主的共和制之间只有一个本质区别：在前者中，官场以君主的名义压迫和掠夺人民，为特权阶级和有产阶级谋取更大的利益，并中饱私囊；在后者中，官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压迫和掠夺人民，为同样的阶级谋取利益和中饱私囊，但却是以“人民意志”的名义进行的。在共和制中，虚构的“人民”，即所谓由国家代表的 "合法民族"，窒息了真正的、活生生的人民。即便将打压人民的棍棒称之为“人民的棍棒”，老百姓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Bakunin 1990, 23)。

马拉泰斯塔也主张同样的立场。他在1924年写道：“即使在最民主的民主国家中，也总是少数人说了算，他们用武力强加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因此，“民主是谎言，是压迫，实际上是寡头政治；即少数人的政府为特权阶级谋利“。无政府主义对民主政府的批判绝不应被理解为“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同样糟糕”。巴枯宁和马拉泰斯塔都强调过，即便是最糟糕的民主政体也比最好的君主政体或独裁政体更可取。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将“国家”分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阶级利益的机构，因此得出结论，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即多数人统治（Malatesta 1995, 73）。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这会真正实现。由于现代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等级森严的机构，统治着大片领土，因此国家权力实际上只能由少数民选代表行使。这些代表不仅仅是受命完成特定任务的代表。他们是有权力发布命令并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统治者。因此，他们将构成一个独特的政治统治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代表将被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所改变，并主要关注如何复制和扩大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权力。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谓的民主，并不是反对应在大会上做出集体决定的观点。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集体决策应在工作场所和社区集会上做出。无政府主义者用各种术语来称呼这些集会，如劳工委员会、公社、生产和消费协会。全国劳工联盟（CNT）是西班牙的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它在1936年萨拉戈萨大会决议中提出，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决策将在 "全体会议"、"公社大会"和 "人民大会”中做出（Peirats，2011, 103, 105, 107）。

历史上确实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将无政府主义称为“无国家的民主”，但他们只是少数。20世纪3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格里高利·马克西莫夫（Gregori Maximoff）拒绝接受 "资产阶级民主” 和 "苏维埃共和国” 的 "民主"，理由是：与他们所宣称的相反，它们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人民治理基础之上。相反，它们是由少数统治阶级行使权力以复制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的国家。有鉴于此，马克西莫夫主张废除国家，转而通过工作场所和社区委员会联合会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他认为这种自我管理制度是真正的民主。他写道："只有在社区联合会的条件下，真正的民主才能发展到其逻辑的极致，才能成为现实。这种民主就是无政府状态"（Maximoff 2015, 37–8）。马克西莫夫在另一个场合也曾说到，"无政府主义归根结底不过是最纯粹、最极端形式的民主"。马克西莫夫认为无政府主义是 "真正的民主"，但他并不是在提倡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结社或决策形式。他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来描述相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无政府主义社会称为 "真正的民主"，因为对他们来说，"民主"必然是指政府制度。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将 "民主"与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是与另一种名为 "社会民主主义” 的社会运动并行且对立的。虽然 "社民"一词目前已经被用来指任何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但它最初指的是一种旨在废除一切形式的阶级统治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民党人主张工人阶级应组织工会，成立参与选举政治的“社会主义政党”。社民党人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既能赢得直接的改善，如八小时工作制或禁止童工的立法，又能通过夺取国家权力和建立“工人国家”来推翻阶级社会。社民党人认为，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党将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Taber 2021）。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是提出各种反对社民党的论点，如指出试图通过征服国家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其结果是，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使用 “民主" 和 "民主主义者”等术语的主要场合之一，就是指“社会民主主义”（Kropotkin 2014, 371-82; Berkman 2003, 89-102）。

历史的一大讽刺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是最初使用 "民主"一词的人。1868年，他与朋友们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 "社会主义民主联盟"（The 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的组织，并为其撰写了一份纲领，承诺该组织的目标是废除资本主义和国家。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第一国际西班牙分会也使用了 "民主" 的语言，尽管它正式反对选举政治的策略。1871年9月巴伦西亚会议的决议宣称，"真正的联邦民主共和国是共同财产、无政

府状态和经济联盟，或者换句话说，是自由农业和工业工人协会的世界性自由联盟"。

这种语言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并不流行，到1872年，巴枯宁已经明确放弃了这种语言。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当他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并将其视为原同盟的继承者时，他决定将其命名为社会革命者同盟（Bakunin 1990, 235-6, note 134; Eckhart 2016, 355）。

[image]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策方法

在确定了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的看法之后，现在要谈谈他们对集体决策系统的看法了。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可以在大会上做出决策。要确定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究竟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可能很困难，因为这个话题并不经常出现在现存的文章、小册子或书籍中。不过，现有的资料确实确立了一些明确的立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多数表决，而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一致决定，即所有相关人员都必须同意一项提案。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根据具体情况，如组织的规模或所做决定的类型，主张两者兼而有之。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一致同意" 制度并不是用不同语言表达的现代共识决策。我没有发现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将共识的关键特征作为一个过程来使用的证据，例如协调人推动会议通过的具体步骤，或搁置和阻止提案之间的区别。

马拉泰斯塔主张将一致同意和多数表决相结合。他写道，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达成一致，如果不可能达成一致，人们就会投票，按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或者将决定权交给第三方，由第三方担任仲裁"（Malatesta n.d., 30）。这一立场是针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主张，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决定都应完全由一致同意做出，并反对使用投票。他回忆说：

> 「1893 年......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现在也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把形式误认为本质，言语对文字的强调多于对事物的强调，为自己制定了一种“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仪式感。这种仪式束缚了他

> 们，瘫痪了他们的行动力，甚至导致他们做出荒谬怪诞的断言。比如他们从 "多数派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少数派” 这一原则出发，得出了 “没有相关各方的一致同意，任何事情都不能做” 的结论。但是，由于他们谴责政治选举，因为政治选举只是为了选择统治者，于是他们认为选票不能作为意见的表达，并认为各种形式的投票都是反无政府主义的」。（Malatesta 2016, 17. 另见 Turcato 2012, 141）

据称，这种反对一切形式投票的做法导致了滑稽的局面。这包括无休止的会议，但却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也包括为了发表一篇论文而成立的小组，但却因为微小的分歧而在没有发表任何文章的情况下就解散了（Malatesta 2016, 17–8）。马拉泰斯塔从这些经历中得出结论，如果只有在 "一致同意” 的情况下才能采取 "联合行动"，那么 "社会生活” 就不可能实现。在不可能同时实施多种解决方案或有效团结需要统一行动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是合理、公平和必要的"（Malatesta 2016, 19）。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拉泰斯塔举了修建铁路的例子。他写道：

> 例如，如果正在考虑修建一条铁路，那么关于道路的线路、坡度、材料、发动机的类型、车站的位置等等，将会有无数的问题。如果不可能完全满足每个人的要求，那当然最好是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要求；当然，始终要有一项谅解，即少数人有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宣传自己的想法，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设施和材料来进行试验、展示，并努力成为多数（Malatesta 2016, 18–9）。

这并不是说马拉泰斯塔将无政府主义社会视为人们对每项决策都进行投票的社会。例如，他认为农民不需要就什么季节种植庄稼进行投票，因为这是他们已经知道答案的事情。有鉴于此，马拉泰斯塔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需要投票决定的事情会越来越少，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学习到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案（(Malatesta n.d., 30）。

马拉泰斯塔并不是唯一不同意反对所有投票制度的无政府主义者。

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期间，比利时无政府主义者乔治·托纳尔（Georges Thonar）主张与会者不应参与投票，并宣布自己 "反对任何投票"。大会记录称，这引发了 "一个小事件"。一些与会者大声鼓掌，同时也听到了热烈的抗议声"（Antonioli 2009, 90）。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随后发表了如下讲话：

> 「我不明白昨天的投票怎么会被认为是反无政府主义的，换句话说就是专制的。绝不能将大会决定程序问题的投票与普选或议会投票相提并论。我们工会在任何时候都使用投票，我再说一遍，我看不出有任何违背我们无政府主义原则的地方。
>
> 有些同志认为有必要在任何事情上提出原则性问题，哪怕是最小的事情。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反对议会制的精神，他们重视的仅仅是在盒子里放一张纸条或举手表示自己的意见（Antonioli 2009, 90-1）。」

马拉泰斯塔主张多数表决，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同感。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彼得·阿西诺夫（Peter Arshinov）在1928年写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之间的实际问题都是通过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一个决心采取行动的组织中，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Arshinov 1928, 241）。

1936年2月，全国工人大会拥有85万名会员，它同样承诺多数表决。无政府主义者何塞·佩拉茨（José Peirats）对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的决策系统作了如下解释。CNT是一个由工会组成的联合会，这些工会是 "自治单位"，"只有通过定期或特别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一般性协议"才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各个工会可以 "自由做出任何不损害整个组织的决定"。“联合会的指导方针”由自治工会自己决定和直接管理。这是通过一种制度实现的，在这种制度中，"任何地方、地区或全国性决定的基础” 都是 “工会大会，每个会员都有权参加大会，提出和讨论问题，并对提案进行表决”。这些大会的 "决议"是 "按比例代表制以多数票通过的"。地区或全国大会的议程由大会自己 "制定"。这些大会反过来对议程上的每个议题进行 "辩论"，并在达成一致意见后选出授权代表作为 "集体意志的执行者"出席大会（Peirats 2011, 5）。

主张多数表决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多数表决通过的决定是否应对决策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有约束力，还是只对投赞成票的人有约束力，存在分歧。马拉泰斯塔认为，联合会的大会决议应该只对投赞成票的人有约束力。他在1900年写道，既然联合会是一个自由协会，它就无权"强加于个别成员"，因此“任何团体就像任何个人一样可以拒绝接受任何集体决议，除非该决议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和合意的"。所以联合会大会上做出的决定应该 "只对接受这些决定的人有约束力，而且只要他们接受这些决定就有约束力"（Malatesta 2019, 210, 206）。

马拉泰斯塔在1927年重申了这一观点。他声称，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完全由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组成的组织）的代表大会 "并不制定法律”、也不会"将自己的决议强加于他人"。他们的决议只是 "提交给所有相关者的建议、提议和提案，除了那些接受这些决议的人之外，这些决议对其他人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

大会的功能在于：

> 「维护和增进最活跃的同志之间的个人关系，协调和鼓励关于行动方式方法的纲领性研究，让所有人了解各个地区的形势和每个地区最迫切需要采取的行动；整理无政府主义者中的各种观点，并从中得出某种统计数字。」

马拉泰斯塔关于大会决议的立场不应被解释为一个人可以在一个组织内为所欲为，而不考虑组织的共同纲领或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1929年，他明确指出，在一个组织内，每个成员都应 "感到有必要协调自己与其他成员的行动"，"不做任何有损于他人工作、进而有损于共同事业的事"，"尊重已达成的协议 —— 除非真诚地希望离开大会"。他认为，"没有感受到也没有履行这一义务的人应该被驱离"。

通过考察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可以更具体地了解这种关于大会决议的立场。1907年，欧洲、美国和阿根廷团体的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出席了前文提到的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大会上的提案或决议以多数票通过，每位代表只有一票。具体实施方式因决定的类型而异。在大会的第一天，代表们对议程产生了分歧。一派提议，反军国主义议题应从议程中删除，该议题应在国际反军国主义

协会的大会上单独讨论。另一派则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参加单独大会之前，必须在其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就反军国主义问题形成立场。前者赢得了33票，后者赢得了38票。由于只能执行两者之一，多数派的立场获胜，大会将反军国主义列入了议程（Antonioli 2009, 36-7。后来关于反军国主义的讨论见，137-8）。

几天来，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多项决议。这些决议对少数派没有约束力。正如荷兰代表克里斯蒂安·科内利森（Christiaan Cornelissen）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投票被用来约束少数人时投票才会受到谴责。这里的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将投票作为一种简单的手段来确定所面对的各种意见的规模"。由于几乎所有代表都反对，禁酒的决议草案甚至没有付诸正式表决。在不需要单一决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项决议，前提是每项决议都获得多数票。四项略有不同的关于工团主义和总罢工的决议获得通过就是这种情况。大会纪要对这种情况做出了回应，表示：

> 「鉴于这四项动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之处，读者可能会对它们全部获得通过感到惊讶。这违反了大会准则，但却是有意识的僭越。为了使多数人的意见不至于窒息或看似窒息少数人的意见，多数人将单项动议一一提出进行表决。所有四项动议都获得了多数赞成票。因此四项动议均获得通过。」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以多数票通过的决定应对组织的每个成员都有约束力。1926年6月，一群参加过俄国革命、为躲避布尔什维克镇压而被迫逃往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无政府主义者总联盟组织纲领》（草案）。这份文件就具体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应如何构建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包括这样一个立场，即：大会集体做出的决定应对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每个部门和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应执行多数人的决定。

纲领指出：

> 「只有在协议和联盟的所有参与者都最彻底地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并遵守集体决定的必要条件下，这样的协议和基于协议的联邦联盟才能成为现实，而不是虚构或幻想。在一个社会项目中，无论其邦联制基础多么

> 庞大，没有执行就不可能有决定。这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更不允许，因为它只对工人及其社会革命承担义务。因此，邦联主义类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承认每个成员的独立权、自由言论权、个人自由权和主动权的同时，要求每个成员承担固定的组织义务，并要求执行集体决定。」

在一个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内部，当然会出现对其纲领、战术和战略的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纲领》的作者后来澄清说，有三种主要的潜在结果：在 "分歧不大"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以维护组织的 "团结"。如果 "少数派认为牺牲自己的观点是不可能的"，那么将进行进一步的 "讨论"。讨论的最终结果要么是达成一项协议，使"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策略”共存，要么就是"分裂，少数派脱离多数派，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 (Group of Russian Anarchists Abroad 1926b, 218).

以多数票通过的决定应对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具有约束力，这并非是唯一的纲领主义立场。印在每张会员证上的CNT章程宣布："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承认多数决定的有效性"。虽然全国劳工联盟承认"个人主权”以及激进人士拥有自己的观点并为之辩护的权利，但全国劳工联盟成员 "有义务遵守多数人的决定"，"接受并同意执行多数人决定的集体授权"，即使这些决定与激进人士的 "个人情感"相悖。这一立场的理由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组织"（引自 Peirats 1974, 19-20）。

不过，CNT的成员们对于是否应将这种多数表决制（这种制度下的决定对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应用于规模小得多的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存在分歧。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是一个由亲密团队组成的特殊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些亲密团队有4到20名成员。FAI最初大多通过一致同意的方式做出决定，很少使用投票表决。1934年，Z亲密团队和Nervio亲密团队推动 FAI通过多数表决的方式达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协议。Afinidad亲密团队同意有必要在FAI内部实行这种制度，但反对在小型特定无政府主义组织或亲密团体内部实行这种制度。在一次对抗性的FAI会议后，Afinidad离开了FAI，以示抗议（Ealham 2015, 77; Guillamón 2014, 28-9）。

[image]

结论

在系统地研究了证据之后足以发现，现代和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显然主张相同的核心立场。许多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无国家的民主，而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则称之为自由联合或无政府状态。至少有一位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西莫夫，在无政府主义成为流行表述的几十年前，就把无政府主义称为“无国家的民主”。

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多数表决、一致同意或两者结合的方式做出决定。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相同的基本决策系统。主要区别在于，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经常使用协商一致的决策程序，而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使用这种程序。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应该使用民主语言的问题。在一个人们已被社会化为将“民主”自动视为“好事”的社会中，将无政府主义描述为一种直接民主对倡导来说可能是有益的。然而，这样做也有潜在的弊端，比如人们会把无政府主义混淆为社会应该由一个激进民主的“国家”来管理，这个国家在大会上做出决定，然后通过法律、警察和监狱等制度化暴力将这些决定强加给每个人。

无论我们这些现代无政府主义者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的任务也仍然与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前辈们保持着一致：在对战等级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当下的实验实践来发展结社、协商和决策的形式，以令我们既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又能 预示 一个既没有主子也没有臣民的社会 。

By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学博士，佐伊·贝克

[image]
[image]

从民主到自由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18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LGBTQI 不平等 乌克兰 代议制 公域私域 分离主义 制度 包容 参与式国家 女权主义 性别歧视 战略 投票 抗议活动 无政府主义 欲望 法西斯 消费者 电子民主 白纸 直接民主 种族主义 秩序 经济学 维稳 罗贾瓦 自治 萨帕塔 资本主义 邂逅空间 革命 香港
[image] 编辑	[image]iyp MMartinez

[image]

INTRODUCTION

您是"随大流儿"的人吗，总是追求与其他人步调一致？如果是，那您可以绕开本篇了。如果您自觉没有"合群"的精神、不愿安于主流，更追求自由和独立性，尤其如果您也绝对不是专制主义者的话，就像我，那么本篇的理论值得我们仔细思考，更好的是，去实践。—— 编者

- Table of Contents

  什么是民主
  垄断合法性
  原始民主
  代议制民主 —— 权力的市场
  直接民主：没有国家的政府？
  共识与一致统治的幻想

被排斥者：种族、性别和民主
反对自治的争论
民主解放的障碍
走向自由：出发点
横向、分权、自治、无政府状态
揭开机构的神秘面纱
创造邂逅空间
培养集体性，保持差异性
解决冲突
拒绝被统治
从民主到自由

 下载电子书版本：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mdHfKBMo3QUrXVkltpHMEeeyutcbeyB/view?usp=sharing

---

民主是当今最普遍的政治理想。乔治·布什援引民主作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奥巴马祝贺解放广场的反叛者将民主带到埃及；“占领华尔街”组织声称已经提炼出民主的纯粹形式…… 从“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到罗贾瓦自治区，几乎每个政府和民众运动都自称“民主”。

但是，解决民主问题的良方是什么呢？大家都同意：更多的民主。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新运动，承诺提供“真正的民主”，与他们所描述的排他性、强迫性和疏远性的表面化民主制度形成对比。

是否有一条共同的线索能将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民主联系在一起？究竟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民主”？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能提供与这个词本应相关联的包容性和自由吗？

在直接参与民主运动的经验的推动下，活动家们又回到了这些问题上。活动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从纽约市到白俄罗斯、从香港到印度，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巨大不平衡促使人们走上街头，这并不是特定民主制度的偶然缺陷，而是可以追溯到民主本身起源的结构性特征；它们几乎出现在历代民主政府的每一个例子中。

代议制民主保留了最初为国王服务而发明的所有官僚机构；直接民主则倾向于在较小的范围内，甚至在国家的正式结构之外，重新创造它。民主不等于自决。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好的东西都经常被描述为 “民主的”。这并不是反对讨论、组织、集会、网络、联合会，也不是反对与您并不总是同意的人合作。相反，这个论点是，当民主活动家从事这些实践时，如果您把自己所做的事理解为“民主”—— 即：是作为一种参与式政府的形式，而不是自由的集体实践—— 那么迟早我们会重现与不太民主的政府形式类似的所有问题。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都是如此，甚至共识程序也是如此。

那么， 与其把民主程序作为目的来倡导，不如让我们回到当初吸引我们走向 民主的价值观：平等主义、包容性、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命运的理念。 如果当下的“民主”不是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最有效途径，那么什么才是？

随着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冲击着当今的民主制度，这场讨论的利害关系越来越大。如果变革者继续试图用一个 “更具包容性” 的版本来取代现行的秩序，他们将继续跌回起步的地方，而其他与变革者一样感到失望的人们则将会更愤世嫉俗地倾向于更专制的替代方案 —— 这就是特朗普时代的崛起方式。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实现被当下的民主所背叛的承诺的框架。

本篇将研究连接不同民主形式的共同线索，追溯民主从古典起源到当代代议制、直接的和基于共识的变体的发展，并评估民主语话和程序如何为采用它们的社会运动服务。在此过程中也将概述直接而不是通过民主统治来寻求解放的意义。

这个项目是多年来跨国对话的结果。作为补充，会增加一些被推崇为直接民主模式的运动参与者的案例研究：西班牙的15M（2011年）、希腊宪法广场的占领运动（2011年）、美国的 “占领运动”（2011–2012年）、斯洛文尼亚的起义（2012–2013年）、波斯尼亚的全体会议运动（2014年）、和罗贾瓦革命（2012–2016年）。本站点接下来的章节将包含部分运动的详细经验介绍。

[image]

什么是民主

民主到底是什么？教科书上的大多数定义都与“多数人的统治”或“民选代表”的政府有关。而另一方面，少数激进者认为，“真正的” 民主只发生在国家垄断权力之外，并与之相抗衡。我们究竟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具有特定历史的决策程序呢，还是把它理解为对平等、包容和参与性政治的普遍渴望？

为了确定我们批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要先从这个词的本身说起。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 dēmokratía，就是 dêmos “人民” 和 krátos “权力” 的组合。这种对“人民统治”的表述，在拉丁美洲重新出现的是 poder popular，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哪些“人民”？又是什么样的“权力”？

这些词根 demos 和 kratos 暗示了所有民主的两个共同点：决定谁参与决策的方式，以及，执行决策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公民权和督察权。这些都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它们使民主成为了一种政府形式。任何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东西都更应该被描述为“无政府状态”—— 没有政府，来自希腊语 an-”没有” 和 arkhos “统治者” 的组合。

民主的共同点：

- 一种确定谁参与决策的方式；(demos)
- 一种执行决策的方式; (kratos)
- 一个合法决策空间; (polis)
- 以及维持它的资源; (oikos)

谁有资格成为 demos？有些人认为，从词源上讲，demos 从来就不是

指所有的人，而是指特定的社会阶层。即使其党派人士大肆宣扬其所谓的“包容性”，但在实践中，民主总是要求以一种方式来区分被纳入其中的人和被排除在外的人。

这类“方式”可能是立法机构中的地位、投票权、公民身份、成员资格、种族、性别、年龄或参加街头集会后被黑名单；但在每一种民主形式中，要想有“合法”的决定，就必须有正式的“合法性条件”，以及符合这些条件的确定群体。

在这方面，民主制度化了其希腊起源的省籍、沙文主义的特征，同时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可以涉及全世界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被证明与民族主义和国家如此兼容的原因；它预设了 “他者”，而 “他者” 没有被赋予同样的权利或政治机构。

在现代民主的黎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Of the Social Contract) 中，对包容和排斥的关注已经足够清晰，他强调民主和奴隶制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他提出，越是 “恶人” 被戴上枷锁，公民的自由就越完美。正如以赛亚·柏林后来所说的，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死亡。这个比喻所表达的自由的零和观念，是“国家”所赋予和保护的权利语话的基础。

换句话说：公民要想获得“自由”，国家必须拥有终极权威和全面控制的能力。 国家试图生产羊 ，为自己保留狼的地位。

> “只有在所有人类，男人和女人，都获得自由的情况下，我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相反，他人的自由远非否定或限制我的自由，而是我的自由的必要前提和确认。 ” —— 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把自由理解为累积性的，单个人的自由就变成了所有人的自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当局保护的问题，而是最大限度地增加每个人之间相互交融的可能性问题。在这个框架中，强制力越集中，自由就越少。

这种构想自由的方式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 ：它将自由视为

集体产生的与我们的潜力的关系，而不是静态的私人权利泡沫。

再来看看另一个词根，kratos。民主与贵族制、专制、官僚制、财阀制和技术官僚制共享这个后缀。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用社会中的某个子集来描述政府，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 这个共同点就是 kratos，权力。

什么样的权力？再来参考一下古希腊人的观点。

在古希腊，每一个抽象的概念都是由一个神的存在人格化的。Kratos 是一个不可侵犯的泰坦，体现了与国家权力相关的那种强制力。Kratos 出现的最古老的资料之一是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雅典民主制初期创作的戏剧《普罗米修斯的束缚》。戏剧开场，Kratos 强行押解戴着镣铐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因偷取众神的火种送给人类而受到惩罚。**Kratos** 以一个狱卒的身份出现，不假思索地执行宙斯的命令—— 一个 **“**为任何暴君的行为而生**”** 的蛮子。

【注：泰坦是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古老的神族，这个家族是天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亚的子女，他们曾统治世界，但因为他们阉割了父亲乌拉诺斯，而受到乌拉诺斯的诅咒，最终被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推翻并取代。】

Kratos 所化身的那种力量是民主与专制和其他一切形式的统治的共同点。它们有着共同的强制机构： 法律 机构、 警察 和 军队 ，所有这些机构都先于民主，并一再超越民主。

这些都是 “为任何暴君的行为而制造的工具”，无论掌舵的暴君是国王、官僚阶层，还是 “人民” 自己。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民主只是意味着人民为了人民而对人民进行的打击”。一个世纪后，穆阿迈尔·卡扎菲不无讽刺地赞许地回应了这句话：“民主就是人民对人民的监督。”

在现代希腊语中，kratos 只是“国家”的意思。为了理解民主，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政府本身。

[image]

> “就像在绝对政府中国王就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是国王。” —— 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

垄断合法性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从各种欲望的嘈杂中产生一种单一的秩序，将少数人的资源和活动吸收到多数人规定的政策中来。

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有一个合法的决策空间，有别于其他生活。它可以是议会大厦里的大会，也可以是人行道上的大会，还可以是通过智能手机征集选票的应用程序。在每一种情况下，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都不是我们人民的直接需求和欲望，而是一种特定的决策过程和协议。在一个国家中，这被称为“法治”，尽管这一原则并不一定需要一个正式的法律体系。

这就是政府的本质：在一个空间做出的决定决定了所有其他空间可以发生的事。其结果是异化 —— 决定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的摩擦。

民主有望解决这一问题，将每个人都纳入决策空间：所有人的统治。“民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无论多么间接，他们是作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服从自己。”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决定实际上都是由它们所影响的人作出的，那就没有必要采取强制执行的手段了啊……

【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没有困扰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因为他们重点保护的少数群体权利是财产所有者阶层的权利 —— 他们已经对国家机构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正如詹姆斯·麦迪逊在1787年所说：“我们的政府应该确保国家永久利益不受创新的影响。土地所有者应该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支持这些宝贵的利益，并平衡和制约其他利益。政府应该保护少数富人免

受多数穷人的侵害。”】

在这种赢家通吃的制度下，什么才能保护少数人？民主的拥护者解释说，少数派将受到制度规定的保护—— “制衡”。换句话说，控制少数群体的同一结构应该同时保护他们免受侵害.

在这种方法中，民主和个人自由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为了保护个人自由，政府必须有权剥夺每个人的自由。然而，相信机构永远比维护机构的人更好，确实是一种乐观。我们越是赋予政府权力以“保护边缘群体”，当政府权力反过来对付边缘群体时，就越危险。

您对 “民主进程应该凌驾于您自己的良心和价值观之上” 的想法有多少认同？让我们尝试一个极简的练习。想象一下，您身处一个有奴隶的民主共和国—— 比如说，古雅典，或者古罗马，或者直到1865年底的美国。您究竟是会遵守法律，把人当作财产，因为您清楚地知道，在这期间，整整几代人都可能会在枷锁中生活和死亡？还是说，您会像美国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哈里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 与美国起义领袖约翰·布朗 (John Brown) 那样，无视法律，凭着自己的良心行事？

如果您会追随哈里特·塔布曼的脚步，那么说明您 也相信 这世上有比“法治 ”更重要的东西 。对于任何想把遵守法律或多数人的意愿作为合法性的最终仲裁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image]

> “这是民主国家，不是无政府状态。我们国家有一套制度来改变规则。等你能进入最高法院时再做决定吧。”——罗伯特·斯图特曼

原始民主

在古雅典，这个被后人津津乐道的 “民主发源地”，我们已经看到了自此以后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征—— 排斥和强制。只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年男性公民才能投票，妇女、奴隶、债务人以及所有缺乏雅典血统

的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制度最多只涉及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

事实上，古雅典的奴隶制比其他希腊城邦更为普遍，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权利更少。男性公民之间的更大平等显然意味着在抵制妇女和外国人方面的更大团结。参与式政治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

我们可以从雅典人关于公域与私域 - 即城邦与家庭/polis and oikos - 的对立中绘制出这个封闭社区的边界。城邦，即希腊城邦，是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公民在这里平等互动；相比下，家庭，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男性财产所有者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 这是一个在政治范围之外的区域，但又是其基础。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家庭”代表着提供维持政治资源的一切，但又被视为理所当然在政治之外。

这些类别今天仍然伴随着这个世界。“政治/politics” (“城市事务”) 和 “警察” (“城市管理”) 这两个词来自 polis，而 “经济/economy” (“家族管理”) 和 “生态” (“家族研究”) 则来自 oikos。

民主仍然以这种划分为前提。只要在政治上存在着公域与私域之别，从家庭（以无形的、无偿的劳动来维持现行秩序的性别化的亲密关系空间）到整个大陆和民族 (如殖民时期的非洲 —— 甚至黑人本身) 都可能被置于政治领域之外。同样，自民主起源以来就作为民主的基础结构的财产制度和它所产生的市场经济，在被政治机器强制执行和维护的同时，也被置于不容置疑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主张“个人即政治”是女权主义者是对家庭与城邦二分法的拒绝。但如果将这一论点理解为 “个人也应该接受民主决策”，那就相当于只是把政府的逻辑延伸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真正的替代方案是肯定权力的多个场所，认为合法性不应局限于任何一个空间，因此家庭中做出的决定不会从属于正式政治场所中做出的决定。
[image]

“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在雅典人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想到过将所有社区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一种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权的方式做出共同决定？” —— 大卫·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

幸运的是，古雅典并不是平等决策的唯一参考点。粗略地调查一下其他社会，就会发现许多其他的例子，其中许多都不是以如此般排他性或强制性为前提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些也都理解为“民主制度”呢？

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这本书中，大卫·格雷伯引述他的同事们认定雅典是民主的起源；他推测，易洛魁人、柏柏尔人、苏拉维西人或塔伦西人的模式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只是因为他们的决策形式都不是以投票为中心的。

一方面，格雷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注重建立共识而非实行强制的社会是正确的：其中许多社会比古雅典更多地体现了与“民主”相关的最佳价值；而另一方面，我们给这些例子贴上“真正民主”的标签，同时又质疑发明这个词的希腊人的民主资质，这是没有意义的。

这仍然是民族中心主义：通过在我们自己认为的低劣的“西方”范式中给予“非西方”范例以荣誉地位来肯定它们的价值。相反，我们需要承认，民主作为一种可以追溯到斯巴达和雅典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的特定历史实践，并没有达到这些其他许多社会所设定的标准，将它们描述为“民主”是没有意义的。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描述和纪念他们，会更负责任，也更准确。

毕竟雅典被视为最初的民主国家。如果雅典之所以变得如此有影响力不是因为它有多自由，而是因为它将参与式政治成功结合到了国家权力中呢？

在当时，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社会都是无国家的，有的社会是等级制的，有的社会是横向的，但没有任何无国家的社会有 **kratos** 那样的中央集权。相比之下，现存的国家很难说是平等的。雅典人创新了一种混合形式，在这种混合形式中，水平性与排他性和强制性同时存在。如果您认为国家是可取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这听起来可能很有吸引力；但如果国家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那么古雅典的奴隶制和父权制就不是民主模式的“早期不规范”了，而是从一开始就编入

其DNA中的权力失衡的迹象。

[image]

代议制民主 —— 权力的市场

美国政府与古罗马共和国之间的相似性多于与雅典。罗马公民不是直接治理，而是选举代表来领导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随着罗马领土的扩大和财富的涌入，小农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量被剥夺财产的人涌入首都；动乱迫使共和国将投票权扩大到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然而，政治上的包容对抵消罗马社会的经济分层几乎没有作用。这一切听起来有点耳熟。

罗马共和国在凯撒夺取政权后宣告结束；从那时起，罗马由皇帝统治。然而对于普通罗马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官僚机构、军队、经济和法院的运作仍然和以前一样。

快进到18世纪的美国革命。大英帝国的北美子民对 “没有代表权的税收” 感到愤怒，他们反抗并建立了自己的代议制民主，很快就建立了罗马式的参议院。然而，国家的职能又一次没有改变。那些为甩掉国王而战的人们发现，有代表权的税收也并没什么不同。

结果发生了一系列的起义—— 谢斯起义、威士忌起义、弗里斯兰起义等等—— 都被残酷地镇压了。新的民主政府在大英帝国失败的地方成功地安抚了民众，这要归功于许多反抗国王的人们的忠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新政府显然在“代表”他们。

【“遵守法律才是真正的自由” —— 这是一个纪念镇压谢斯起义的士兵的纪念碑上写的字。 】

这类故事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临时政府的警察局长进入国王的警察局长被赶走后腾出来的办公室，拿起了他的前任刚刚放下的文件。在20世纪的希腊、西班牙和智利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中，以及近年在突尼斯和埃及，推翻独裁者的社会运动不得不继续与“民主政权”下的警察进行斗争。这就是 **kratos**，也就是

有人声称的“**DeepState**”，从一个政权延续到下一个政权，城头大王旗。

法律、法院、监狱、间谍机构、税收官员、军队、警察 —— 大多数我们认为在君主制或独裁制下才存在具有压迫性的强制权力工具，在“民主制度”下也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然而，当我们被允许对“谁监督它们”投下选票时，我们就应该把它们视为 “我们已经允许了的”，即使它们依旧被用来对付我们。这就是两个半世纪以来民主革命的伟大成就：它们没有废除国王的统治手段，而是使这些手段得到普及了。

自美国革命以来，权力从统治者向议会的转移一直在使革命运动过早地停止。反抗者没有能通过直接行动来实现他们所寻求的变革，而是将这一任务委托给了他们的新代表，继续由国家来掌舵，结果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梦想被出卖。

国家确实很强大，但有一件事它不能做，那就是给臣民带来自由。它不能，因为它的存在就来自于臣民的服从。它可以使他人臣服，它可以征用和集中资源，它可以强加费用和义务，它可以发放权利和特许权—— 作为给被统治者的安慰奖—— 但它不能提供自决权。**‘Kratos’**可以统治，但它不能解放。

代议制民主则承诺了轮流统治的机会：一种分布式的、临时性的王权，就像股市一样散漫、动态，却又等级森严。在实践中，由于这种统治是委派的，所以仍然有一些统治者相对于其他所有人拥有巨大的权力。

通常，像布什和克林顿那样的人，他们来自一个事实上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往往占据了社会所有其他等级制度的上层，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即使一个政客在平民中长大，他越是行使权力，他的利益就越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背离。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政治家的意图，而是国家机器本身。

在争夺国家强制力的指挥权时，竞争者从不质疑国家本身的价值，即使在实践中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只是国家权力靴子下的草芥。

代议制民主提供了一个压力阀：当人们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目光投向下一次选举；把国家本身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如果您想制止企业的暴利或对环境的破坏，国家本身不是唯一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力工具吗？别忘了，首先正是国家导致的这些状况。

[image]

“自由选择主人并不意味着能够废除主人，也不会废除奴隶。在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中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如果这些商品和服务维持着对劳苦和恐惧生活的社会控制 —— 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持着异化。而个人自发地复制叠加的需求并不能建立自主性，它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民主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这样了。那么自始至终伴随着“民主”的经济不平等呢？您也许会认为，基于多数人统治的制度可能会缩小贫富差距，毕竟穷人总是占多数。然而，就像在古罗马一样，民主在当今的崛起同样伴随着贫富差距的巨大鸿沟。这怎么解释呢？

就像资本主义在欧洲继承了封建主义那样，代议制民主被证明比君主制更可持续，因为它在国家的等级制度中提供了流动性。货币和选票都是以等级制方式分配权力的机制，可以减轻等级制度本身的压力。

与封建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停滞不同，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不停地重新分配权力。由于这种动态的灵活性，潜在的反叛者在现行秩序中提高自己地位的机会比推翻它的机会要更大。因此，异议往往会从内部给政治制度本身重新注入活力，而不是威胁它。

代议制民主对于政治的意义就像资本主义对于经济学的意义一样。消费者和选民的欲望由 货币 来代表，这些货币承诺赋予个人权力，但是，却无情地将最多的权力集中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只要权力集中在那里，就可以很容易地阻止、 收买 或 摧毁 任何威胁到金字塔本身的人。

【注：正如 “自由派”资本家怀疑即使是最民主的政府的活动也会干扰自由市场的纯粹运作一样，纯粹民主的拥护者可以肯定，只要存在经济不平等，富人就肯定会对即使是最精心构建的民主进程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然而，政府与经济密不可

分。市场依靠国家来落实产权，而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一种转移、合并和投资政治权力的手段：它本身就是一个代理市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有钱有势的人看到自己的利益通过民主制度受到挑战时，他们能够通过迅速中止法律来处理问题 —— 看看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和现代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可怕命运吧。在“国家”的框架内，财产始终凌驾于民主之上。

[image] “民主意味着100%的人口合作，以确保51%的选民谁有权来指挥大家去干什么。当然，在实践中，这意味着 – 我。”

在代议制民主中，就像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一样，按理说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事实上只有少数人能够脱颖而出。如果你没有赢，那一定是你不够努力！- 这也是用来为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不公正行为辩护的合理化理由：瞧，你们这些懒虫，如果你们再努力一点，你们本可以成为比尔·考斯比或者希拉里·克林顿 …… 但是，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工作，‘顶层’ 都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人。

当 ‘现实’只是透过媒体‘产生’的 ，而媒体的使用权基本 完全由财富决定 ，那么 选举就 只是 一场广告活动而已 。 市场竞争 决定了哪些游说者能获得资源以决定 选民做出选择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本质上只是一门提供立法投资机会的生意。当政治代表直接依靠他们的富人客户获得权力时，还指望他们能保护穷人那就太傻了。

[image] 一个尖锐的讽刺画面

直接民主：没有国家的政府？

就这样，人类走到了现在。非洲和亚洲都正在出现支持民主的新运动；与此同时，欧洲和美洲许多对代议制民主的失败感到失望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直接民主上 —— 从罗马共和国的模式转回雅典的前身。

如果问题被视为政府对人民的需求反应迟钝，那么解决方案不就是让政府更具参与性、让人民直接掌握权力而不是把权力下放给政客吗？

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法律而不是立法者进行投票吗？还是推翻现行政府，建立一个由联邦议会组成的新政府取而代之？还是其他的什么意思？

一方面，如果直接民主只是一种参与性更强、更耗时的“国家”试点方式，那么它可能会让人们在政府的细节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它会保留其固有的中央集权。这里有一个规模问题：比如美国，您能想象2.19亿“合格选民”直接进行美国政府的活动吗？传统的答案是，地方议会会向地区议会派出代表，而地区议会又会向全国性议会派出代表 —— 但在那里，您将再一次回到代议制民主。最好的情况是，您可以想象不需要再定期选举代表了，而是由上层颁布法令没完没了地进行一系列的全民公决。

这一设想的一个最有力的版本是数字民主，就是所谓的电子民主，由海盗党等组织推动。海盗党已经被纳入到现有的政治体系中；但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想象一群通过数字技术联系起来的民众，通过多数人的投票实时做出有关社会的所有决定。

在这样的秩序中，多数派政府将获得实际上不可抗拒的合法性；然而最大的权力很可能集中在管理这个系统的技术官僚手中。 他们对决定哪些信息和哪些问题出现在前台的 算法进行编码 ，他们将从根本上 塑造参与者的概念框架 ，比今天的 选举年政治广告 更有侵略性一千倍。

[image]

但是，即使这样的制度能完美运作，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您是否真的希望保留集权的多数统治？仅仅是参与性的事实并不能使政治进程减少任何强制性。只要多数人有能力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少数人，它就依然是一个与今天统治所谓的民主国家的制度在精神上完全相同的制度—— 这个制度同样需要监狱、警察和税收官员，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履行同样的职能。

真正的自由不是回答问题的过程有多大的参与性，而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构思问题 —— 以及，我们是否能阻止别人把他们的答案强加给我们。

在政府下运作的机构（不论是独裁的还是民选的），即便直接由多数人行使职权，其压迫性也不会少。归根结底，即使是最直接的民主国家，也更善于集中权力，而不是最大化自由。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民主是国家治理的手段。一些民主的支持者试图转变语话权，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 国家*之外才能进行，并反对国家对权力的垄断。

对于国家的反对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战略举措，因为它夺取了三个世纪以来的民众运动和自吹自擂的国家宣传赋予民主的所有合法性。然而，这种做法有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民主”本身起源于国家政府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所有我们熟悉的历史上的“民主”例子都是通过国家或者至少是由有志于治理的人进行的。人们对民主作为一套抽象愿景的积极联想是后来才有的。

第二，它助长了混乱。那些提倡民主作为国家的“替代物”的人，很少在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区分。如果你摒弃了代表制、强制执行和法治，却保留了使民主成为一种治理手段的所有其他标志—— 公民权、投票权和在单一决策结构中集中合法性 —— 你最终会保留政府的程序，却没有使其有效的机制。这结合了两个世界最坏的情况 —— 它确保了那些接近“反国家民主”并期望它发挥与国家相同功能的人必然会失望，同时造成一种情况，即反国家民主倾向于在较小范围内重现与国家民主相关的动态。

最后，这只能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如果你想用“民主”一词来指称的东西只能发生在国家框架之外，那么使用一个2500年来一直与国家政治相关的术语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歧义。

【反对意见认为，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这是经典的 “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谬论的变种。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没有一个现存的民主政体符合你对这个词的理解，那么你可能需要换一个术语来描述你想要描述的东西。这就好比共产主义者面对 20 世纪所有镇压性的共产主义政权时抗议说“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当一个想法如此难以实现，

以至于数百万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配备了相当一部分人类资源并竭尽全力，却无法产生一个可行的模式时，就该重新回到绘图板上去了。给无政府主义者十分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机会，然后我们再讨论无政府主义是否可行。】

大多数人会认为，你所说的“民主”毕竟是可以与国家调和的。这就为国家主义政党和战略在公众视野中重新获得合法性创造了条件，哪怕此前它们已经彻底失去信仰。

西班牙左翼民粹政党 “我们能/ Podemos” 和希腊民社政党 “左盟/ Syriza” 分别在巴塞罗那和雅典被抗议者占领的广场上获得了吸引力，这要归功于他们关于 “直接民主” 的言论，只是他们进入了政府的大厅，而现在他们的行为就像其他政党一样。他们仍然在做“民主”，只是更有效率和效果。

如果没有一种语言能将他们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与人们在广场上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 这个过程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

[image]

当我们把反对国家的行为确定为“民主实践”时，我们就为自己的努力被重新吸收到更大的代议制结构中奠定了基础。

“民主” 不仅是管理政府机器的一种方式，也是再生和合法化政府机器的方式。 候选人、 政党、 政权，甚至政府的形式，在明显不能解决选民的问题时，都可以不时地被替换掉。这样一来，政府本身—— 至少是其中一些问题的源头—— 就能够继续存在。直接民主只是重塑政府形象的最新方式。

即使没有人民熟悉的 “国家” 这个外套，任何形式的政府也都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决定谁能参与决策，以及以什么条件参与决策—— 简单说，谁算得上是 “民主派”。 这种规定一开始可能是模糊的，但随着一个机构的成长和风险的增加，它们会变得更加具体。

【在没有正式机构的情况下，民主组织往往通过取消在其机构

之外发起的行动的合法性并鼓励对其使用武力来执行决策。因此，就出现了抗议活动指挥者攻击示威者的经典场景，只因为示威者的所作所为事先没有“通过集中的民主程序达成一致”。（回忆香港抗议活动中“勇武派”术语的由来及前后过程；甚至，“白纸”抗议活动中呼喊政治变革口号的人如何引发自由派KOL们的色变和呵斥。）】

如果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决定—— 没有kratos —— 那么政府的决策过程就不会比人们自主做出的决定更有分量。这就是一个寻求 “无国家政府” 的项目的悖论。

这些矛盾在默里·布克钦 (Murray Bookchin) 将自由主义市政主义作为国家治理的替代方案的表述中已经非常明显。布克钦解释说，在自由主义市政主义中，一个排他性的、公开的、受法律和宪法管辖的先锋派组织将通过多数票作出决定。他们将在市议会选举中竞选候选人，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取代国家的联邦。一旦这样的联邦开始运作，即使参与的市政当局想退出，其成员资格也将具有约束力。那些试图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保留政府的人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个类似于国家的东西，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

所以，重要的区别不是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区别，而是政府与自决之间的区别。政府是对特定空间或政体行使权力：无论过程是独裁式的还是参与式的，最终结果都是施加控制。相比之下，自决意味着按照公民自己的条件管理自己的潜力：当人们共同参与时，他们不是在统治对方，而是在促进累积性的自治。

自由达成的协议不需要强制执行，而将合法性集中在一个机构或决策过程中的制度总是需要强制执行。

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国家本质上是不可取的想法是很奇怪的。这个想法的正确用词应该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排斥和统治，主张权力结构、决策过程和合法性观念的彻底分散化。这不是一个完全以参与性的方式进行治理的问题，而是使其无法强加任何形式的统治。

[image] 从广场到议会：民主是众包的国家权力

> “从严格意义上讲，从来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也永远不会有 ……人们很难想象所有人民将永久地坐在一个集会上处理公共事务。” ——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社会契约论》

共识与一致统治的幻想

如果说民主政府的共同点是公民权和督查 —— demos & kratos —— 最激进的民主将把这些类别扩大到包括整个世界：普遍公民权、社区治安。

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将是公民，每个公民都将是警察。

【理论上说，当我们将 “公民身份” 等以排斥方式界定的类别扩大到包括整个世界时，这些类别就会瓦解。但是，如果我们想打破它们，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呢，反而是在进一步使它们合法化的同时承诺打破它们？当我们用 “公民权” 这个词来描述某种理想的东西时，这就会强化这种制度在今天存在的合法性。】

【其实，英语单词“police”源于古希腊语“polis”，意为“公民”。】

在这个逻辑的最极端，“多数人的统治” 意味着协商一致的统治：不是“多数”，而是一致的统治。我们越是接近一致，政府就越是被认为是合法的 —— 那么，协商一致的统治不就是 “最合法的政府” 吗？那么，最后，就不需要任何人来扮演警察的角色了。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值得反思的是，把直接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理想化意味着什么样的乌托邦。想象一下，要产生足够的凝聚力以通过共识过程来统治一个社会，使每个人都达成共识，就是不成了极权主义了么？还是把事情弄简单点吧! 如果替代强制的办法是消除分歧，那么肯定还有第三条路。

这个问题在 “占领” 运动中凸显出来。一些参与者将大会理解为运动的管理机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没有一致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是“不民主的”。另一些人则将大会视为没有规定性权威的邂逅空间，人们可以在其中交换影响和想法，围绕共同的目标形成流动的群集来采取行动。前者认为，当他们的 “占领者” 同伴采取未经大会商定的战术时，他们感到被出卖了；后者反驳说，将否决权授予任意召集的群众，包括在街上碰巧经过的任何人，是没有意义的。

[image] 关于在占领奥克兰期间大会作用的分歧

也许答案是，决策结构必须分散化，并以协商一致为基础，这样就没有必要达成普遍协议了。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人们应该如何划分政体？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大会的管辖权或它可以作出决定的范围？谁来决定一个人可以参加哪些大会，或者谁受某项决定的影响最大？如何解决不同地方大会之间的冲突？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么将一套管理合法性的规则制度化，要么优先考虑自愿结社形式。在前一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可能会僵化，因为人们会参考协议来解决争端。在后一种情况下，决策结构将不断转变、破裂、冲突，并重新出现在难以被描述为“治理”的有机进程中。当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地退出决策过程或从事与决策相矛盾的活动时，那么发生的就不是“统治”了—— 它只是对话。

【参见康德论点：共和国是“有自由和法律的暴力”， 而无政府状态是“没有暴力的自由和法律”——因此法律仅仅是一种不会被强制执行的建议。】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关于侧重点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产生理想的“机构”，使其尽可能地具有横向性和参与性，而不是服从于它们作为权威的最终基础？或者，我们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创造的任何特定的制度都从属于自由，因此是可有可无的？

再来一次—— 什么是 合法 ，是制度还是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制度也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它们本身没有价值。任何人都不应被迫遵守任何压制其自由或不能满足其需要的机构的协议。如果每个人都能在纯自愿的基础上自由地与他人组织起来，那将是产生真正符合参与者利益的社会形式的最佳途径：因为一旦一个结构对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不起作用，他们就必须对它进行改进或替换。这种方法不会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达成共识，但这是保证共识出现时有意义和可取的唯一途径。

[image] “权力下放？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我怀疑我们是否会就其实施达成共识。”

被排斥者：种族、性别和民主

我们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支持民主的论点，理由是“民主作为最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最适合打击我们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只要统治者/被统治者、包容者/排斥者这些类别被纳入政治结构，并被编码为“多数”和“少数”，即使少数群体的数量超过多数群体，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权力不平衡也总是会反映为政治权力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妇女、黑人和其他群体尽管表面上拥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投票权，但仍然缺乏与其人数相称的政治影响力。

在《废除白人民主》一书中，已故的乔尔·奥尔森（Joel Olson）对他所谓的“白人民主”—— 通过赋予白人特权的跨阶级联盟将民主政治权力集中在白人手中的制度—— 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是最理想的制度，认为白人至上是其运作的偶然障碍，而不是其自然结果。如果民主是平等关系的理想形式，那么为什么它自出现以来就一直与结构性种族主义有牵连？

在政治被构建为零和竞争的地方，掌握权力的人将不愿意与他人分享权力。想想那些反对普选权的人和反对将投票权扩大到有色人种的白人：民主的结构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偏执，而是给了他们将偏执制度化的动力。

奥尔森追溯了统治阶级培养白人至上主义以分裂工人阶级的方式，但他忽视了民主结构借力于这个过程的方式。他认为，我们应该促进阶

级团结，以此来应对这些分裂，但（正如巴枯宁这位马克思的对立面的学者所论证的那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差异—— 想想古代雅典。种族化的排斥一直是公民身份的反面。

因此，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层面不仅仅是经济权力中种族差异的后果，它也是经济权力差异的产生。

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民族和种族分裂就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了；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财产的没收为美洲最初的殖民提供了资金，对美洲的掠夺和对非洲人的奴役为欧洲和后来北美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初的启动资金。种族分化也有可能在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转变中持续下去—— 例如，作为以白人（或犹太人，甚至库尔德人）为主的公民的排他性集会。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改良派经常说要让我们的政治制度更加 “民主”，他们的意思是要更加“包容”和平等。然而，当他们的改革以一种使政府机构更多合法化和更加强化的方式实现时，这只会在打击目标群体和边缘群体时为这些机构增添更多力量 —— 看看民权运动以来对黑人的大规模被监禁的惊人数字吧。

马尔科姆·X和其他黑人分离主义倡导者是对的，一个由白人建立的民主制度永远不会给黑人提供自由 —— 不是因为白人和黑人永远不能共存，而是，因为民主治理将政治变成了集中政治权力的竞争，造成了阻碍共存的冲突。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同意布克·华盛顿的观点，他说："种族民主的重建实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强调的是政治手段和民权法案，而不是经济手段和自决。】

如果今天的种族冲突能够得到解决，那将是通过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来实现的，而不是将被排斥者纳入“包容者” 的政治秩序。

“只要还有警察存在，您认为他们会骚扰谁？只要还有监狱存在，您

认为谁会被送去填补监狱？只要还有贫穷存在，您认为谁会穷困潦倒？相信你我可以在基于等级制的社会中实现平等，这是幼稚的。您可以随机洗牌，但仍然是同一副牌”。 —— 《改变一切》
[image]

只要我们把我们共同在政治上所做的事理解为“民主”—— 通过合法的决策过程建立的“政府”—— 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合法性被用来为那些在功能上属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方案辩护，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发言人的决定。（举例来说，回忆一下，以白人为主的大会的决策过程与许多占领团体内较少白人的营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只有当我们放弃任何政治进程本质上合法的观念时，我们才能够消除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治理特征的种族差异的最终托辞。

谈到性别问题，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了解下为什么露西·帕森斯 (Lucy Parsons)、埃玛·戈德曼 (Emma Goldman) 和其他女性革命家认为要求妇女选举权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有人会拒绝参与选举政治？简短的答案是，她们想彻底废除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更具参与性。但仔细观察，你可以发现一些更具体的原因，为什么关注妇女解放的人可能会对选举权产生怀疑。

让我们回到 polis 和 oikos 。民主制度依赖于公域和私域之间的正式区分；公域是所有合法决策的场所，而私域则被排除在外或被打折扣。纵观各种社会和时代，这种划分都带有深刻的性别特征，男性主导着公域—— 所有权、有偿劳动、政府、管理和维稳，而女性和那些不属于性别二元的人则被归入私人领域：家庭、厨房、育儿、性工作、护理工作、其他形式的隐形和无偿劳动。

由于民主制度将决策权和权力集中在公共领域，这就复制了 父权制的权力模式 。当女性被正式排除在投票和政治之外时，这一点最为明显，但即使在女性没有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她们在公共领域也常常面临非正式的障碍，同时在私人领域承担着 不成比例的责任 。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共领域，有助于使女性和不符合性别二元的人处于不利地位的空间进一步合法化。如果 “民主化” 意味着决策权从非正式和私人场所向更多的公共政治空间转移，其结果甚至会削弱某些形式的女性权力。回顾1970年代建立的基层妇女庇护所是如何通过国

家资助实现专业化的，以至于到了1990年代，创建这些庇护所的妇女甚至连在这些庇护所担任初级职位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请不能把女性正式参与公共领域的程度作为解放的指标。相反，我们可以解构公域和私域之间的性别区分，确认在关系、家庭、家族、邻里、社会网络和其他不被承认为“政治领域”的空间中发生的事。这不会意味着将这些空间正式化，或者将其纳入所谓的性别中立的政治实践，而是，将多种决策方式合法化，承认社会中的多个权力场所。

有两种方式可以应对男性对政治领域的统治。第一种是尽量使“正式的”公共空间具有无障碍性和包容性—— 例如，通过登记女性投票、提供儿童保育、设定谁必须参与决策的配额、权衡谁被允许在讨论中发言，甚至像在罗贾瓦那样，建立具有否决权的妇女专属议会。

这一战略旨在实现平等，但是，它仍然假定所有权力都应属于“公域”。

另一种办法是，确定已经赋予那些没有受益于男性特权的人以权力的决策场所和做法，并赋予他们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方法借鉴了长期以来的女权主义传统，即 优先考虑人们的生活和经验，而不是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承认多样性的重要性，重视通常看不见的生活层面。

这两种方法可以相辅相成，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摒弃 “所有合法性都应集中在单一体制结构中” 的想法。

[image]

“在所有现代的妄想中，选票无疑是最大的妄想 …… 统治的原则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人有权统治另一个人。”—— 露西·帕森斯，《选票骗局》

反对自治的争论

有几种反对意见认为，决策结构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应该

是分散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被告知，如果没有一个决定冲突的中央机制，社会就会退化为内战；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就不可能抵御集中的侵略者；还需要中央政府的机器来处理压迫和不公正。

而事实上，中央集权 既可能挑起纷争，也可能解决纷争。当每个人都必须 在国家结构上获得杠杆作用 才能对自己的生活条件进行任何控制时，这必然会产生摩擦。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曾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自主共处，殖民主义强加的在单一国家框架内争夺政治权力的要求产生了长期的种族暴力。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美国政治中也很常见—— 考虑一下早期围绕华盛顿和巴尔的摩选举的帮派战争，或者为 “流血的堪萨斯” 的斗争。如果这些斗争在美国不再常见，那并不能证明国家已经解决了它产生的所有冲突。

【注：流血的堪萨斯，是1854年至1858年之间一系列围绕奴隶制的冲突。这场冲突发生在当时未建州的堪萨斯领地和临近的密苏里州，起因是南北方支持与反对奴隶制度的双方试图争夺堪萨斯领土的控制权，以决定堪萨斯是否以蓄奴州或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冲突特点为多年的选举舞弊、突袭、袭击以及报复仇杀。这场冲突对当时美国中部的政局，以及之后美国南北战争有重要影响。】

中央集权的政府，被誉为解决争端的方式，只是巩固了自身的权力，所以胜利者可以通过武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当中央集权的结构崩溃时，就像 南斯拉夫 在90年代引入“民主”时那样，其后果确实可能是血腥的。最好情况下的集权也只能推迟纷争—— 就像 债务 不断累积利息那样。

但是，分散化的网络能够对抗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吗？如果不能，那么整个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任何去中心化的尝试都会被更多的中心化对手击溃。

答案还有待观察，但今天的集权势力肯定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无坚不摧。**2001**年，兰德公司就已经在论证，分散化的网络，而不是集中的

等级制度，将成为21世纪的权力者。在过去的20年里，从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到“占领”运动和库尔德人在罗贾瓦的自治实验，成功地为新的实验（包括民主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开辟空间的举措都是分散化的，而像“左盟”这样更为集中化的努力则几乎立即就被招安了。许多学者现在正在从理论上探讨以网络为基础的组织工作的特点和优势。

[image] 该图说明了基于分散化的和自治的网络的组织相对于代议制民主和基于集会的直接民主的优势。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 一个社会是否需要一个中央政治机构来制止压迫和不公正？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南北战争前夕发表的第一篇就职演说是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表述之一。值得详细引用：

> 分裂 的核心思想是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受到宪法的制约和限制的多数人，并且总是很容易随着大众意见和情绪的故意变化而变化，是一个自由民族唯一真正的主权者。任何拒绝多数原则的人都必然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少数人的统治作为一种永久安排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拒绝多数原则，就只剩下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了……
>
> 从物理上讲，我们不能分开。我们午发把我们各自的部分从对方身上移开，也无法在彼此间筑起不可逾越的墙。丈夫和妻子可以离婚，可以离开对方，也可以两地分居，但我们国家的不同部分不能这样做。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他们之间必须继续进行或友好或敌对的交往。
>
> 那么，有没有可能使这种交往在分裂后比分裂前更有利或更令人满意呢？外人之间能比朋友之间更忠实地执行条约吗？假设你去打仗，你们不可能一直打下去；当双方都损失惨重且任何一方都没有收获之后，你们就停止了战斗，然后关于交往条件等同样的老问题就会再次出现在你面前。
>
> 这个国家及其制度，是属于居住在这里的人民的。每

> 当他们对现有的政府感到厌倦时，他们就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来修改它，或者行使他们的革命权利来肢解或推翻它 ……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你就会得出世界政府的概念：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实行多数人统治。

林肯是对的，与协商一致的党派相反，一致的统治是不可能的，那些不希望被多数人统治的人必须在专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外人之间缔结条约不可能比朋友之间制定法律更容易，这一论点乍一听很有说服力。但朋友之间不会互相强制执行法律——法律是强加给弱者的，而条约是平等者之间缔结的。政府不是发生在“朋友”之间的事。就像“自由的人民”并不需要主权一样。

如果我们必须在专制、多数人统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做出选择，无政府状态是最接近自由的东西 —— 即林肯所说的我们推翻政府的 “革命权利”。

然而，林肯将无政府状态与南方各州的分离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在对自治进行批判，这种批判至今仍在回荡。争论说，如果不是联邦政府，奴隶制永远不会被废除，南方也不会取消种族隔离或给予有色人种民权。这些反对不公正的措施不得不由联邦的军队和一个世纪后的国民警卫队在枪口下推出。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分权似乎意味着接受奴隶制、种族隔离和三K党？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中央管理机构，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人的压迫行为呢？

这里有几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在林肯的三个选择中 —— 专制主义、多数人统治和无政府状态—— 分离主义者 所代表的是专制主义，而不是无政府状态。 同样，想象 中央政府 的机器将只用在自由的一方，那是天真的。监督南方融合的国民警卫队曾用实弹镇压全国各地的黑人起义；今天，美国 监狱里的黑人 几乎和美国 曾经的奴隶 一样多。最后，人们不必为了反对压迫而把所有的合法性都赋予一个单一的管理机构。人们仍然可以采取行动 —— 只是不能以执法为借口。

反对权力和合法性的集中化并不意味着退缩到 寂静主义 。有些冲突

必须发生，无法回避。它们源于真正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强加一种虚假的统一，只会推迟问题的解决。

林肯在就职演说中以“国家”的名义恳求暂停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拥护者之间的冲突 —— 这场冲突就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是必要的冲突，它已经因为数十年的无法容忍的妥协而被推迟了。与此同时，奈特·特纳和约翰·布朗等废奴主义者能够果断采取行动，而不需要中央政治权威 ——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有中央政治权威。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自治行动所产生的压力，联邦政府永远不会干预南方；如果有更多人像他们一样采取主动行动，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内战也没有必要发生。

[image] 《 林肯的谎言：叙事矩阵、华尔街和政府的内战 》

换句话说，问题不是无政府状态太多，而是太少。是自治行动迫使了奴隶制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民主商议。更何况，如果无政府主义的游击队员多一些，而不是多数人统治，南方白人就不可能在重建后重新获得南方的政治优势。

还有一个轶事值得一提。林肯在就职演说一年后，向一个有色人种自由委员会发表讲话，认为他们应该移民去建立另一个像利比里亚那样的殖民地，希望美国其他黑人也能跟随。关于被解放的黑人和美国白人公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 「对我们双方来说，最好还是分开 ...... 我们的人民不愿意你们这些自由的有色人种留在我们这里，尽管这很残酷。」

所以，在林肯的政治宇宙观中，白人公民的政体是不能分裂的，但只要 “oikos” 的黑奴不再承担他们被赋予的经济角色，那他们就最好还是离开吧。这就很清楚地戏剧化了整件事：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但被排斥者是可以抛弃的。如果内战后获得释放的奴隶移居非洲，他们就会及时体验到欧洲殖民统治的恐怖，仅在比利时殖民的刚果就有千万人死亡。

解决这种灾难的适当办法不是把全世界合并成一个由多数人统治的单

一共和国，而是，打击所有把人民分为“多数”和“少数”的机构 —— 将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机构 —— 无论它们自称有多么 “民主”。
[image]

民主解放的障碍

除非发生战争或奇迹，否则每个现存政府的合法性都会不断受到侵蚀；而且它只能不断被侵蚀。无论国家做出怎样的承诺，都无法弥补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生活的控制的损失。虽然我们很少见树不见林，但每一种具体的不满都凸显了这一系统性问题。

这就是民主的作用：另一次选举，另一个政府，另一个乐观的和失望的周期。

但这并不总是能安抚民众的情绪。过去十年来，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无数的运动和起义—— 从瓦哈卡到突尼斯，从伊斯坦布尔到里约热内卢，从基辅到香港，在这些运动和起义中，失望和不满的人们试图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中大多数人都围绕着更多、更好的民主标准，尽管这很难得到一致的认同。

考虑到市场和政府对我们的控制力有多大，确实很容易想象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扭转局面，去治理他们。即使是那些不相信人民有可能治理政府的人，通常最后也会拿起他们剩下的最后一件武器—— 对政府的抵抗。将抗议运动视为直接民主的实验，人们开始预示一个更民主的世界的结构。

但如果预示民主是问题的一部分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运动中很少有人能够真的对他们所反对的结构进行不可调和的抵制。

除了恰帕斯（Chiapas）和罗贾瓦（Rojava）可以说是例外，其余的所有这些运动都被击败了，重新融入了现行政府的运作（就像“左盟”、“我们能/Podemos”），或者更糟糕的是，推翻并取代了那个政府，却没有在社会上实现任何真正的改变（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乌克兰）。

当一个运动试图在与国家民主相同的原则基础上使自己合法化时，它最终会试图在自己的游戏中击败国家。即使它成功了，胜利的奖赏也是被收编和制度化—— 无论是在现有的政府结构内还是通过重新发明政府。因此，以反抗国家为开端的运动最终会重新创造国家。[image]

> “有时您会反抗，但这只是从头开始再次做同样的事。” —— Albert Libertad “Voters: You Are the Real Criminals”

这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有些运动声称自己比当局更民主，更透明或更具代表性，结果却无法履行承诺；有的运动通过选举政治上台，结果却背叛了自己的初衷；有的运动直接推行民主策略，结果是这些策略对那些寻求国家权力的人同样有用；有的运动推翻了现有政府，结果却取而代之，最终自己变成了自己曾经的敌人。让我们依次考虑每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把运动限制在大多数参与者能够事先达成一致的范围内，那就可能无法在第一时间启动运动。当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政府及其法律的合法性时，“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利做任何可能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事，不管现有权力结构有多坏。因此，一个以多数票或共识做出决定的运动可能很难同意使用除最具象征意义的策略之外的任何其他策略。你能想象密苏里州弗格森的居民召开共识会议，决定是否要烧掉 QuikTrip超市以对抗警察吗？然而正是这些行动，引发了后来被称为BLM的运动。人们通常要经历过新的事物才会对它持开放态度，将整个运动局限于大多数参与者已经熟悉的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运动是完全透明的，那就意味着让当局决定我们可以使用哪些策略。在广泛的线人渗透和监视的大背景下，如果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公开进行所有的决策就只会招致现状受益者者的残暴镇压。

并且，一个反抗机构越是公开透明，其行动就越可能是保守的，即使这与它明确的存在理由相矛盾—— 想想所有的环保联盟，它们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来阻止导致气候变化根本性原因的活动。在民主的逻

辑中，要求政府透明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应该代表人民并向人民负责。但在反抗的逻辑之外，我们不应该要求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相互代表并向对方负责，而应该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他们的行动自主权。

如果我们以“代表公众”为理由来要求合法性，我们就为当局提供了一个容易绕过我们的方法。在没有普选前，我们可以说一个运动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但现在一个选举所吸引的人，比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所能动员的人，还要多。选举的胜利者永远可以声称自己“代表”的人比参与反抗运动的人更多。

同样，声称 “代表社会最受压迫阶层” 的反抗运动，也会因为这些阶层的象征性代表进入权力大厅，进而被淘汰。只要我们认可 “代表” 的概念，一些新的政客或政党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言论上台。

【1968年5月底，临时选举的宣布打破了席卷整个法国的疯狂罢工和占领的浪潮；大多数法国公民投票支持戴高乐总统的政党的场面足以驱散所有革命的希望。这说明了选举是如何作为一种盛会，将公民彼此“代表”为现行秩序的自愿参与者。】

我们不应该声称我们代表人民—— 我们应该断言，没有人有权统治我们。

[image] 曾经中国网络上的流行讽刺。可惜这一理解似乎被局限在国境线内了。

当一个运动通过选举政治上台会发生什么？卢拉和他的劳工党在巴西的胜利似乎呈现了一个最好的情况，即 一个以基层激进组织为基础的政党掌舵国家。当时，巴西接纳了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运动，包括150万人的土地改革运动MST（“无地工人运动”）；其中许多运动与劳工党密切相关。然而在卢拉2002年上台后，社会运动进入了持续到2013年的急剧衰退。劳工党成员退出了地方组织，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而现实政治的需要使卢拉无法对他以前支持的运动作出让步。

MST运动曾迫使卢拉之前的保守派政府将许多土地占有合法化，但在卢拉时期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种状况在拉丁美洲各地反复出现，因为所谓的“激进政治家”背叛了让他们上台的社会运动。那之后巴西

最强大的社会运动是反对劳工党的右翼抗议活动。选举不是通往自由的捷径。

[image]

如果我们不追求国家权力，而是专注于推广社区大会等直接民主模式，结果会怎样？需要小心，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被滥用来服务于各种各样的议程。2012年斯洛文尼亚起义后，虽然卢布尔雅那的自发组织的社区大会仍在继续运作，但一个由市政当局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一个 “代表性不足” 的街区组织集会，作为 “振兴” 该地区的试点项目，其明确意图是吸引心怀不满的公民重新与政府对话。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人们对代议政治的普遍失望，我们看到政府提供了更多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来安抚公众。正如希腊、西班牙和智利的独裁政权被迫转型为“民主政府”以平息抗议运动一样，国家正努力收编那些原本很有可能领导反对派的革命者。如果你对政治体制的运作负有直接责任，那么当它失败时，你就只能责怪自己，而不是责怪体制本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巴西阿雷格里港到波兰波兹南都在进行 “参与式” 预算的新实验。在实践中，参与者很少能对市政官员施加任何影响；他们最多只能充当顾问，或对城市资金的 0.1% 进行投票。参与式预算的真正目的是将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失败转移到 “使政府更加民主” 的项目上来。】

2014年乌克兰革命期间，法西斯党派“自由联盟/Svoboda” 和 “右区党/Right Sector” 通过在被占领的迈丹广场举行民主集会而崭露头角。2009年，希腊法西斯党 “人民协会-金色黎明” 的成员与雅典 Agios Panteleimonas 社区的当地人一起组织了一次集会，协调性攻击移民和无政府主义者。

如果我们要促进包容性和自决，仅仅宣传参与式民主的言论和程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传播一个反对国家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权力本身的框架。

甚至明确的革命策略也可以以“民主”的名义为世界强国谋利。从委内瑞拉到马其顿，我们已经看到国家行为者和既得利益者为了缩短选举周期，将真正的民众异议引导到虚假的社会运动中。通常，目标是迫

使执政党辞职，以便用一个更 “民主” 的政府 —— 即 一个更符合美国或欧盟目标的政府—— 来取代它。这类运动通常把重点放在 “腐败” 上，暗示只要有合适的人掌权，这个制度就会运转得很好。当我们走上街头时，与其冒着成为某些外交政策炮灰的风险动员起来反对任何特定的政府，不如直接反对政府本身。

[image]

埃及革命生动地说明了民主革命的死胡同。在数百人为推翻独裁者穆巴拉克和建立民主而献出生命之后，民选使另一个独裁者穆尔西上台。一年后，也就是2013年，一切都没有改善，发起革命的人民再次走上街头，拒绝民主的结果，迫使埃及军方废黜了穆尔西。

而今天，军方仍然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激发两次革命的同样的压迫和不公正仍在继续。军方、穆尔西和反抗的人民所代表的选择与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描述的一样：暴政、多数派统治和无政府状态。

在这里，在与贫困和压迫斗争的最极端之处，我们总是直接与国家本身对抗。只要我们屈服于被统治，国家就会根据需要在多数人统治和暴政之间来回转换 —— 这是同一基本原则的两种表现形式。

国家可以有多种形态，就像植被一样，它可以枯萎，然后从根部重新生长。它可以采取君主制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可以采取革命专政或临时理事会的形式 ……当当局仓皇而逃、军队叛变时，国家仍然可以像一个细菌一样继续存在，秩序的粉丝和礼仪的拥护者最容易携带国家主义的细菌，在哪怕是看起来“水平”的大会上。 所有这些形式，无论多么“民主”，都可以再生为一个能够粉碎自由和自决的政权。

避免合谋、操纵和机会主义的一个可靠的方法是拒绝使任何形式的统治合法化。当人们通过灵活的、横向的、分权的结构直接解决问题并满足需求时，就没有领导人可以腐败，也没有正式的结构可以僵化，没有单一的程序可以被劫持。

取消权力的集中，那些想夺取权力的人就无法得逞。一个无法治理的民族可能需要抵御潜在的暴君，但他们永远不会将自己的力量置于统治之下。

[image]

走向自由：出发点

民主的经典辩护是，它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 —— 除了所有其他形式之外。但如果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原点。

重新想象没有政府的人类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程；两个世纪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也只是从表面上看。为了进行分析，我们将总结出一些可以指导我们超越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以及一些关于如何理解我们可以做什么以取代政府治理的一般性建议。大部分的工作还有待完成。

“无政府主义不是民主的最激进形式，而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范例。”———Uri Gordon, Anarchy Alive!
[image]

横向、分权、自治、无政府状态

仔细审视，民主并没有达到当初吸引我们的价值观念 —— 平等主义、包容性、自决。除了这些价值观，我们还必须加上横向性、分散化和自主性，作为前者不可缺少的对应物。

自20世纪末以来，横向性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萨帕塔起义开始，并通过反全球化运动和阿根廷的反叛运动获得了动力，去中心化结构的想法甚至已经蔓延到了商业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陷入多数人的暴政 —— 即 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就某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此事无法启动 —— 那么去中心化与横向化同样重要。权力下放不是所有机构都必须通过的单一程序，而是，意味着多个决策场所和多种形式的合法性。这样一来，当权力在一种情况下分配不均时，它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平衡。

权力下放意味着保持差异 —— 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运动和社区力量的源泉，就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我们既不能以“亲密团队”为借口将自己隔离成完全同质的小圈子，也不能将我们的政治降低到最低共同点。

权力下放意味着自治 —— 能够主动自由地行动。自治可以适用于任何规模的层面—— 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运动、整个地区。要想获得自由，你需要能控制你周围的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你越是能自给自足，你的自主性就越有保障。

这当然不一定意味着独自一人实现自己的所有需求，它更多意味着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让你能够对你依赖的人施加影响力。

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应该能够垄断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关系的建立。一个提倡自主的社会需要工程师所说的冗余：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广泛的选择和可能性。

如果我们希望促进自由，仅仅肯定自治是不够的。民族国家或政党可以主张自治；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可以主张自治。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是自治的，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与他人培养的关系是平等的还是等级的、是包容的还是排他的。 如果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享有自治权，而不是只为自己谋求自治，我们就必须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人能够积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制度权力。

我们必须制造无政府状态。

[image] 伊斯坦布尔2014盖齐起义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揭开机构的神秘面纱

机构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相反。它们没有要求我们服从的固有权利。我们永远不应赋予它们比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更多的合法性。当我们的愿望与他人的愿望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看看制度化的程序是否能够产生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一旦我们赋予一个机构裁决我们的冲突或支配我们的决定的权利时，我们就等

于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这不是对某一特定组织模式的批评，也不是主张 “非正式” 结构优于 “正式” 结构。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模式都看作是临时性的，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评估和重塑它们。

在托马斯·潘恩想把法律奉为王者的地方，在卢梭把社会契约理论化的地方，以及近来资本主义的狂热者梦想着一个仅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的地方，我们反驳说，当关系真正符合所有参与者的最佳利益时，就不需要法律或契约了。

同样，这也不是赞成单纯的个人主义，不是赞成把关系视为可消耗的，更不是赞成只与那些与自己有相同偏好的人组织起来的同温层圈子。在一个拥挤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拒绝与他人共存或协调。问题的关键只是，我们不能寻求立法关系。

与其听从蓝图或协议，我们可以不断地 评估制度 。它们是在奖励 合作 呢还是在奖励 竞争 ？它们是 分配代理权 呢还是制造权力瓶颈？它们是否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了按自己的条件发挥潜力的机会？还是强加了外部的要求？它们是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促进冲突的解决，还是 惩罚所有 违反成文制度的人？
[image]

创造邂逅空间

我们提议用各种邂逅空间来取代集中决策的正式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敞开心扉，接受彼此的影响，找到与他们有共同优先事项的人。相遇意味着相互转变：建立共同的参照点、共同的关注。

邂逅空间不是一个被赋予权力为他人做决定的“代表机构”，也不是一个采用多数规则或共识的“管理机构”。它是一个机会，让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行事。

在2001年魁北克市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首脑会议的示威游行之前，紧

接着举行的发言人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邂逅空间。这次会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自治团体，它们聚集在一起，抗议自由贸易区。与会者没有试图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是介绍了各自团体准备的倡议，并尽可能地协调互利。许多决策是在随后的非正式小组间讨论中进行的。

通过这种方式，数以千计的人能够在不需要中央领导的情况下协调他们的行动，也不需要让警方对即将展开的一系列计划有太多的了解。如果邂逅空间采用旨在实现“团结和集中化”的组织模式，参与者可能会整晚无果地争论目标、战略以及允许哪些策略。

过去20年的大部分社会运动都是混合模式，将邂逅空间与某种形式的民主并列。例如，在 “占领” 运动中，营地作为开放性的邂逅空间，而大会的正式目的是作为直接的民主决策机构。这些运动大多取得了最大的效果，因为它们所促进的邂逅为自治行动提供了机会。如果我们把邂逅作为这些运动的推动力呢，而不是作为通过“民主程序”来塑造的原材料，那么它可能会帮助我们优先考虑我们最擅长的事。

无政府主义者因与民主语话的矛盾而受挫，有时会退缩，仅根据已有的亲密关系来组织自己。然而隔离会滋生停滞和分裂。最好的办法是根据我们的条件和需要来组织，这样我们就能与所有其他有相同条件和需要的人接触。

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理解为 动态集体中的节点 ，而不是拥有静态利益的离散实体时，我们才能理解人们在 “占领运动” 等活动中所经历的快速蜕变 —— 如果我们敞开心扉，这种相遇就有巨大的力量来改变我们。

培养集体性，保持差异性

如果没有任何机构、合同或法律能够支配我们的决定，那么我们如何商定我们对彼此的责任呢？

有人建议区分 “封闭式” 团体和 “开放式” 团体，前者的参与者同意为自己的行为向对方负责，后者则不需要达成共识。但这就引出了一个

问题：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如果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我们只对我们的同伴负责，直到我们选择离开这个群体，而且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这与参加一个开放的群体就没什么区别了。同时，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参与了一个封闭的群体，共享着一个不可逃避的空间：即 地球。因此，这不是一个区分我们必须对彼此负责的空间和我们可以自由行动的空间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在每一个范围内促进责任感和自主权。

为此，我们着手在社会的各种层面上创造互利协助的集体 —— 人们相互认同并有理由为对方做正确的事的空间。这些集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住房合作社、到社区大会、再到国际网络。

同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根据亲密关系和相互依存对参与者的有益程度，不断地对这些集体结构进行重新配置。当一种配置必须改变时，把不一定是失败的标志：相反，这至少表明参与者没有争夺霸权。与其将团体决策视为“追求一致”，我们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空间，随着不同社会群体的融合和分歧而产生差异、发生冲突和发生转变的空间。只要有正当理由，分歧和分离与“达成一致”同样可取；组织人数较多的优势应该足以阻止人们无端地分裂。

我们的机构应该帮助我们消除分歧，而不是压制或淹没分歧。从罗贾瓦回来的一些观察家报告说，当那里的集会无法达成共识时，它就会分裂成两个机构，在它们之间分配资源。如果这是真的，它提供了一种自愿联合的模式，是对普洛克路斯忒斯式民主的巨大改进。

解决冲突

有时，分成不同的群体不足以解决冲突。为了摒弃集中化的强制力，我们必须想出解决纷争的新方法。反对国家的人之间的冲突是维护国家至高无上地位的主要资产之一。如果我们想创造自由的空间，我们就不能变得如此分裂以至于我们无法捍卫这些空间；我们也不能以制造新的权力不平衡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墨西哥自卫军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墨西哥一些地区

抵御与政府职能相同的贩毒集团，但最终却陷入了帮派战争。】

民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投票、法院和警察都是为了“判定”冲突，但不一定能“解决”冲突；“法治”实际上强加了一种赢家通吃的模式来解决分歧。通过集中权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迫使争斗各方即使在相互不能接受的条件下也暂停敌对行动。这使它能够压制干扰其集中化控制的纷争形式，如阶级之间的战争，同时助长破坏横向联合和自主抵抗的冲突形式，如帮派战争。如果不考虑到国家结构挑起和加剧暴力的方式，我们就无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和种族暴力。

当我们赋予机构固有的合法性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解决冲突的借口，而是 依靠国家的干预 。它给了我们一个离场的借口， 以武力解决争端 ，并将那些在 结构上处于弱势 的人排除在外。最终我们不是主动直接解决问题，而是争权夺势。

如果我们不承认国家的权威，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借口：“我们必须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否则就要承受持续纷争的后果”。这让我们有动力去认真对待各方的需求和看法，去发展化解紧张局势的技能。不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同意，但我们必须找到不产生等级、不产生压迫、不产生无谓的对立的分歧解决方式。这条路上的第一步就是：消除国家提供的不解决冲突的激励机制。

不幸的是，许多曾经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冲突解决模式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被古雅典和罗马的法庭系统强行取代了。我们可以从变革性司法的实验模式中看到我们必须发展的替代办法。

[image] 图中这两本书在这里下载：https://www.patreon.com/posts/tao-bi-tong-zhi-41662369

拒绝被统治

在设想一个横向的和分权的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时，我们可以想象重叠的集体和集会网络，人们在其中组织起来，以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 食物、住房、医疗、工作、娱乐、讨论、友谊。由于相互依存，

他们会有充分的理由友好地解决争端，但谁也不能强迫其他人留在一个不健康或不满足的安排中。为了应对威胁，他们会动员起来，组成更大的临时组织，利用与世界各地其他社区的联系来实现防御。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很多无国家社会都是以这样的模式存在的。今天，这样的模式继续出现在土著社区、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交汇处。

这让我们回到了本议题的起点—— 现代希腊雅典。在这个民主最早诞生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现在在无政府主义的旗帜下“再次”组织起来，形成横向的、分散化的网络。他们的结构取代了古代雅典公民身份的排他性，而是广泛而开放的；他们欢迎逃离叙利亚战争的移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实验必须发展否则会消亡。

他们寻求维持一种权力分散的分配方式，以取代强制性的政府机构，并通过集体团结来加强这种权力分配。他们不是联合起来强加多数人的统治，而是通过合作以防止统治本身发生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种“过时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个长期错误的终结。

“多数人有权统治少数人的原则，实际上把所有政府都变成了两部分人之间的较量，即哪一部分人是主子，哪一部分人是奴隶；只要人们拒绝做奴隶，这场较量 —— 无论多么血腥 —— 就其本质而言，它永远不会最终结束"。—— 莱桑德·斯普纳 (Lysander Spooner)，《并非叛国》
[image]

从民主到自由

让我们回到起义的高潮。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以新的形式找到彼此，提供了一种陌生但令人振奋的机构感。突然间，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言语和行动、思想和感觉、个人故事和世界事件。确定性 —— 我们终于感觉到了家的感觉 —— 和不确定性：终于有了一个开放的地平线。我们一起发现自己有能力做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事。

这种时刻的美丽之处超越了任何政治制度。冲突与意外共识的闪现一样重要。这不是民主的运作，而是自由的体验—— 集体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任何一套程序可以将其制度化。这是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从习惯和历史的钳口中挣脱出来的奖赏。

下一次机会之窗打开时，与其再次重塑“真正的民主”，不如让我们的目标成为自由，自由本身 。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超越权术，超越民主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19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亿万富翁 代议制 投票 无政府主义 民主 法治 爱 直接行动 米兔 自治 自由 资本主义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iyp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社会变革。一种是彻底废除现有制度，从头开始。另一种是假定它们本质上都是好的，只要它们能够扩大到"更具包容性"，就可以为每个人服务。后者是改良派，前者是我们。 - iyp

- Table of Contents

“每个小孩长大后都有机会当总统”
多数和少数
法治
谁是输家？
资本主义与民主
自由没有出现在选票上绝非偶然
代议制是一个矛盾
但民主的替代方案是什

么？
协商共识
自治
无首联盟
直接行动
有分歧？无需报警！
过自己的生活，无需任何人的许可
附录： 一则寓言

[image]

如今，民主统治着世界。共产主义早已消亡，即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在举行选举，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在忙着开会以规划我们经常听到的 "全球社会"。那么，为什么最终不是每个人都快乐呢？为什么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国家的合格选民却很少去投票？

长期以来，民主一直都是每场革命和反叛行动的口号，难道这个世界真的不够民主吗？问题出在哪里？

https://youtu.be/xIraCchPDhk?feature=shared

“每个小孩长大后都有机会当总统”

不，不会的。当总统意味着占据着等级森严的权力地位，就像当亿万富翁一样：每有一个人“当上”总统，就会有数百数千万人“当不上”总统。亿万富翁和总统往往亲密交往这绝非巧合；他们都存在于一个特权世界里，与我们其他人无缘。说到亿万富翁，我们的经济并不完全民主 —— 资源分配的比例极不平等，如果你想“当选”，就必须从资源入手。

即使任何人都能成长为总统，也无助于数百数千万必然无法成为总统的人，他们仍然必须生活在这种权力的阴影之下。这种不平衡是代议制结构所固有的，不论在地方还是在高层都是如此。镇议会的职业政客们整天讨论市政事务并通过各种法令，却不征求必须实地工作的市民的意见；当其中某项法令令市民不满时，他们不得不利用仅有的闲暇时间提出异议，然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上直到下次镇议会开会。从理论上讲，市民们可以从现有的政客和潜在政客中选举出另一个不同的

市议会，但政客们作为一个阶层，其利益始终与市民自身的利益存在本质上的冲突 —— 此外，投票舞弊、不公正选区和愚蠢的党派忠诚通常都会阻止人们走到这一步。即使在一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即 选举出一个由一心想要消除政客与公民之间权力失衡的火枪手组成的全新政府，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通过接受系统中的角色来延续这种失衡 —— 因为政治机器本身就是以这种失衡为基础的。

要想成功实现目标，他们就必须解散政府，与其他民众一起从根本上重构社会。

但是，即使没有总统或市议会，我们所熟知的“民主”也仍然会成为自由的障碍。撇开腐败、特权和等级制度不谈，多数人的统治不仅具有内在的压迫性，同时还具有极化分裂和同质化并存的矛盾性。

民主制度将政治参与局限于孤立隔绝的投票站，使人们无法学习如何行使权力和集体解决冲突。
[image] 显然，至少无政府主义者和所有那些被封锁账号的人都被认为不是“人民”

多数和少数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是“少数”，而“多数人”投票决定你必须放弃像水和空气这类对你的生命至关重要的东西，你会服从吗？从根本上说，难道有人真的认为仅仅由于一个群体的人数比其他群体更多就应该接受他们的权威吗？我们接受多数人的统治，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它会威胁到我们 —— 而那些确实受到威胁的人在有机会阐述疑虑之前就已经被压制住了。

自认为 “遵纪守法” 的普通公民并不认为自己会受到多数决制的威胁，因为无论自觉与否，他都觉得自己听合群的、拥有多数人的权力和道德权威：如果不是由于这个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确实很 "温和" 的话，那就是因为理论上他真的相信只要自己有机会提出论点所有人就都能被他的论点所 “说服”。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一直以来都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即 如

果所有事实都为人所知，那么每个人都能明白只有一种正确的行动方案 —— 如果没有这种信念，那么民主制度不过是群体专政罢了。但是，即使"事实”可以对每个人来说都同样清楚，假设这种事情是可能的，不同的人仍然会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动机和需求。我们需要的是能考虑到这种差异性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 在这种结构中，我们既能摆脱多数人的统治，也能摆脱少数特权阶级的统治。

[image]

生活在民主统治下的人们学会了从数量的角度思考问题，学会了更多地关注公众舆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良知，学会了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跟随主流的脚步。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根源于竞争：竞争是为了说服其他人支持你的立场，不论这是否符合他们各自的最大利益；竞争是为了在其他人击败你之前形成“多数”，从而掌握权力 —— 而失败者（即“少数”）将受到诅咒。

与此同时，多数人统治迫使那些希望获得权力的人诉诸最低公分母，从而引发了一场逐底竞争，奖励那些最平淡、最肤浅、最擅长蛊惑人心的人；在民主制度下，权力本身就与一致性而非个性联系在一起。权力越是集中在多数人手中，任何个人能做的事情就越少，无论她/他是在“多数”之内还是之外。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声称要给“每个人”参与的机会，这就为压制那些不遵守其规定的人提供了完美的理由：如果他们不喜欢现在的政府，为什么不自己参政呢？如果他们没有在多数派掌权的游戏中获胜，难道就没有机会吗？这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 "受害者" 推理如出一辙：如果洗碗工对自己的工资不满意，他就应该更加努力工作，这样他就也能拥有一家连锁餐厅自己去做老板。当然，每个人都有参与竞争的机会，无论多么不平等 —— 但对于我们这些不想参与竞争、一开始就不想把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的人来说，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想成为统治者也不想要被统治呢？

这就是警察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法院、法官和监狱发挥作用的地方。

□

因此，政治冲突可以被视为同一经济阶层内部的人们之间的分歧，而不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歧。

[image] [image]

法治

即使你不相信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任何地方出现的不合规现象，你也必须承认，法律制度并不能代替公平、相互尊重和善意。股东和地主所崇拜的“公正平等的法律”规则并不能保证不出现不公正现象；它只是创造了另一个专业化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权力和责任被让渡给了昂贵的律师和傲慢的法官。这种安排非但起不到保护社区和解决冲突的作用，反而会确保造成我们社区解决冲突和自卫技能的萎缩，而那些本应以阻止犯罪为己任的人却与犯罪泛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依赖于犯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跟你说，我们“需要”这些机构来“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 尽管法院的隐含职能充其量只是将多数人的立法强加于少数人。实际上，只有当一个人能够以法院认可的“货币”向法院施加足够的力量时，他才能够利用法院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由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从一个迂回的角度来看，法院的存在的确是为了保护至少是少数人的权利。

仅仅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是无法实现正义的；这些法律只能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规则制度化。常识和同情心永远优于执行严格、不近人情的规定。如果法律是精英阶层的私事，他们只想让法律永存，那么有理智和同情心的人最终必然会成为被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培养和奖励这些品质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盲目服从和无动于衷。

资本主义＋民主 ＝ 一块钱，一票
[image]

谁是输家？

与每个人的需求都受到重视的决策形式不同，剥夺失败者和外来群体的权力是民主的核心。众所周知，在被誉为 "民主摇篮” 的古代雅典，由于妇女、外国人、奴隶和其他人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几乎只

有八分之一的人口被允许投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属于“早期的弊端”，时间一长弊端就被消除了，但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 排斥本身就是民主最基本、最持久的特征：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数百万人仍然不被允许投票，而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别在 2500 年里并没有明显的削弱。每个资产阶级都能想出千百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让所有受影响的人都来参与决策是不切实际的，就像没有任何老板或官僚会梦想着让他的员工在工作场所享有平等的发言权一样。如果民主在希腊的出现不是作为 “人类迈向自由的一步”，而是作为防止权力落入某些人手中的一种方式，那会怎样？

民主是维持有权势者与无权势者之间分化的最可持续的方式，因为它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动力去捍卫这种分化。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的最高水平 ——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 —— 与资源和权力分配的空前不平等密切呼应。独裁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你也许可以屠杀、囚禁和洗脑整整几代人，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将寻求任何时机重新为了自由奋起反抗。但是，如果你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当权者，能够把 "多数人的意愿” 强加给他的同伴，而不是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那样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那么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破坏性的利己主义的共同阵线，抵制了任何使个人自由成为可能的协作。如果周围有更多的专制独裁政权作为 "对比"，那就更好了，这样就可以用“自由”的口号来美化这一切。

[image]

资本主义与民主

好吧让我们暂时搁置对民主的疑虑，考虑一下，如果民主是人们分享生活权力的有效手段，它是否能与资本主义兼容。在民主制度下，知情的公民应该足够开明地根据他们自己的自身利益来投票，但除非富有的高管，谁又能控制信息流呢？他们不可能不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来调整报道的内容，这也难怪他们 —— 那些不惜疏远企业广告商的报纸和电视网早就被眼里只有钱的竞争对手给挤垮了。

同样，投票意味着在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根据哪种可能性看起来最可取 —— 但除了政治机构的富豪元老们及其他们在广告和公关公司的外甥们之外，谁来设定选项呢？谁来确定什么被认为是可能的，谁来

构建欲望本身？在美国，两党制使政治沦为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而这“两害”都首先要对其资助者负责。当然，两党在压制个人自由或花多少钱买炸弹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们是否有机会投票决定由谁来控制商场等 "公共"空间，或者工人是否有权获得其全部劳动成果，或者任何其他可能严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进程的基本功能就是将可能出现的情况限制在公职候选人辩论的狭窄范围内。这打击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士气，使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无能的空想者 —— 实际上没有什么比相信有产阶级的代表能解决由他们自己的统治所造成的问题更空想的了，也没有什么比接受他们的政治制度作为“唯一可能的制度”更无能的了。

归根结底，即便是最透明的民主政治进程也总是会被财产所有权等经济问题所压倒。即使我们能把所有人，包括资本家和囚犯，全都召集到一个巨大的大会中，又有什么能阻止统治市场的相同动力蔓延到这个空间呢？只要资源继续分配不均，富人就总能收买别人的选票：或者就通过字面意思，或者通过向他们许诺分一杯羹，或者通过宣传和恐吓。恐吓甚至都是隐晦的 —— "那些激进分子想夺走你辛辛苦苦挣来的财产"，当然也可以是公开的，就像十九世纪选举活动中伴随的血腥帮派战争那样。

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民主也只能在那些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并放弃其奖励的人中间发生，才能达到其所声称应该达成的目的 —— 在这些圈子里，有比多数决制更有意义的替代方案。

[image]

自由没有出现在选票上绝非偶然

自由是一种活动的品质，而不是一种存在于真空中的条件：它是一种每天都要赢得的奖赏，而不是一种可以放在地下室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擦亮以公之于众的财产。自由是无法给予的 —— 你最多只能希望将他人从阻碍他们找到自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真正的自由与投票无关；自由并不意味着仅仅能够在不同的选项中做出选择，而是，首先能够积极地参与确立选项。

如果几代人为之奋斗并献出生命的自由的最佳例证是一个人在投票亭里勾选选票上的一个方框，然后一扭头就回到他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

环境中继续去工作，那么我们的解放先辈和女权运动祖母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就只不过是他们当年所追求的“自由”的虚假替代品。

要想更好地诠释真正的自由，可以看看音乐家与她的同伴们即兴演奏时的情景：他们在愉悦的、看似毫不费力的合作中创造了一个声音和情感的环境，改变了世界，而世界也反过来改变了他们。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我们每个人之间的互动中，你就会得到与我们现有系统截然不同的东西 —— 人际关系和活动中的协调。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放弃投票这一自由和参与的典型表达。

[image]

代议制是一个矛盾

没有人可以代表你的权力和利益 —— 你只有通过行使权力才能拥有权力，你只有通过亲自去参与才能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政客们以声称“代表”他人为职业，仿佛自由和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代理来掌握；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祭司阶层，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我们被剥夺了权利。

在选举中投票是我们无能为力的表现：这是承认我们只能通过祭司阶层的调解来接近本就该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资源和能力。当我们让他们为我们预制选项时，我们就把社区的控制权交给了这些政客，就像我们把技术交给工程师、把医疗保健交给医生、把我们生活环境的控制权交给城市规划者和私人房地产开发商那样。我们最终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里，尽管这个世界是由我们的劳动所创造的，而我们就像梦游者一样，被那些自称的领导者和专家垄断的可能性所催眠。

[image] 《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研讨》

事实上我们本不必需在总统候选人、软饮料品牌、电视节目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做出简单的选择。我们可以作为个人和社区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们可以制作自己的美味饮料、社会结构和权力，我们可以在自由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有时，一位候选人的出现道出了人们长久以来的心声 —— 他似乎从

政治世界之外出现，真正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批判了制度本身的逻辑，巧妙地说服人们，“制度是可以改革的 —— 只要有合适的人掌权，制度就能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原本用于挑战制度本身的大量精力就被转用于支持另一位候选人竞选公职了，而后者却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但是，这些候选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想法和动力 —— 从何而来？他们是如何成为焦点的？他们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民众的情绪；通常情况下，他们明确试图从现有的基层运动中转移能量。那么，我们是应该把精力放在支持他们这些人上呢，还是放在加强当初迫使他们采取激进立场的革命势头之上？

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被可能由最糟糕的候选人执政的前景所恐吓，不得不关注选举场面。"如果他上台了怎么办？" 想到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怎么办！

但问题是，政府首先就拥有如此大的权力 —— 否则，谁掌权就不那么重要了。只要情况继续，暴君就永远存在。正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将精力投入到 反对国家权力的持久解决方案 中。

[image]

但民主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协商共识

从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社区、欧洲的直接行动团体、到澳大利亚的有机农业合作社，全球各地都已经在实行基于共识的决策。与代议制民主不同，参与者持续参与决策过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使真正的控制权。

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不同，共识过程平等重视每个人的需求和关切；如果一个人对决议不满意，那么每个人都有责任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新解决方案。基于共识的决策并不要求任何人接受他人对

自己的控制，尽管它确实要求每个人都考虑其他人的需求；它在效率上的损失在自由和责任方面得到了十倍的弥补。

适当的协商共识过程不是要求人们接受 领导力 或通过 同质化 找到共同事业，而是将每个人整合成一个工作整体，同时允许每个人保留自己的自主权。

代表权 ≠ 自决权
[image]

自治

要获得自由，你必须能够控制你周围的环境和生活中的基本事务。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了；除非你邀请别人来代理，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对你的时间和潜力进行投票。为自己争取这些特权并尊重他人的这些特权，就是培养自主权。

自主不能与所谓的独立混为一谈：实际上，没有人是纯粹“独立/孤立”的，因为我们彼此的生活都相互依赖。 在 竞争激烈的 社会中，对自给自足的美化是一种暗中指责那些不愿剥削他人的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的方式；因此，它是建立社区的最大障碍之一 。 与成功学幻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自由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共识。

自治是官僚主义的对立面。没有什么比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行动更有效率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试图从上而下对每个人的行动发号施令更低效的了，除非你的根本目标是控制其他人。自上而下的协调只有在必须迫使人们去做他们绝不会主动去做的事情时才有必要；同样，强制性的统一，无论如何横向强加，都只能通过削弱组成团体的个人的权力来增强团体的权力。除非参与者保留自主权，否则共识与民主一样具有压制性。

只要每个人都能从其他人的参与中获益，自主的个体就可以在不就共同议程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因此，合作的团体可以包含冲突和矛盾，就像我们每个人单独所做的那样，并且仍然赋予参与者权

力。让我们把在举着同一面旗帜齐步走的活儿留给军队去做吧。

最后，自治意味着自卫。自治团体必须自卫，抵御那些不承认其自决权的人的侵犯，并通过竭尽全力摧毁胁迫性结构来扩大自治和共识的领土。

[image]

无首联盟

独立自主的团体可以在没有任何一方行使权力的情况下，以联合会的形式开展合作。这种结构听起来像是乌托邦，但实际上却非常实用和高效。

举两个例子来说，国际邮件递送和铁路运输都是基于这种系统的：虽然各个邮政和运输系统内部都有等级制度，但它们彼此间通力合作，将邮件或铁路乘客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不需要终极权威。

同样，在一个集体中无法达成足够共识的个人也可以在不同的团体中共存。

当然，从长远来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向下一代讲解合作、体谅和宽容的价值观 —— 这也正是我们所主张的，而且在这项任务上，我们做的基本上可以肯定不会比资本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拥护者差。

[image]

直接行动

自主性要求你为自己采取行动：与其等待通过既定渠道提出要求，结果陷入繁琐的文书工作和无休止的谈判，倒不如去建立自己的渠道。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直接行动。如果你想让饥饿的人有饭吃，就不要只把钱交给官僚主义的慈善组织 —— 找出浪费食物的地方，收集起来，然后分享。如果你想要负担得起的住房，就不要试图让市

议会通过一项法案 —— 那将耗时数年，而人们每晚都会继续露宿街头 —— 接管废弃的建筑，向公众开放，并组织团体在暴徒出现时保卫它们。如果你想让公司减少权力，那就不要向资本家收买的政客请愿，指望他们限制自己的金主几无可能 —— 而是亲自从他们手中夺走权力。不买他们的产品，不为他们工作，破坏他们的广告牌和办公室，阻止他们开会和运送商品。他们也会使用类似的手段对你施加权力 —— 只是因为他们早在你出生前就买通了你所在社会的法律和价值观，所以看起来才有效。

不要等待外部权威的许可或领导，不要乞求更高的权力为你安排生活。 主动出击 ！
[image]

有分歧？无需报警！

在真正符合每个参与个体最佳利益的社会安排中，被排斥的威胁应足以阻止大多数破坏性或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即使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排斥也肯定是比监狱和处决更人道的做法，因为监狱和处决会让警察和法官腐败，也会让罪犯恼羞成怒。那些拒绝尊重他人需求、不愿融入任何社区的人，可能会被排除出社区生活 —— 但这总比流放到精神病院或死囚牢房要好，而这两种可能性都在等待着这些人。

暴力只应由社区在自卫时使用，而不应像我们目前的不公正制度那样自以为是地使用暴力。不幸的是，在一个武力统治的世界里，以共识为基础的自治团体很可能会发生与那些不遵守合作或宽容价值观的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他们必须小心，不要在捍卫这些价值观的过程中自己失去这些价值观。

在许多情况下，社区内部的严重分歧可以通过重组或细分群体来解决。通常情况下，在某一社会结构中无法和睦相处的个人，在另一环境中或作为平行社区的成员，合作会更成功。如果一个群体内部无法达成共识，该群体可以分裂成更小的群体，在内部达成共识 —— 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不便和挫败感，但总比群体决策最终由最有权力的人强行做出要好。个人和社会如此，不同的集体也是如此：如果合作带来的好处大于挫折，就足以促使人们消除分歧。即使是截然不同的群体，和平共处也是他们的最大利益，他们必须通过协商来实现这一目

标……

无论他们投谁的票，我们都会抵抗！

[image]

过自己的生活，无需任何人的许可

……当然，这是最困难的部分。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另一种社会制度，我们谈论的是人类关系的彻底转变 —— 要解决我们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了 —— 除非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冲突关系中固有的暴力和纷争将继续加剧，任何法律或制度都无法保护我们。在基于共识的结构中，没有虚假的解决方案，没有压制冲突冷处理以避免解决问题的方法；参与其中的人必须学会在没有胁迫和屈服的情况下共存。

在你的 友谊和爱情中 ，每当它们摆脱了权力的束缚，每当合作自然而然地发生时，就能发现这个新世界的第一粒珍贵的果实。想象一下，将这些时刻扩大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规模 —— 这就是代议制之外的生活。

也许我们感觉自己与那个世界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但共识和自治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不必等待政府来投票决定做什么 —— 你现在就可以与身边的人一起实践它们。付诸实践，这种生活方式的优点显而易见。如果你的代表不愿意为你争取自由 —— 因为他们无法为你争取自由 —— 那就去组建自己的自治团体吧，只对你们自己的权力负责，为你们自己争取自由。

[image]

附录： 一则寓言

三只狼和六只羊正在讨论晚餐吃什么。一只勇敢的羊慷慨陈词曰："我们应该投票决定！”其他羊担心勇敢羊的生命安全，但出乎意料的是，狼群默许了。但当大家准备投票时，狼群把其中三只羊拉到一边，威胁他们说：

“只要你们仨投我们的票，我们就不吃你们，而是把另外那三只羊当晚餐。否则，不管你们投不投票，我们都会吃了你们”。

另外三只羊对选举结果感到震惊 —— 它们的同伴居然投票支持它们被杀死和吃掉。它们愤怒而恐惧地抗议着，但最先提议投票的羊却斥责它们：你们生活在民主社会应该感恩，至少我们还有发言权！”

[image]

[image]
[image]

写在1月6日国会暴动之后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MAGA 代议制 媒体 宣传 政变 无政府主义 暴力非暴力 权力 极化 极右翼 民主 法西斯 特朗普 直接行动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iyp

他们的反叛只是在反射伤害，我们的起义将是传播治愈之道的途径。

- Table of Content
  对选举政治的批判
  激进的抗议

[image]

「各路政客齐聚一堂，将1月6日国会大厦暴动斥之为“无法无天”、“反民主”和“极端主义”，甚至将其歪曲为“无政府状态”。但入侵国会大厦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本身是非法的、不民主的或极端主义的，而在于它是将压迫性权力集中到专制者手中的一种努力——这恰恰是无政府状态的反面。直接行动、激进战术和对选举政治的批判始终都是反法西斯和对抗国家暴力运动的基本要素。我们绝不能让极右翼分子将其与暴政联系在一起，也不能让中间派混淆视听。——Crimethinc」

[image]

怎样才能改变这个世界？长期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完成任务的最佳方式是自己动手，而不是等待政客通过法律或警察批准。我们称之为直接行动。我们支持直接行动不仅因为它有效，还因为它是一种自决手段，一种实现我们自己的愿望而不是领导或代表的愿望的方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人都有责任追求自己的目标，同时寻求平等共存与合作，尊重彼此的自主权。

但正如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所发生的事情那样，藐视法律和直接反对政客的行动也可以达到其他目的。从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到纳粹的"水晶之夜"，扩大可允许的策略范围以将权力集中在高层当局手中一直都是法西斯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同样涉及冲破法律，像MAGA暴徒在国会大厦那样执行你们“敬爱领袖”的命令，也绝对不是无政府主义所言之直接行动。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的全部意义在于保持横向权力。

在来自华盛顿的叙事中，1月6日事件中的“英雄”是政客和执勤警察——就是那些每天都在剥削和残害我们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阻止我们参与真正的自决。在这种叙事中，反派是那些藐视法律、与警察对抗、将政客赶下舒适座椅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试图让特朗普继续担任当初“民主”将他提升到的职位，而是因为，这一次，他们是在藐视民主和法律秩序。按照这种逻辑，如果特朗普多获得几千张选票而赢得大选，那么他可能实施的任何程度的暴政都是绝对“合法”的，只要他是通过合法手段这样做的。

如果这个版本的故事获得支持，那么对未遂政变的反应将成为所有寻求解放的人的深刻失败——正是这种将政治行动的目的与其手段相分离的做法成为了政客和特朗普叛乱团伙的特征。

[image] 在此前一整个夏天里残酷镇压BLM运动的警察从1月6日起忽然就变成了“英雄”，至少在中间派政客的叙述中是如此。

对政客们来说，除非通过他们的渠道，遵循他们的程序，并认可他们对我们的权力，否则任何行动都是“不合法的”。他们声称，只有当我们其他人满足于每四年投一次票，然后再回到吃瓜群众的角色中时，“自由和民主”才能发挥作用。重要的不是结果——比如我们能否获得足够的医保、是否能在 COVID-19 这类大流行病中幸存下来、是否能保护自己不受种族主义警察的侵害等等——而是，我们是否仍然自满得把一切都交给“代表”，无论发生什么。

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目的与手段也是分离的，但方式恰恰相反。他们的目标是不择手段地维护专制权力，征服和惩罚所有反对者。为了捍卫这一 "神圣" 的目的（特朗普 1月6日的推文在此无耻地模仿了墨索里尼）他们认为，无论执勤警察或政客说什么，“人民” 都有理由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既坚持所有人的自由，又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除非自由无一例外地属于所有人，否则自由就毫无意义；而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由本身。无论拜登声称他将颁布何种“进步”的改革措施，人们都应该在等待改良的过程中保持服从和顺从，将我们的权力下放。这样的 "自由"只能是一个空壳，在权力席位的下一次转移面前不堪一击。国会大厦骚乱者的手段虽然披着“自由”的外衣，但当其目标是加强白人至上主义和支持暴君的权力时，只能进一步削弱我们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捍卫直接行动这一社会变革的途径，而不是让法律和秩序的拥护者把我们逼入游说代表和乞求权力掮客的死胡同。请记住 —— 如果法西斯主义者拙劣的政变企图以某种方式得逞，直接行动将是抵制他们将要实施的政府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我们坚持认为，直接行动的价值在于恢复权力的归属 —— 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将权力分配给所有人，而不是将权力集中在领导者手中。

[image] 以奥威尔式的方式，极右翼试图利用反叛的语言 —— 包括“奥威尔式”这个词 —— 来服务于他们镇压反叛的计划。

对选举政治的批判

特朗普的暴徒们一心维护专制统治，冲进国会大厦的暴动事实上是帮了选举人团一个大忙。各政治派别的批评家都谴责过这一怪异的制度；甚至选举民主最狂热最忠实的拥护者也批评过选举人团制的缺陷。尽管选举人团被明确设计为对人民主权的一种对冲，然而在忽然之间，1月6日的入侵却将它变成了 “人民意愿” 的神圣象征，使整个国家重新团结在这一古老程序的背后。

更重要的是，它加剧了特朗普长达数月的反对选举有效性的运动所催

化的一种现象：不加区分地捍卫美国的“选举民主”，将其视为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堡垒。特朗普的法西斯好战对现状的维护者来说是个福音，他利用恐惧来支撑一个在公众眼中逐渐失去合法性的制度，并将任何对美国民主的批评与独裁野心联系在一起。

在被赶出舒适办公室的政客们的庄严言辞中，对抗法西斯主义或暴民统治的唯一选择就是他们的民主品牌。但是，这种中央集权、赢家通吃、多数决制的选举制度早已让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幻灭感，同时也传播了这样一种观念：使用系统性胁迫手段来治理政治对手是完全合法的。这些影响加在一起，使得独裁手段在危机时刻具有危险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一个魅力十足的领导人手中，他在美化权力的同时，还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弱者和超人。

特朗普的“创意”之一就是巧妙地利用了民众对华盛顿、"沼泽"、联邦权力、对精英等的怨恨，以实现扩大权力并强化了精英主义，同时将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中。正因此，他才能煽动起一帮自诩为 "革命者" 的人试图发动政变，以加强他们所反抗的国家。特朗普利用代议制民主产生的怨恨和疏离感，以“捍卫民主”的名义领导了一场反民主的叛乱 —— 即便叛乱成功，也只会加剧民主最糟糕的一面。

[image] 特朗普利用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普遍失望来推行更加专制的政策。

许多自由派人士对被特朗普误导的群众挠头不已，他们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认为大选是 "被窃取的"，特朗普一定是真的赢了。虽然各种荒谬的阴谋论对所谓的 "被窃取” 的确切机制说法不一，但跳出阴谋论看选举的情感背景及其政治后果更为有用。

近7500万人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在赢家通吃的制度下，由于这些选票的分配方式并不能夺取选举人团的多数票，因此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为零。这些选民被蛊惑人心的言论煽动得热血沸腾，并被怂恿着相信投票给特朗普是他们“为保护自由”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但突然间，自由派媒体告诉他们，他们的所有选票都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样的结果，在特朗普和其他白人至上主义者或基督教教条主义支持者的怂恿下，他们觉得自己是唯一有权掌权的人，因此许多人选择接受“邪恶的自由派窃取了选举” 的戏剧性叙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也相信了窃取选举的说法，你也可能会来到华盛顿，梦想着自

己在这场戏剧中扮演主角，想象着在这个故事中，你的行动不会仅限于浪费一票，你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将腐败的精英们从权力的殿堂中扫除”，亲手迎来新千年。

当然，梦想变成了噩梦。无论他们是被自己的MAGA同道践踏、被警察枪击或殴打、被解雇，还是因联邦指控而被捕，或者只是灰溜溜回家了，被全世界贴上叛乱者的标签，他们通过剥夺他人权力来报复大选中他们自己被严重剥夺权力的努力也肯定是暂时失败了。但是，如果政治中心认为这意味着“民主安全”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的教训不仅仅是蛊惑人心威胁民主 —— 正是民主首先奖励了特朗普的蛊惑人心。恰恰相反，代议制民主正在其自身的矛盾下屈服，它无法实现其所承诺的赋权和自决。自以为是的自由派可能会谴责特朗普的死忠们的无知，他们像堂吉柯德似的对着投票机的大风车摇头晃脑，并在QAnon阴谋网络中大放厥词。但他们没有看到，特朗普选民所表达的不满是由真正的现实问题造成的，即使他们的反应是错误的。虽然否认拜登获胜的人使用了“民主被背叛”的言辞，但更准确地说，他们是觉得民主背叛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什么样的制度会将投票作为赋予权力和参与的最高表现形式，将其描述为我们唯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声音”—— 然后又告诉7500万选民，他们的投票毫无意义，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必须在下一个4年的时间里重新回到被动状态，去服从一个他们反对的、与他们的选择毫无关系的政权的命令？

一个“民主”的政权。

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那些人否认拜登获胜的行为。法西斯政治的主要特征包括民众动员、群众对国家的情感投入、以及政治神圣化。特朗普的宣传机器巧妙地制造了所有这一切，产生了高水平的投票率，并在他输掉选举时产生了愤怒否认的强烈反应。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人们对民主的崇高承诺与异化的选举场面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以至于激发了强烈的幻灭感，这些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力量。我们可以从民众对统治阶级的蔑视中看到这一点，因为统治阶级远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关切，弥漫着不负责任和腐败的气息。

[image]

这里有许多与无政府主义的感性共鸣之处。而根本性的不同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将这种挫败感归结为根源。问题在于制度本身 —— 一种组织社会和决策的方式，它将我们的参与限制在毫无意义的仪式上，将我们的权力下放给遥远的偶像，同时强迫我们服从未经我们同意、从上而下强加给我们的决定。

充其量我们可以“选择”对他人行使强制权力的人，但我们自己却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强制权力。当这种政治领域的异化等级制度在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 —— 工作、学习以及其他许多由他人发号施令的场合 —— 也出现时，人们感到无力和愤恨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分析这种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人们就可能会把这种怨恨转移到实际上对这种异化并不负有责任的其他人身上，站在制度的某些受益者一边去挤兑那些比自己更惨的人。

政治中间派和左派坚持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极右翼则坚持选举舞弊的臆测，与他们所有人都不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每次选举都是偷来的 —— 是代议政治窃取了我们人民的代理权，窃取了我们合作决策和直接决定自己生活的能力。大选的问题并不在于特朗普还是拜登应该胜出 —— 特朗普赢只会导致更多的人被剥夺权力和受到压迫 —— 问题在于，无论哪个政客获胜，我们人民都是输家。

虽然8100万投票给拜登的人在选举中获得了更大的满足感，或者至少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投票是有意义的，但事实上，他们并无法控制拜登如何使用这一权力，如果拜登违背自己的承诺或选民的愿望，人们也几乎没有任何追索权。至于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7700万选民 —— 更不用说没有投票或无法投票的1.75亿人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就像历史上的其他历次大选一样 —— 作为“大多数”的他们甚至无法安慰自己是胜利的一方。这就难怪人们会愤世嫉俗、疏远他人，抓紧时间寻找阴谋论的解释，无论多么牵强附会。

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能让我们掌握自己生活的方法既不是代议制的虚假承诺、也不需要阴谋论的虚假前提。相反，我们需要的是自下而上的集体自组织、团结和互助防御，以及对和平共处而非争夺霸权的共同理解。我们拒绝接受任何使我们脱离我们共同的自决和集体协调能

力的制度的合法性，无论它被称为民主还是其他任何名字。

正如我们在大选前后所争论的那样，即便特朗普按照协议正式当选并得到选举人团的认证，那也不会使接受其统治的合法性变得更加合乎道德。没有任何“民主程序”可以证明大规模驱逐、大规模监禁、大规模感染死亡、无家可归、饥饿、生态破坏、或特朗普权力的任何其他后果是“合理的”。这些都是错误的 —— 不是因为它们 "不民主"，而是因为它们与一个自由、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格格不入。

即使是 —— 或者说尤其是 —— 在这次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不受欢迎，我们也必须阐明这些批判，并展示民众自决的替代形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无数种方式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而不需要发动国会风暴。 我们可以在 家庭 、 工作场所 、 学校 和 运动 中进行集体参与式决策。我们可以组织互助项目、邻里集会和其他聚会，作为在政党政治对抗模式之外建立相互关系的替代性空间。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自下而上组织权力的激进实验中汲取灵感，从萨帕塔自治区的社区中心**Caracoles** 到罗贾瓦的议会制度。我们可以削弱那些自称“代表”我们说话的老板、经理和政客的权威，藐视他们的命令，组织起来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或者至少组织起来抵制他们阻止我们尝试满足需求的努力。

在美国，整个左翼似乎都没有比捍卫选举制度的完整性更有远见的计划，此时此刻，无政府主义者有责任站出来指出皇帝没穿衣服 —— 申明选举过程不应被奉为自由和责任的最高表现形式的所有充分理由。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让极右翼成为唯一能阐明现行制度问题的人，就像他们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企业媒体的主要批评者那样。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 优势 ，而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失良机。

这些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心中的 “革命" 与我们想要创造的自由世界截然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是跨越差异共存和相互尊重，而他们的目标则是用武力统治其他人。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 "不要践踏我”（著名的加兹登旗上的文字），但1月6日的事件表明，他们愿意践踏 —— 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还是比喻意义上的 —— 任何挡在他们面前的人的身体和自由，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盟友。与此相反，无政府主义

者主张种族正义、互助和横向基层组织，以抵制红帽子人群所体现的白人至上主义、超级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有毒混合物。

即使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出于对美国民主的真正不满，我们也必须将他们的困惑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区分开来。与所有二元论一样，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特朗普大军的独裁 “自由" 与他们冲击的国会的异化 “民主" 之间的关系时，这两者之间所谓的“绝对对立”就会瓦解。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权力下放，让不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无法胁迫我们，而那些冲击国会大厦的人却只想把权力集中到他们所喜欢的行政部门手中，而不是臃肿的立法机构。因此，我们必须既远离中间派的所谓 "民主捍卫者”、也远离从右翼攻击民主的人，我们主张的是：无论是法西斯强人还是正式当选的华盛顿精英都不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号施令。

尽管学者们对党派分歧表示遗憾，但总有一个问题将所有政客团结在一起，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应该由他们来为我们做决定。这就是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1月6日后迅速走到一起的原因。如果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者加入实际的“大多数” —— 即 没有投票的那些人 —— 并决定我们可以一起做出比华盛顿的代表们更好的决定，我们就可以自下而上地重塑社会。

[image] 坐在国会大厦舒适座椅上的人和冲击国会大厦的人至少有这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想统治我们。

激进的抗议

1月6日的 "骚乱"发生后，乔·拜登与许多评论家一起指出，前一年的夏天针对BLM起义的军事化镇压与警察对武装暴徒冲击国会大厦时所表现出的维稳意愿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自由派的角度来看，这揭示了种族问题而非对法律和秩序的关注如何左右着警察对抗议活动的反应；从激进派的角度来看，这表明白人至上主义是法律和秩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拜登在进行这一比较时所追求的议程揭示了这场抗议活动是如何被策略性地变成了错误记忆，以重塑 “什么样的抗议策略能在未来几年被公开肯定为合法” 的标准。

在将 "为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Justice for George Floyd）和 "BLM"（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与冲击国会大厦形成对比时，大多数自由派媒体将反警察起义定义为 "和平的" 或 "大部分是和平的"，将特朗普的群情抨击为 "暴力的"。难道我们忘记了2020年最具催化作用的时刻之一是反叛大军占领并烧毁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的时刻吗？难道我们忘记了从纽约到洛杉矶再到费城爆发的抢劫吗？难道我们忘记了在波特兰与警察和联邦官员发生的长达数月的夜间冲突吗？保守派媒体当然没忘，但他们偷梁换柱试图将支持特朗普的骚乱者描绘成 "真正的受害者"。

这只是一个最新的例子，再次说明人们倾向于根据发言者是否希望将行动或团体定性为 "合法或非法"，而将其定义为 "暴力" 或 "非暴力"。

奥巴马总统曾经著名地称赞埃及革命 —— 请注意：在那场大规模起义中，数周的激战烧毁了上百座警察局 —— 是 "非暴力的道德力量让历史的弧线再次向正义弯曲"。他使用这种修辞是为了承认革命结果的 "合法性" —— 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 —— 而不承认超越 "非暴力" 限制的社会变革方法的有效性甚至存在性。在 "为乔治·弗洛伊德伸张正义"（Justice for George Floyd）的起义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选择性失忆和双标。左派强调去年夏天的行动是 "非暴力" 的，从而将其描绘成 "合法的"；而右派则强调这些行动是 "暴力的"，从而将其谴责为 "非法的"。这些都是相互竞争的策略，目的是安抚民众，防止革命性变革对政权体系的威胁。右翼战略通过制造暴力形象来为外部维稳做辩护，从而推动侵略性的镇压；而左翼战略则通过散布关于非暴力运动的虚假记忆来为内部治安辩护，从而实施暗中镇压。两者目标相同：都是为了让人们保持一致，保护有钱有势阶层的权力免于受到愤怒的起义者带来的真正威胁。

如果说2020年的反警察起义是合法的，那并不是因为它们是 "非暴力" 的；它们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回应了对人民生命和社区的直接威胁；它们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动员了数百万人站起来反击种族主义和暴行，扩大了民众对白人至上和警务的认识，改变了美国的权力平衡。一些示威活动保持了非对抗性，特别是在那些反对他们的力量可以轻易制服他们并残暴对待他们的地方，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许多示威活动都是对抗性的，特别是在那些增强了参与者的力量、击退了警察、发出了在全世界引起共鸣的强有力的抵抗信息的地方，这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因此，不应该仅仅因为 "暴力" 而谴责那些入侵国会大厦的人。当然，我们不希望生活在一个由强制力统治的社会中；无论是国会大厦暴徒的暴行，还是姗姗来迟将他们赶走的防暴警察的暴行，都不是我们想要创造的世界的模式。但是，1月6日事件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暴乱者为传递信息而采取的暴力行动 —— 也不在于警方为应对而采取的暴力行动 —— 而在于不论他们中任何一方得逞，都将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特朗普的支持者理应受到谴责，因为他们试图帮助一个暴君掌握权力，以维护一个正在给数百万弱势和受压迫人民带来苦难的政府。问题不在于入侵者采取了激进的策略，而在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恐吓和统治。

只要拜登以同样的手段执政，并保留许多相同的政策，就有必要抵制他的政府，就如同必须抵制威胁政府的法西斯分子一样。

[image] 无论是国会大厦暴徒的暴行，还是姗姗来迟将他们赶走的防暴警察的暴行，都不是我们想要创造的世界的模式。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始终坚持战术多样性的价值，以及除了礼貌地要求强权者做出让步之外，还要做更多事情的重要性。1月6日事件发生后，可以预见，各个政治派别的政客和学者将联合起来，将焦点从冲击国会大厦者的议程本身转移到他们所使用的超越法律和秩序界限的策略上。就在入侵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佛罗里达州州长、特朗普的忠实拥护者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就以国会大厦发生的事件为借口再次推动美国最严厉的反抗议法之一，这只是所有特别厚颜无耻和虚伪的例子之一。这与特朗普臭名昭著地将夏洛茨维尔残暴的法西斯分子与试图抵御他们的反法西斯分子虚假地等同起来、或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从针对仇恨团体转向关注所谓的 "极端主义"（这一类别也被包含进了激进的解放运动）的做法如出一辙。

面对这些伎俩，我们应该将焦点转向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需的努力。我们可以挑战自由派对BLM起义的健忘症，指出我们之所以知道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名字 —— 而不是成千上万被警察杀害的其他人的名字 —— 是因为明尼阿波利斯勇敢的反抗者们没有注意到所谓的 “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界限”。我们可以指出，尽管人们对 "Antifa 恐怖分子” 和 “BLM暴徒” 的所谓暴力大肆谩骂，但戴着红帽子的 "Blue Lives Matter" 人群在一个下午杀死的警察人数就比整个2020年反对警察暴力和白人至上运动杀死的警察还要多。我们可以借鉴革命历史和世界各地并行斗争的实例，说明要想实

现持久变革，要想抵御肆无忌惮挥舞武力、胆大妄为的极右势力，就必须采取激进的策略。

最后，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社区组织起来，走上街头，无视政客们为应对1月6日事件而镇压抗议活动的任何努力，坚定只有通过基层民众的自我组织才能打败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加强国家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 —— 国家只会使武器更加锋利，而这种武器迟早会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

[image] 从夏洛茨维尔到伯克利，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者通过激进策略在阻止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不是这些努力干扰了他们的招募，谁知道他们现在会强大多少。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革命的核心并不是攻打某种象征性的堡垒，而是自下而上地重组社会 —— 这样，即使国会大厦被占领，占领者也无法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归根结底，这是唯一真正可靠的防御手段，可以抵御像特朗普这样野心勃勃的强人和试图为他夺权的暴民。选举政治可以轻易地让他们上台，也可以轻易地让他们下台；法律和警察可以轻易地帮他们实现夺权，也可以轻易地挫败他们的夺权行为。只有横向的基层抵抗才能确保我们的自由。

By CrimethInc

[image]
[image]

民主：爱国的诱惑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4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主权 代议制 国家 国家主义 平等 库尔德 意识形态 政府 政治竞争 无政府主义 民主 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策略 罗贾瓦 萨帕塔
[image] 编辑	MMartinez

"无论面具上贴的是法西斯、民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标签，我们最大的对手仍然是国家的机器 —— 官僚机构、警察和军队。

我们的敌人不是那些跨越国境线与我们对峙的人；而是那个自称为我们的“保护者”、让我们成为它的奴隶的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最严重的背叛永远是让自己屈从于这个机器，并为其服务，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一切人类价值踩在脚下"。

—— 法国哲学家 西蒙娜·韦伊

- Table of Content
  即使是最“民主”的民主国家...
  把无政府主义当

作“民主”来推销

[image]

与大多数政治词汇一样，民主是一个 “本质上有争议” 的概念 —— 其含义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战场。作为政治表达的大众模式，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是 “去争议” 或固定这些概念的含义，并将它们置于特定的关系中。例如，“平等”一词可以指平等获得优势（自由主义）、平等承担国家社会责任（法西斯主义）、或无阶级社会中的平等权力（无政府主义）。按照这样的解读，我们无法客观地确定这些概念的含义 —— 所有存在的都是不同的用法，每种用法都经常与其他概念组合在一起，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

因此，我想暂且不讨论对民主概念的适当理解，而是想问一下使用这个词的战略选择：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值得以指向无国家和无统治的方式去质疑 “民主”？下面有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的援引是一个相对较新且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现象。第二个论点是，这种援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修辞结构和受众目标几乎不可避免地最终会迎合爱国情绪和民族国家起源的神话。

即使是最“民主”的民主国家...

从历史上看，“民主”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谈到自己的理想或实践时倾向于使用的一个词。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杰出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著作进行调查后发现，在他们使用该词的极少数场合里，基本都是在传统的国家主义意义上使用的，指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实际存在的民主制度和权利。在这里“民主”意味着代议制政府，区别于君主制或寡头政治。

蒲鲁东显然是从这些角度来看待民主的。他在《什么是所有权》第一章中写道：

>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君主制自私自利的牺牲品，他们认为只有宣布自己是唯一主权者，才能永远摆脱困境。但君主制是什么？是一个人的主权。民主

> 是什么？国家的主权，或者说国家中多数人的主权......实际上，政府并没有革命，因为原则是不变的。现在，我们今天就可以证明，即使有最完美的民主，我们也无法获得自由。

蒲鲁东的问题是主权本身，而不是谁或什么使主权合法化。在《贫困的哲学》第7章中，他也反对任何 “权力体系，无论其起源如何，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蒲鲁东，1847年）。蒲鲁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区分 “真正的” 和 “所谓的” 民主；民主这个词只是意味着由代表组成的政府。

这种方法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一直存在。巴枯宁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状态》（1873:178）一书中抨击马克思主义者 “所谓人民政权 ...... 是指由人民选出的少数代表组成的人民政府 ...... 这是一个谎言，在它的背后隐藏着少数统治者的专制，这个谎言更加危险是因为它把自己伪装成了人民意志的表达”。

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在1917年10月的《地球母亲公报》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 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权威是专制的最后支柱。最后的，但也是最强大的支柱 ...... 专制是无形的，因为它没有人格化，它剪断了参孙的激情，使他丧失了意志。人民有祸了，因为现在公民是主权者，权力掌握在主人手中！这是一个自愿为奴的国家。

最后，马拉泰斯塔（1924年）也只是从政府制度的角度来看待“民主”的：

> 即使在最民主的民主政体中，也总是少数人在统治，并以武力强加自己的意志和兴致 ...... 因此，那些真正想要 “人民的政府” 的人，即追求每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意志、想法和需求的人，必须确保任何人 —— 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 —— 都不能统治其他人；换句话说，他们就必须废除政府，即任何强制组织，代之以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人的自由组织。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没有试图将无政府主义与民主相提并论，也没有试图以传统代议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术语来解释民主。无政府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通过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著作出现。

布克钦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否定了无政府主义，但这件事在这里并不重要，因为他关于民主的论述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直保持着一致性，当时他的论述是以向无政府主义者推荐的战略为措辞的。布克钦赞同奥地利-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对自上而下的权力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则”以横向和自发关系的“社会原则”为代价而扩张的批判（布伯，1957年），他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抵抗途径是在地方层面“恢复社区、自治、相对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和直接民主”，培养“从其逻辑本身来看与日益普遍的政治体制形成尖锐对立的社会体制”（布克钦，1980 年）。这描述的显然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地方主义，其基础是“自由的民众大会”、“资源的集体化 ”以及行政协调人员的严格授权。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是否应该使用“民主”的语言 —— 尽管是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民主 —— 来推动这种安排？这种语言的魅力何在？

[image]

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民主”来推销

从根本上说，将无政府主义与民主相联系是一种双管齐下的修辞手法，旨在增加无政府主义对主流公众的吸引力。这种手法的第一部分是抓住民主在现有政治语言中的正面含义。无政府主义的负面（被抹黑的）形象是无意识和混乱的，而“民主”则是大众媒体、教育系统和日常用语中广为认可的术语，通过搭上“民主”的顺风车，无政府主义的正面形象得到了提升。这里的诉求不是任何特定的制度或决策程序，而是民主与自由、平等与团结的联系，是民主与独裁的二元对立，是西方“自由国家”与其他政权的区别。

不过这种手法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肯定是颠覆性的：它试图将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事实上并不民主的社会，因为这些社会将决策权从

人民手中剥离，交到精英手中。这等同于一种论点，即主流受众认为与民主相关联的制度和程序 —— 由代表组成的政府 —— 实际上并不民主，或者至少是非常苍白的和很有限地实现了它们承诺要体现的价值。在这种说法中，真正的民主只能是地方性的、直接的、参与性的和审议式的，而且最终只能在一个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中实现。这种修辞手法的整体目的是让受众产生一种被欺骗的愤慨感：虽然对“民主”的情感依恋得到证实，但对民主实际存在的信念却被否认。

现在，这种手法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概念问题，一个是实质问题。概念上的问题在于，它引入了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民主”概念，其野心之大，几乎排除了所有属于该术语通常理解范围内的政治经历 —— 包括所有代表没有严格授权且不能立即罢免的选举制度。无政府主义者声称，当前的 “民主” 政权实际上根本不民主，唯一名副其实的“民主”应该是某种版本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这就要求人们以一种相当极端的方式重新构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虽然这种新用法有可能保持逻辑上的连贯性，但它是如此的稀有，与普通用法背道而驰，其作为主流观点枢纽的潜力非常值得怀疑。

[image]

第二个问题更为严重。虽然与民主的联系可能只是为了迎合其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涵，但它也将无政府主义与它本该试图颠覆的作为民主自豪感的爱国主义性质纠缠在一起了。它所诉求的不仅仅是参与性机构的抽象设计，而且是从美国革命传统中恢复的参与性机构。布克钦（Bookchin，1985年）对此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他呼吁无政府主义者 “开始用民主革命的词汇说话”，同时发掘并扩大民主革命的自由主义内容：

> [美国]资产阶级的过去具有自由主义特征：新英格兰的城镇会议。市政和地方控制、统治越少越好的美国神话、美国人对独立和个人主义的信仰。所有这些都与控制论经济、高度集中的企业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背道而驰 …… 我支持共和国民主化和民主激进化，并从基层做起：这需要建立完全符合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机构。我们不能再回到俄国革命或西班牙革命了。这些革命对北美人民来说是陌生的。

辛迪·米尔斯坦在其文章《民主是直接的》（本站第一篇）中的表述通

过寻求建立在美国起源神话之上，直接实现了这一计划：

> 鉴于美国被奉为民主“灯塔”，回顾那些在美国革命中英勇奋战却惨败的激进民主，似乎尤为恰当。我们需要接手这项未竟事业……与所有伟大的现代革命一样，美国革命催生了一种基于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面对面集会的政治……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继承了这种直接民主的自我教育，即使只是模糊的回声…… 许多人仍然珍视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独立、主动、自由、平等。它们继续在基层自治与自上而下的代表制之间制造着非常真实的紧张关系。

很多人一直认为美国政体建立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真正以自由和平等为动力，而米尔斯坦呼吁这种观点正是为了迎合现有的爱国主义情绪，同时也强调了其颠覆性后果。米尔斯坦甚至引用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批评改良主义议程 “以一种被限定的和中立化的民主概念来运作，它既不是民有、民治、也不是民享，只是以所谓的人民的名义而已”。不过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它依赖于对爱国情绪本身的自我限制性批判，并允许其所诉求的基础神话不受对人为制造的集体身份和殖民排斥的批判的影响。米尔斯坦指出，“创建这个国家的历史事件”中存在种族、性别和其他方面的不公正现象，因此有必要避免粉饰这些不公正现象，但他只能提出一个不具体的建议，即 “努力探讨这种压迫与美国革命的解放时刻之间的关系”。

然而，鉴于文章呼吁的对象是非无政府主义者，这种探讨能否真正发生几乎没有任何保证。这里所呼吁的爱国主义情绪往往是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叙事几乎不包含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本身就会对公民和公共领域概念的西方启蒙根源产生许多疑问）。以直接援引美国早期政体的方式来颂扬民主，最终可能会强化而非质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而民族国家则声称 —— 无论多么虚假的声称 —— 是殖民时期民主遗产的载体。从埃及革命对军队的拥护，到 “占领” 运动中弥漫的杰斐逊主义情绪，再到乌克兰革命中赤裸裸的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组织和行动方式与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论调之间屡次混杂，在最近的动员浪潮中显得尤为突出。

[image] 最近的动员浪潮恰恰展示了这种典型的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组织和行动手段与明显的爱国和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混杂。

事实上，有一个理由可以化解这种担忧 —— 那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有充分理由感到亲近的运动所表达的民主和民族主义情绪。其中最突出的是与墨西哥东南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所在地恰帕斯州社区的斗争，以及罗贾瓦或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革命运动。这两场运动不仅使用民主的语言来象征一种分权和平等的社会形式，而且还明确提出了民族解放的议程。库尔德运动已公开认可布克钦为灵感来源。这是否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声援这些运动是错误的呢？我的答案是 “不” ——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而这个区别也证明了上文的一般性论点。对于全球南方的无国籍少数民族来说，使用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语言与使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语言是两码事，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前者诉诸的不是现存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爱国主义建国神话，以及与之相关的特权和不公正，而是一种不同的、未经检验的、彻底分权的、潜在的无国家 “民族解放” 形式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有其自身的风险，但全球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很难说教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回到重点：至少对于美国和西欧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选择使用“民主”的语言是基于动员和颠覆一种爱国主义的愿望，而这种爱国主义最终是亲建制的；因此它有可能巩固其试图破坏的民族主义情绪。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有一个公众形象问题。试图通过与主流民主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联系来消除这一问题的影响是不值得冒的风险。

□

Anarchy Alive! Anti-authoritarian Politics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By URI GORDON
https://files.libcom.org/files/anarchy_alive.pdf

[image]
[image]

社区、民主、互助，迈向/超越双重政权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6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不平等 互助 公域私域 劳工运动 协商 参与式 国家 基金 女权主义 学运 巴勒斯坦 性别歧视 政治竞争 民主 激进民主 生态 社区 竞争 绣带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 黑豹党
[image] **编辑**	[image]iyp MMartinez

本篇主旨在于提供一个部署框架，或者说是一种思路，为您的研讨/研究项目和活动增加实用性价值。而非"推荐"一整套策略。换言，您不必完全认同本篇中介绍的所有变革方案，但您应该可以从这里开始策划您认为"更好的"竞争性方案。

- Table of Content

  导言
  我们的民主危机
  我们的社会变革理论
  过去的教训
  基于并超越当前的组织
  方法
  劳工与合作社运动
  共同基金
  激进派的规则就是用来

打破的
革命性机构建设实践
组织“第一次起义”
迈向美国的双重政权
住房公平
粮食与环境正义
能源民主
社区委员会
提升激进民主
结论： 超越城市的“下一个系统”
关于作者：共生研究集体

[image]

导言

当年的“阿拉伯之春”夺回了中东和北非的公共空间，向新一代展示了在最压抑的环境下进行创造性抵抗和政治想象的可能性。他们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广场运动，从欧洲的反乌托邦运动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占领以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为口号，对 “我们的制度是最好的、唯一可能的制度” 这一主流论调提出了一代人中最激烈的抨击。它要求在国家之外建立新形式的激进民主，结束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 —— 事实上，许多 “占领” 运动的分支都试图创造这样一个微观世界。

然而，2011年席卷全球的乌托邦精神并没有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带来全面的解决方案。“占领”及其激发的运动未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另一个世界 —— “下一个系统” —— 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

这篇文章中的目标是将我们反对压迫和统治的斗争转化为建设“下一个系统”的战略方法 —— 将“占领”的诗歌转化为真正社会变革的散文。这里的建议既具体又全面，即：组织切实可行的参与式民主和互助社区机构，使其能够扎根、成长，并逐步取代目前统治普通人生活的机构。

通过满足社区需求，并通过激进民主机构引导社区集体行动，我们的目标是发展出既能建立民众力量来对抗无动于衷的寡头统治、又能取代资本主义的机构，而左派常常被批评为未能预见到这一点。我们所设想的“下一个系统”是自由意志主义的生态社会，其基础是公民的直接参与，而不是精英们不负责任的权威；是经济的社会所有权，而不是剥削；是人类的平等，而不是种族、性别、国籍和阶级的社会等级；是保卫我们的共同家园及其非人类居民，而不是无限制地破坏环境；是恢复社区，而不是孤立边缘。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是制定一个框架，从头开始打造这样一个社会，正如无产者所宣称的那样，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设新世界。

卡尔马克思曾批评乌托邦主义者试图“为未来的炊事班写食谱”。他的意思是，乌托邦主义者想象他们可以从零开始设计一个新社会，并通过意志力将其实现。当他们不可避免地失败时，他们注定会失望和幻灭。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着力于社会变革的复杂和动态过程。他认为，只有仔细研究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激励结构和阶级动态，我们才能了解它的前进道路。在马克思看来，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本质，每一种制度都蕴含着后继者的种子，只需鼓励其成长，就能实现变革。

而我们认为，政治变革的答案就在乌托邦主义者和马克思之间。马克思说，描述一个理想的未来是在浪费时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如果脱离了这些想法可行的实现过程，那么设计复杂的乌托邦对我们的政治或战略指导来说意义不大。然而，我们也不能坐等“不可避免”的革命的到来，不能仅仅在这里对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格局进行批判。这里所阐述的下一个系统愿景，作为实现全球革命性愿景的重要中间步骤，今天可以而且必须在我们的社区中进行试验。

如果我们稳步改变现有的制度、生产模式和相互关系方式，而不是试图凭空捏造一个全新的系统，那么下一个系统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并经久不衰。我们的核心观点是，建立激进民主的合作机构网络可以在短期内维持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集体斗争，组织我们的基础以赢得与国家和私营部门的斗争，开始削弱公众对当前功能失调的系统的支持，假以时日，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机构。我们的建议将过程与目标相结合，将民主和社区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和目的。我们填补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分析与乌托邦想象之间的空白，尝试了左派一直在努力创造的东西：向后资本主义世界过渡的现实模式。

[image]

我们的民主危机

当今的政治局势处于危机的边缘，尽管一系列灾难似乎层出不穷，但却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无休止增长的结构性要求和以外部化成本换取私有化收益的做法，已将我们的全球气候迅速推向全面动荡的边缘。栖息地的破坏、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侵蚀了全世界（人类和非人类）社区的生态基础，导致了自小行星消灭恐龙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灭绝事件。一个极小的跨国统治阶级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攫取了大量未征税的财富，使数十亿人陷入贫困。四分五裂的全球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而竞相低头。随着战后社会民主蜕变为新自由主义，甚至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也被掏空，并被剥夺了政治权力。

“民主”机构本应通过被赋予权利的公众的力量来确保共同利益，但事实上它似乎无力阻止这一切。从20世纪70年代起，普通人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就被削弱了，因为资本主义精英重新夺回了国家，让我们回到了一个全面私有化、放松管制和紧缩的时代，而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则将弱势群体作为替罪羊。与此同时，帝国冒险主义继续通过新的战争和冲突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进一步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迫在眉睫的生态悬崖都非常有可能加剧全球的苦难、暴力和暴政趋势，其严重程度将超越以往任何时候。

这场系统性危机的背后是民主的缺失。欧盟和全球金融机构（它们对依赖于全球北方投资和贸易的负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决定施加了相当大的控制）是由一个非民选的技术官僚阶层管理的，他们对跨国资本主义利益唯命是从。最近对美国政治进行的一项严格的定量研究表明，收入最低的90%美国人的政策偏好对政府的政策决策没有独立的影响；相反，立法者只对企业和最富有的10%美国人的利益做出回应。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美国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说法受到了严重威胁。” 即使在号称民主的国家，引导国家决策的机构在结构上也无法避免生态和经济崩溃，无法确保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集体行动问题。

[image]

我们的社会变革理论

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像我们这样无法忍受的状况可以通过动员公众“革命性地”撤出对统治机构的支持而被抛到一边。作为极权主义、政治暴力和直接民主的著名理论家，阿伦特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有助于厘清人类当前面临的问题，并指明前进的方向。

在政治学中，权力通常被理解为使他人做事的能力，通常通过暴力或胁迫来实现服从和统治。然而，在《论暴力》一书中，阿伦特证明了权力在现实人类社会中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她将“权力”定义为人们协同行动的能力——集体行动的能力，因此是群体而非个人的属性。“领导者”之所以拥有权力，只是因为选民授权他们指挥群体的集体行动。

阿伦特认为，从独裁政权到参与式民主政体，所有政治制度中的权力都来自公众的支持。没有臣民的服从，任何独裁者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没有群体或勉强或热情的支持，任何需要集体行动的项目都无法实现。当人民开始撤回支持并拒绝服从时，政府可能会诉诸暴力，但只有军队或警察选择服从，政府的控制才能持续下去。阿伦特写道：“当命令不再被服从时，暴力手段就失去了作用……一切都取决于暴力背后的力量。”权力来自集体行动而非武力，这一认识是我们过渡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

然而，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政治策略（而不仅仅是对过去某些政治事件的描述），阿伦特的权力理论需要做几处修改。首先，如果没有预先存在的群众组织，公众就无法集体撤回其支持。单独行动的个人对国家权力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阿伦特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 2011年的突尼斯）只发生在极其罕见的危机时刻。

其次，如果看不到可行的替代方案，大多数人甚至不会考虑撤回对统治机构的支持。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一个世纪前所解释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只有通过他所说的“阵地战”才能被削弱——在工人阶级中发展物质和文化基础，以制定反对派的叙事、并组织反对派的机构。

第三，撤回会带来严重的代价。即使没有暴力镇压（即使是当今最自由的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人们也要依赖资本主义和国家机构来获取基本的生存需求和集体行动的渠道。因此，要超越资本主义和国家，就必须建立替代机构，以满足这些需求，并组织人们采取有力的行动，相互配合。不参与此类反对机构而单纯主张撤回支持的说法与冷漠无异。

第四，我们不能忽视革命后社会的预先形成 —— 需要积极创建机构来取代我们现在拥有的机构。阿伦特有些浪漫地认为，在公众大规模撤回对统治机构的支持之后，真空中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有机民主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是站在她这一边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在罗贾瓦（Rojava）的民主联邦制，革命俄国、德国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巴黎公社，阿根廷的工厂接管，以及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革命，都是在革命危机中出现的植根于社区的参与式政治的典范。然而，管理和协调整个社会的更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却不是自发的面对面民主所能企及的。要想将权力革命性地转移到激进民主的民众机构，就必须预先存在此类参与性机构，而不是天真地相信它们会在大罢工、大规模公众“不服从”或叛乱动荡中诞生。

我们认为，阿伦特对国家权力来源的分析一般也适用于资本主义机构（当然，它们是由国家支撑的）。只有通过创造可持续的、平等主义的替代方案以削弱公众对它们的依赖和认可，才能取代它们。当下有效的政治策略必须将阿伦特关于社会权力运作和人民革命可能性的最佳直觉与社区机构建设的组织愿景相结合。由于通过现有体制渠道取得足够进展的前景如此暗淡，必须从头开始建立新的民主与合作体制。

在早期阶段，打造激进民主的政治基础设施将主要在当地进行，通过对现有社会进程的衍生和编纂，将其扩展为主流实践，并纳入更广泛的战略。这里提出的社区机构是模块化的。它们可以作为单个项目独立存在，通过微调来解决因现行制度失灵而产生的具体问题，但其设计目的是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网络。通过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些机构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城市或社区的权力关系，并为新的宏观自治结构和公民社会奠定基础。通过设计和管理自己的新机构，社区可以培养一种创造性和集体精神，使他们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跨越文化和地理距离相互联系，并为新社会奠定平等主义的基础。只有这样的过程才是真正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

这里讨论的大多数社区机构都不是新发明的，而是经过世界各地几代人的群众斗争发展起来的。这里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将其整合为统一的反资本主义战略。

具体的制度安排可能取决于当地的需求和条件，但可能性包括工人拥有的合作社、社区委员会、社区土地信托、当地食品分配系统、互助网络、社区拥有的能源、大众教育模式、时间银行、托儿中心、社区医疗诊所等等。具体机构将作为政治可能性的示例进行讨论，但我们的理解是，激进民主意味着“普通人”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其进行创新、修改、废弃或替换的权力，作为开源实验全球对话的一部分。支撑这一战略愿景的是实用主义精神。如果一个社区所建立的东西行之有效，那么它就可以通过本地化调整输出到其他地方 —— 就像 “广场运动”的目标和抗议方法被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迅速采用和调整那样。

我们的组织愿景植根于整个争取自由和正义的革命运动史。我们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萨帕塔主义、另类全球化运动、新无政府主义、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阿林斯基主义社区组织传统、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无政府工团主义、议会共产主义、社会生态学、和社会团结经济运动等方面汲取灵感，发展思想。以以下提案为起点，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些广泛的思潮综合为一个运动组织，从事社区机构建设和组织工作，涵盖住房、能源、食品、医疗保健、技术、劳动、教育、生态恢复和其他问题。在此，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此类组织工作的前身，我们如何通过社区机构建设在这些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以及将这些机构整合到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转型的革命性框架中的方法。

[image]

过去的教训

1917年，在三月推翻沙皇和十月革命之间，俄罗斯社会的政治权力分裂成了两股并行治理社会的对立力量。苏维埃是一个由激进民主、自治的工人委员会组成的网络，与他们试图取代的官方议会临时政府并行运作。特别是代表该市工人和士兵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与俄罗斯国家正面争夺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它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其他苏维埃的代表，并将自己改组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当时，许多俄国社会

主义者将这种政治局势称为"双重权力"（dvoyevlastiye）。列昂·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写到了双重权力，而弗拉基米尔·列宁则认为，这种权力的分化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可能导致革命推翻共和制临时政府。

然而，在当时，"双重权力"基本上是描述性的。美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率先将这一概念充实为变革政治的战略框架。在他被称为"自由意志市政主义"的政治蓝图中，直接民主的议会联盟将被迫与民族国家发生冲突，从而无法继续共存。本文主张采用比布克钦更灵活的方法——尽可能地与自由民主政府接触，以参与性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方向对其进行重组。即便如此，布克钦关于双重权力的理论工作仍是我们战略的核心。以下各节将探讨如何通过修改和超越当前的社区和劳工组织的方法，在此时此地建立双重权力，以创建激进民主的社区机构。作为北美人，我们的重点将主要放在美国，但我们的建议应被理解为一个无国界的项目，受到世界各地有远见的组织者的启发和指导。

[image]

基于并超越当前的组织方法

参与式民主是我们组织和机构建设愿景的核心。当一个社区能够自己决定其需求是什么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是接受高高在上的"解决方案"时，其好处是多方面的。在组织、社会服务提供和国际发展领域，有很多用心良苦的组织和个人都不明白这一点，而亚洲移民妇女倡导者（AIWA）的创始人 Young Shin 则是一个更积极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初，Shin开始组织奥克兰制衣、酒店和高科技工厂行业的中国和韩国移民女工与猖獗的工资盗窃现象作斗争。然而，当她与这些妇女交谈时，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们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英语，而不是组织起来。Shin感到很困惑——据她所说，大多数妇女在工作、购物和洗衣服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而且很少有时间走出她们所在的移民飞地。为什么学习英语被认为如此重要？难道这些妇女只是想要自己被同化，并通过拼命劳作去攀登社会阶梯吗？

然而，Shin相信工人们，她组织的英语课程最终起到了关键作用。首

先，英语课让妇女们能够在工作场所反抗压迫者。

一群妇女告诉 Shin，她们希望能够告诉老板不要对她们大喊大叫，要尊重她们。这些课程还帮助妇女们了解到她们本该享有的劳动权利，将自己置身于所有劳动妇女争取正义的历史斗争中，并反击有关性别和家庭的压迫性文化规范。最终，随着她们获得了新的技能和信心，妇女们确实加入了抵抗工资偷窃和其他许多争取劳工正义的斗争。对于 Shin 和任何寻求组织起来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社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建立直接民主的合作机构，可以在早期阶段获得支持，确保社区能够做出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决策。直接民主也是一种大众教育形式。通过直接民主，人们可以培养政治意识，实践横向合作民主的伦理。默里·布克钦写道：

> 「人们面对面集会，找出共同的问题，并通过互助和志愿社区服务解决这些问题 …… 这些结社形式或多或少地起到了民主公民学校的作用。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们可以变得更有社会责任感，更善于以民主方式讨论和决定重要的社会问题。」

种族、阶级和性别的鸿沟也可以通过协商、民主的过程来弥合，只要这个过程的结构是为了消除这些不平等。

在组织活动的所有场所 —— 工作场所、社区等 —— 只有通过激进民主的框架，才能迎来真正的变革政治。这就意味着要从社区层面建立一个邻里委员会网络，使其能够自行创建和管理这些机构。以此为出发点，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美国进步组织的主要潮流，以及参与式民主决策伦理和合作式机构建设战略如何将这些传统推向新的高度。

[image]

劳工与合作社运动

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工人的斗争培养了一种进步政治，提出了

从生存到解放的要求。最低限度上，劳工运动要求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要求体面的生活水平；在最雄心勃勃的时候，他们要求废除工资制度，对关键的生产基础设施实行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并建立一个由人民自己决定其目标和劳动强度的社会。必须复兴和扩大的正是后一种更为激进的劳工运动。在不改变经济所有制结构的情况下，通过讨价还价来获得更多的经济剩余不是一项能够取得长期成功的战略。

尽管本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 但这些“成功”并没有充分解决生态、种族、性别和国际主义等问题，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共识已将工会化推向了历史最低点。大规模失业、工作临时化、发达国家的反劳工法、以及工业化国家的暴力政治压迫，都削弱了工会。传统的工业无产阶级已不再能明确界定，其规模也不足以成为唯一的革命力量，或许从来都不是。

但现在，我们有机会将工业无产阶级定位为更广泛的民主斗争中的重要一翼，不仅仅是反对雇佣劳动，而且还要反对种族和性别压迫、等级制度、生态破坏、国家，甚至是工作本身。只有在农民、无产者、劳工以外的社会运动以及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之间建立跨阶级的国际联盟，才能赢得更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劳工运动应被视为这场斗争的核心支柱，但不应等同于斗争本身。

工人们已经开始在传统工业工会主义的界限之外组织起来。创新的方法包括：在医院、机场和大学等劳动枢纽建立跨阶级的联盟和工会运动；蔑视工会官僚机构，倡导工会民主；建立非营利组织、工人中心和其他工人阶级自治机构。

工人合作社是最有希望实现工作场所民主的工人机构之一。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社会主义的核心要求，因此，将个人工作场所转变为工人民主自我管理的场所，是建立直接民主和实现整体经济社会化的关键一步。通过赋予工人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权，合作社提供了对经济部门的民主控制以及摆脱雇佣劳动、摆脱国家干预的途径。但是，合作社也存在一些重要问题 —— 有些问题源于合作社作为企业的失败，有些问题则源于合作社的成功。

研究表明，合作社一旦起步，甚至比同等规模的寡头资本主义企业更具竞争力，但 “一旦起步” 是这里的关键词。合作社的主要弱点，也是其数量稀少的原因，是融资极为困难。与富裕的企业家不同，中等

工资的普通工人几乎没有资本可以提供，因此，他们所能筹集到的任何小额初始投资对他们来说基本上都是孤注一掷的风险。

缺乏风险投资，公司即便为工人所有，也必须求助于银行。在当今以营利为目的的信贷体系中，银行天生就对具有实验性结构的企业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结构允许围绕利润最大化以外的目标（如工人的生计或共同利益）来组织生产。因此，大多数贷方要么要求大量资本作为抵押，要么要求他们的代理人参与初创公司的决策过程，甚至可能拥有股份（这就损害了合作社的基本目标 —— 即工作场所民主）。即使那些跨过了障碍的合作社，也往往局限于相对较小规模的活动（超市、餐馆、共享单车等）。

另一方面，成功的合作社也面临着其他问题。蒙德拉贡（Mondragon）是西班牙的一个合作社网络，拥有超过7.4万名工人业主和120亿欧元的资产，支持广泛的行业和项目，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内部民主。然而，即使是成功的合作社，也存在许多局限性。

蒙德拉贡最早的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是其工人所有者只关心自己的繁荣，而忽视了参与更广泛的反佛朗哥斗争。最近，也许更令人担忧的是，合作社的内部民主在为保持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而进行的改革中被慢慢削弱。1985年至1991年间，蒙德拉贡网络中由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将大部分决策权让给了蒙德拉贡合作社公司，这是一家中央控股公司，其选举产生的上层管理人员基本上不对工人股东负责，除了在象征性的年度大会上。大约与此同时，蒙德拉贡开始在其国外子公司雇佣大批工资工人（非所有者）。到2014年，只有40%的蒙德拉贡公司员工是拥有合作社投票权的工人业主。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合作社面临适应资本主义的生存压力时，需要一个超越工人所有制企业的机构来提供激励，防止自我剥削。有助于合作社经济繁荣的宏观经济结构，如大规模的非营利信贷系统和对企业使用血汗工厂劳动力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合作社自身所能创造的范围。

而合作社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时，也面临着剥削消费者或将本不应被商品化的东西（如医疗保健或艺术创作）商品化的压力。例

如，即使是民主管理的电力公司，如果其工人决定赚取更高的利润，也可能会利用其对电力能源的垄断来抬高消费者的价格 —— 除非能源和其他必需品一起完全退出资本主义市场，并以其他方式协调其供应。因此，仅仅使一个工作场所民主化是不够的（尽管这可以是一个开始）。合作社只有作为改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更全面斗争的一部分，才能发挥其潜力。

[image]

共同基金

我们该如何为合作社提供资金，激励合作而非竞争，并将这些成员机构与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挂钩？我们建议设立一个共同基金，吸收社区经营合作社网络的利润，汇集社区可用于经济发展再投资的资金。该基金将由网络内合作社的成员所有者民主控制，最初将为更多合作社提供资金，以进一步发展该网络。随着发展壮大，该基金可以投资于无利可图的目的，如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建立其他独立的社会机构、资助政治运动，以激进民主的方式取代地方政府。

通过“工作世界”等组织的非采掘性融资获得的信贷流是工人所有权的一个特别好的起点。“工作世界基金”的初始资本来自捐款、投资资本以及控制该基金的成功的工人合作社的利润。该组织利用这种混合资本流向新成立的工人合作社或将所有权转让给工人的现有企业提供零息贷款和教育支持。与众不同的是，在合作社开始盈利之前，该基金不接受任何贷款偿还，即便盈利后，也严格按照利润的一定比例偿还。(在没有利润的月份贷款方不必支付任何费用）。

“工作世界” 已在全球资助了千余家由工人控制的公司，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正在带头发展一个地方合作社基金网络。该基金目前需要地方组织者来建立地方信贷机构和孵化新的合作社，响应这一号召将是对本文提出的劳工组织和基层合作社发展的有力补充。这样一个基金网络 —— 如果由民主控制并自下而上地提供资金 —— 可以成为新合作经济和新社区参与劳工运动的基础。

毫无疑问，有组织的工人斗争是重要的。但是，过去的工会运动所发展的机构主要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内部发挥集体行动的杠杆作用。而现在，这些无产阶级机构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image]

激进派的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美国的社区组织工作历来以一种被称为 “以机构为基础的社区组织”（或 “基础广泛的社区组织”）的模式为主。这种模式在本世纪中叶由索尔·阿林斯基在芝加哥社区的工作以及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在南方各地开展的民权组织活动演变而来。民权运动的遗产显然是进步政治想象力的核心，阿林斯基的《激进分子守则》至今仍被用作组织工作的基础手册。这种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工会和宗教团体等社区机构已经在内部组织起来了，并且已经得到了社区的认同，因此它们是为社区利益开展更有力的组织活动的完美载体。例如，民权运动就是通过黑人教会的现有力量组织起来的。以这一传统为基础的主要组织网络继续在美国各地使用以机构为基础、主要是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方法，而公共利益倡导组织在许多问题的宣传活动中也借鉴了阿林斯基主义的传统。

然而，以机构为基础的组织活动依赖于我们所质疑的两个前提：一是社区机构已经存在，组织时机已经成熟；另一个前提是，只要人民有足够的参与度，施加足够的压力，代议制民主仍然可以为人民服务。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社区机构在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推进、有组织劳工的解散、公共空间和公立学校的私有化、娱乐和社区中心的关闭、以及有组织宗教对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重要性的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下已经崩溃。简而言之，如果社区机构匮乏，如果幸存的社区机构对许多公民的重要性大不如前，那么通过今天的社区机构开展工作并不会帮我们充分前进。

利用现有机构要求权力让步，也无法充分发挥阿林斯基自己的 “组织铁律” 的潜力 —— 即 永远不要做别人能为自己做的事。在以机构为基础的组织活动中，“铁律”意味着专业组织者应重视社区培训和领导力发展，而不是代表社区开展活动。前一种方法可以建立力量，发展组织或运动；后一种方法则会扼杀力量。尽管铁律背后的理念是正确的，但以机构为基础的组织工作并没有将其发挥到极致。在（勉强）

代议制的民主中，培训人们向权力杠杆施加压力仍然意味着最终要依靠他人 —— 主要是反应迟钝的 “民选”官员和不民主的机构 —— 来代表社区进行变革，而不是自己发起变革。

以机构为基础的组织网络和庞大的公共利益倡导团体生态系统还遵循另一个阿林斯基主义的核心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必须是具体的、直接的和可以解决的。而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些严格的要求限制了这些组织认为可能的范围，也限制了他们改变社会基本结构的程度。正如社区组织者弗朗西斯·卡尔波图拉和金·费尔纳（1996年）所问的那样：“为渐进式变革而进行的斗争是否包含了对社会结构的改变？”

> 「争取渐进式变革的斗争是否必然包含、甚至导致对现行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批判，或者它们只是以其他方式重新分割同样的蛋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也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参与这些斗争的组织 —— 据称是为了改变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 它们自己是否建立了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内部结构，还是仅仅复制了大社会的模式和文化？」

这里提出的模式确实侧重于满足社区利益的具体做法，也确实涉及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但重点始终是系统性变革的更大愿景。

尽管必须借鉴社区组织的传统，但在向下一个系统过渡时，我们必须优先考虑建立民主自治和自给自足的新社区机构，而不是通过回避提供服务的传统组织模式开展工作。创建和组织这些机构是建立社区权力的手段，使社区做好准备，在必要时发起更传统的组织运动，迫使政府或私营部门采取符合社区利益的行动。同时，这些民主合作社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在国家和私营部门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或要求时，通过互助网络和直接行动，填补福利国家萎缩的缺口。

黑豹党是这一模式在美国的最佳先驱。即便如此，其组织模式的激进潜力仍未得到充分发挥。成立于1966年的黑豹党明确提出了黑人权力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愿景，反对军国主义、黑人社区的贫困化和警察暴力。他们的 “服务于人计划” 包括为饥饿的学童提供免费早餐、合作鞋厂、社区卫生诊所和教育中心，以及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合作住房。他们经常用 “滞留在救生筏上” 的比喻来说明这些计划的功能 —— 社区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维持当前的生活，但永远不要忘记真正

的目标是上岸，是革命。黑豹将这些计划理解为“革命前的生存”——一种在社区获得解放之前维持社区生存的手段。

生存计划向社区证明，黑豹党对改善黑人生活是认真的。这种方法让黑豹在仅凭革命言论无法取得成功的地方建立了力量，成员人数也随之增加。即便如此，此类计划在结构上本可以比他们所做的更有利于建立权力。如果这些计划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和资本并与之对立的社会结构，那么生存计划也可以成为解放计划。通过满足社区的基本需求，这些机构打破了资本主义对人们生活的控制，使受压迫的人们能够在资本主义内部开辟空间，捍卫空间，从而改变自己周围的世界。这种“生存工作”与“解放工作”之间的关系是本文提出的政治愿景的核心主题。

黑豹党的成功与失败对我们在当下赢得真正的胜利有很多启示。我们打算借鉴黑豹党的传统，同时将他们的模式推向新的高度。

[image]

革命性机构建设实践

我们的战略框架中的这些活动部件如何才能共同作用以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接下来我们将利用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来证明，整合互助制度和参与式民主机构可以动员全社会开展有效的抵抗运动。然后，我们将为美国城市的革命转型描绘出一幅扩大这种组织规模的蓝图。

组织“第一次起义”

第一次起义爆发于1987年底，是一场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群众起义。这是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民众动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奥斯陆协定》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成立，并将其作为实现巴勒斯坦独立的框架。尽管这一框架存在缺陷，但这场人民斗争颠覆了以往关于事实上吞并被占领土和不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共识，永远地改变了冲突的进程。

关于第一次起义的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群众抗议在使以色列占领军无法治理巴勒斯坦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较少讨论的是社区互助组织和联合参与式民主在使这种大规模抗议成为可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下文的简要概述显示了这些机构是如何为反对当时最极权的政治秩序之一的革命运动奠定基础并使之持续下去的。

监狱系统内的组织活动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政治孵化器，也是在占领区这个更大监狱中双重权力发展的缩影。通过绝食，政治犯最终赢得了监狱内部自我管理的让步。他们组建了政治组织和代表机构，迫使监狱当局承认这些代表，并围绕卫生、教育和其他日常任务进行分工。巴勒斯坦囚犯将这种安排称为 tanthim dakhili（“内部组织”），类似于双重权力的概念。即使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这些囚犯也能开辟自治空间，为革命斗争创造先决条件。

囚犯们教授和学习从巴勒斯坦历史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种知识，通常每天学习8到14个小时。随着这些刚刚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政治活动家被释放回社会，抵抗运动被激发了出来。因投掷石块而被捕的十几岁男孩在几个月后重返战场，成为坚定、称职的组织者，他们学习了运动建设、公民抵抗战略和理论。

[image]
https://x.com/MikePrysner/status/1847021728322703362
https://x.com/MikePrysner/status/1847021728322703362

与此同时，监狱外的组织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萨利赫·阿布·拉班（Saleh Abu-Laban）是一名从1970年到1985年的巴勒斯坦政治犯，他说："当我进入监狱时，那里还没有‘民族运动’；只有秘密活动的地下牢房。而当我出狱后，我发现整个世界充满了组织、委员会和社区机构”。

巴勒斯坦劳工运动是这一社区组织新世界的核心。工会是在工人的居住地而不是工作场所成立的，因为移民劳工很普遍，而且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工会被定为刑事犯罪。工会随后与全国运动中的地方组织结成了牢固的联盟。这些地方工会通过巴勒斯坦共产党和工人团结组（Workers' Unity Bloc）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劳工组织者和社区团体组成的网络，将他们的阶级抗争与更大的民族解放计划联系在一起。

年轻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中学和大学组织学生会。在那里，他们召集示威游行，成立志愿者委员会，为难民营和贫困村庄服务，并将青年输送到民族运动中。青年在起义中培养了至关重要的团结做法，包括组建一个主要由学生管理的全国互助网络，以协调数十个地方委员会之间的服务提供。

在为第一次起义奠定基础方面，巴勒斯坦妇女运动也许是最重要的。这些女权主义组织者从解决其成员的实际物质需求入手，但有意将这些项目导向妇女解放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更高目标。她们成立的妇女委员会将被占领土各城镇的家庭主妇和劳动妇女聚集在一起。组织者在较贫困的村庄和难民营挨家挨户地接触那些不识字的、经济上依赖男人、主要局限于私人家务的妇女。免费的合作社托儿服务使这些贫困妇女得以加入合作社，参加扫盲和职业培训课程，并参与妇女委员会的政治活动。

妇女委员会是一个邦联系统，由各个委员会组成的网络以民主方式运作当地的项目。每个妇女委员会提名一名成员代表参加地区/区域委员会，地区/区域委员会再提名代表参加全国机构。这些全国妇女委员会与工会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扩大了互助供应线，并培养了社区领袖。

这些活动有多重目的。它们使军事占领下的生活条件更加宜居，使巴勒斯坦家庭在 无情的殖民化 面前得以维持。这些活动为妇女个人提供了更大的经济独立性，使她们能够慢慢挣脱父权控制的界限，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生活和民解放运动中来。她们奠定了“家庭经济”的早期基础，这种经济促进了巴勒斯坦人的自给自足，后来又以抵制和罢工等形式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持久的物质支持。最后，这些妇女建立了社区的组织能力，以发动一场广泛的社会斗争，吸引巴勒斯坦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些不同的地方社区机构相互合作，相互重叠。妇女委员会和志愿工作委员会联合开展了许多慈善项目，女权组织者管理着服装工人工会，政党则帮助将不同的劳工团体联系在一起。

劳工、学生和妇女运动最终凝聚成起义最重要的政治机构 —— 民众委员会（**al-lijan al-sha'abiyya**），并催生了激进民主的社区委员会管理。

[image] 第一次起义，巴勒斯坦，1987

1987年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用卡车在贾巴利亚难民营炸死了四名巴勒斯坦人，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迅速席卷整个领土。每个难民营和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结束占领。到1988年1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方工会、妇女委员会、学生协会、政党组织和友好邻邦等社会基础设施中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委员会承担了各种社会职能：收集垃圾、确定地方罢工日期、通过 “替代税收制度”募集捐款、分发食品和医疗援助、修复受损建筑、组织修建街垒、发展地方经济自给自足等等。

与妇女委员会一样，民众委员会也通过联盟结构相互协调。地方委员会提名代表参加地区/市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协调街区、营地和附近村庄的抵抗活动。这些委员会反过来又选出代表参加地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再派代表参加 al-Qiyada al-Muwhhada，即秘密的“民族统一起义领导”组织（UNLU）。1988年1月，UNLU首次开始分发小册子，详细介绍罢工日期、抵制以色列商品、游行以及对各个民众委员会的其他指导 —— 如呼吁发展 “家庭经济”、扣缴占领政权的税款以及辞去占领政府的职务。

这一结构充当了一个民主的联邦制影子国家，与镇压和不民主的军政府平行且对立，以热情的民族主义合法性和组织效力来弥补其对暴力垄断的不足。它实施了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抵抗占领的战略：破坏占领及其机构所行使的霸权；以平行机构来满足人类需求，从而取代占领；以及创建一个新的民族主义霸权来取代占领。

事实证明，这种组织结构对于协调地方行动，使其在全领土范围内保持一致也是至关重要的。它让普通巴勒斯坦人对斗争的方向和新社会的形成有了发言权。从根本上建立并行权力，才能动员全体巴勒斯坦民众抵抗集体被剥夺权利和财产的现状。对于我们这些从当今社会运动中兴起的横向主义中受到启发的人来说，第一次起义可以教给我们很多东西，让我们了解以一种实际而有力的方式真正实现这一理想所需的组织条件。

最终，镇压的规模让这一高度灵活的模式也难以承受。最有经验的组织者被监禁，对巴勒斯坦社会中广泛的收买或胁迫线人网络的偏执，最终使起义的组织能力支离破碎，进而崩溃，运动也随之瓦解。巴勒

斯坦解放运动在推翻占领政权方面本可以做得更好，这是另一种讨论；但该运动说明了这种基层民主机构建设形式如何能够引导规模惊人的集体行动，并使参与式民主和互助成为社会的指导力量。第一次起义的最终目标不是要建立自由社会或激进民主，而是用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取代占领。即便如此，具有不同目标的类似结构的运动也可以走类似的道路，并在像美国这样更自由的社会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民主是民族解放的手段；对我们来说，它们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image] 巴勒斯坦第一次起义，1987

迈向美国的双重政权

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证明了将双重政权组织起来的巨大潜力。将这种组织模式移植到美国环境中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将以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为例 ——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城市，也是我们首先打算开始将这里的想法付诸实践的城市。底特律也是当前新自由主义危机中受冲击最大的城市之一。底特律的治理不民主、房地产价值低迷、城市核心人口减少、点源污染严重、开发商势力巨大、贫困率高、以及种族隔离等问题，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也比其他大多数城市更为极端。整个“锈带”和其他地区的后工业化城市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和机遇，在底特律行之有效的方法很可能在其他城市也适用。

以下是一个不精确的蓝图，说明组织者如何从目前的条件出发，在底特律建立双重权力和自由意志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并通过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并行组织工作，在此基础上扩大规模。为了使我们的概述简洁易懂，我们将民主合作机构的发展设想仅限于住房、食品正义、能源和社区民主 —— 而不是试图为每一个可能的问题勾勒出类似的发展轨迹。这些机构和许多其他机构将在一个网络中进行协调，并通过战略升级的框架加以解决。换句话说，我们从现在能做的小事做起，同时计算每个项目和行动，为未来积蓄力量，将斗争推向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多个前沿。

[image]

住房公平

在这个全球快速城市化的时代，住房和房地产是阶级抗争的中心战场。开发商和房东凌驾于租户和公众之上的权力，让他们可以攫取财富和资源，人为制造稀缺，通过仕绅化和“城市更新”将贫困居民赶出社区，剥夺人类基本的居住权，压制能够提升共同利益的城市发展方式。然而，正是城市公地赋予了黄金地段的大部分价值 —— 通过其周围的基础设施、文化和人性。我们共同创造的这种社会价值被极少数资产阶级攫取，牺牲了我们其他人的利益。

底特律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率先采用各种方法来反击这种社会秩序。底特律大部分地区的房产价值严重低迷，但却正处于大规模仕绅化浪潮的风口浪尖（很可能在未来20年内）。房产价值低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房地产资本主义利益和剥削；自2005年以来，底特律三分之一以上的房屋因抵押贷款违约或拖欠税款而被取消赎回权。底特律市中心和中城的集中开发同时也播下了不包容“复兴”的种子，在这个黑人和低收入者占绝大多数的城市中，划出了白人和中产阶级的领地。

房产价值的上涨通过两种方式驱赶贫困居民：随着一个地区需求的增加，房东会提高房租，而无力承担增加费用的租户则会被驱逐；同时，随着房屋评估价值的增加，税收负担也会增加，如果房主无法负担新的房产税，他们将面临取消赎回权、房屋拍卖和被驱逐的命运。

许多已支付房租的租户也会因为房东未能支付房产税而被驱逐。

让法拍房家庭继续住在自己家中的有组织的努力已经开始。

Tricycle Collective 成立于2014年，该组织在县拍卖会上买下被占用的房屋，价格往往比拖欠的税款低得多，并将所有权签还给住户。尽管这种形式的临时税款减免对这些家庭至关重要，但这样做并无法改变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权力，是这些结构性权力推动了驱逐、住宅隔离和仕绅化。保障低收入公民住房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社会化：将住房从市场中剥离出来。

在短期内，最适合建立由社区管理的社会化住房反仕绅化堡垒的机构是社区土地信托（CLT）。社区土地信托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法律实体，受托进行符合社区利益的物业管理 —— 确保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保护环境资产，并推动社区合作发展。底特律 CLT 的领导结构是

按照激进民主的路线设计的，董事会成员可被罢免，对住房合作社成员负责，政策变更须经民主批准。

组织者将通过该社区土地信托基金筹集资金，购买被遗弃的和有人居住的房产（经房主或租户同意），对其进行修缮，并将其作为市场外的收入调整型经济适用房。与“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的模式一样，通过社区土地信托基金获得住房的人将承诺在未来的房屋修复项目中投入一定数量的工时（由自己或他人代劳），以扩大合作住房体系。

社区土地信托基金可以创造多种多样的住房景观，旨在促进有意识的社区建设，同时满足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从本质上讲，这种住房体系将最大限度地增加居民的选择权，并为各种形式的合作生活创造实验机会。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个人和家庭并不想住在公社里，强调扩大日常生活的合作领域不应成为进入的障碍。然而，还有许多人感到受制于当前住房选择的疏离和限制。在这种组织模式中，重振社区和反击我们的社会原子化是所有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思考居住安排。

在这个系统中，住房安排有两个轴线：预期居住时间和社区化程度。在第一条轴线上，住房选择的范围包括：为目前流落街头的人提供紧急临时庇护所；为寻求庇护的虐待和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过渡性住房；为从临时庇护所出来的人提供过渡性住房，作为接受其他社会服务的起点（住房优先模式）；为大学生或长期访客提供一年以内的短期住房；提供一至五年的半永久性住房，如有需要可延长；最后，为计划无限期居住的人提供永久性住房。

在第二条轴线上，可供选择的住房类型包括个人公寓和独户住宅，以及各种集体居住区。一些公寓将重新设计，使居民拥有私人生活空间，并与娱乐、烹饪和用餐的公共空间相连。邻里关系紧密的街区将与食品合作社相结合，这样，一栋建筑将拥有一个宽敞的厨房和餐厅，整个街区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聚餐，每周轮流做饭和打扫卫生。其他大房子和住宅区可能会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意向性社区的所在地。共同管理住宅、共享归属感和加深关系的仪式，以及集体抚养孩子，这些都是当前有意识社区的特点，这样的住房系统将加以培育和扩展。一些住宅或公寓还将采用坎普希尔和L’Arche社区的模式，让不同身心能力的人与健全人一起生活在社区中，或者采用混龄住房

的模式，以替代生活辅助设施中对老人的普遍隔离和虐待。

在不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之外开发可负担的合作住房选择，是防止底特律有色人种贫困社区被驱逐的重要一步。以这种方式使用的社区土地信托将促进社区发展，同时为解放社会奠定基础。

[image]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

粮食与环境正义

社区土地信托机构还能为被忽视的边缘社区带来粮食公正。在全国许多地方，这些机构被用来管理社区菜园。发展合作性、可持续的地方粮食系统对城市社区和生物圈都至关重要。城市社区菜园可以同时回收公共空间，扩大公民参与和社区社会联系，并为很少有机会获得健康食品的人们提供食物。在底特律，城市的大片区域都是食物荒漠，许多地方都已经建起了社区菜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菜园并没有相互协调，也没有为最需要食物的人提供食物。与住房问题一样，社区土地信托基金可以与这一双重权力组织的社会工作机构合作，将个人和家庭与供应社区菜园新鲜产品的互助网络连接起来。

即使从根本上扩大目前小型、零散的种植规模，这些菜园也无法满足底特律所有的食品需求。但它们将开始取代不可持续的、不健康的工业化食品体系，并发展出一个知情的食品运动，推动各地食品生产的根本性变革。

轻描淡写地说，资本主义食品体系亟需彻底改革。它是导致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以及土壤和水污染达到危险程度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过抽干蓄水层，用杀虫剂和除草剂毒害环境，用工业化单一种植取代复杂的生态系统，以及通过过度依赖石化肥料破坏全球氮循环的稳定，它侵蚀了所有农业（以及生命本身）赖以生存的生态基础。此外，这种系统生产的粮食在市场上分配不均。全球有 8 亿人营养不良，其中包括15%的美国家庭和五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畜牧业是最严重的犯罪者，其土地使用效率低下，对水、空气、土壤、气候、野生动物栖息地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我们的农场和渔场对工人进行可怕的剥削，对动物本身进行肆无忌惮的虐待，并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社区菜园让人们买得起、吃得到农产品，是迈向以植物为基础的食品体系的重要一步。

社区菜园的这种作用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正如由家长经营的托儿合作社既增强了工人阶级妇女的能力，又挑战了父权制规范；正如恢复性司法实践既削弱了警察和监狱的权力，又挑战了这些机构背后非人化且往往是种族主义的信念；可持续的社区菜园也将既为人们提供食物，又挑战传统农业的贪婪逻辑。通过在城市园林和住宅中采用永续农业和农业生态学的原则，也就是说，通过将人类社会和食品生产融入我们的生态系统，而不是将其消灭，人们会更加意识到自己在食物网中的作用，减少与非人类世界的隔阂。社区菜园应欢迎每个人作出贡献，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

然而，组织者还应该努力通过共同种植维系我们大家的食物的实践，传承绿色和后人道主义伦理 —— 对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相互关联的生命世界的深刻尊重。如果不培育和传播这些价值观，任何社会主义项目都不可能取得长期成功，因为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会威胁到每一个社会。

生态努力最终必须超越食物，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服装到科学研究，从交通到娱乐，从资源开采到废物管理。非人类的利益最终也必须在参与式民主的结构中得到体现，通过人类代理人让他们发出声音，并通过明文规定的规范将某些活动列为禁区，类似于目前为生态系统和非人类个体提供法律权利的倡议。但研究表明，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帮助人们培养对自然的情感依恋。

[image]

能源民主

能源生产、分配和消费是城市环境和阶级抗争的另一个重要场所。与美国大多数大都市一样，底特律的能源网由国家支持的私人垄断企业控制。能源公司（DTE）通过州监管机构制定的价格，确保所有基础设施投资获得 10%至 15%的回报。这是一种特别具有剥削性且（如下所示）脆弱的能源资本主义模式。有效的、有远见的组织者可以帮

助社区绕过企业垄断的价格欺诈和污染，通过社区所有的可再生分布式发电网为所有人提供负担得起的电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生产一直都是复杂和资本密集型的，需要技术和专业知识，这就使得精英控制的集中化成为可能。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在《化石资本：蒸汽动力的兴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一书中指出，工业生产从水力发电转向煤炭发电，实际上是出于资本主义加强对劳动力控制的需要。使用廉价水力发电的纺织厂只能建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尽管蒸汽动力更为昂贵，但它可以在任何可以运送煤炭的地方为纺织厂提供动力。由此产生的资本流动性使资本家得以在城市中心建厂，与农村河边的厂址不同，城市中心有充足的劳动力后备军充当临时工，并有强大的国家来惩罚罢工的工人。对能源的集中控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社会权力。对风能和太阳能等新型分布式能源生产的社会所有权可能会威胁到这种权力。

社区能源已经开始在底特律扎根。2011年，由于拖欠电费，DTE公司收回了高地公园的一千多盏路灯。为此，高地公园的居民成立了一个名为“Soulardarity”的组织，负责安装社区所有的太阳能路灯。成员每年缴纳会费，以维持和扩大该计划。Soulardarity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但它的模式有潜力扩展到太阳能电池阵、风力发电以及为成员家庭供电的高效电池系统，尤其是如果将其纳入更广泛的多问题战略框架中。太阳能电池阵可以由社区土地信托基金管理，社区拥有的无线路由器可以与路灯相结合，为公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住房合作社也可以在防寒保暖和节能措施方面开展合作。

与社区园艺一样，组织能源民主也为普及环境教育提供了机会。如果不采取措施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Soulardarity 就没有可信的平台来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相反，通过将教育工作植根于社区成员参与的具体项目中，Soulardarity 可以有效地倡导气候问题和环境正义。

能源经济的所有权结构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一环。正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在“This Changes Everything”一书中所言，要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通常需要对电网进行民主管理（而非盈利管理）。

[image]

社区委员会

所有这些互助和参与性社会服务工作的核心是建立激进民主的机构。就像第一次起义中的巴勒斯坦人、革命时期罗贾瓦的库尔德人、以及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加泰罗尼亚人一样，美国社区应该积极组织地方大会，让自由公民聚集在一起做出决策，并赋予这些机构政治权力。底特律有几个很好的起点。

底特律的街区俱乐部历史悠久，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邻里委员会。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街区俱乐部和更多非正式的社区网络在防止许多社区彻底崩溃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那些在经济衰退中抵御得最好的社区，都是那些已经建立了有组织的街区俱乐部的社区。他们修剪空地和草坪，驱赶可能的抢劫者，并在基本服务延迟或缺失时与市政府沟通。不过现有的街区俱乐部通常是非政治性的，而且大多是超地方性的，几乎没有影响更广泛的城市政治的愿望或能力。但作为参与式民主的孵化器，它们可以与其他合作机构协调，承担更多雄心勃勃的社区项目，并在此过程中积蓄力量。

另一个起点是租户组织。“社区工团主义”或“社区工会主义”是一种组织租户与房东进行集体谈判的策略。租户联盟实质上是围绕公寓楼或住宅区组织起来的邻里委员会。租户组织工作和合作住房工作与民主理事会的发展都有重叠。“夺回土地”运动的组织者谢恩·伯利（Shane Burley）在向工作场所以外的斗争输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劳工组织方法的背景下讨论了社区工团主义。他指出，正如该传统中的工会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推翻时成为能够取代老板与工人关系的结构一样，租户社区工会也可以争取接管物业管理。然而，伯利并没有将工人和租户组织的这一目标——即形成解放社会的机构——转化为政治上的社区自治。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发展这样的委员会是为了重构植根于社区参与的民主治理，而不仅仅是几栋楼的自主管理。

社区委员会联盟将监督社区合作社和互助网络的管理。下一步将是把这些委员会纳入城市治理本身。在底特律，最近的城市宪章修正案允许市议会区的居民成立社区咨询委员会（CAC）；然后，他们的市议员必须定期与这些委员会商议并主持公开会议。建立或接管这些 CAC 可能是迈向激进民主治理之路的一个起点。在其他城市，具体的机制会有所不同。一些城市效仿巴西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的做法，开展了参与式预算试点项目。迫使城市采用这种治理模式将是向

赋予社区委员会权力和建立民主联邦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

社区委员会和其他项目所维持的公民参与水平也将使这一革命性的社区组织能够通过选举直接夺取市政权力。然后，可以重写《城市宪章》，朝着激进参与式民主的方向调整城市治理结构。在这一阶段，本文所述的机构建设战略将开始产生市政变革的连带效应。

[image]

提升激进民主

市政当局为推动所有其他运动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新杠杆。对合作信贷流和社区共同基金的公共支持将极大地扩展后资本主义经济。一旦合作住房的范围足够大，足以证明概念的正确性并削弱开发商的权力，新的政治基础和市议会的支持就可以用来进一步实现土地和住房的市政化。只要参与式民主在合作住房系统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得到法律的认可，合作住房的市政化将极大地扩展社区的可用资源和法律权力（如征用权）。底特律市可以保证住房是一项人权。

市政当局还将允许市民将整个能源网市政化，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进行公共利益管理。这样，有投票权的公众就能迫使彻底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有了足够多的围绕社区能源所有权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向能源民主的转变是完全可行的。在密歇根州，州监管机构设定电价，以保证 DTE 公司在一定范围内获得高昂的投资回报。如果电力需求下降超出预期，他们就会重新计算并提高电价，以维持类似的回报水平。这种定价结构有可能推动能源垄断企业的破产：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合作可再生能源发电，DTE出售的电力价格将上升，社区所有权的平均资本成本将下降。最终，DTE 会因为要为股东维持如此高的回报率而被迫陷入财政危机。到那时，市政府将完全有能力将电网市政化，并购买任何符合公共利益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如 DTE 的太阳能电池板）。

利用民主权力控制市政决策的制定，意味着底特律的再发展将有一个全新的方向。像地段价值税、扩大公共交通和恢复性司法实践这样的非改良派的革新都将触手可及。本文没有足够篇幅讨论到的其他许多重要政策也是如此。这种激进的组织方式还可以建立一个植根于社区诊所的全民医疗保健系统。它可以大大缩小警察部队的活动范围，并

通过社区巡逻队以及由训练有素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冲突缓和者组成的社区团队，将所有公共安全服务置于平民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规划公立学校，将混合式大众教育模式和基于社区的学习融入公共领域，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我们可以在全市范围内设置共享单车、物资回收工团、社区中心和时间银行。

[image]

结论： 超越城市的“下一个系统”

假设我们能按照自由意志主义市政主义的路线，重新配置一系列像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让市政官员直接向分散化的社区委员会联盟报告，并利用新的城市治理结构来鼓励公民社会中社会主义机构的发展，正是这些机构的发展使得革新成为可能。

合作社、共同基金、社区土地信托、集体住房、社会服务、城市农业网络以及其他此类创新都将得到推广。那下一步是什么？

地方行动本身不足以真正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国家暴力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所以它们的替代品也必须如此。一旦我们建立了双重政权，我们就可以转向更大规模的变革，这是摆脱资本主义的转型所必需的。问题是如何从地方和市政机构发展到一个由经济合作社、互助组织和民主决策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从而挑战并最终颠覆现有的权力结构。

其关键在于库尔德革命家阿卜杜拉·奥贾兰所说的 “民主联邦主义” ，即布克钦自由意志主义市政主义的一个版本。这种政治制度以地方协商民主为核心，但通过网络实现区域的合作，最终实现无国界的全球合作。例如，底特律任命的代表可能会参加一个地区大会 —— 最初可能是中西部城市的一个网络，但最终是一个包括特定地区内所有农村、郊区和城市社区的大会。随着代表社区数量的增加，联盟的级别也会增加 —— 从社区到市、县、州或省、地区、国家、大陆，最后到全球。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可能与美国的联邦制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民主联邦制的主要权力中心在基层。代表必须接受即时罢免，并对社区的意愿负责，而上级机构则主要侧重于协调，尽可能将政治活动留给地方社区。

在某些方面，区域协作与城市内部协作的运作方式相同 —— 联盟参与共同的斗争，创建自治机构来协调经济并使之民主化，并通过使国家权威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过时来削弱国家。这些地区性民主机构还将连接各自社区的经济和公民社会。中西部城市网络将在必要时汇集和重新分配资源，交换商品和服务，并共同规划政治行动。随着两种权力的紧张局势逐渐显现，这种联合政治行动将变得至关重要。应对这些紧张局势的策略将因国家而异，这取决于国家是同情还是敌视转型，或者更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在同情的情况下，比如在左派或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期间，民主联邦制已经扎根的城市将有机会推动有意义的进步改革。

联邦将汇集资源，建立政治联盟，赢得从全民基本收入到严格的环境保护，再到对合作企业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将为城市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以继续建立其替代性的后资本主义体制。当然，从长远来看，与国家共存是不可能的 —— 即使是相对民主的国家也不可能愿意将大量的政治权力让渡给地方组织，也不能指望它们会自行消亡。但是，这场运动应该愿意与它们合作，向它们施压，要求它们进行有益的改革，即使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它们的所有职能 —— 而且，当时机成熟时，效仿阿伦特，通过撤回公众支持来窒息它们的权威。

更困难的是敌对的情况，如专制或右翼政府统治下的情况。如中国。这种国家可能会使用暴力镇压任何地方起义，巴勒斯坦第一次起义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或者，他们可能会剥夺一个社区决定自己未来的合法权利。

例如，化石燃料行业的许多美国州政府都禁止乡镇和城市反对水力压裂。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试图大规模驱逐移民，这就需要庇护城市团结起来抵抗。

孤立的革命是最脆弱的，因此在敌对状态下，联邦和地区联盟显得更加重要。如果国家试图镇压革命，同情革命的城市（尤其是与国外社区建立联系的城市）可以发起自己的政治运动，反对敌对政府、或援助被围困的盟友。通过永久化的社区机构，而不是像许多抗议活动那样昙花一现，各种进步的社会运动将得到加强。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替代方案的存在，是引发足够多的阿伦特式不服从以削弱国家的唯一希望。

这种激进民主战略的雏形已经在许多国家出现，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而自由意志主义左翼之间的全球对话则可以促成这种跨国联盟的诞生。希腊的互助组织基地、恰帕斯的萨帕塔主义者、罗贾瓦的库尔德革命者、以及阿尔及利亚西部的撒哈拉难民社区，都是左翼政治国际转变的典范，其根基是“社区优先于政党”，人们日益认识到国家不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通过组织跨国界的活动，我们可以共同建设我们希望实现的平等主义和生态社会。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预料到私营部门会对我们怀有敌意，从而加速了团结和联合的必要性。合作经济必须在城市之间形成网络，才能发展得足够大、足够有韧性，成为资本主义可行而稳定的替代品。区域性政治机构也比地方性政治机构更有能力成功遏制资本主义势力，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的规模更大。更大规模的机构也更引人注目，因此更适合作为全球社区的典范。

随着民主社区替代方案的推广，整个政府和资本主义产业将一个接一个地解体。这将给我们留下什么？

重要的是不要预设未来社会的准确轮廓，因为任何静态的蓝图都无法预测不断变化的环境，而新制度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民将以民主的方式设计它。尽管如此，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主继承者必须解决一些大问题：劳动力套利和资本外流、去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发展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些全球社会经济问题中推测出下一个体系的生存方式。

这些解决方案相互关联，需要新的全球机构来管理。这些机构需要通

过类似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协议来控制跨国公司 —— 可能需要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再分配税收。这一全球网络还需要编纂普遍劳动权利（通过全球最低工资、普遍工会权利以及全球商定的将生产控制权移交给工人和社区的机制），并通过国际劳工组织进行管理。最后，需要制定大量合作性经济规划，以发展去工业化的国家，同时过渡到生态可持续的经济 —— 富裕国家的绿色新政和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马歇尔计划。

显然，这些目标最好由国际甚至全球决策机构来实现。在我们看来，这些决策机构应由一个权力相当有限的全球代表机构组成，对地区机构负责，而地区机构又对通过参与式民主管理的更大的地方机构负责。只有地方和地区层面的民主联邦制，才能使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出现的机构对世界人民负责，而不是对遥远的精英负责。

这些政治组织将由工人和公众民主管理的合作经济企业来维持。社区本身将决定生产和分配（至少）必需品 —— 作为核心公共产品管理的食物、住房和医疗保健。所有合作企业都将对社区委员会负责，以确保满足社会和环境的需求。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些目标，美好的未来将属于我们。

工作时间将大幅缩减，休闲时间将激增。艺术和徒步旅行等资源密集度较低的娱乐方式将使我们的身心和生物圈更加健康。几乎每个人都将以城市水耕系统或与当地生态系统共生的生态农业农场种植的植物性食物为生。能源将主要来自风能和太阳能，与建筑环境融为一体，而不是取代野生动物。废物将被重新利用、生成新材料，从而不再需要垃圾填埋场和采矿。

当我们建立了自下而上的民主治理，消除了私人利润，并开始恢复地球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下一个系统”？也许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已经结束。这里所阐述的愿景的核心精神 —— 社区控制、地方实验和激进民主 —— 意味着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想预测。就连本文的作者也无法就所有细节达成一致 —— 对于非必需品，是否应该保留一定的货币、市场和私有制？还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应该完全公共化？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应该减少民主决策中面对面协商的需要？但是，这些细节需要现在和未来的社区中的人们去讨论和尝试。唯一可

以确定的是，变革应遵循平等主义的原则 —— 这些原则可以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态主义或后人道主义，但遵循这些原则仍然允许实现实用主义和多样性。

没有完美的世界，但肯定有更好的世界。即使是我们对下一个系统的愿景，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的话，也不会是千篇一律或一成不变的。这里所描述的路径和系统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个框架，一种确保未来的系统能够代表并响应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需求和愿望的方式。而真正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则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追随萨帕塔主义者，他们在据说“历史已经终结”的那一刻奋起反抗，引发了一场革命浪潮 —— 一场生态意识、激进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的全球运动，而我们现在仍在乘风破浪。他们走出墨西哥丛林，要求一个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一个真正民主和正义的世界，一个所有世界都适合的世界。他们给想要提供帮助的国际志愿者的建议很简单，在今天这一建议已经变得更加响亮：「在你们自己的社区建立萨帕塔主义」。30 年后的今天，现在开始还为时不晚。

关于作者：共生研究集体

约翰·迈克尔·科隆（John Michael Colón）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作家。他的兴趣包括前卫艺术和文学、思想史、异端经济学、社会学和出版。他曾为《今日美国》和《阿斯伯里帕克报》做过报道，并为 WPRB 103.3 FM 制作过新闻和文化节目。刚刚获得比较文学学位的他开始了诗人、小说家和杂志自由撰稿人的职业生涯。

梅森·赫森·霍德（Mason Herson-Hord）是汽车城自由骑士组织的一名组织者，与公交车乘客一起为底特律大都会区更好的公共交通而奋斗。他的主要政治和学术兴趣是去殖民化、激进女权主义和生物区域主义。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

凯蒂·霍瓦特（Katie Horvath）是一名社区组织者，她最近离开了以机构为基础的组织工作，转而致力于在底特律建立双重政权和创建下一个系统。她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学士学位。

代顿·马丁代尔（Dayton Martindale）是《In These Times》的助理编辑。他的写作和活动参与了各种社会变革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气候

正义和动物解放运动。他的作品曾发表在《In These Times》、《Earth Island Journal》、《Truthout》和《The Nassau Weekly》上。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学学士学位。

马修·波格斯（Matthew Porges）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名作家和研究员。他专门研究地缘政治与环境的交集，重点是北非。他的工作足迹遍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和印度。

□

[image]
[image]

打破共识现实：从同意的政治到革命的诱惑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7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共识 创造力 反叛 同意 强奸 性 想象力 无政府主义 欲望 米兔 诱惑 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iyp MMartinez

除非你能做到改变产生欲望的条件，否则你不可能仅仅通过满足现在的欲望来获得解放。

- Table of Content

  同意就够了吗？
  共识现实、非暴力、自由(派式)同意
  我们能拯救 "同意"的政治话语吗？
  欲望、同意和政治
  诱惑介绍
  转变、邀请、传染
  诱惑失败时
  进入未知世界

[image]

我们这些为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而奋斗的人们面临着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我们不想成为先锋，不想去"领导"他人、不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因为这与我们反权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要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就不得不采取目前大多数同胞可能不喜欢的策略。数百万人的贫困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要求我们采取果断的行动。我们绝不会诉诸我们强烈谴责的专制手段。那么在此条件下，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让我们挑战现行体制？

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形成了优先考虑“同意”的做法，以此作为对这一困境的临时回答。我们通过性教育工作者了解到这一论述，他们将“同意”宣传为在强奸文化中“培养相互尊重的性行为”的工具。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和其他关系中应用这种模式，寻求尊重他人的自主权，避免做出违反他们的“同意”的行为 —— 也就是说，在他人决定并表达自己的愿望时，保持在他们所希望的界限内。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强迫，无论是身体上的、口头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强迫，并坚持参与或不参与我们选择的任何事情的自主权。

然而，在性领域之外，“同意”的话语并不总能为评估直接行动的战术和策略提供一个充分的框架。了解一项行动是否得到了“同意”，可能并不足以说明它是否有效或有价值。意识到大多数人会反对我们的某些策略，我们不会在“同意”的基础上计划我们的行动，但我们也不渴望成为先锋。此外，由于“欲望”只能建立在你所知之事的基础上，因此，除非你能做到改变产生欲望的条件，否则你不可能仅仅通过满足现在的欲望来获得解放。

那么，如果不从 “同意”的角度出发，我们还能如何构想我们的政治项目呢？

仔细审视我们的活动就会发现，在倡导反叛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是在按照一种诱惑的逻辑行事。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这种重构的影响了？让我们从研究 “同意的政治” 及其局限性开始。

[image]

同意就够了吗？

乍一看，把我们的政治实践建立在 “同意” 理论基础上的想法会显得很直观。我们对国家的批判是什么？国家是一个对我们行使权力甚至生杀予夺的机构，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是否“同意”被治理。选举制度根本无法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同意”所需的有意义的选项。以前就有

人说过："我们的愿望永远无法装进他们的票箱"。我们提倡自愿结社的原则 —— 让我们可以自由组建任何团体和集体，而不必被迫参加任何团体和集体。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资本主义、政府、警察以及所有强加其统治的等级制度说不，因此这些显然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达成共识。只有在我们摒弃主宰我们生活的强制制度时，我们才能在"同意"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关系：到那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控制别人，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很有道理 …… 不是吗？当然，这种关于 "同意" 的论述为想象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但它是如何作为一种战略来推翻旧世界的呢？我们很难设想有哪种政治实践既能严格尊重所有人的"同意"，同时又能破坏这个等级制社会的结构。如果我们坚持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就必须通过非强制性的过程来瓦解强制性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从而建立一个非强制性的社会。放弃这一愿景可能会破坏无政府主义的基础。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摆脱资本主义和国家 —— 即 经济和政治胁迫的基础 —— 我们就永远无法到达一个以"同意"为基础的框架能够真正站得住脚的社会。

该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呢？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同意" 的含义，以及它在我们的社会和运动中是如何运作的。

[image]

共识现实、非暴力、自由(派式)同意

权力与"同意"是紧密相连的。权力失衡会导致自由同意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可能与一个孩子发生"自愿的性行为"吗？遭受他人经济控制的人能够"自由地同意"他人的欲望吗？要使同意有意义，就必须能够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根据自己的条件说不。当国家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当经济控制了我们的生存手段，我们就无法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我们"同意"的能力的边界称为共识现实。

共识现实是权力关系体系中可能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它不仅通过传统的控制机构 —— 如大众传媒、宗教和家庭 —— 来实施，而且还通过常识、民间话语和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无数微妙规范来实施。它并不像民主神话中所说的那样，"只是我们所有欲望的总和，在一个

伟大的妥协中融合在一起，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和睦相处”。共识现实构成了统治阶级为尽可能有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同时剥削我们所有人而做出的协调一致的努力。资本主义民主确保了这种效率；它是目前为最多的人提供加入剥削阶级阵列的动力的制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选择，掩盖了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极度缺乏自主权的事实。资本主义民主的王牌是这样一种理念：在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和影响欲望的思想市场中，每个人的同意都会得到尊重。

我们可以争辩说，这个市场并不是真正自由的 —— 巨头公司控制着大众传媒，一些观点比其他观点得到更多的传播，因此“同意”并非完全知情 —— 这没错，但仅如此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显然，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可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平等地获得施加影响的手段。但决定我们体验现实的框架的是权力体系，而不仅仅是言论。所有政治制度 ——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 都会产生特定的社会关系模式。仅仅对这些制度进行讨论并不能超越其所处的框架。

【注：例如，“自由”发言的能力本身似乎证明了一种制度的正义性，因为国家确保 “言论自由”。而在无政府的社会关系中，我们自由发言的能力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不需要国家来 “保护” 它或界定言论的界限。当我们把表达自己的愿望说成是 “行使权利”时，就已经在从我们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来定义我们行动的合法性了，而不是断言我们的愿望从根本上就是有效的。】

自由言论为每个人提供了自己的一盒彩色粉笔，用来装饰脚边的水泥块，并称之为“自由”；至于我们能否从这里走开，根本不在讨论范围内。我们对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体验，远比我们的想法和论述更能决定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感觉。为了改变我们的想象力和欲望的边界，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让新的体验超越共识现实的界限。

举个例子，在每个组织联盟和占领运动中，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什么是暴力？乍一看，这个词似乎并不比最高法院对“淫秽”的定义更有连贯性：“我无法给它下定义，但我看到时就能认出来”。这使得它成为自由派秩序党用来控制群体规范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工具。不过，回顾一下暴力/violence和违反/violation的同源

词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词的使用背后的含义。所谓暴力，就是任何“违反合法使用武力规范”的行为，这些规范是由国家规定的，并已纳入我们的“共识现实”中。关于暴力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话术，在这种话术中，“非暴力”代表了“同意”；当我们试图为自主性和战术多样性留出空间时，我们的对手会认为我们仅仅因为反对共识现实的条款而无视“同意”。

请看我们当地占领运动中一位焦虑的自由派人士是如何对自主行动的占领者“非法占领建筑物”感到失望的，并因此努力拉开占领团体与占领运动整体之间的距离。他对记者说：“我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没有违法。” 占领大楼不涉及身体暴力，也不涉及财产损失，甚至在他自己的定义中也没有任何可以被理解为“暴力”的行为，而挥舞着步枪的暴徒的驱逐行为却暴力得足以震惊整个政治光谱。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在这里，有意义的“暴力”似乎是对共识现实的破坏。这位自由派人士想要表达的是：占领大楼的行为侵犯了他的同意权。为什么呢？因为这与他感到投入其中的潮流有关，但他却没有被邀请参与决策，而且这涉及到他个人不喜欢的行动。当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自主开展了占领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公众大会上达成共识，去做这样一件极大地挑战共识现实的事情。占领是否伤害到任何人并不重要：它的 “暴力”与其说是字面上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对共识现实的挑战。对这位自由派来说，这种挑战构成了对集体“同意”的侵犯。

我们姑且称之为 “自由派式同意”：我们必须在策略上遵守最保守的共同标准，否则就会违反他人的“同意”。按照这种逻辑，无论我们选择与否，我们都必须忍受这种制度，因为任何违反制度的行为都会将我们置于危险之中。这已经超越了对代表性的批判 —— “未经我的同意，你就不应该代表我采取行动”；而是对自主性的批判 —— 因为任何假定与他人“有密切关系”的行动都会受到共识现实所规定的界限的约束。

✂

这就是接受政治同意框架的风险。在这种逻辑下，任何团体或联盟中最温和的部分都将凭借其与共识现实的一致性而占据主导地位。对任何人来说，什么是“好的”，都是基于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好的”，这

就使得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的策略看起来与我们试图改变的世界非常相似。如果我们确实渴望彻底打破现存的制度，那就不要把自己困在与我们想要摧毁的体系完全一致的框架中。

“非暴力”是唯一能够全面保护共识现实、抵御所有想要改变它的人的对抗的意识形态。通过先发制人地谴责任何超出公民话语范围的行为，它确保了任何反抗最终都会强化权威的基础框架，甚至将维持秩序的责任转嫁给忠实的反对派。根据这一逻辑，自由派与暴力控制系统的共谋可以说是“非暴力”的，因为它们接受共识现实所规定的“合法性”边界。正如每一个和平主义者都谴责针对国家的武装斗争和反叛一样，从金博士到甘地，他们被引用的每一场所谓的 “非暴力” 运动和革命的成果，都建立在明确使用或威胁使用国家暴力的基础之上。我们对自由派不愿承认国家从根本上是暴力的而非偶然暴力的态度摇头，但暴力与共识现实交织得如此天衣无缝，以至于根本无法察觉。

> 自由派如此焦虑地反对的“暴力”，顾名思义，就是破坏共识现实的暴力。而这也正是我们认为这种暴力是必要的原因：把抵抗说成是表达我们的 “异议”，这并没有攻击共识现实，而只是表明了我们在共识现实中的立场。 在共识现实中并不存在对立的党派 —— 共和党和民主党、积极分子和反动分子 —— 相反，这里只有支持共识现实的党派和反对共识现实的党派。

简而言之，自由派的 “同意” 概念是革命的障碍。根据定义，打破共识现实不可能是“协商一致”的。我们必须超越政治同意的话语，去想象改变现实的解放战略。

[image] 夏洛特，街头贴纸

我们能拯救 “同意”的政治话语吗？

是的，自由派的 “同意”只是捍卫共识现实的工具，对我们的解放计划毫无用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同意”话语本身。那么是

否有办法在基于“同意”的框架内回应这些反对意见呢？

让我们来探讨一些对自由派“同意”言论的可能回应。

「决策应优先考虑受影响最大的人」

根据这一原则，一项决策对一个人的影响越大，他/她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例如，在决定是否建造新的公寓时，贫困社区长期居民的意见应比开发商或较富裕的新居民的意见更重要。因此，一项行动的共识程度并不取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每个公民是否都会在选票上勾选 “是”或 “否”；相反，个人的感受会根据后果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按比例加权。

这就避开了在权力差异中协商政治共识的一些问题；作为一种在基于超越利润动机的价值观的社会中解决优先事项冲突的方法，它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这一原则是否能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有用的指导呢？我们无法轻易确定“谁”会在通过制造不可预知的局面来开辟变革前景的战略中受到最大影响。在一些活动家看来，那些最容易受到激进战术潜在后果影响的人，很可能无法承受任何超出共识现实政治范围的战术升级的影响。而在实践中，这种担忧可能会强加一种战术保守主义，复制自由派式“共识”的效果，并在有效抵抗与优先考虑他人安全之间制造二元对立。

【注：从2005年就职典礼后华盛顿特区亚当斯摩根的游行到奥斯卡·格兰特起义，只要集体行动不和平、不合法、不完全平息，这种情况就会一再发生。那些更容易受到国家暴力或其他潜在升级后果影响的人 —— 更常见的是，那些自封的发言人，他们的特权让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人 —— 大声疾呼反对激进策略。由于许多无政府主义鼓动者部分受到白皮肤、男性身体、无子女和合法公民身份等特权的保护，因此，如果不征求可能受到影响的弱势人群的意见就提高赌注，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经常反驳说，那些受到特权保护的人恰恰是应该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危险境地的人。但在可能引发爆炸性冲突的大型混杂人群中，“同意”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自以为是的左翼分子认为，聚集在街头的目的仅仅是为了 “向权力讲真话”，但我们其他人必须想办法引发冲突，

以免加剧敌人在我们这些“坏抗议者”和我们的潜在同志之间制造的隔阂。】

另一方面，在试图根据这一原则使我们的努力“合法化”的过程中，有时会落入一个陷阱，即 用支持某项行动的少数人作为例证来代表整个想象中的人群。我们把对我们的活动表示热情的特定当地人、工人阶级、原住民或其他人赋予一种神话般的真实性，暗中把那些不支持我们活动的人一笔勾销了。我们把这些支持者变成了自己的某种假肢，使我们有权对抗表面上的“多数派”，把我们选择的同志想象成代表“受影响最严重的人”。每个活动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假想朋友，不管是国际工人联盟组织者青睐的工人，还是反对移山运动争取到的西弗吉尼亚当地人，亦或是嘻哈视频中的临时演员，起义者都希望他们能和自己一起走上街头。

这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我们高估民众对我们行动的支持。然而，我们有各种合理化的理由来加固这种做法：我们没有看到公众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最边缘的人群（我们假定他们最有可能支持我们不受欢迎的行动）最没有自由公开表达这种支持；等等。这些论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当我们把赌注押在对这种假想朋友的幻想上，试图通过代理权衡未被代表者的同意时 —— 我们假定的与他们的密切关系现在代表了他们的“同意” —— 这只是相当于自欺欺人。

「决策范围必须扩大到所有受影响的人」

通常情况下，许多会受到所谓协商一致的决策影响的人并没有适当的影响力。例如，大学理事会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决定提高学费，但如果没有支付学费的学生的参与，这算哪门子协商一致？如果决策包括了所有利益相关者，而精英们又不能以武力将其强加于人，那么“同意”政治不就有希望了吗？

听起来有道理。但不幸的是，这个框架更适合于事后阻止行动或质疑其有效性，而不是发起行动。而无政府主义起义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的追踪能力，也超出其所能触及的生活范围。我们甚至不可能清楚地知道每个会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是谁，更不用说从他们每个人那里征求有意义的意见来确认或否定共识了。在实践中，要让每个受影响的人都参与决策，要么需要诉诸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

—— 而不是基于“同意”的框架 —— 要么，就接受决策的不可能性。

在此，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 在许多问题上永远不可能达成广泛的共识。我们或许可以就今晚上吃什么达成一致，但在如何组织社会和分配资源的真正问题上，今天不可能达成共识。在一个由种族主义和父权制分层的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从根本上就存在冲突。当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世界：人们不会为了地位和生存而互相残杀；但是，我们不可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抛弃现在这个阶级世界。

【注：这一分析的含义之一是，我们必须切实认识到冲突是一个现实。我们提出的愿景不仅仅是要创造一个“人人都同意”的世界。我们努力尽可能优先考虑彼此的同意，同时认识到有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冲突，必须承认冲突，而不是把冲突当垃圾扫到被强加的共识的地毯下面。我们的理想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而是一个冲突不会产生等级制度和压迫的世界。我们设想的社团可以根据我们的愿望走到一起，也可以分开；与国家不同，这些社团不需要强加的共识。 】

「我们是在自卫」

按照这种推理，压迫性机构的运作构成了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不需要得到攻击者的同意就可以进行自卫。这种伤害并不总是停留在字面的、直接的、个人的层面上，在一个复杂到无可救药的全球经济中，几乎所有试图发起防御性反击的行动都会显得要么是象征性的，要么是方向错误的。尽管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接行动可以被定义为捍卫我们自己，反对国家和资本违反我们的“同意”。

但是，直接行动作为自卫的说辞并没有为我们如何前进提供多少指导。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和资本是主角，而我们自卫的各种表述只是他们行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做出反应，而不能制定新的战略举措。此外，“自卫”的框架是建立在自由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的，我们的个人私权始于他人的私权，终于他人的私权。我们要捍卫的是什么？我们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下的社会角色吗？国家“赋予”我们的权利吗？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应该为摧毁自我而战！当然不是指我们的身体和生命，而是我们由国家和资本构成的“自我”。

如果我们的自我延伸到银行的窗外，如果我们的自我如此广泛地重叠，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框架 —— 我们不仅仅是在自卫。在最好的情况下，自卫是一种理由，而不是一种实践；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一种虚伪的烟幕，导致我们缺乏一个框架来评估自己的有效性。

「同意必须是知情的」

在所有以“同意”为基础的伦理体系中，无论是医疗体系、性、还是其他体系，真正的“同意”都要求充分了解某个决定的影响。在政治层面，这种批评认为，如果人们都能获得完整的信息，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就是自由派的基本假设：“当人们能够获得所有相关信息并公开讨论这些信息以做出理性决定时，就会产生最好的世界”。

这种推理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没有考虑到权力动态。当金钱和财产的获取决定了人们的行动能力时，在国家垄断所有使用暴力的特权的统治之下，知识实际上并不是力量。此外，它似乎要求一种完全透明的政治，这要么会排除任何所谓的“非法活动”，要么会把我们所有人都送进监狱。知情同意的框架既无法让我们想象如何就革命达成共识，也不足以决定与谁分享多少关于我们为革命而采取的行动的信息。

在得出 “同意” 框架无法满足我们的政治需求这一结论时，我们 并不是 赞同违反 “同意”。相反，我们是在承认，同意框架还不足以超越自我否定的二元对立，要么尊重同意到我们无法推翻现行制度的程度，要么完全无视同意。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出一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框架，而不是抛弃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

【注：顺便说，在性行为领域这意味着什么？请记住，我们承认 “同意”话语的局限性并不是要完全抛弃它，而是要确定它能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还需要去何方。“同意"为我们提供了在性互动中谨慎对待彼此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挑战对欲望的简单观念：我们最深刻的情色时刻不是发生在终于实现了内心早已存在的欲望时，而是，发生在我们体验到意想不

到的、前所未有的快乐形式时。也许从“诱惑”的政治话语中获得的启示可以为我们的性欲提供视角，但我们仍要忠于性爱中的 “同意” 话语。我们对政治同意话语的批判并不抽象，而是基于其战术上的缺陷，以及它允许我们做什么和想象什么的局限性。相比之下，“性同意”话语已经证明了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它促使我们审视自己的欲望，并改变我们在情欲方面的相互关系。】

事实上，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国家统治等形形色色的等级制度的依据远不止这些制度的运作“未经我们同意”这一说法。归根结底，我们为新世界而战是出于欲望，而为了超越政治“同意”话语的限制，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欲望”究竟是什么。

[image]

欲望、同意和政治

什么是欲望？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不要将欲望视为个体内部产生的元素，而是把它看成是流经个体的自主力量。由此，引发个体欲望的不会是某种事物；同时，整个社会都可以产生和传播欲望，即使这些欲望在大多数人心中仍然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分析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类个体，而是以人为媒介的欲望。

我们如何看待与“同意”和政治行动相关的欲望和自我身份？现有的 “同意” 论述预先假定了自我和欲望的静态概念。它假定欲望是整体的，由单一的推力而不是不同方向的多重拉力组成。当你有多种欲望时，在头脑里进行抉择过程中获得多数票的欲望被假定为“唯一重要”的欲望。“同意”话语假定人想要的东西是可知的，并且可以在共同的现实框架内表达出来。

但在现实中，人的愿望并不是固定或整体的。它们会根据我们的经历和环境不断变化。它们是多重的、矛盾的、不同的，它们的多样性令人惊讶，它们的易变性令人沮丧。它们抵制我们禁锢或驯化它们的企图。它们根本无法适应二维的二元“同意”模式 —— 在这种模式下，一个人要么想要什么，要么不想要什么。这种认识是令人惊讶，但它开辟了理解革命计划与反对我们的共识现实之间关系的新途径。

欲望的本质是复杂和离心的，这与利益的简化和向心性质形成鲜明对比。左派的传统做法是，组织者协助选民赢得胜利，从而建立起权力，这种权力可能会被用于实现日益激进的目标 —— 但这些目标通常是以选民的“利益”而非选民的“欲望”为框架的。这是一个巧妙的伎俩：由于利益似乎是一个客观而非主观的问题，因此外部管理阶层更容易摆脱对利益的界定和代表。利益可以被定义为单一的、连贯的和综合的，而欲望则是多重的、不完整的和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群体“共享利益”，朋友和恋人“共享欲望”。利益是由僵化的欲望块组成的，以令其在“共识现实”中具有意义。

欲望不仅比我们所能论述的要复杂得多，也不稳定得多，它还受到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和受剥削条件的影响。即使在矛盾和混乱中，人们的欲望范围也很少能逃脱共识现实的限制。谁真的会去想象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为我们的小隔间安排上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更多的电视频道和数不尽的洗涤剂品牌、更长的锁链和更柔软的笼子？这并不是在贬低那些在目前这个孤独囚困的消费主义体制内为改善条件而奋斗的人们。这只是想说，如果我们的计划仅仅建立在我们希望成为其盟友的群体的“共识愿景”之上，那么我们的“革命”计划充其量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的。

革命者的任务和同盟者的任务截然不同 。我们不是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梦想”的。无产阶级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而我们要摧毁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 革命者的任务是转变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集体认识，从而使我们的欲望及其驱使我们创造的现实也能发生转变。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改变现实，超越我们的 “同意” 概念所能引导的范围。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话语来想象变革，以打开走出共识现实的道路。

[image]

诱惑介绍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我们目前的做法似乎还隐含着另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诱惑。

什么是诱惑？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相当不光彩的概念，让人联想到操纵他人的企图，诱使他人为了操纵者的目的行事。在性的语境中，它既可以指浪漫、有魅力、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提议性接触，也可以指诱骗他人屈服于自己的挑逗的方法。其内涵令人不快，但最突出的因素是：暗示引诱者“制造”欲望，而不仅仅是发掘欲望。在考虑政治层面上的欲望和共识现实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这种含义是很有趣的。

当我们“引诱”时，我们会给表面上不想要某样东西的人提供一个新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他们可能终究还是想要它。“同意”的重点在于获得外部行动的许可 —— “这样可以吗？” ；而“诱惑”的重点在于内部，在于欲望本身："你会想要这个吗？” 我们的诱惑行为并不是为了诱导他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而是为了诱导他人想要做这些事情，在最重要的意义上说：想要承担这些事情所带来的所有风险和乐趣。

同样，我们也不相信能说服所有人都同意我们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梦想；不仅整副牌对我们不利，荷官、牌桌和整个赌场都对我们不利。我们不确定我们的目标是每个人都 “真正” 想要的，我们也不假定每个人都会采纳我们的观点“只要他们能获得所有正确的信息”。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不声称代表任何人，也不代表任何沉默的大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革命不是一项代议制民主计划。当然我们也不会因为对这些事情感到绝望而决定与世隔绝。我们并不认为面对共识现实的束缚，反抗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想要一条不同的前进道路，一条不假定欲望是固定的、不依赖于自由派式“同意”的道路。

我们既不想用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也不想无视他人的愿望。相反，我们想要施展一种魔法，一种炼金术。我们要诱发欲望，而不仅仅是 满足 欲望。

【等下，试图诱导他人的欲望听起来好像不像那么自由。这不就是广告业的功能么？也是上个世纪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杠杆。民主自称是一个思想市场，让人们可以在这里讨论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做出决定；不同的欲望配置一直在交战。广告公司不仅创造了特定的欲望，还通过消费经济强制推行一种欲望模式。宣传、潜意识信息、诱导上瘾、赤裸裸的暴力：这些构成了一个残酷的武器库，每时每刻都在对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军队为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扫清了道路，而“非政府组

织”则致力于诱导人们成功地创造出可以在全球市场上交换的货币。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以如此透明的操纵性术语建构的项目产生怀疑吗？尽管看起来很严峻，但这一前景揭示出，如果我们不是某些欲望模式的拥护者，我们就会在这些欲望战争中成为客体而非主体。既不能退回到从内心深处发掘“真正”欲望的本质主义观念中，也不能退缩到仅仅在个人层面浇灭欲望而同时坐视世界燃烧的伪佛教计划中。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努力创造一个世界，让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发挥独特的潜能，而不是简单地在现有条件下推动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最大的力量不在于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理性，而在于我们所采取的激情行动和我们所过的不受管束的生活。我们不要试图让人们“皈依”无政府主义；我们要带着顽皮的喜悦出发，用流淌在我们血管里的无政府主义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无政府状态是可能的，是可行的，甚至对那些今天可能还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来说同样是可取的。

你是如何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你出生时就穿着黑色连帽衫吗？你“一直都知道”自己会渴望反叛暴动吗？如果不是，那么你很可能有过某种经历，这种经历让你看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对我来说，这种经历发生在我 18 岁那年，当时正值反伊拉克战争抗议活动的高峰期，我听到一个模糊的传言，说我应该出现在某场音乐会上。我去了，结果，当音乐会结束时，出现了一群狂人，他们打着鼓，拉着横幅，在我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之前，我已经加入了 200 人的行列，在大街上游行，管他什么许可不许可。我们势不可挡。我热血沸腾，狂喜地嚎叫着，直到失声痛哭。从此一切都不再一样了。

我以前也参加过温文尔雅的被警方“许可”的游行。如果你问我是否想要参加一场激烈的、未经许可的午夜游行，我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很酷，但我事先并没有这样的强烈愿望；如果有人直截了当地邀请我，我可能会出于焦虑或漠不关心而拒绝。欲望是由背景、神秘感和体验本身产生的。我猜想，关键在于它的出人意料和非法性：它让我超越了自我，打开了一扇无法关闭的欲望之门。如果有人事先询问我是否“同意”参与，那可能会破坏我所体验到的解放感。

相信我，我和你一样对这种影响感到不安。但我们需要诚实地看待那

些为我们打开激进政治之门的变革性经历，并思考我们如何才能为更多其他人构建和打开这类大门。如果我们不打算成为“先锋”，也不打算通过单纯的理性讨论来 说服 所有人加入我们，那诱惑可能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image]

转变、邀请、传染

诱惑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假设，诱惑是通过三个过程展开的：转变、邀请和感染 —— 我们通过改变环境，为新的可能性创造空间，从而使新的欲望蓬勃发展；我们邀请他人参与到这些新的环境中来，尝试不同的行动和欲望模式；我们用好奇心、对自由永不满足的渴望、以及尝试实现自由的方法来感染他人。

我们努力寻求变革，因为如果欲望是建立在我们所知之事物的基础之上，那么就只能通过改变我们生活的条件来诱发新的欲望，从而超越我们当前现实的限制。有时，这可以很简单，比如在没有被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街上做事，或者将公园或建筑用于全新的目的。不服从对于变革至关重要；没有什么是比真正打破常规更好的开启新可能性的方法了。但是，我们的行为受到的限制远不止交通法规和土地区划；社会规范、性别角色和无数其他制度都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方式，我们受到的每一种限制都为变革提供了新的领域。关键在于挑战“理所当然”的事情，开启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可能性，并想象如果这些规则和边界不再固定，世界会有怎样的不同。

邀请既不需要通过理性话语进行说服，也不需要通过武力强加于人。在这里，我们坚持“同意”的话语精神，坚持尊重他人的意愿，反对强制。我们向往一个以自愿联合为基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参与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自由选择，而不是武力或操纵。

这可以有多种形式：在被占领的大楼里敞开大门，在公共场合建立互助模式，在游行队伍离开演出现场时提供黑头巾和油漆罐（涂鸦用的颜料）。当然，我们无法事先邀请他人参与许多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必须秘密组织，或者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可以塑造我们的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在参与者的作用。

诱惑让被邀请者成为主角，他们的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 这与仅仅寻求许可的 “同意” 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 关键是要让人们发现新的欲望，想要做一些他们以前不想做的事情；他们必须坐在驾驶座上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使用的诱惑的含义与传统的负面含义相反。

最后，我们希望邀请他人参与到实践中来，这些实践将被证明具有传染性：能够自我复制的思想、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应用的模式、能够被证明具有传染性的态度。传染确保了反叛不局限于激进分子、场景主义者或任何其他特定群体。只有当反叛广泛传播，不再局限于特定人群时，无政府主义理论才会永久地超越无政府主义者。当其他人从我们创造的空间中走出来，感到自己更加强大时，我们就成功了。当我们打开的可能性裂缝被证明无法再关闭时，我们就赢了。

[image]

诱惑失败时

不幸的是，我们的行动并不总能实现这些目标。有时，当我们试图施展变革的法术，但却失败了。

我们的努力可能出错的一种方式是，将组织小团队定位为主角，而不是我们希望引诱参与的受邀者。这是一种自我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就传播不动，它仍然只能是一个独特群体的事情。对于转型的游击队员来说，重要的是颠覆性思想和实践的流通和传播，而不是某个特定社会团体的力量 —— 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党派。

有时，当我们的诱惑失败时，那些我们试图邀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而不是被诱惑了。多年来，这已被证明是单方面激进活动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中被邀请担任主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如果觉得别人想利用你，那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当人们在汇报谈话中沮丧地谈到行动中没有征得“同意”时，我们必须将其理解为诱惑的失败。当他们谈到“同意”时，他们描述的是他们对所发生的行为的反应；而我们对诱惑的分析则将这些行为背后的欲望作为重心。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重构这些冲突来更好地理解它们：它们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欲望的人之间的较量，而是不同欲望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内部的较量。一个不受欢迎的行动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满足参与者或旁观者的欲望。相反，该行动未能使颠覆性的欲望产生或流入新的宿主。以 “同意” 为论点提出反对意见的批评者，可能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有关策略，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没有机会成为自己参与的反叛故事的主角。

[image]

进入未知世界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革命主体”，也不是革命先锋或什么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周围的斗争和动荡无关。我们加大赌注，掀起反叛；我们戳穿虚伪，敢于冒险；我们找到逃离共识现实的路线。我们承担风险，诱使他人与我们共同承担风险；我们彼此照护，这样我们就能共同面对危险。

归根结底，诱惑政治并不依靠理性论证来影响他人。我们一头扎进汹涌的变革之火中，让怪诞的激情围绕我们。这并不是说这些欲望是“我们的”，相反，我们就是这些欲望本身。我们成了避雷针，噼啪作响，流淌着电光火石的欲望。

我们不要忘记用行动诱惑自己的重要性。行动主义很容易僵化为沉闷、重复的例行公事。如果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欲望中产生的行动，就不太可能吸引我们或其他人。当然，有些孩子会通过参与“要食物不要炸弹”这类温和运动而变得激进化，他们曾经讨厌每个星期天都呆在厨房的日子。但我们是在集体体验新事物、令人兴奋的事物和令人恐惧的事物的过程中，建立最深厚的斗争关系的。将生活推向可能性的最边缘，不仅美好，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风险很高。从 “同意”的话语中，我们保留了关爱他人和关注他人需求的优先权。我们绝不能无视那些被我们邀请进入变革区域的人们的福祉；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让“一致同意”的现实来决定我们可能的梦想和行动的范围。我们不能保证安全，但我们可以分享未知的

危险，分享其乐趣和刺激。

本文节选自出版物《TERROR INCOGNITA》，这是一部关于欲望、反叛和未知的沉思录。

[image]
[image]

让我们谈谈民主，“真正的民主”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30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民主 激进民主 爱国主义 直接行动 诉求

代议制民主再现了压迫性的权力制度。

民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为了争取民主，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 Table of Contents
什么是民主？
我们如何让“民主”成为现实？
处理旧的“民主”外壳

[image]

> “人民的政府就是人民。权力在人民手中。人民的领袖并不都在政府里。他们遍布各地”。—— 维诺娜·拉杜克，白土民族（明尼苏达州西北部联邦认可的美洲原住民乐队）

在美国，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国家保证了我们的“自由”。然后，我们被要求起立，双手放在心口，向国旗宣誓效忠。四年级时，我发现了不这样做的后果。我被命令到大厅去，老师质问我：为什么不宣誓？面对老师的怒火，我浑身发抖，沉默不语。当我向我的活动家母亲征求意见时，她建议说，如果我悄悄地改掉一些词 —— 比如“为了部分人的正义和自由” —— 可能会比违抗老师而面临惩罚要舒服得多。

这就是我接受的早期教育：强制性爱国仪式的有毒组合；有价值但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权力压力下对理想的妥协；愤世嫉俗；失望；以及最终的软弱、生搬硬套或拒绝参与。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民主不过是定期的投票，让别人代表我们去做决定。在这种代议制民主下，他们声称我们 “最大的爱国责任就是投票”。无论输赢，我们都应该接受民选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正在尽最大努力代表我们。

✂

然而，我们一再看到的是，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代表大公司和比他们更富有的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私人财富积累所产生的巨大不平等通过这种所谓的民主得以复制。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出路是选出更好的候选人，和/或参加被允许的抗议游行，以引起那些政客的注意。我们还被告知要参加政府主办的各种听证会和“公园与游憩”式的社区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提出自己的想法 —— 这只是一个发泄情绪的阀门。

人民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最终，只有当选者及其技术官僚顾问被认为有能力做出公平、明智的决定，并因 “做出了明智之举” 而被视为英雄。即使是全民公决（也被称为 “投票问题”）也只允许我们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而不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现在是谈论民主的时候了 —— 不仅在我们的国家，而且在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社区，甚至我们的家庭中。我们可以谈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民主的肤浅或腐败，但是，我们也应该讨论如何在旧的外壳中建立新的民主。我们如何才能构建有意义的、公平的民主进程，真正为所有人创造自由和自主？

让我们把民主作为摆脱等级制度和压迫的手段。

让我们来谈谈民主，它是我们战胜暴力、环境破坏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过程。

让我们把民主作为永无止境的过程 —— 一个始终都在前进中的状态，并且是一个确保广泛和深入讨论以做出正确决定的过程。

[image]

什么是民主？

> 如果与我们无关，那就不再有“我们”。—— 残疾人权利运动口号

> 民主不能成为人人都有发言权却无人承担责任的地方。—— 阿斯特拉·泰勒

在她最近的影片《什么是民主？》“占领华尔街”活动家阿斯特拉·泰勒解释了为什么她没有选择用“占领”活动中流行的口号 “民主就是这个样子” 来命名这部电影。她之所以选择把它表述成一个问题而不是答案，是因为 “民主”一词并没有明确的公式或标准。

民主可能像街头抗议，任何人都可以带头高呼。它可能像工会投票决定罢工。民主可能是长者长篇大论地解释社区的基本价值观。它可能是 “集会中的大会”，地方代表召开会议，制定重大的运动战略 ……

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看到它时，我们就知道它，当我们感觉到它时，我们就认出它。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民主的字面意思是人民的统治，但人民是谁，他们如何统治，必须由这些人民自己来决定。尽管这一理念引起了人们的共鸣，但历史上被称为“民主政体”的政府的故事并不精彩。按照我们对民众赋权的标准来看，大多数民主政体都有明显的缺陷，比如将大多数人都排除在“民治”之外。

这些缺点蕴藏在这些民主政体的规则、宪法和程序中。古希腊人开创的民主制度只允许成年男性公民（非奴隶）审议城市问题。在美国，原本为建立自治制度而进行暴力革命之后，开国元勋们受到启发，保留了雅典 “自由男性公民”参与的限制。然而，他们忽略了古希腊的随机抽签程序，转而建立了一个选举精英代表民众做出决策的共和制度。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民主项目》（The Democracy Project）一书中写道：这种制度的明确设计是为了压制民众对民主的革命情绪，尤其是为了削弱豪德诺索尼联盟（又称易洛魁联盟）和来访的海盗的影响力，因为他们通过高度参与和包容的程序来管理自己的社区。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已经通过许可了妇女和其他以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的代表权而变得“更加民主”，原住民、“归化移民”和黑人也在各级政府中当选 …… 是的，但是，事实证明，非富人 —— **98%** 的人 —— 仍然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只能选择由哪些富人来为他们做决策。

在欧洲，议会制度使左翼政党有了代表权，这些政党承诺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甚至结束父权制。2015年，当这些政党组成的联盟在希腊掌权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非常兴奋。然而，那些指望希腊的SYRIZA或西班牙的Podemos能够 —— 甚或愿意 ——对抗全球金融精英压力的人，现在全都失望了。

民主的目标与现实之间的这种距离，使许多人认为民主一词已经破产。总体而言，历史上国家对民主的表述似乎限制了部分甚至大部分民众的参与 —— 声称所谓的技术或功绩原因 —— 而有利于强权保留其权力。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喜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2011年的起义中，一名希腊抗议者在试图进入政府大厅时遭到阻拦。警卫拦住她问：“你以为你是谁？” 她回答说：“我需要是谁？”

[image]

我们如何让“民主”成为现实？

> 因此，激进民主制度化（人人都有发言权）对于创造持久变革至关重要。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同时挑战当今时代的不公正现象，并为解放社会添砖加瓦。
> —— 共生研究小组

在回答 “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妨先问几个其他问题： 我们为什么渴望民主？哪些品质使民主成为理想的治理形式？我们的民主愿景中蕴含着哪些价值观？对民主的承诺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即使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也会感到既不舒服又解放 —— 我们也许可以用 “民主”来形容这种感觉。查阅宪法或任何其他程序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除非我们之间进行讨论。因此，这里有一些主题或者说 “民主元素”，可以融入对话中：

⛭ 自治/自主：参与如何才能不仅仅是发表意见的权利？如何才能真正影响与个人生活和共同事务相关的决策？

⛭ 成员和社区：谁有资格参与自治，在自治过程中的哪些阶段参与进来？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踢出局？

⛭ 发言权、个人自由和创造力：个人如何才能在与他人合作创造新的可能性的同时，自由表达其独特的自我并获得支持？

⛭ 集体福祉：如何平衡个人利益，并以社区利益为制衡？

⛭ 多样性的力量：如何扁平化传统的权力等级，以确保更好、更人性化的决策和“包容性”的参与？

⛭ 斟酌、论述和讨论：我们如何促进富有成效且相互尊重的对话？

⛭ 协议/决定：决定是通过什么程序做出并记录的？何时以及如何重新审议？

☆ 教育与智慧分享：新成员如何向前辈学习，成为成熟的参与者？

☆ 不同意见：当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个人拥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有哪些限制？

☆ 公平正义：对待他人的行为标准是什么？如何纠正错误以及如何执行规则？

当我们找到机会或创造机会以建立民主制度时，应当考虑到上述每一个问题。答案应该反映在规范和期望的文件中 —— 有些人可能称之为规则、附则、首要原则、社区协议、宪法或社会契约。

如果每个人都同时发言，或者重复说同样的话或无关紧要的话，这可能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民主”，但它不会是那种令人愉快或有效的民主。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和讨论的结构可以防止 “无结构的暴政”，防止等级模式的重新出现，防止那些无法放下 “我”来争取 “我们”的机会的人霸占会议和组织。

📎

民主是出了名的不稳定。当混乱降临时，强势的声音会赢得权力，因为“我们”都受够了，已经分崩离析，而不是走到一起。或者，“我们”只是没有出现。

在我们自己的组织中，也经常会出现复制等级制度和统治、橡皮图章、腐败和拉帮结派的情况。一些人常常把本应透明的信息私藏起来，或者采取防御而非反思的态度，容忍滥用职权，在棘手的问题出现时。在我们努力做到正确的过程中，有时会固化程序，导致参与者灰心丧气、精疲力竭，而没有认识到变革、成长、休息和娱乐的必要性。

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有行为倾向、有文化规范和社会化态度、有不同创伤和愈合能力的人。在我们试图建立信任、积极变革以实现自由社会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优势和潜在挑战加以审视和考虑。通过民主社会成员明确的问责承诺，可以发展出旨在调和分

歧、揭露微妙支配的慷慨做法。没有公正，我们就不能指望前进。

可持续的民主论坛取决于组织、时间管理和规则。如何在不采用人们熟悉的强制模式的情况下执行规则，也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解放的愿景往往更容易达成一致（比如男女发言时间平等），但实现起来却很难。

我们需要承认，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评估、反馈、监督和反思都应包含在内。这些过程至关重要。同样，明确关注政治教育/或**paideia**也是必不可少的 —— 这是对参与者进行教育和培养的过程，目的是深化民主智慧和承诺。以学习和反思为目标的概况介绍会、学习小组和会谈也应纳入我们的新民主实践。

我们还应认识到民主是有先决条件的。有了物质、社会和经济条件，每个人才能参与。物质条件包括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空间，提供托儿服务、午餐和语言翻译等等。

社会条件包括减少阻碍妇女、非二元和无学历者等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参与的行为。可以通过制定协议和有意识的程序来消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精英主义等，如亲密核心小组、强有力的协助、参与配额和建设性的 “呼吁”，以鼓励反思、问责和转变。

我们还可以通过明确要求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发表意见，并提供机会练习主持和演讲等技能，鼓励他们在我们的横向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问一问：“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每个人 —— 无论其财力、地位、工作时间和家庭责任如何 —— 都能参与进来？” 这有助于解决穷人被严重排斥在民主进程（包括我们的民主进程）之外的问题。例如，对于那些已经筋疲力尽的人来说，冗长的会议本身就可能是参与的障碍。

回答这些经济条件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工作并不是平等分担的，煮咖啡和打扫卫生的人需要能够平等地参与我们的民主进程，他们也需要能够休息。

[image]

处理旧的“民主”外壳

> 「我们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成为一种力量。资本主义现代性企图渗透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最深层细胞，扭曲其结构，离散我们所有人，面对这种企图，我们必须组织起来，以民主 —— 社区价值观 —— 来对抗这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社会的自由生命形式。既然社会性与自由相关，那么自由就只能在民主的领域中得以实现。激进民主扩大了社会的自由空间。它防止我们被占领、异化、殖民和毁灭我们的国家主义制度所压制和消灭。此外，它还帮助我们成为能够自主发言、自主讨论、做决定和行动的人。激进民主激发人类的意志力。它使人们能够做自己。这样的人才能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只要这样的人以自己不同的特质参与社会，他们就会创造多样性，增加社会和自身的自由。」—— KOMUN

> 「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 奥德丽·洛德

许多人 —— 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 都认为，改造社会的途径是让更多的人投票并努力选出优秀的候选人。他们希望当选的优秀人士能够制定新的政策，而不仅仅是反映富人和权贵的利益。当然，有候选人承诺这样做的传统，但记录并不反映成功。相反，我们往往对他们的妥协感到失望。

许多人认为，在美国，一个据称是“进步”的黑人担任总统，民主党在国会的组合将导致扭转新自由主义不断升级的影响 —— 紧缩、不平等以及市场因素主导所有重要决策。但他们不仅没有阻止，反而变本加厉。银行赢了，人民输了。

许多人继续寄希望于那些反主流的当选者和有希望的候选人能够想出办法，从内部赢得胜利并改变现状。然而，即使有可能让几位进步人

士赢得公职，我们，人民，仍然希望在如何解决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问题上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引用玛丽娜·西特琳和达里奥·阿泽里尼的书名：“他们不能代表我们"。

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善意的，而且也很善良、有魅力和聪明，但他们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复杂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想法、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人直接参与民主进程，致力于纠正过去的错误，为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创造条件。

虽然“进步派”的和民粹主义的候选人很擅长提高人们的期望，但我们可以努力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治理体系，让更多的人拥有发言权。现在是释放我们的想象力、自下而上地努力实现生活民主化的时候了。是时候提出、讨论和决定我们自己的规则了。这个过程就是双重权力组织：建立民主结构，通过展示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来消除虚伪的精英民主机构和走形式的合法性。这些替代性的民主大会和工作组可以通过决策和寻找资源来满足我们的关键需求，如住房、食品、教育、获得土地、安全和文化，从而建立和重新利用权力。

然而，除非国家在自身矛盾下崩溃，否则我们的民主结构将一直处于“合法国家机构”的阴影之下。我们不能对国家机构视而不见，相反，我们必须与之对抗，并施加压力，使其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出回应。因此，我们会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巨大的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应该为向政府提出 “要求”付出多少努力，还是应该自己想办法去做。

我们面临着一个战略问题，即何时逃跑，何时躲藏，何时战斗。这种矛盾将继续存在，必须加以研究。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要求会得到承认并使政府作出反应？什么时候我们的要求注定是徒劳的、令人精疲力竭的和被人利用的？什么时候我们有可能面对镇压和惩罚，必需以暴力的方式来回应政府的挑战？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成功地维持我们的替代方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努力争取一些被国家垄断的资源？我们能否在听证会上和民选官员的走廊里提出要求，并同时为我们自己的民主集会保持足够的精力？……也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既要支持进步派政客的政策倡议，又要让他们对自己的承诺负责。

也许我们可以考虑 “抵抗”与要求的概念。抵抗既是一种立场，也是一个位置。我们以抵抗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愿望和信念，但抵抗也是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在这里喝柠檬水，谈论天气、棒球、孩子和政治。它是一个公共的但安全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可以欢聚一堂，满足需求，交流信息，表达观点，产生想法，制定计划。

抵抗没有起点、中途和终点 —— 只要柠檬水没有喝完。我们有柠檬，让我们来做柠檬水。我们的民主运动的柠檬水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对解放的承诺和我们的关爱伦理。

[image]

作者：科拉·罗洛夫斯 (Cora Roelofs)，共生组织的活动家和作家、公共卫生研究员，新罕布什尔州基恩州立学院政治学教授和活动家琼·罗洛夫斯（Joan Roelofs）的女儿。激进民主是“共生组织”的核心项目，不同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它从多种意识形态和历史上的著名运动中汲取智慧，稳步地发展了无政府主义秉持的直接行动理念，在这里看到详细介绍），虽然它立足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基础，但对于中国变革者来说是值得参考的策略。

[image]
[image]

历史重演：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 特朗普的法西斯卷土重来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1月6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MAGA 亿万富翁 代议制 制度 反法西斯 国家 巴勒斯坦 建制派 投票 新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 权力 极右翼 民主 法西斯 特朗普 直接行动 秩序 等级制 策略 维稳 职业媒体 自由派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iyp

为什么说民主党需要对唐纳德·特朗普重新掌权负责？

- Table of Content

  烫手山芋再次易手
  共谋党
  那条通往法西斯主义的路
  —— 警察 ——
  —— 法律 ——
  —— 媒体 ——
  —— 清空街道/软性维稳 ——
  —— 政治棘轮 ——
  —— 令公众麻木 ——
  未来之路

[image]

特朗普赢得了2024年总统大选。这意味着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将不

得不重新开始2017-2020年的许多战斗。但首先，为了了解所面临的挑战的规模，先来看看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烫手山芋再次易手

我们一直认为， 在21世纪， 国家权力 是一个烫手山芋。由于 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 使得国家机构难以减轻 资本主义 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没有任何政党能够长期掌握国家权力而不丧失公信力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法国、奥地利、英国和日本的执政党都遭到了惨败。

在**2024**年的选举中，哈里斯和特朗普 都已经 因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而蒙上了污点，但哈里斯是直接与现任政府有关联的人，这也是她落选的原因之一。是的，数以千万计的特朗普选民支持他的计划， 但真正将他推向胜利边缘的选民基本上是在投抗议票 。

民主党已经竭尽所能将自己与统治秩序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转向右翼，将支持从自己队伍中所谓的 “左派”手里转移出去，令抗议运动失去动力。事实证明，在人们渴望变革的时候，这是一场失败的赌注。

美国其他地区将如何应对还有待观察。如果民主党的领导层屈服，接受法西斯主义小伙伴的地位，那么未来确实会非常暗淡。而另一方面，如果全国有一半的人显然会抵制特朗普的计划，那么民主党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将被迫去追逐他们作为这部分人“代表”的地位，就像2017年发生的那样。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在街头决定。

[image]

共谋党

共和党已成为法西斯党。在这次大选之前，民主党则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共谋党。

承认唐纳德·特朗普是法西斯主义者，却只是敦促人们 投票 反对他，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特朗普确实打算在美国推行法西斯主义 —— 如果他明确承诺，他将围捕数百万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国内驱逐行动”），让军队上街镇压抗议活动 ，并 利用法院系统 攻击任何反对他的人 —— 那么，仅仅局限于用选票去“反对”就意味着张开双臂欢迎法西斯主义。

⚡

当法西斯主义即将来临时，我们应该做的是组织地下抵抗网络，就像意大利和法国的反法西斯行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那样。适当的做法是准备以一切必要手段进行抵抗。若非如此，那就是共谋。

强化 法西斯分子赖以推行其政策的机构 就是共谋。将针对 法西斯分子所要针对的人群的暴力正常化 就是共谋。将 人们分享信息的通信平台交出去 就是共谋。 阻止人们采取对抗法西斯政权所需的人和战术 ，都是共谋。在过去四年里，民主党做了上述每一件事。

民主党领导层已经做好了与法西斯共存、被法西斯统治的准备。他们宁愿选择法西斯主义，也不愿再经历四年抗议浪潮的动荡。让一个更加专制的政党掌权给了他们一个托词 —— 相比之下，这让他们看起来更有面子，即使是他们引导人们离开街头，以为特朗普实施他的计划铺平道路的。

[image]

那条通往法西斯主义的路

以下将解释为什么民主党对这种情况负有责任。

—— 警察 ——

民主党在拜登-哈里斯时代一开始就加倍支持警察，而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正在思考，是否应该寻找一种比继续将大量公共资金用于警察部门军事化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贫困和心理健康危机问题。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拜登政府资助和美化的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将成为实施特朗普议程的前沿阵地。

民主党亲警察的转向还帮助了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等前警察在2020年上台。亚当斯的政府是一场灾难；他目前是第一位面临联邦指控的纽约市长，包括贿赂、共谋和欺诈。特朗普此后向亚当斯伸出了橄榄枝，一个腐败的强人向另一个腐败的强人伸出了橄榄枝。这就是将国家权力直接交到镇压势力手中的后果。

—— 法律 ——

从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初期开始，民主党人对特朗普的批评就集中在他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这一观点上，并提出了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口号。正如无政府主义者2018年所提出的观点：

> 「如果你想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奠定基础，“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就是一种自取灭亡的说法。当一个由 “选区划分”选出来的立法机构通过新法律时会发生什么？当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扎堆的法院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决时，会发生什么？当联邦调查局镇压抗议活动时，你会怎么做？」

现在，最高法院由特朗普任命的人员控制着，特朗普准备重新掌权，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任何决心阻止特朗普实施其议程的人都必须准备好违反特朗普的法官将通过的法律。

> 「打着 “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旗号游行，就是在唾弃所有那些每天都要面对法律压迫和遭受不公正的人。这是在拒绝声援社会各界，而这些社会各界可以让反对特朗普的社会运动在街头发挥影响力。最后，这是在将压迫工具 —— 法律 —— 合法化，而特朗普最终将利用法律来镇压你们的运动。」

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去年七月警告的那样，特朗普的胜利意味着中间派所指望保护他们的所有机构 —— 选举政治、法院系统、警察、普通公民遵守法律和尊重当局的倾向 —— 现在都成了他们敌人手中的武器。这首先适用于法律。

[image] 蒂华纳

—— 媒体 ——

2022年，当Twitter的所有者将其出售给埃隆·马斯克时，他们明白，他们是在把 21 世纪最主要的政治传播平台的控制权交到了一个极右翼自大狂的手中。马斯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禁了一批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账户，这些账户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期间帮助动员民众进行反法西斯抵抗。这是马斯克将推特沦为极右翼宣传工具过程中的一步。

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所言：

> 「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不仅仅是个别财阀的一时兴起 —— 它也是朝着解决资本主义阶级内部的一些矛盾迈出的一步，以便更好地建立统一战线，以压制工人和其他所有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暴力的人。」

事实上，亿万富翁小圈子的资助是特朗普能够赢得2024年大选的主要因素之一。亿万富豪们之所以能够将忠诚转向特朗普，部分原因在于，随着通信平台和街头抗议活动受到控制，他们不必担心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会造成不利于商业的混乱局面。

这就引出了下一点。

[image] 西雅图

—— 清空街道/软性维稳 ——

民主党竭力诋毁反警察运动的声誉并使其失去动力，这直接落入了其对手的手中，为特朗普毫无阻力地重新掌权铺平了道路 。

通过与共和党争夺法律与秩序党的地位，民主党使共和党得以将有关“犯罪”的言论推向右翼，以至于特朗普和他的党羽们可以在暴力犯罪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还能在有关犯罪的言论上大放厥词。这与特朗普拒绝将其论调后退哪怕一毫米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还试图阻止新运动获得势头。例如，当全国各地限制堕胎时，民主党就竭力阻止有效的基层动员。

清空街道是否有利于民主党2024年的选举前景？这需要回到2020年寻找答案。

当时，中间派人士在一篇又一篇的专栏文章中频频表示担心，认为2020年5月和6月的街头对抗可能会使大选转向特朗普。而事实上，2020年6月民主党选民登记人数增长了50%，而共和党选民登记人数当月仅增长了6%。那些将抗议活动作为决定2020年如何投票的因素的人将票投给了乔·拜登，比例高达 7%。

换句话说，乔治·弗洛伊德起义帮助了拜登的当选。

请记住，乔治·弗洛伊德起义 并非始于 选民登记活动。它是通过焚烧一个警察分局开始的。 根据《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 ，**54%**的受访者认为这是正当的。如果不是这样，这场运动就不会成功地将对乔治·弗洛伊德、布伦娜·泰勒等人的谋杀案推向公众讨论，民主党也不会在选举中获益。 如果不对不公正的根源采取真正的行动，就不可能产生强大的运动 。

作为专门收编抵抗运动的政党 ，民主党本可以在 **2021-2024年从更强大的运动** 中获益。然而，他们宁愿失败。

—— 政治棘轮 ——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得到了前总统乔治·W·布什、前众议员利兹·切尼、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查理·赛克斯和其他许多右翼人士的支持。这不仅

是因为特朗普的议程甚至让那些以前代表共和党建制派的人都感到震惊，还因为哈里斯代表了一个中间派政治项目，让共和党人决定移民等问题的话语权。

正如之前所论述的：

> 「美国的两党制就像一个棘轮，共和党不断将公共政策和允许的言论拉向右翼，而民主党则通过追逐政治中心来获取权力，成为阻止政策和言论转向的机制。」

这一策略帮助共和党将移民和犯罪等一度边缘化的观点正常化，但并没有使民主党更容易当选。

回过头来看下足以发现，特朗普在2024年的胜利标志着21世纪政治话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新自由主义共识似乎所向披靡；他的胜利似乎代表着一种侥幸 —— 一个离群索居的政客通过利用所谓"反全球化运动"的言论而上台的侥幸。而如今，新自由主义共识的鼎盛时期显然已经过去，下一个必须是别的东西。然而，几十年来，民主党一直与共和党合作，压制提出替代方案的运动。他们压制自己阵营中代表前进方向的力量，如伯尼·桑德斯运动；这使得特朗普有可能把自己伪装成"反叛的代表"。

这使得极右翼在下一阶段不可避免地掌握权力，因为民主党帮助压制了无政府主义、反专制主义和左翼的 替代方案 。

—— 令公众麻木 ——

最后，令人痛心的是，拜登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让公众对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政府企图实施的计划不再敏感。最重要的是，拜登政府通过支持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实施残暴的种族灭绝来实现这一目标。拜登和哈里斯这样做让数百万人习惯于这样一种观念：人的生命没有固有的价值 —— 基于某人在目标人群中的地位而对其进行屠杀、监禁和折磨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环境恰恰会让唐纳德·特朗普在两个半月后重新上任时，能够实施他打算实施的那种残暴的国内政策。

[image]

未来之路

归根结底，当然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民主党。是我们没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运动来抵御他们的镇压。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阻止特朗普驱逐数百万人，并将数十亿美元输送给亿万富翁和国家维稳机构。

幸运的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有责任阻止选举数据令我们失去动力。正如在2016年回应特朗普首次胜选时写道的那样：

> 「选举代表了我们彼此最糟糕的一面，提炼出了人类最令人反感、最懦弱、最奴颜婢膝的一面。许多永远不会亲手将母亲从孩子身边夺走的人，却能在投票站的私密空间里支持驱逐出境，就像大多数吃肉的人永远不会在屠宰场工作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政府本身的异化，特朗普议程中的大部分丑陋政策就永远无法实施。」

现在有一个短暂的机会之窗，当数百万曾指望民主党保护他们“安全”的人醒悟过来，意识到我们才是彼此唯一的希望时 —— 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支援彼此，重建我们自**2020**年以来失去的一切。

我们必须开展积极主动的项目， 将无政府主义革命与各政党区分开来，这些项目将展示每个人都能从 我们的提议 中获益，并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提供机会，让他们 参与 到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项目中来。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曾经做到过。前线见。

[image] 如何动员起来反对特朗普承诺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
https://prod-files-secure.s3.us-west-2.amazonaws.com/531add87-fc78-41ca-9a54-b203f8ee73fd/4d2d655b-8c44-44d2-960a-60580613ea66/strategizing-to-stop-mass-deportations_lite.pdf
[image]

By Crimethinc

[image]
🌐

在全球化之后，在加速的内卷和后增长时代，推动升维斗争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5月12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1 原理和理论
[image] 标签	MAGA 不平等 世界主义 中产阶级 全球化 数字货币 新常态 新秩序 新自由主义 施瓦布 无政府主义 特朗普 资本主义 革命
[image] 编辑	MMartinez

真正的洞察力来自个人经验，而不是来自任何言语、经文或教义、哲学著作或更高的权威。
讲述道理的力量远不及对经验保持诚实。动员呼吁的力量远不及示范革命。

本文提供了一系列阅读资料，因此会同步到本项目物料总站《炫》的Books栏目。

[image]

不只有中国和美国，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在萎缩。这不是新闻也不是任何突发状况，这是一个已经持续十多年的长期趋势。主流新闻将其描述为“疫情后果”，是错误的。疫情只是加速器，不是主因。

施瓦布所谓之“新常态”很早就把握了这一趋势，并将其作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其本质是最大限度地缩小中产阶级，向一个没有中产、只有穷人和富人的社会结构过渡。

社会的这种分层会导致消费经济向分配经济的过渡。（在局部地区刺激消费不会改变这一进程）

为了实现这一过渡，已经有了一整套控制和发展工具系统在准备中。特别是臭名昭著的数字货币，它本质是一种现代票证系统。年龄超过40岁的华语读者应该会记得粮票布票等等票证，数字货币就是其变体。只是在不同的、更先进的技术层面上，它允许人们控制的不是单个商品的消费，而是整个消费领域的消费，不仅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

[image] 🔗 https://mastodon.world/@MatthewR/114052169931337704

指责施瓦布、达沃斯及其“吃人”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他们的确是在试图阻止一个客观的进程，而这个进程的 “根本”不是基于他们的计划和行动，不是他们策划出来的，而是基于整个信用经济模式的僵局。

理解这点是对于“接下来我们会走向何方”的洞察力的基础；尤其是，识别欺骗性的解决方案的关键。

欺骗性方案不止存在于华语区。大转型时代最盛产的就是骗子。

将全球主义者视为“故意制定险恶计划”的恶魔不完全正确 —— 他们只是试图为客观存在的危机和矛盾寻求答案，尽管他们提出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性方案。

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不同的、更人性化的经济项目，因为目前的经济模式是无法改革的 —— 特朗普的MAGA理念就是在试图维护当前的危机，而不是解决危机。因此，从长远来看，特朗普和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 —— 因为他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只是在试图为痛苦续命。

今天，世界经济危机仍在继续，而其下一步依然会是全球化。但不会回到过去了。最好的结果是走向自下而上的全球化。

全球化所代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联互通是不可逆转的，这其实可以是好事：因为这种互联互通理论上是可能服务于人类和地球的利益的，而不仅仅像现在和曾经那样只服务于精英阶层。尽管迄今为止，全世界的富人和权贵阶级已经根据自身利益塑造了“全球化”，但也同时存在着一种反向运动，正在试图重塑我们这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以造福人类和地球 —— 即“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运动。

这场运动虽然分散，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努力尝试在同一个框架内团结成一场共同的基层斗争。

☘

在贪婪、支配、剥削压迫、生态破坏的资本主义帝国全球秩序之外，构建一个公平互助的世界，一个“即使仍然受到全球资本文化和价值观的制约，也能较少受其主导” 的世界。

这场运动需要有彻底改变的勇气，引导人们撤回对主流社会关系的认同 —— 即支配性的、神经症竞争博弈性的、主权性的社会关系；从而阻止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并由此创造一种新的环境 —— 使这场运动能够将不同的、更公正的规范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

在加速的内卷和增长下降的情境下，毫无疑问，反全球化运动完全有能力将相互矛盾的政治倾向凝聚到一个共同的项目中。在左翼成员之间已经引发了很多富有成效的讨论（你知道，那些通常情况下基本不交流的人们）。通过这些富有成效的对话，革命派学会了更加具体地战术布局，改革派学会了更加深远地思考问题，因此每个人都对各种可能性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但是，如果不直面有关社会秩序的重大问题，这场运动就无法发展壮大。它需要明确的承诺和政治原则，尽管明确政治原则会改写支持面（比如革命派的原则会损失改良派的支持域）。我们一直在争取的是让无等级无胁迫的、互助自主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在这场比赛中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即超越权术的升维革命。亦即，最大范围的支持域。

这绝非空中楼阁，它具有不仅是丰富的而且是经典的理论根据。

多数人可能只知道一种世界主义，其实世界主义始终都有两种传统。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后来的大英帝国的传统只是相比下更著名一些。在帝国法律的仁慈统治下，一段时间内各种文化都能蓬勃发展。但正如乔姆斯基和杜兹纳等很多人早已指出的，这一传统的现代继承者将其用作促进霸权国家私利的挡箭牌：因此人权就是帝国的权利；人道主义干预就是帝国的干预；世界主义就是常旅客的意识形态……

但还有另一种鲜为人知的反律法主义传统，可以在西诺普的第欧根尼的世界主义中找到。第欧根尼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无城可居的哲学家（他要活在今天就是标准的无证流民、边缘户），他正在晒太阳时亚历山大大帝来访，他就直接告诉亚历山大让开点，因为后者挡住阳光了。或者，在芝诺的《理想国》中，一篇由外邦人、被驱逐者撰写的专著中，其“天空之城”笼罩着整个世界，而不是有边界的城邦政体——它摒弃了法律和强制，摒弃了神庙、法院和竞技场。

这一传统在21世纪初的后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的论述和实践中得到了新的演绎。这个世界主义可以从帝国争霸的可疑乐趣中解脱出来，甚至可以从现代世界政治的“自由思想家”中解脱出来，从其当代拥护者中解脱出来。芝诺的著名训诫：“现在，无论你碰巧住在哪里，与你自己的朋友一起，创建你自己的城市”，就是古斯塔夫·兰道尔的实存社群无政府主义的早期预言。

如果您也对变革感兴趣且希望了解更多升维斗争的理论设想和研究，下面我们简单挑选了一些书籍和论述资料，希望能提供帮助。

不要轻易购买代币。不要轻信那些鼓吹牺牲的口号。多阅读，多思考，首要考虑的是原理，而不是激情。

更好的是，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成为示范者和探索者——让自身成为“革命”，将自己从沉重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点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计划及其纲领截然不同的。我们在行动中提出建议并不意味着要成为斗争的指导者，更不意味着要将其强加于任何人，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具有斩断和变革潜力的话语和实践。这是最重要

的、价值最高的长期努力。

[image]

以下是17份入门级资料（将来我们可能会在一期工程中增加一些关于后全球化构想的新洞察，但这不是今年的首要工作）：

1、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Power of Solidarity

https://books.google.co.jp/books?id=wgscPgVppNYC&hl=zh-CN&source=gbs_book_other_versions

2、The Battle of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Seattle

https://z-library.sk/book/16734962/f2d352/the-battle-of-the-story-of-the-battle-of-seattle.html

3、Social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Stat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6448762_Social_Theory_and_Globalization_The_Rise_of_a_Tra

4、Deepening Anarch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Anarchist Ideal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738405_Deepening_Anarchism_International_Relations_and_

5、Anarchy and Anarchism: Towards a Theory of Complex International System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8170794_Anarchy_and_Anarchism_Towards_a_Theory_of_Com

6、‘Anarchism without “anarchism”: searching for progressive politic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https://richardfalk.org/2010/11/26/anarchism-without-anarchism-searching-for-progressive-politics/

7、The Will of the Many. How the Alterglobalisation Movement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Democracy

https://z-library.sk/book/5539337/874baa/the-will-of-the-many-how-the-alterglobalisation-movement-is-changing-the-face-of-democracy.html

8、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https://z-library.sk/book/873408/2629c9/direct-action-an-ethnography.html

9、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https://z-library.sk/book/2930812/04a4e8/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html

10、Th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Frequent Travelers: Toward a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Cosmopolitanism

https://z-library.sk/book/68365391/6f2413/the-class-consciousness-of-frequent-travelers-toward-a-critique-of-actually-existing-cosmopolitanis.html

11、Who Rules the World?

https://z-library.sk/book/5892152/283ec7/who-rules-the-world.html

12、The Mask and the Flag: Populism, Citizenism and Global Protest

https://z-library.sk/book/3333681/1420ce/the-mask-and-the-flag-populism-citizenism-and-global-protest.html

13、Black Flame: The Revolutionary Class Politics of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https://z-library.sk/book/1268791/b17f66/black-flame-the-revolutionary-class-politics-of-anarchism-and-syndicalism-counterpower-vol-1.html

14、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https://z-library.sk/book/2083357/5fdc55/the-democracy-project-a-history-a-crisis-a-movement.html

15、Radical Gotham. Anarchism in New York City from Schwab's Saloon to Occupy Wall Street

https://z-library.sk/book/17488361/e6f469/radical-gotham-anarchism-in-new-york-city-from-schwabs-saloon-to-occupy-wall-street.html

16、Historical Geographies of Anarchism. Early Critical Geographers and Present-Day Scientific Challenges

https://z-library.sk/book/3521731/519838/historical-geographies-of-anarchism-early-critical-geographers-and-presentday-scientific-

challeng.html

17、Postanarchism

https://z-library.sk/book/3579039/4cb9d9/postanarchism.html

[image]
[image]

Category 2 实践

[image]	**# of Posts**	6
[image]	**Posts**	[image]“结束吧!/Gotovo je!” ——对斯洛文尼亚直接民主的思考, [image]无政府主义革命：披荆斩棘, [image]做一个无法被代表的人, [image]“不要亲手开倒车!” - 波斯尼亚的直接民主实验和第二轮噩梦, [image]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image]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
[image]	说明	通过交流经验和知识来协调、沟通和建立共同力量。这里所记载的经验不承诺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们是很多人花了多年的时间进行实地斗争后做出的总结和反思。它们也许能帮助其他尚未开启行动的人们缩小一些试错成本。

[image]
[image]

“结束吧!/Gotovo je!” —— 对斯洛文尼亚直接民主的思考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2 实践
[image] 标签	15M 代议制 占领 国家 学运 战术 收编 改良 斯洛文尼亚 无政府主义 民主 直接民主 自治 起义 邂逅空间
[image] 编辑	[image]iyp

永远不要害怕冲突，不要在需要挺身而出时害怕不受欢迎。要害怕不能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如果信仰有任何意义，那就是这了。生活是对人类精神的巨大考验，我们的人生将被我们为做真实和正确的事情而付出多少努力来定义。

- Table of Content

  “Gotovo je! ” - “结束吧！” 2012 ~ 2013年起义中针对代议制的口号
  占领和直接行动的民主
  学生运动中大会的局限性
  建立机构还是开辟空间？
  反对并超越（直接）民主

[image]

寒冷的冬夜。空气中混杂着硝烟和胡椒喷雾的味道。从我们的背后，我们听到了成千上万人喉咙里发出的怒吼：“（那些政客）他们全都完蛋了！我们要推翻他们所有人！”在我们面前，是燃烧的围栏、成排的防暴警察，以及远处雾蒙蒙的民主终极象征 —— 议会大厦。我

们的脸上吹着冷风，我们的身边是同志们的臂膀，我们的血管里迸发着电光火石。起义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街道依然属于我们。起初只是对民主锅里几颗"老鼠屎"的抗议，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巨大机会。在短暂的一瞬间，我们获得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我们允许自己梦想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尝试创造超越等级制度的团结空间。在我们发现自己弱点的每一秒中，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努力重获力量。

但愿我们当时能知道，将我们拽回现实的，不仅仅是 —— 国家暴力、运动的自然周期或开庭日期，而是 —— 主要是：民主。

[image] 2013年1月起义期间在斯洛文尼亚议会前焚烧政客的照片。

"Gotovo je! " - "结束吧！" 2012 ~ 2013年起义中针对代议制的口号

2012-13年的冬天，一场大规模抗议浪潮席卷了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小国斯洛文尼亚。抗议始于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这是一个去工业化的废墟，曾是斯洛文尼亚现已消失的汽车工业中心。腐败的市长在每个主要的十字路口都安装了测速雷达，导致数百名本已陷入贫困的人被收取他们无力支付的罚金，为一家私营公司牟利。在一系列秘密袭击和公开示威中，人们将测速装置一个个烧毁，然后聚集在广场和街道上，用自制燃烧弹、石块和他们能拿到的一切东西"告诉"市长，这个城市不再欢迎他了。作为对警方最初镇压的回应，声援活动在短短几天内遍布全国各地。抗议活动持续了六个月。

一方面，这些抗议活动是对从社会主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过渡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的反应，这种过渡使许多人变得贫穷和屈辱。另方面，从一开始，抗议者就明确地针对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机构。这是斯洛文尼亚自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以来最大的一次自发组织的斗争。它推翻了马里博尔市长和国家政府，但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个空间，使人们有可能发明新形式的自治行动，并对代议制民主提出质疑。

虽然这一时期的影响不能归结为失败（尽管失败也是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的激进力量是如何迅速地重新回到现有秩序中的，以及“民主”语言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政府垮台和重新选举的承诺是这场斗争的第一颗钉子，因为它满足了许多人的要求，这些人随后开始撤离街头。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左翼政党竭尽全力垄断了起义的话语权；最终，它承诺在议会中实行更直接的民主，成为新政治秩序中一颗闪亮的新星。最后，在起义的发源地马里博尔，当选的/被收编的下一任市长来就自起义队伍，来自一个民间社会团体。他承诺要“重振马里博尔的民主，发展经济”，但选举他的人很快就失望了。到2015年，他因腐败问题被投入监狱，市议会要求他辞职。

那么，直接民主是否助长了斯洛文尼亚社会的持续激进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的寮屋运动，到反战和反北约运动，再到学生占领、自发组织的野猫式罢工、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最近的要求欧洲要塞对巴尔干沿线移民的开放，在所有这些斗争中，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活动家都认为，传播直接民主的方法是我们可以为激进运动做出贡献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而对抗代议制民主、等级制结构和改良主义政治。多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将精力投入到使大会成为这些运动的组织核心，可能只会偏离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定义这一工具，从直接民主的概念转向另一个框架。

这并不是要否定作为一种组织模式的大会。大会经常能帮助人们走上街头，投入斗争；它们是重要的组织工具。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往往令人失望。我们很容易将大会的组织方式和我们参与大会的精力不足归咎于阻碍运动在全社会蔓延的敌对势力。但在掌握了协商、促进和所有配套形式之后，也许终于到了质疑直接民主概念本身的时候了。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大会理解为另一种团结的机会 —— 不是作为统治和政府的空间，而是将权力分散到我们社区的场所。

我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言。以下只是一些战友对多年来斗争的反思。是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所学到的东西。

[image] 2013年1月，抗议者推倒斯洛文尼亚议会前的栅栏。

占领和直接行动的民主

> “我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我认为直接民主比我们现在所知的秩序都更好。有了直接民主，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说出来，找到朋友帮助你，然后直接去做就行了。”

2011年，新的、地方化的占领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广场上展开。在西班牙，人们走上街头，开展了后来被称为 “15M”的运动；在美国，这场运动被称为“占领”。在斯洛文尼亚，与欧洲其他许多地方一样，2011年10月15日，第一次占领运动始于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抗议。因此，在卢布尔雅那，这场运动被称为“15O”。对证券交易所前广场的占领持续了六个月。

这次占领将社会中所有隐藏的分歧公之于众。贫困、吸毒、无家可归、精神健康问题、资本主义下日常生活的苦难 —— 所有这些都变得家喻户晓清晰可见，因此再也不能把它们当作所谓的“个人失败”问题忽视掉了。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占领”运动的核心问题是要求“真正的民主”，而 “15O”则不同，它（不仅仅）以此为中心；相反，它抨击的是金融化、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紧缩政策、总体体制和代议政治。对许多人来说，营地和大会成了一个平台，可以在这里讨论甚至组织城市中的所有政治活动。特别是在占领的最初几周，帐篷营地只是在城市各处开展的众多有趣的直接行动之一。

大会就是占领营地的中心。为了应对被谈论“应该做什么”的负担（这是一个与缺乏责任感相关的问题），运动参与者提出了 “直接行动民主”（DDA）的概念。直接行动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无论谁提出某事，本人都应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接行动民主”也促进了自主行动的增加，而不是把重点放在集会内部的民主决策过程上。因此，运动中形成的文化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主要是通过各种行动形式努力与公众沟通。

DDA也有缺点。正如在各种结构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它（不加思索地）偏向于那些有足够能力/魅力吸引更多人参与其行动的人。相对较少的运动参与者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行动，积极且精彩，但也意味着

精力被广泛分散，各种努力之间往往互不关联，而过度紧张的同志们经常只是在倦怠中挣扎。随着政治项目在各种工作组之间的分配，“直接行动民主”帮助创建了几个不同的决策场所；然而，它并没能产生一个可以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学习的交流空间，以创造一种超越直接民主的有意义的力量。

每日大会的重点变成了营地问题，参与者越来越少，而每月的大会则更多地关注运动的政治内容。那些参与工作组但不在营地露宿的人最终感到被疏远了。最终，“15O”运动在疲惫和沮丧中结束。许多人陷入了孤独和抑郁。

然而，“15O”给我们上了几堂重要的课。首先，尽管人们都在谈论直接民主是 “占领运动” 的一个积极方面，但 “15O” 的一些参与者很快就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将合法性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决策场所是没有成效的。所有开创性的、令人兴奋的事情都是在基于共识的直接民主程序之外发展起来的，把在证券交易所前发生的占领活动理解为“直接民主运动”有意义吗？也许吧，但如果我们当初把分散行动作为我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我们就能避免因把大会作为聚集在一起的中心空间而导致的所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将大会的做法非正式地制度化，也许人们会更有能力发现和抓住运动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刻，并在之后及时识别出该运动被边缘化的苗头。也许我们会更有能力扪心自问，哪些策略是在推进我们的激进议程，哪些策略是在助长自我中立化，导致我们被限制在旧策略的惯性中。

[image] 2011年10月15O运动开始时，证券交易所前的占领。Borza“证券交易所”，已被改为Bojza，“奋斗”的意思。

学生运动中大会的局限性

> “如果他们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可以推动更加激进的行动，占据大学更多的空间。现在，让我们展示自己的力量吧。”

卢布尔雅那，2011年11月。在城市的一侧，帐篷占据证券交易所前的广场已有一个半月。在城市的另一边，学生们挤在文学院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里。大会的议程只有一项：是否占领文学院，阻止高等教

育私有化。

我们中的一些人来到这里，准备封锁整栋楼的知识生产，希望这种激进行为能打开空间，动摇大学的权力关系。我们认为，运动最好能挺过三天再被驱逐，但仍准备继续战斗，而不是在有限的占领中耗尽精力，那样无法打破大学的现状，更不用说整个社会了。其他人则认为，占领几间教室并与当局展开谈判就足够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几位教授和学生领袖说服大多数人投票反对全面封锁。

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少数”的人来说 ——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首先投票 —— 选择是很艰难的。我们考虑过是否违背大会的决定，独自占领整栋大楼，冒着与其他人疏远的风险。最后，我们服从了大会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也许应该采取不同的行动。

部分占领持续了几个月。起初，大学管理部门还在试图进行谈判，因为他们不知道抗议活动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不需要满足任何要求。占领者甚至自己就放弃了一些教室，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用自己组织的学习项目来填满这些教室。占领的结束并没有在社会上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也没有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斗争中来，而是让学生运动疲惫不堪、四分五裂，只能通过现有的代表制度与学校当局进行谈判。自此以后，斯洛文尼亚再没发生过占领大学的事件。

无政府主义者呢？我们试图参与自发组织的研究过程，但大多数情况下感觉像是在自说自话。经过几个月的挫折，我们才意识到，在接受民主决策规范的同时，我们未能进一步推动这一时刻的到来，错失了在运动内部、大学内部以及整个社会中开启富有成效的冲突的机会。至少，我们本可以就运动应该使用哪些策略，以及如何决定哪些策略是合法的，展开一场亟需的讨论。但我们没有制定自己的议程，而是接受了他人的优先事项，并在这一过程中迷失了自我。问题并不在于大会本身，而是这个机构被理解成了 “唯一的决策场所”，因此在它之外的任何行动都显得不可接受 —— 即使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

[image] 2011年11月卢布尔雅那艺术学院占领之初的会议。

建立机构还是开辟空间？

> “通过组织大会，我们希望开辟新的共同力量表达空间，随着我们交流经验、知识和观点，这种空间将不断扩大，从而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和团结的共同空间”。—— *2012*年*12*月底，卢布尔雅那第一届“起义公开大会”邀请函。

“15O”结束几个月后，起义开始了。但这次没有人急于召开大会。在卢布尔雅那开展活动的最初几周，人们举行了各种分散的行动、抗议、讨论和会议。当人们发现起义中某些有组织的团体正试图决定和代表运动的诉求，以便将运动引向集中化和可预测的方向时，其他参与者便将大会作为防止集中化和统一化的工具，而不是“直接民主”的方法。通过将许多不同的参与者聚集到一个地方，大会就相当于创建了一种基础设施，在这种基础设施中，每个建立等级制度的企图都会被所有人看到，从而受到质疑和反对。

从一开始，“起义公开大会”就被定位为通过交流经验和知识来协调、沟通和建立共同力量的几种不同方式之一。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汇聚和交流的空间，但绝不让它变成为整个起义做决定的唯一场所。这是一个空间，让想做类似事情的人找到彼此，并讨论出现的问题 —— 例如，它是人们抨击民族主义的平台。

这些大会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它们向尚未采取激进方法的人们传播了这些方法。在大会上，人们认识到了策略多样性的价值；通过讨论，许多参与者承诺声援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在最初的几次抗议活动中，一些人甚至主动将身着黑衣的示威者交给警察；而在起义接近尾声时，当几名抗议者被捕时，数百人跑到警察局围堵，直到被捕的人获释。

虽然起义持续了半年之久，但在此期间，卢布尔雅那只举行了几次大会。基于前两次运动的负面经验，我们认为，如果要让大会成为运动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就必须知道何时应该放弃大会。当出现在街头的人越来越少时，我们显然需要继续前进，而不是试图重现已经过去的局面。在大会可能成为怀旧行为空间的时候，我们拒绝再次呼吁大会；相反，我们开始思考哪里可能出现新的冲突点，以及如何围绕冲突点组织起来。

马里博尔则有不同的经历。在起义结束三年多后的今天，即2016年，覆盖约半个城市的邻里大会仍在那里举行。这些大会主要集中在城市不同街区日常生活的自我组织上。有人猜测，在马里博尔继续举行大会而在卢布尔雅那没有，是因为在这座因去工业化而荒废的城市里，更需要切实的自我组织。还有人认为，大会在马里博尔得以延续，是因为那里的一个团体将维持大会作为其首要项目。这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种大会是否能产生激进的内容 —— 或者说，只是采用一种所谓激进的形式就足够了吗？如果参加邻里大会的人利用大会来追求反动的目标呢该怎么办？在采取大会上的共识策略的同时推广更激进的价值观会有意义吗？开拓空间就够了吗？

在起义中，尽管我们在实践中违背并超越了“直接民主”的概念，但我们仍然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我们的许多行动。这成了一个问题 —— 与其说是大会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与起义的其他成果相关联的问题。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和反专制思想似乎是当地各种行动的“先锋”，但起义在公众中的代表权却落在了后来组建了一个类似于 “Syriza(激进左翼联盟)” 的政党的人手中，他们承诺在议会中实行“更直接的民主”，并与社会运动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如果不是我们帮助推广直接民主的话语，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image] 2012年12月3日，马里博尔起义。

反对并超越（直接）民主

当起义行将结束时，人们想知道如何将我们在街头建立的联系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在卢布尔雅那的一次大会上，人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在居民区组织活动，希望通过建立一个人们可以自我组织的机构，让那里的人们变得更加激进。

我们从未想过要成为抵抗运动的专业组织者，因此我们只在自己居住的街区组织活动；同样，我们也打算尽可能多地轮换角色。在起义的高峰期，由于行动频繁，我们很难对所有行动进行跟踪，因此将大会作为一种工具来利用就显得很容易了，但至少那个时候大会本身还不是目的。而当街头不再有人、大会成为居民区唯一的 “行动形式” 时，要避免其目的性就变得难上加难了。尽管街区大会的参与率很高，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人们只是依赖我们来组织和推动会议。所有工作组都希望我们参与其中，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不再是一个自我组

织的过程。我们意识到，与其让少数人组织会议，倒不如不组织会议。我们不想以这种方式接受权威的地位。

然而这种状况对市政府来说却很合胃口。当我们听说一个我们没有组织起来的社区也开始举行邻里大会时，起初我们还以为终于看到了真正的自我组织。但不幸的是，这竟然是市政府通过一个“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干预。他们资助人们开展 “自我组织” 项目。市政府收买了直接民主的框架，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以消除该社区可能出现的任何异议。

当国家赞助直接民主时，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如何才能防止这种共谋。让运动依赖于一个如此容易被反过来对付运动本身的工具，这是个好主意吗？如果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大会需要改进，而在于直接民主没有任何 区别于国家 的内在因素呢？当人们开始成功 推翻君主制时，国家通过引入代议制民主而继续存在下来了。 国家的所有机构和职能都保持不变 ，唯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机构和职能是由 选举产生的代表 而不是世袭君主管理的。直接民主会不会是这一妥协的新版本，再次保持权力的不均衡分配，同时给我们带来自决的幻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创造邂逅空间，参与公开讨论的机会，并通过彼此的交集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 —— 邻里大会可以继续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吗？也许是的。但我们可能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它，不能将其理解为 “直接民主的工具”，而应将其理解为连接和协调自主行动和团体的平台。截至2016年年中，这方面的最新实例是反种族主义阵线（Anti-Racist Front），这是一个活跃于移民斗争中的个人和团体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在斯洛文尼亚进行直接民主实验几年后得出的结论：我们暂时保留了形式，但我们需要抛弃话语。

[image] 2012年12月，卢布尔雅那起义期间的游行。

[image]
[image]

无政府主义革命：披荆斩棘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2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2 实践
[image] 标签	专制 代议制 公域私域 原子化 孤独 左翼 意识形态 无政府主义 直接民主 资本主义 选举 金融危机
[image] 编辑	[image]iyp MMartinez

“政治”始终是为实现某些理念而进行的权力斗争。没有斗争，没有思想，就没有“政治”。

[image]

我身处希腊雅典美术学院的院子里。这是2011年5月25日，一个炎热的夏日。为期五天的无政府主义和反专制节日将在六小时后开幕，我正在抓紧时间准备我心目中的所有小细节。我独自一人工作。

我穿过校园，把一名电工从一个舞台带到另一个舞台。在西班牙，人们在沉默了75年之后，目前为止已经上街游行了十天。他们向所有人发出了反抗的信号，把解放的火焰从阿拉伯国家带到了欧洲大地。我们正在为我们自己的节日做准备：三个舞台的音响系统和两个公共讨论和讲座区；还有一个剧院舞台、一个书展区和工作坊区。我们大约有30人，来自两个亲密团队，正在建设一个可容纳12000人的区域。我们的行动就像一支斯巴达军队（完全是偏执狂的想法，认为一小群意志坚定的战士具有惊人的能力）。心灵是一艘宇宙飞船。人们在夏夜前往其他星球旅行的生活方式似乎已有数千年的传统。我们正在走向无政府状态！有时，它似乎离我们很远；有时，它突然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今天下午，雅典卫城后面有一个集会，人们将在那里接收革命的圣火从西班牙传到希腊。一年来，每周都有一次小型无政府主义集会在议会门前的宪法广场举行，讨论危机问题。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集会上，人们将在这里决定响应来自西班牙、突尼斯和埃及的行动号召，前往宪法广场扎营。他们发出呼吁，希望其他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

[image] 2011年5月26日：宪法广场抗议的第二天。

我们可以做大量的后勤工作，为人们准备一个空间，但如果反抗精神把他们吸引到其他地方，重要的是存在！我们可以终其一生为运动建立理论论据、意识形态立场或基础设施，但当反叛发生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放弃那些可能将我们彼此隔开的东西，想方设法与对方相遇，向反叛者传播有益的思想和革命实践。

那天出现的是一场热带风暴，一片浩瀚的汪洋映入我们的眼帘，广阔而狂野。十万人突然聚集在议会周围，高喊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代议制的经典口号："烧掉它，我们要烧掉议会，烧掉这个妓院！”没有人去参加下午的讲座，所有人聚集都在宪法广场。有8000多人在深夜来到音乐会现场和电子音乐舞台。人群陷入疯狂，彼此分享着陌生而狂野的热情。

我们与 Void Network 一起在宪法广场扎营。我们在已经参加了三年的每周一次的无政府主义集会“为了社会的自我组织”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一些团体拒绝前来宪法广场 —— 他们称其为小资产阶级，与之保持距离，留在远处观望。其他无政府主义、自治和反专制团体和个人整个夏天都呆在宪法广场。我们也留在那里，向无数绝望的人们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参与雅典大会的组织工作，以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确保任何政党或极左团体都无法操纵决策，防止左派接管运动。

其他团体只是为了三天的起义而来。这场起义规模巨大……在金融崩溃、非人的紧缩措施、失业和难以置信的国家镇压中……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夏天之一。

[image] 2011年5月29日：宪法广场的营地。

2010年，希腊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签订合同，同意采取紧缩措施，这让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全球经济利益是如何控制代议制民主的。人们感到被他们信任了40年的政客们背叛了，这些政客是被人民亲手推举进议会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愤怒之余，人们想象着烧毁议会大厦；其中一些人甚至已经点燃火种。金属栅栏和全天候巡逻的防暴警察保护了议会长达三年之久，成为“人民”与支配我们生活的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最后屏障。

对代议制信仰的崩溃也是一种解放。曾经顺从于等级制逻辑的人和常识的受害者现在摆脱了政客的领导和记者的操纵。工会和政党失去了影响力。新的个人和集体智慧与解放取代了旧的身份。数百万人参加了疯狂的起义 —— 先是呐喊自己多年来对政客的信任，然后是呐喊打倒政客。

人民迈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这就是2011年夏天在希腊和在全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发生的事。

[image] 2011年6月5日：宪法广场的营地。

我当时在母亲家里。那是2011年6月。她是一位65岁的社会民主党人，她想知道人们既然已经包围议会这么多天了为什么还没有成功攻入议会。因为催泪瓦斯，她不敢上街，但她总是问我："也许我白天也可以来营地？” 我的叔叔和婶婶也在那里，他们是泛希社运党（PASOK）的成员，该党成立于1973年，现在是国家的执政党。姨妈今年62岁。她的眼睛闪闪发光，讲述了昨晚一位著名的泛希社运党部长的豪华轿车在议会外经过她身边时的情景。她一拳打在轿车身上，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跑到轿车后面，砸碎车窗，打了部长一拳。她感到了解放的快意 —— 她感到了自由！她迈出了这一步 ...

[image] 2011年6月15日：在宪法广场与右翼民族主义抗议者进行战斗。

但是，在宪法广场举行的集会最终真的赢得解放了吗？或者，它们的“直接民主”方式实际上只是导致激进左翼联盟党和极右翼“金色黎明”出于表面上不同但根本上相似的原因获得了大量的新拥护者？

人们通过全国各地的集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未参加过任何公共活动的普通人，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举着扩音器保证每个人都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激昂地讲述着内心最深刻的恐惧和最珍贵的愿景。

这就像是某种集体治疗，是对过去的妄想的宣泄，是跳入公共空间的尝试，是对社会权力巨大可能性的探索。那是一个美妙的夏天，每个人都呆在街上，与所有人谈论一切。

然后，民主重新建立。

无论如何，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缺席了，他们犯下了本世纪迄今为止最大的政治错误。无论如何，我们 —— 本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们 —— 对于我们社会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还没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解决方案。我们很清楚如何解构我们敌人的思想，但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无法将我们的理想从无政府主义的云端带到粗糙而肮脏的现实地面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其他具体的选择了，人们不得不 —— 或者说被迫 —— 在社会控制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做出选择，前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专制主义领袖作为“父亲”的形象，后者则承诺为他们提供免费学校、医院和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他们免受统治这个世界的 新自由主义狂鲨 的伤害。

因此，在集会发言、参与 “直接”民主之后，人们再次排队投票，重申国家的民主。你迈向自由的每一步都会成为前进的障碍。民主本身就是障碍之一。

[image] 2011年6月15日：防暴警察在写着“直接民主”的横幅后面排队。

我们时代的民主，资产阶级文明的最高成就，其内在特性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雅典。

每个国家的开国元勋都把自己想象成 “未受教育的野蛮人” 的 统治者 ，在他们眼里这些变态的穷人一旦不受控制就会犯下各种罪行。“民主”是由那些对政治和经济感兴趣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希望 通过语言 而不是刀剑（ 如果语言不够，就用刀剑 ）来控制大众。 代议制 是一种精神控制制度，它提供了一种伪自由的现实，在这种制度下，你无法对有关你生活的根本决定施加任何重大影响。

民主的开国元勋们，也许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害怕他们的孩子产生 批判性思维 。民主使人愚昧：我们被迫保持一种幼稚的心态，参与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我们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和愿望。你不需要知道决定你生活的决策的具体细节：你只需要投票给那些看起来足以 管理你生活的人 就行了。民主使腐败蔓延：领导人耗尽 社会资源 。民主让人们麻木不仁。没人在乎你的意见；你只是数百万人中的一个。民主永远不会教你在公共场合发言，只会让你保持沉默，听你的长官讲话。你们是去鼓掌的，别的不用干。 在你们的整个政治生活中，你们都是缺席者、是被代表的人。

民主让你们害怕，害怕隐藏在你们的小圈子里、选区里和国家中的"民主敌人"。民主在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边界，现在你们必须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这些边界。边界是虚构的，是社会的发明，但你被塞进战场上的身体却是真实的。民主将人类的其他部分排除在你的社会之外，它准备了一支军队，包括你在内，去杀死所有被排除在外的人。一旦你拒绝为了民主而杀人，你也会被排除在外。

这种制度具有惊人的自我复制能力。它制造学校、医院、剧院、幼儿园、军营、大学校园、美术馆、博物馆和游乐园，你可以在这些机构中度过一生。如果你想逃离这些机构，你很可能会被送进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监狱或精神病诊所（所有这些机构也都是"民主机构"）。这种惊人的自我复制能力的另一面是，民主无法超越自我，无法进化成不同的东西，就像苏联永远不会到达共产主义一样。听听民主国家对反叛者是怎么说的："没有人可以讹诈民主"。

由此，民主从未改变。法规和政客可以更换，但其核心始终是同样的寡头制度和贵族制度。民主总是通过选举、商业合同和裙带关系，寻找最好的人来延续"民主"本身。

这一点不足为奇。民主是一种保守的部落方式，古希腊的某些部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自我繁衍的。在你逃离部落之前，它永远不会允许你变得与众不同。而今天，当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国家的控制在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时，要想摆脱民主，除了摧毁它别无他法。

即使知道这一切，有些人仍然捍卫民主。他们希望找到一种不会导致寡头政治的民主形式，就像 21 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在寻找不会导致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一样。但是，所有国家的开国元勋们都站在各

种民主主义者面前，赞许地看着常态的重现 —— 同样的剥削条件，新面孔出现在同样的旧的权威座椅上。

只要我们不敢斩断这种秩序的根基，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对于那些害怕踏入自己的欲望和权力的未知领域的人来说，民主是最后的选择。同样，对“真正”民主的需求是社会运动在所谓的“社会领域”中合法化（并避免刑事化）的最后途径。正如民主是最后一步一样，民主也是社会运动产生新可能性的最后障碍。

[image] 2011年6月28日：民族主义的旗帜取代了要求直接民主的旗帜。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能将我们从民主中拯救出来吗？

直接民主可以提供另一种管理生活的方式。但这真的是你需要的吗？你想在更小的范围内重现旧世界的局限性吗？难道你真的想让 “大会” 来决定你的生活吗？还是想把自己的生活扩展到自决和开放共享创造力的新形式，以你（以及共享生活的人）认为合适的方式，为所有人的权益自由提供各自的力量？

当我参加 **Void Network** 的集会时，我必须考虑到我所有同志的需要和利益，我们的团体必须考虑到这个世界上尽可能多的人的渴望和愿景。 如果我们不互相照顾 ，就不会有 **Void Network**，如果我们不照顾我们的小团队以外的人，我们与整个世界之间就不会有联系。没有任何大会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能力来造福我们的周围。 这就是无政府主义 亲密团队 与人民大会之间的区别，前者产生的是一种集体的、扩张性的力量，而后者则将力量集中在我们的生活和关系之外，使我们与自己和彼此疏远。

直接民主本应帮我们摆脱代表制所产生的冷漠，因为它看起来是一种 “参与式” 的民主。但是，会因此有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的“大会”吗？即便可以，这样的大会真的能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自由和平等吗？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统计数字，因为我们要等上好几天才能被轮到发言。另方面，如果我们把这种形式缩小到一个邻里大会的微小水平，那不就等于把自己困在微观世界里了吗？

任何一种 “直接民主” 都会复制与代议制民主相同的条件，只是规模

更小而已。多数人压制少数人，使他们变得冷漠。很多时候你甚至懒得表达意见了，因为你知道你没有机会将其付诸实践。你常常不敢说话，因为你知道你会被周围的人羞辱。同质化是任何民主程序的终极要求，无论是 “直接” 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 —— 同质化的最终结果是两种终极意见（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失去了人类智慧和感性的巨大丰富性，抹杀了人类需求和愿望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直接民主的人民大会最终也可能决定实施非人道的种族灭绝，就像公元前416年古代雅典对米洛斯实施的种族灭绝一样。由于直接民主的决定，被排斥在外的人们遭到奴役和强暴。直接民主是 “仅限成员” 的。由于其规模较小，它比代议制民主排斥更多的人 —— 产生孤立的泡沫，像古希腊的城邦那样相互争斗。每个人都是“局外人”、“他者”、可能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建立军队来保卫自己，即使你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你也必须为保护多数人的意见而牺牲。谁要是不服从决定，就必须受到惩罚，就像举世闻名的民主受害者苏格拉底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有魅力的领导人找到了跟粉丝直接勾搭的最佳方式，操纵民意的民主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有效！直接民主永远不会把我们从民主中解放出来。

[image] 2011年6月29日：希腊防暴警察，新的重装步兵将“民主”强加给被剥削和被排斥的人。

几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母亲家。现在是2011年9月初，距离 “占领华尔街” 行动开始还有几天时间。我正在给美国的同志们发邮件，敦促他们在各州扩大营地，在占领运动集会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方法。

我的叔叔也在那里。当我看着屏幕时，他对我说：“我们现在决定”（我抬起头看着他）“离开泛希社运党，去尝试欧洲共产党的激进左翼联盟”。我感到恐惧，因为我知道，当他说 “我们决定” 时，他是在代表约200万人说话。就好像他了解他们每一个人似的 —— 他们是被背叛的泛希社运党的追随者，而他从始至终都在这个社民党内。就在一天前，激进左翼联盟的得票率还只有4%。我看着他，就像看着两百万行尸走肉从一个政党走到另一个政党。我想大喊："你们必须走得更远！每一步都需要突破！你不能停在那里……”

无政府主义者在与这类人对话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这些人把政治理解为对现实的管理。

我把历史想象成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微笑着凝视雅典爆发的起义。我感到历史在我的城市逗留了很长时间之后就要离开雅典了，现在议会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在人们心中重新建立妄想。三年半后的2015年，街头依然寂静无声，激进左翼联盟的欧洲共产主义分子赢得了选举，他们的竞选口号只有一个词：希望。(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绝望）

新政府做出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拆除议会周围的金属防护栏撤走防暴警察。议会又“安全”了。民主从未改变。它只是改良和自我复制。

[image] 捍卫宪法广场的自由空间。

披荆斩棘。

2600年前在希腊，两个世纪前在欧洲，争取民主的斗争把贫困的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若干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完全相同的境地 —— 与所有可能的外来者进行永恒的战争，外加决定战争的投票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社会正义和永恒之爱”的承诺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穷人；若干年后，它们成了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工具，成了人类解放的绝对敌人和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障碍。共产党号称是所有“没有发言权的人的代言人”，结果只是成为了言论自由的最大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中被收编成了部长和省长，而伟大的工人解放组织 CNT 则组织人们终生在工厂里上班，直到英勇就义。为了从旧世界的监狱中解放出来，我们很有可能牺牲生命，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新的高质量的监狱里。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在虚无网络（Void Network）中共享的解放愿景，是一个没有金钱、没有国界的旧世界的愿景。但它必需在 21 世纪得到更新 —— 否则，它就会像神话中的幽灵一样留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另一个屏障。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劳动转化为开源的创造力，将工作场所转化为自愿参与创造的美丽公园，在全球网络中自由分配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生产。生活必须围绕欲望的生产和需求的享受来组织。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那就意味着一个没有所谓的 “外来者” 的世界 —— 因此，在你生命的任何时刻，你都不会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 “陌生人”。我们必须将 “社会” 转变为开放、包容的社区，在全球网络中实现充分连接，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欢迎、发挥作

用，而不是被划分为孤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仇外的群体。我们必须向所有“他人”的差异开放“自己”。

在西班牙革命失败后的八十五年里，无政府主义者一直避免提出这种规模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坚实计划。与此同时，在这些年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19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无法想象的程度。全球资本主义就在这里，全球无政府主义却不在这里。

无政府主义革命发生的唯一可能方式是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在地方范围内，更不是在孤立的岛屿上。即使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让无政府主义革命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我们必须设想、计划并去实现这一点。

如果我们将组织结构的规模缩小到微小的邻里大会或微不足道的生态社区，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理的问题就像被巨浪拍打的一艘脆弱的小渔船一样。新专制主义永远不会让我们在另类生活方式的生态偏执泡沫中独善其身（尽管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向富人兜售去那里度假的门票）。我们不能对这个世界的苦难视而不见。

另方面，如果我们允许新旧形式的专制大众结构迫使我们接受他们的效率和实用性观念，我们最终将陷入新的官僚主义怪物的嘴里。

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斗争的社区网络，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灵活团体组成的网络，这些团体随时准备与专制主义作斗争，创建公共解放区，抵御敌人， 并在全球社会解放的革命浪潮中将它们连接起来 ——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不需要任何“ 中央 ”的控制。

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写道：

> 「希腊人有共识或“常识”能力的概念，它将每种感官转化为另一种感官，并赋予人类意识。今天，当我们通过技术扩展了身体的各个部分和感官时，我们萦绕于对技术和经验的外在共识的需求，这种共识将把

> 我们的共同生活提升到世界性共识的高度。当我们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碎片化之后，思考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丁曾梦想过人类意识的这种普遍性，他认为，在将人类团结在一种包容的意识中之前，它们将只是破碎的碎片。」

无政府主义 —— 完全自由、绝对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全球伙伴关系 —— 能否为21世纪支离破碎的人类提供一种包容的意识？

即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也并不简单。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由社会和集体创造的解放愿景，我们就必须避免简单化的解决方案和特定个人的领导。例如，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挺聪明的人，但马克思“主义”是自由思考的障碍。

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正在与国家和资本主义作斗争，以打开通向完全自由、社会平等、互助和自决的通道 —— 实践、战略和方法。我们必须找到一种与许多人建立联系的方式，以便我们能够共同改变产生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条件。反对同质化，我们必须赋予多样性以权力；反对固执己见，我们必须允许所有真理成真；反对排斥，我们要捍卫“陌生人”、非二元、老人、年轻人、怪人和未知者；反对边界，我们要敞开心扉地生活；反对原子化，我们要关心他人，相互学习，去实施我们的伟大计划，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否则，既有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利益将以无穷无尽的相同条件重新出现。除非我们敢于自由生活，敢于分享一切，敢于传播无政府主义，否则这个世界将永远不会改变！

[image]

□

[image]
[image]

做一个无法被代表的人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3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2 实践
[image] 标签	公域私域 反叛 怪胎 独立性 营销 身份政治
[image] 编辑	[image]iyp

你是个人，不是个标签。这是一个需要牢记的事情。

- Table of Contents

我说自己“是个怪胎”是什么意思
我对身份营销的不满
另一个不满，但这次是关于代表性的

[image]

我接下来想说的不是关于身份、外展或我们与大众媒体的关系的结论。这些都是挺大的题目，一篇文章很难说清楚。并且我最近一直在努力避免自己看起来涉嫌说教。所以我在这里写下的只是我的私人结论，并尝试给大家展示下我得出这些结论所使用的工具，希望你们也能掌握这些工具，并用它们去得出你们自己的结论。我相信，这些结论至少会与我的结论有些不同。

我说自己“是个怪胎”是什么意思

直到我开始与来自前占领华尔街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交朋友时，我才听到某些语言的使用比我在酷儿圈子或艺术家圈子中听到的更有意思。比如 “我爱吉米，她是个十足的怪胎”，这里的 “怪胎” 一词的用

法就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保安打量了我一番，在我还没走到图书馆前门就把我赶了出来。我当时正和一个朋友约在那里见面。我朋友的解释是 “你看起来像个怪胎”，当然，这完全是事实。

我也听说过这种用法，在每周聚餐、想找志同道合的人来家里玩的时候，使用这样的句子：“是啊，我们得试着见见城里所有的怪胎”。在这里 “怪胎” 是一种爱称，甚至是一种衡量人品的东西 —— 正是因为在这些圈子里，以及在其他任何圈子里，这个词表示所有那些不能按照世俗文化法则循规蹈矩地做 “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的人。我想，当我说 “怪胎”这个词的时候是指那些因违背世俗事物发展规律而受到了惩罚但仍然坚持不懈做自己的人时，我并不害怕这听起来很前卫。我崇拜怪胎，因为他们是用自己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别人提供的方法生存下来的。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说太前卫，不值得认真对待，那你也不必认真对待我，但 “怪胎” 是我所向往的。

我对身份营销的不满

我认为外展工作很重要。我写的这篇文章本身就是某种外展，对吧？但我认为外展和营销是截然不同的。

营销需要品牌。出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对品牌营销感到厌倦。这甚至不一定像我们开始做营销时感觉会产生淡化效应那么简单，虽然这也是事实。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更根本。我无法相信“人”可以如此简单，也无法相信人应该努力浓缩成一个普遍的“身份”。我无法接受类似 “每个人都想成为性感尤物/大款老板/名流士绅等等” 的说法，因为我认为这些共同的欲望被人为地植入了身份的切入点，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威胁：“如果你不想___，那你就是个怪胎，你会受到惩罚"。

这样一来，受众并没有真正被挖掘出来，而是被营销活动本身建构起来的。我对构建人并不感兴趣。我不想把我的反叛或不满作为一种“反叛身份”，让你像戴帽子一样戴着出去逛街。我不想成为某种社会程序员，设计出我们现在都渴望成为的激进分子或局外人。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适合成为这样的英雄，甚至可能允许这些人逃避对其行为的责任或任何其他来自积累社会资本和“正确身份”而产生的权力。一个当地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谈论着他正在阅读的“正确书籍”和他

正确且性感的街头斗争策略，他已经积累了足够长的资历，以至于周围的人可以忽略他在这里对一个女人的攻击、或者在那里对朋友的背叛。我想，这就是我喜欢将 “怪胎” 的定义与身份保护伞区分开的地方，甚至是 “真正自由的人” 的身份或 “自由战士” 的身份。事实上，并不存在“完美怪人”、“英雄怪人”或任何浓缩的怪胎身份。

我之所以对自由身份的品牌化不感兴趣，是因为当你撇开爱国主义和所有其他已经在进行的狗屁自由品牌化时，甚至看看真正实现的最真实的愿望时，你可能就会发现，没有哪种“自由”是每个人都想要的。我认为，相信存在这样的自由是一种简单的逃避，你真正在做的只是利用对“身份”的规范标尺，这是现代文化赋予我们的一项苦差事。你是在推销身份，推销顽皮叛逆者或者国家公敌的身份，当你可以被市场、新闻媒体、警察等机构物种识别出来时，你就可以被它们所代表了。上帝啊，我真不知道有多希望公众不要再代表我。

(虽然我早就习惯了 ......)

另一个不满，但这次是关于代表性的

当新闻主播来到占领运动营地或起义现场，把麦克风对准一个不服从命令的人，而这个人的确是在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为什么在新闻台把事件浓缩成 “新闻报道产品” 后，屏幕上接受采访的占领者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这是否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头公司在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影中将非白人、非男性的主角塑造成反对叛乱、维护正义和法律秩序、学会欣赏 “和平” 和反对 “暴力” 的人物形象很相似？他们学会了不再咬住别人的手不放，或者为了让自己看起来 “更成熟” 或更容易得到更可能得到的东西，为了“我想要的东西”和“已经被允许的东西”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妥协？为什么当他们代表我们时，我们在屏幕上看起来比我们在夏洛特、石墙、弗格森等街头为自己挺身而出时看起来更容易被驾驭？我们是为了谁而被代表的？我们是否希望我们那仇视同性恋的父母看到我们出现在好莱坞电影或新闻里后转而打电话给我们说：”终于明白了你是完全无害的，现在我们认为可以学着原谅你是个怪胎了” ......？

或者他们展示的不是真实的我们，而是一个他们可能不会逮捕的我们 —— 一个不会胡作非为的我们。就好比 “只要把辫子塞进帽子里就能

站到收银台后面去了”、或者 “穿得像个直人，以免冒犯顾客”。这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但还是值得再说一遍 —— “代表” 是一个陷阱。我不想被代表。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我自己。我想任由自己的想法发展。

当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时，我就面临着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至少我那些头脑冷静的朋友会让我面对这些问题：

- 媒体上的积极报道可能会构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陌生人不会点火烧了我们的社区中心，也不会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朝我们扑过来。

- 是的积极的报道会带来妥协，也许妥协比胜利更多。但如果被媒体报道的微小好处是生与死的区别，也许我们会愿意活得烂一点，假设能活下来的话。

这对我来说很复杂。如果我强迫自己回答 "你何苦？你究竟想要什么？” 这类问题时，我可以肯定地说 —— 我的答案不会是简单的 “活着”。我确实听过上述论点，即“活下来是根本”，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的重要性足以证明你可以不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为了生存，甚至可以按照 “某国梦” 的道德标准去生活。当然这绝对是可能的，而且很明显，甚至是可以消化的。

但对此，我想说的是，我常常认为，比这个世界变得无法生存更糟糕的事情，是它继续像现在这样痛苦或无聊地生存下去。所谓的“生存”就像穿着正装去上班，老老实实等着发工资不要捣乱，投票给你最喜欢的军阀，幻想这个军阀可能不会夺走我那么多东西。甚至你可以在其中茁壮成长。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下一个军阀。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那个确保我自己的雇员的行为“足够专业”的人。

对我来说，如果拒绝被代表就意味着拒绝大众对我的怪胎身份的宽恕，那我已经用不着那种宽恕了。的确，我会因为没有 “通过” 男性女性的身份合规标准而被人从车里泼饮料，也会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被图书馆踢出来，会失去工作，甚至可能被家人抛弃。这并不像人们所说的 “生存”，也许在某些时候，这根本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生存。除了宽恕和宽容之外，我还能做得更好。事实上，在我身边的人

和与我在世界上相处的大多数陌生人的眼中，我已经做到了。即使是那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人，那些泼酒者、起哄者、袭击者，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容忍了我。很好。我不是你的关节痛，也不是你袜子上的洞，我是一个人，我不希望通过电影、新闻媒体和法律来调解与大量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宁愿诚实地、挑衅地生活下去，并与他人相处。

[image]

□

作者 弗朗西丝卡（拉丁语意为“自由的人”）

[image]
[image]

“不要亲手开倒车!” - 波斯尼亚的直接民主实验和第二轮噩梦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5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2 实践
[image] 标签	代议制 代际矛盾 女权主义 开倒车 权威 民主 民族主义 直接民主 直接行动 诉求 起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起义的烈焰开启了解放的希望，却被全会的民主诉求杀死 ……
到底发生了什么？

- Table of Content
  全会 VS. 街头
  机构 VS. 工具
  提出要求 VS. 建立共同的斗争语言
  政府 VS. 自发组织
  民主 VS. 自由

[image] [image]

2014年2月，在战争导致波斯尼亚满目疮痍并分裂为三个民族区域的二十年之后，该国再次爆发战火。但这一次爆发的不是民族冲突，而是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客的熊熊怒火。多年来，这些政客在有计划地掠夺国家的同时，煽动民族分裂以分散人民的注意力。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贫困：2014年的失业率高达44%，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60%。

人们涌上街头。击退了警察，烧毁了议会和市政大楼。在抗议

的混乱中，惊慌失措的政客们从国库中偷走了钱。在莫斯塔尔这个穆斯林和天主教徒分居的城市，一些政客把家人从附近的边境送入克罗地亚。

在33个城市中，以“自由便是我的国”和“开除所有政客”为口号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大批群众。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千人规模的大型集会上尝试直接民主 —— 这是自上次巴尔干战争以来前南斯拉夫国家从未出现过的规模。

【注：2014年的起义并非凭空出现。2006年，一个名为“够了”（“Dosta”）的运动从一个小型互联网论坛发展成为每周在萨拉热窝中心广场举行的大会，其规模每周都在扩大，人们通过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方法，最终引发了抗议活动。随着“Dosta”组织结构扩展到不同的城市，它在政治上仍然是多元的。萨拉热窝全体会议中最活跃的几位参与者都是曾经参与Dosta运动并从此激进化的。在波斯尼亚之外，直接民主的支持者对其中一些人所描述的“波斯尼亚之春”表达了极大的热情。】

2014年的起义有许多鼓舞人心的地方 —— 反对民族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妇女在原本仍是传统的社会中抗议的能见度，关注社会和经济斗争而非种族仇恨。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都在抗议活动中变得激进起来。

然而，就在全会开始之际，起义却逐渐平息了。当时，许多人认为全会是起义之后的“下一步”：一旦警察被击败，政客处于守势，人们就应该聚集在一起，找出大家都想要的东西。然而几个月后，政府就重新控制了局面，全体会议失去了所有的影响力，一切又恢复了往常。

是什么打败了起义？是街头的镇压吗，还是全会的安抚？是起义和全会之间的分歧吗？还是无论如何它都会消亡？

“当我们在街头战斗时，你们在哪儿？”老工人对半年前促成全会的年轻人问出了这句话。老工人仍然每天坚持在萨拉热窝议会前抗议，只是现在，就像起义前一样，他和他的朋友们只能靠自己了。

[image] 在波斯尼亚的愤怒和幻灭 [image] 2014年2月7日：抗议者在图兹拉燃烧的政府大楼前焚烧文件。涂鸦上写着“民族主义去死”、“所有政客都必须下台”。

全会 VS. 街头

起初，全会是街头斗争的有机体现。与抗议活动一样，全会吸引了从未参与过此类斗争的人们。有些人在冲突中感到不自在，但又想表达自己的愤怒，或表达对未来的渴望。他们与示威者一起组成了直接民主的集会，被称为全会。

这些全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集体治疗。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共同空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意见是重要的。他们谈论战争，谈论创伤后应激反应，谈论自己的生活条件，谈论他们对制度的憎恨，因为这个制度如何羞辱了他们，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人。许多人说，“斗争让我们找回了尊严”。

全会的程序旨在保持横向权力：与会者轮流发言，每位发言者的发言时间限制在几分钟之内，主持人旨在促进包容性和平等主义。在某些情况下，这有助于保持全会的多样性。在其他地方，那些受过更多正规教育的人在讨论中更得心应手，因为他们习惯于在某种公共话语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一些全会中，影响力在阿西姆·穆吉奇（Asim Mujkić）这样的知识分子手中累积，他是一名政治学教授，曾多次在媒体上代表萨拉热窝全体会议发言。与此同时，一些参加过示威游行的人没有来参加全会；其他人一开始来了，但后来就不来了。一些人显然相信全会能“代表”他们的需求，无论他们自己是否亲自出席。其他人则可能对有人以他们的名义发言而反感。

就在参加全会的人数逐渐减少的时候，警察悄悄地重新控制了街道。市政府在被烧毁的大楼外重新设立了规模较小的办公室。

“那些亲手纵火焚烧大楼的人后来如何了？”我问，“他们参加图兹拉的全会了吗？”

“没有”，她回答，“他们没有参加。他们派了一名代表参加第一次全

会，那时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那位代表说如果政府不能改弦更张，他们就烧掉大楼。但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来过全会了。”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刚刚烧毁了政府总部的人会对参加公开会议犹豫不决。事实上，在一切平息后不久，警方就开始提出了所谓的“恐怖主义”指控。同时，如果你已经亲手烧毁政府办公室，然后再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从反抗旧秩序和寻求新秩序之间出现裂痕的那一刻起，起义就注定要失败了。

[image] 2014年2月：当局失去控制。

机构 VS. 工具

作为全会主持人和工作组最积极的组织者，他们开始工作时真诚地试图将斗争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但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事实上的权威地位了。他们制定议程，决定讨论的进程；他们成了起义的名号和代言人。他们似乎有责任确定、表达并优先考虑促使人们起义的诉求。这些组织者中的大多数人从未想要过这种权力 —— 但他们希望起义能够成功地改变波斯尼亚社会，他们相信全会对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许多调解人致力于直接民主的原则。他们相信，在议会中坚持直接民主程序将避免权力失衡和官僚主义。但是， 在这种希望中，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将合法性赋予起义参与者的需求和愿景，而是开始将合法性赋予作为“机构”的全会 。 全会不再是解决问题和满足需求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而是成为了一种目的。

随着示威游行的结束，全会不再是加强人们在街头所采取的行动的工具。它们越来越多地扮演起了传统抗议组织的角色，一种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而且是没有牙齿的看门狗。

萨拉热窝全会的一位前协调人说："我们并不想落到这种地步”。“我们想提供帮助，但不想对进程有太多的控制权。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

[image] 2014年2月14日：萨拉热窝全会要求建立“无党派专家政府”。

提出要求 VS. 建立共同的斗争语言

2014年春季的起义让波斯尼亚的政客们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他们一安定下来就在多个方面开启了报复。为了在媒体上败坏抗议者的名声，政客们将焚烧萨拉热窝议会与围困期间塞尔维亚的侵略行为相提并论；这为他们日后提出“恐怖主义”指控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将运动引导回传统政治中，使其不那么激进、不那么难以预测、不那么难以控制。不幸的是，全会却助长了这种努力。

波斯尼亚起义表达了成千上万个人的愿望、想法和需求。但是，全会建立共识的过程并没有将这些愿望、想法和需求用一种共同的斗争语言连接起来，没能做到既保留每个愿望、想法和需求的独特性，同时又为人们创造了一个采取一致行动的平台。

为了加强全会的影响力，各城市的地区全会进行了接触，并承诺制定一份共同诉求的清单。由越来越少的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数以千计的诉求进行了研究，将一些诉求合并在一起，对另一些诉求进行解释和调整，将其他一些诉求完全抛弃。直到起义发生两个月后的4月9日，他们才在萨拉热窝的一次象征性的抗议活动中向政府提出了所有全体会议的共同要求。

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应。 当全会将所有人的愤怒化解成了寥寥几项诉求时，政府已经不再需要关心他们了。这些诉求就是整场起义棺材板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他说："当你从斯洛文尼亚来到这里，告诉我们运动将在集体大会中消亡时，我并不相信你。但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发生了”。

[image] 2014年2月21日：萨拉热窝全会的与会者听取福伊尼察、科尼奇和莫斯塔尔全会发言人的发言。 [image] 2014年3月：全会继续在萨拉热窝举行会议。

政府 VS. 自发组织

在起义的发源地图兹拉，暴乱迫使该州总理辞职。全会随后要求成立一个无党派的“临时政府”，直到定期选举为止。他们希望这个政府每周向全会报告一次。事实上，他们得到了一个由一位教授担任总理的临时政府，同时还有几位以前从未参与过政治的部长。然而很快就发现，这些新政客中的许多人不仅与老牌政党有联系，而且还卷入了腐败，而打击腐败的旧系统恰恰是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没过多久，新当选的政客们就停止了与全会及其委员会的沟通。政府中出现了新面孔，但精英阶层的权力得以保留。

萨拉热窝全会网站 plenumsa.org 上倒数第二个条目是关于应对2014年5月肆虐波斯尼亚的洪灾的。全会参与者自发组织的救援工作对帮助许多人度过这场灾难至关重要，相比下政府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然而在那之后，这些成功的自发组织场所却被抛弃了。次年10月，选举使一个保守党重新掌权图兹拉，据传该党一直在操纵临时政府。

这个新政府的领导人是谁呢？—— 他是一名前内政部长，曾主管警察事务。

“我只有一个敌人。你们不是我的敌人，政府才是我的敌人”。 老工人对他在全会上的老战友说道，“当我们烧毁议会时，我们已经对敌人说完了所有该说的话"。

[image] 2014年5月肆虐波斯尼亚的洪水。

民主 VS. 自由

在过去几年里，波斯尼亚发生了多次运动，每次运动都比上一次运动更加深入。每场运动都有新的参与者走上街头，然后平息下来 —— 但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站起来反抗的人们是否会继续发展自主行动的能力，在一次又一次的起义中积蓄力量？还是最终被制度化加入政党的行列？

将社会斗争建立在对“更多民主”的需求上 —— 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直接民主 —— 在波斯尼亚尤其具有诱惑力，因为那里的人们认

为，代顿协议在整个行政和日常生活中强制实施了种族划分，从而使国家陷入瘫痪。波斯尼亚的许多人认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功能性的“统一国家”，不再按照代顿协议进行分裂，将三个“民族”的所有人都视为同胞。他们赞许地将北欧和西欧国家视为自己的榜样。甚至许多自诩为“激进分子”的人也将直接民主理解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从根本上重组社会的方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全会的直接民主重回到政府的（勉强的）代议制民主只有这么短的一步。当我们用“民主”的言辞使我们的斗争“合法化”时，这就为维持现状的秩序党打开了大门，他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为恢复所谓的“正常的斗争”辩护 —— 他们说必须恢复秩序，这样才能举行“正常的选举”！

事实上，在波斯尼亚造成巨大痛苦的失业、贫困和种族纷争正在欧洲各地蔓延，从希腊到芬兰。政府的现代化和所谓的肃清“腐败”并不足以将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社会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财富永远都不够用。如果我们仅限于试图改革政府 —— 即使这意味着用旨在履行相同治理职能的全体会议网络来取代政府 —— 我们都将永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把起义和全会看作是迈向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步骤，而不是振兴这一秩序的手段，那将意味着什么？

如果全会能够成为协调持续行动的空间，或许就能进一步推动起义，组织新的攻击以遏制当局，并在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创造新的生活形式。一旦全会的讨论变得抽象，无论参与者和主持者的意图如何，他们都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委托、代表和请愿。尽管全会渴望“直接”，但它们最终还是将起义视为一种必须“被代表”的欲望表达，而不是一个可以实现这些欲望的空间。一旦参与者以这种方式理解了起义，自然就会以诉求的形式向政府（即适当的代表机构）表达这些愿望。这些要求只会加强政府，致命地削弱全会。

2014年的波斯尼亚起义只是将全会作为造反工具的众多试验中的一个例子。看来，全会不能作为设想未来的场所，然后四处寻找其他政治机构来实现它。那个政治机构永远都会是“国家”，而国家并不需要人民全会。同样，全会本身也不能成为一个机构，拥有自己的程序，而这些程序本身又被视为是“合法” —— 如果全会做到如此了，那么充其量它自己就成了国家。要想在解放运动中发挥作用，全会就必须成为一种工具，通过它按照不同的逻辑直接行使权力，这种逻辑不是集中权力，而是分散权力，促进参与者的自主和自由，而不是去“代

表”人们。

这位戴头巾的年轻母亲强调说：“这是必须发生的”，她指着图兹拉政府总部被烧毁的外壳，声音因激动而颤抖。“这些建筑必须被烧毁。起义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我希望它能再次发生。它必须发生"。

[image] 波斯尼亚的涂鸦。 [image] “不要调头”/“不要开倒车”：起义后图兹拉被烧毁的政府大楼。 视频：“春天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起义还未完成时制作的视频。
https://vimeo.com/89711771

□

[image]
[image]

堕入欺骗之网：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8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2 实践
[image] 标签	代表 怪胎 无政府主义 民主 消费主义 职业媒体 舆论 身份政治
[image] 编辑	MMartinez

强行“代表”你的不只有政客。

[image]

只要当前的社会秩序还存在，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与权力结构的各个层面发生互动。我们这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需要致力于让这些互动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冲突性、足够反映出我们彻底摧毁权力结构的愿景。这就需要我们对敌人有足够充分的了解。

几乎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能认识到国家和资本是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并对它们的运作方式有一些起码的了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权力网络的一部分。人们可能会认为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传播意识形态的技术系统 —— 即媒体（这里使用“媒体”一词是特指这一系统的整体，而不是指它用来实现其功能的具体工具，因为其中一些工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甚至与这一功能背道而驰）—— 是权力结构的固有组成部分，因此它是所有反叛和一切创造自由生活的尝试的敌人。

然而，即使在媒体高度集中于少数巨型公司手中的情况下（这一事实应揭示其本质），仍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会直接 —— 以非冲突的方

式 —— 与之互动，试图在这类秩序党媒体控制的地盘上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可能说明人们对媒体的功能缺乏了解。

媒体在权力结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民主国家，这种角色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是权力运作的核心。但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正视许多人对民主的幻想。

诚然，民主可以仅仅意味着一种决策过程，让所有相关人员在每项决策中都有发言权或投票权（关于无政府状态与民主的关系另见本站其他部分），但在当今时代，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和社会权力体系，它通过允许表达尽可能广泛的意见来维护社会和平。国家之所以能够允许如此广泛的意见表达，正是因为意见基本上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意见是被抽空了所有生命力的想法；它们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任何项目基础，成为了无伤大雅的空谈。与封建或独裁国家相比，这种空谈使民主国家显得更宽容和开放，从而加强了民主国家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媒体的政治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是民主舆论的调停者和处理者。它吞噬着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国际关系和叛乱、文化崩溃和经济需要 ...... 吞噬着当下现实的全部，并将其碾碎，然后消化，排出体外 ...... 成为粪便。所有的复杂性、所有的活力、所有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都被榨干了，我们只能决定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褐色坨坨是否发臭。

人们 “知道” 这些粪便产生的现实是如此地遥远，以至于普通人无法直接对其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人们接受了二元逻辑，在酒馆里为粪便的臭度争论不休，投票给那些胡言乱语散发着最甜美香气的政客。

不论你支持还是反对这场战争、那条法律、任何候选人、任何政策或计划，都不会对权力结构本身构成任何威胁。媒体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促进先入为主的思维，让人们在遥远的现实面前保持被动，时刻准备在国家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而这些选项最终都会让选择者受制于国家和资本的权力。

媒体还有另一个基本功能。它是消费形象的创造者。它创造名人和人物，让人们仰望并代入他们自己的生活。它创造角色形象，供人们模仿，以构建自己的 “身份”。它创造了脱离生活、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事

件形象。人们正是通过这些不加批判地摄取的形象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并在这种虚拟的不现实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媒体成功的结果就是，人们被动地、可预测地消费着社会秩序制造的垃圾。

选择通过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就是选择把这些思想喂给这个庞大的咀嚼怪物，把自己献给这个耗尽生命的食尸鬼。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毫无意义。媒体不可能把无政府主义行动描绘成一个活生生的实践，也不可能把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复杂的多维个体。因此，想要通过这个窗口以“有价值的方式”表达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不可能的。这些思想只会同样被嚼得粉碎，然后作为众多意见中的一种再被吐出来，成为公众可以争论其臭味是否浓郁的另一种粪便。

活生生的个人会被嚼碎，被作为“形象” ——被作为不论是怪胎、书呆子、还是街头暴徒 —— 但本质上只是形象，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媒体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因此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无法在他们的游戏中获胜。

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游行结束后不久，《60分钟》节目中出现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片段，这就是这一过程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这12分钟的采访和照片拼贴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媒体合作的最好结果了。媒体自始至终完成了任务。节目编辑从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和几个小时的西雅图事件录像中，挑选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老板）想要使用的内容，组成了这个简短的片段。在使用 “新无政府主义者” 这个标题时，这些调解专家已经将观众与这些新 “名人”、这种 “新”亚文化区分开来了。形象塑造专家将被他们称为 “哲学向导” 的人，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分开进行采访；采访者与这位被媒体赋予“向导” 角色的人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作为一个群体接受采访，其中一些人坐在地板上，摄影机的角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所有人的坐姿都比受访者低。不知情的观众会以为这些 “新无政府主义者” 是那位“向导”的追随者，即使他只是被职业媒体称为 “向导” 而已。

采访者用他的问题非常明确地引导了谈话内容 —— 毕竟这就是他的专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以正常方式接受采访，而这正中媒体下怀。通过回答问题，他们弱化了自己的论点，落入了一些老生常谈的窠臼，比如关于财产破坏不属于“暴力”的无趣老套，并进一步使自己被边缘化和异化。我还没有见过媒体对这些 “新无政府主义者”、“尤金无政府主义者”（赶紧毁掉这个词吧）的描述、或者说没见过任何记者/采访者或新闻工作者选择使用的任何话术完全不具备这种操纵性，真的是没见过 —— 因为操纵就是媒体的运作方式。

在西雅图示威游行之后，媒体对无政府主义者给予了大量关注，尤其集中在“破坏财产”的问题上。由此产生的许多事情虽然不足为奇，但却让我感到不安。

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担心自己的“媒体形象”。因此，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谴责破坏财产的行为，因为这会给无政府主义运动带来“不良的公众形象”。但这些人太荒谬了，以至于比那些公开坚称“破坏财产不是暴力”的人更让我感到不安。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媒体上频繁出现的这一论点，让自己卷入了这个社会的既定价值观；他们在衡量自己的言论，使其符合“民主对话”的观点。这种观点试图迫使革命行动符合暴力/非暴力的道德等式。对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等式是完全无用的，没有任何意义。当前，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核心是必须摧毁所有权力和权威机构，从而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充分实现自我创造可能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愿望、梦想、能力和环境 —— 根据每个人为自己创造的生活而决定的。这与任何“道德”都没有关系。因此，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没有必要处理这样的问题：“破坏财产到底是不是暴力？” “这是自卫行为还是攻击行为？” 我们没有理由关心这些问题。我们的愿望是攻击和摧毁所有权力结构，愿景决定了我们的行动。其他这些问题都是基于虚伪的权力道德规则，除了给我们的行动能力套上沉重的枷锁之外，别无他用。按照职业媒体的要求、使用媒体关于如何谈论这些问题的准则、并遵循媒体的规程来谈论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事实上，我们与媒体交谈又有什么用呢？

在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人们选择放弃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60分钟》节目所明确指出的，在媒体的地盘上与媒体打交道就是接受委托。人们把自己的想法交给 “传播 ”大师，让他们在意识形态市场上咀嚼成更多的“意见”。人们把自己的现实生活交给

这些切割专家，将其变成60秒的孤立事件的图像。人们将传播活动交给那些专长于对失去活力的、预先消化的非思想和非事件进行单向“传播”以创造社会“共识”的人。然后，人们抱怨自己在媒体中的“形象”有多么糟糕。那你又为什么要选择接受被代表呢？选择接受媒体的代表，就像接受投票箱或工会主义一样，都是接受委托。而拒绝委托才是无政府主义和反叛观点的核心，其中包括拒绝按照媒体的条件与之打交道。

如果我们把自决和自主行动作为无政府主义实践的根本基础，那么传播我们思想的方式显然就是创造我们自己的传播手段。涂鸦、海报、公报、报纸、杂志和海盗电台，都可以用来表达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无需通过职业媒体的咀嚼机制。

这些自我决定的传播方式与职业媒体的区别在于，它们不是试图在宣称客观的同时对观点和图像进行调解，并向被动的受众散播预先消化好的废话；想法，它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表达其观点的实际尝试，不仅体现在文字上，还体现在表达观点的方法上。当然，这些我们可以自己掌握的方法不会像主流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那样让更多的人了解。但对受众面的考虑只对那些想要传教的人有意义，对那些把无政府主义视为一种信仰体系的人有意义，如果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让人们“皈依”的那种信仰体系。用一些意大利同志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商品可卖，霓虹灯又有什么用呢？而在资本统治的时代，布道 —— 即使是无政府主义的布道 —— 也是意识形态的推销。而对于那些只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并摧毁阻碍这种生活的社会的人来说，这种市场宣传毫无价值。

不幸的是，自从西雅图的反世贸组织行动以来，媒体一直对无政府主义的小菜垂涎三尺，而且一直有无政府主义者愿意让那些媒体如愿以偿。毫无疑问，只要无政府主义还在市场上有位置，媒体就会继续追捧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媒体是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就像国家、资本、宗教、法律一样 …… 换句话说，职业媒体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这样对待它。有鉴于此，三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 —— 阿图罗、卢卡和德鲁 —— 的行动堪称典范：当一名记者闯入他们同志的葬礼现场寻找鲜活的新闻时，他们把他赶跑了。

□

By 美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沃尔菲·兰德斯特赖尔

[image]
[image]

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9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2 实践
[image] 标签	专业化 参与式 反叛 尊严 政治去专业化 民主 社区 策略 自主 自治 萨帕塔 集体身份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Saul Bright

“我们厌倦了强权的剥削，我们就组织起来了，以保护自己并为正义而战。一开始我们的人并不多，只是少数，走这走那，与像我们一样的人交谈和倾听。我们这样做了很多年，而且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引起轰动。换句话说，我们是静悄悄地联合起来的。这种状况保持了大约10 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发展壮大了，达到了数千人 ……我们在政治和武器方面训练得相当好，突然间，当富人们忙于除夕派对时，我们发起进攻，接管了城市。我们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信息：我们在这里，他们必须注意到我们 …… 然后富人派出他们的大军来消灭我们，就像他们对所有奋起反抗的被剥夺者所做的那样 —— 他们下令把他们全部消灭。但我们挺住了，因为我们在战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在山林中让自己变得强大。军队到处搜寻我们，用炸弹和子弹射击我们，他们正在制定的计划是一次性杀死所有的土著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谁是萨帕塔主义

者，谁不是。我们跑啊打，打啊跑，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不放弃，不投降，不被打败。”——《第六次宣言》

- Table of Content
  第一部分
  导言
  恰帕斯州的萨帕塔反叛
  作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
  民主的自治
  第二部分
  萨帕塔自治的政治组织
  政治能力问题
  结论

[image]

第一部分

> 「对我们来说，自治是我们在自己的村落中进行抵抗的灵魂和核心；它是在民主、正义和自由的建设和发展中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新方式。」—— 恰帕斯州新革命社区成员马卡里奥（Macario）（引自 Mora 2017, 72)

导言

自战后繁荣结束以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改变了很多国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民主方面，公民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下降，对政治机构和政党之外的不信任日益激增（Chapdelaine，2010, 2）。代议制民主的一些固有局限性 —— 包括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权力过于集中以及公民权力被剥夺 —— 导致了人们对这种政治组织形式愈发不满，并希望转向新的实践（Hatzfeld，2011）。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些团体越来越多地呼吁建立 “参与式” 或 “审议式” 的民主，以弥补大多数国家公众参与程度有限的问题

（Sintomer & Bacqué 2011, 15-16）。

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丹尼尔·加西（Daniel Gaxie）两位学者开始，法国政治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受支配群体民主参与度低的一个因素是 "面对政治化时的结构性社会不平等"（**Blondiaux 2007, 762**），即他们 "没有社会能力进入 [政治秩序] 强加的判断和意见表达范畴"（Lagroye et al. 2012, 350-351）。个人"体验"并"表现"这种无能，"特别是通过不参与"公民"活动"（同上，348）。不参与"并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见"，而是一种无能感，这种无能感是由界定政治语言和模式的社会授权机构所维持的"（同上，351）。因此，参与政治进程的非法性是一种个人的无能感，同时也是社会公认的。

科学文献没有考虑参与式民主的传统尝试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源自现代国家框架这一事实的限制。这一框架部分基于政治专家或专业人士与"外行人"/即"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外行/普通人"的定义是指那些无法按照既定政治制度的规范和模式进行干预的人。正如斯塔尔等人（2011，103）所说，关于更具包容性的参与式民主形式的研究一般将这种制度视为"国家决策的一种咨询过程"（......）这些著作中讨论的"直接式的"、"审议式的"和"去中心化"的民主形式都是参与"国家"的方式。那么在这种分割被解构甚至废除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image]

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萨帕塔人的经历是无国家人民自组织的一个范例，它已持续了30年之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尽管环境很不利，尤其是墨西哥政府的镇压和准军事组织的暴力，但这一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却一直顽强地存在着。并且，其激进的特点仍可从以下方面辨别出来：其以农民和原住民为基础的民众、其在国家之外的自治项目、其国际主义的和反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因此，所谓的"外行"公民/"普通人"事实上是萨帕塔组织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其基础，这就直接提出了他们"是否有能力"组织和管理自己的问题。正如他们在《拉坎顿第六次丛林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 这种自治治理的方法并不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发明的，而是来自几个世纪的土著抵抗运动和萨帕塔人自身的经验。这是社区自治。换句话

> 说，没有‘外人’来治理，而是人民自己决定由谁来治理、如何治理，不认同的人可以离开。如果管理者不服从人民，人民就会追究他们，他们就会被撤职，换另一个人上任。

莫尼克·查普德莱恩（Monique Chapdelaine）（2010年）分析了从1994年1月1日武装起义开始到2005年发起的 “其他运动”（公民参与国家层面的倡议）的民主功能，强调了该运动的独特性。其中，她研究了萨帕塔主义者的“民主”概念。萨帕塔主义者采取激进的观点，将自己定位为反对国家的立场、并主张新的协商和决策方法，包括社会行动者的多样性和权力的完全下放。他们认为，民主社会的权力应位于基层，即民间社会。萨帕塔主义者完全反对墨西哥政府目前的运作方式，将参与式民主作为其政治组织的一部分。

萨布丽娜·梅勒诺特(Sabrina Melenotte)（2010年）认为，将政治治理的概念应用到萨帕塔自治的实践中，可以将新的参与者纳入分析，从而纳入公民社会。治理是一种规则和制度体系，包括社会行为者的多样性和权力的完全下放（同上，第180页）。它使我们能够思考公民参与以及在国家边缘出现有组织权力的可能性，这要归功于它在权力实践中涉及的参与者的多样性。因此，治理方法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公民社会的自治将竞争和政治重组联系起来。

自治是指人民有能力在国家制度之外进行自我治理。萨帕塔可以被看作是自治实践的结果，法国历史学家杰罗姆·巴谢（Jérôme Baschet，2019年，2021年）认为，自治代表了萨帕塔经验最重要的特征。萨帕塔主义者自己也是通过这一概念来描述他们的实践及其政治和社会组织模式的。他们的解放计划脱离了国家机构，并将其自治形式重新定位到不包括国家的另一个不同的规模上（Baschet 2021, 2）。

[image] 萨帕塔的标牌上写着：“北区。善治委员会。严格禁止：贩运武器、种植和消费毒品、醉酒、非法出售木材以及破坏自然。萨帕塔人与战斗同在。” ......你身处反叛的萨帕塔领土，这里是人民的统治—— 政府服从。”

这种方法确定了萨帕塔自治在教育、卫生、司法和治理领域的运作方式。他们的政治组织的特点是萨帕塔主义者所说的 “mandar obedeciendo”，意思是 “人民统治，政府服从”（Baschet 2019, 356）。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细分为社区、市镇和地区）与人民之

间的关系是严格的横向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双向的：[......] 政府服从，因为它必须征求人民的意见并按照人民的要求行事；政府指挥，因为它必须执行和实施集体决定的内容[......]"（同上，360）。因此，萨帕塔人的自治超越了传统上提出的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对立，而分析萨帕塔人组织的三个层面内部和之间的交流对理解萨帕塔人的自治至关重要。

玛丽安娜·莫拉（“Kuxlejal Politics”，2017年）根据2005年至2008年间通过访谈、观察和非正式谈话收集的材料，对萨帕塔市"Diecisiete de Noviembre"的文化和政治实践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同上，5）。莫拉在知情同意和萨帕塔大会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些调查。她重点关注所谓的 “日常政治”，并将其视为萨帕塔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模式的核心（同上，3-4）：

> 「萨帕塔土著自治的日常政治同时通过所谓的“拒绝的政治”与国家互动，并在反叛自治项目内部实施多层次的参与形式，包括与国家和国际政治行动者的庞大网络进行对话（......）。 从这种双管齐下的政治中产生了特殊的泽塔尔(Tseltal)和托霍拉巴尔(Tojolabal)文化实践 —— 集中在三个中心领域：知识生产、生存方式和权力行使 —— 部分地冲破了种族化和性别化的新自由主义墨西哥国家的殖民遗产。」

对萨帕塔 “生活方式” 的仔细分析在某些方面触及了合法性的主题，但只是间接的。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宝贵的证据来源，说明如何通过使该系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直接实践来构建社会自治。这种方法不需要依赖于正式的、学术化的 “参与式民主” 理论，就是说没必要用政治科学来实证衡量其中的变量，如信心、合法性或参与度。简言，萨帕塔主义者不需要依靠官僚、学者或政客来研究、投票和管理他们的民主。

虽然学者们对萨帕塔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但他们并没有从公民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普通公民的“合法性”由什么构成？恰帕斯社区（主要是农民和土著人）的政治能力是如何构建的？在这种情况下，“被管理者”与 “管理者” 之间，“政治专家” 与 “普通人” 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

[image]

恰帕斯州的萨帕塔反叛

虽然1994年1月1日的武装起义被普遍认为是我们今天所知的萨帕塔运动的开端，但我们必须从该国土著和民众动员的更长历史中来看待这一事件。这段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10年墨西哥革命期间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斗争，其目的是将农业用地归还给自西班牙殖民统治之前就开始集体管理土地的当地居民。以农业为主的恰帕斯州饱受贫困和不平等的困扰，土著人被严重边缘化，没有得到被承认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侵蚀，现代萨帕蒂主义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成立于1983年，是1994年反叛运动中的主要组织。它脱胎于该国北部的一个马列组织 - 民族解放阵线（FLN），最初采取的是孤立和秘密的游击战。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杰罗姆·巴谢（Jérôme Baschet）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明白，萨帕塔主义并非诞生于1994年1月1日，在其背后和周围存在着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恰帕斯土著农民积累了至少二十年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经验"（2019, 19）。政府和准军事组织的暴力行为使 EZLN 和土著社区走到了一起。在最初的起义中，"一支土著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占领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奥科辛戈、拉斯玛格丽塔斯、和阿尔塔米拉诺 [......]，人们高喊着 'Ya basta！（"受够了！"），提出了萨帕塔运动的首要和核心要求：自治和承认土著居民的权利。

在1994年至2003年的起义初期，政府进行了镇压，从武装斗争过渡到政治斗争，并试图与墨西哥当局进行谈判。2003年8月，萨帕塔主义者对这些谈判的失望导致他们宣布在夺取的领土上实行自治，他们宣布单方面执行《圣安德烈斯协议》（规定在宪法上承认土著权利），但墨西哥政府没有遵守该协定。他们成立了 "......五个善治委员会，将27个萨帕塔反叛自治市联合起来......]"（Baschet 2021）。

> 在奥文蒂克，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宣布，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于1996年1月创建的五个萨帕塔阿瓜斯卡连斯特（guascalientes）将更名为"海螺社区/

> caracoles”（萨帕塔社区中心），并将成立五个相应的善治委员会，作为五个萨帕塔地区多个自治理事会的协调机构。 (Mora 2017, 38)

莫拉认为：

> 圣安德烈斯协议为在国家边缘开展创造性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后不久，萨帕塔支持基地（即积极支持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政治军事结构但不属于叛军军事队伍的社区成员）组织了自治机构和行政单位，以执行集体决策，并作为自治市的一部分启动了自己的教育、司法、农业和医疗保健项目。运动的同情者也动员起来支持这些举措，包括我自己在内。(Mora 2017, 4)

2019年8月，萨帕塔宣布进一步扩大自治权，成立了四个新的自治市和七个新的“善治委员会”（Baschet 2021）。如今，萨帕塔主义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不直接隶属于任何其他意识形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毛主义。

[image] Escuelita Zapatista（“萨帕塔主义者的自由”）或“自由小学校”是2013年8月（12 日至16 日）进行的一项为期五天的教育实验，在此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活动家被邀请加入恰帕斯州的玛雅家庭参与萨帕塔自治并向其学习。

作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的自治

今天，“参与式民主”这个概念指的是形式、受众、框架和规模方面的各种方法。它起源于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这些批评尤其指出了代议制民主导致的代表和被代表人之间的脱节、权力的过度集中、以及对公民权力的剥夺，从而使 “参与式民主”成为必要（Hatzfeld，2011, 53）。从那时起，参与的发展就围绕着两个不同的问题展开。如果要使参与成为领导者可用的政治工具，它就必须能够纠正和补充代议制。有鉴于此，各国政府试图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传统上被排除在公共政策制定之外的参与者参与进来。但是，如果要使参与成为挑战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工具，那么参与就必须是一场政治斗争。最后一点使我们有可能将参与式民主理解为一种产生民众反抗权力的手段。

但是，“… 如果仅仅从根据公共决策者的需要授予和设计参与机制的角度来考虑参与，将是一条死胡同”（同上，27）。事实上，正如萨帕塔人的自治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我们也有可能在国家框架之外进行独立的尝试，倡导基于参与的新政治实践。自治政治制度的基础是“.....所有人都有能力管理自己” 的理念。(Baschet 2021, 11）因此，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政策制定和决策。

自我管理是劳工运动传统的一个概念，鼓励工人自主工作（同上，54）。因此，它是一种旨在彻底改变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的实践：与工作、消费和知识的关系从此完全不同，它倡导的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组织模式（同上，55）。

萨帕塔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渴望彻底改变生活方式。不过萨帕塔主义者并没有谈论自我管理，而是用自治一词来描述他们的组织模式：

> 在 “自治”这一名称下 —— 萨帕塔主义者自己综合了他们的实践 —— 我们必须理解完全脱离墨西哥国家机构的自治模式的实施，以及植根于土著传统但又前所未有的、尽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决定的生活形式的重塑。(Baschet 2019, 372)

一方面，萨帕塔自治代表了对国家的激进批判，因为它拒绝任何包括权力集中在内的政治组织形式。事实上，这不仅意味着政治在规模上的重新定位，即从国家转向地方，还意味着权力等级的重新定位，国家现在不存在了（Baschet，2019）。在《圣安德烈斯协议》未能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之后，自治似乎成为了一种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些人群需求的组织模式（Melenotte，2010）。除非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造、重组和废除，否则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萨帕塔主义者于2003年宣布在其领土上实行事实上的自治，并从那时起一直实行自治。宣布自治不仅仅是不再与墨西哥政府对话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一种反抗国家压迫的形式。

> “他们害怕我们发现自己就可以管理自己”，埃洛伊萨女士说。她证实了一个基本原则：我们，“普通人”，

> 是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的 —— 这一 “发现” 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和所有自称政治专家的人来说，是证明了他们有害的无用性！（Baschet 2019, 372）

另一方面，自治也是社区组织这一悠久民间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一传统中，集体行使权力和建立共识至关重要：社区的权威高于个人的权威（Baschet，2021）。然而，通过通常被排除在社区大会之外的青年和妇女的融入，“传统”也正在经历权力关系的转变，以及与妇女相关的社会结构和象征性角色的转变（莫拉，2017）。例如，妇女在萨帕塔革命中很早就被列为优先事项，并被完全纳入自治安排中。正如杰罗姆·巴谢在2021年所指出的，萨帕塔自治正在教育、卫生、司法和政治领域实施。它贯穿了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是一个为“lekil kuxlejal”（一种与特定领土相关的有尊严的集体生活）而奋斗的过程（Mora 2017, 12）。它代表了有尊严地生活的日常愿望，因此通过日常实践表现出来（同上）。与土地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它允许在无需法律结构的情况下，以自治为基础创建集体身份（Guimont Marceau，2010 年）。萨帕塔主义者通过在实践中践行他们的理念，展示了无国家参与式民主的意义远不止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它从根本上植根于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变革。简而言之，这是革命性的。

[image] 墙画上写着：“宁愿光荣地死去，也不愿带着被暴君支配我们的生活的耻辱而活着”。

第二部分

这里是第二部分。我们认为萨帕塔反叛的联邦制和非分裂政治体制，以及他们共同的 “mandar obedeciendo”原则，使得政治的完全去专业化成为可能。

萨帕塔自治的政治组织

萨帕塔人的政治结构是一个联邦体系，下设三个相互影响的层级：社区；自治市镇（称为MAREZ），将多个社区联合在一起；以及基层自治组织 Caracoles，在地区一级协调各市镇。每个级别都有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权力机构，任期两到三年。这两个要素之间的联系对于自治

的运作至关重要。例如，决策只有在与其他各级议会/当局协商后才能做出：事实上，市级议会、地区议会和社区之间经常会有多次反复的讨论（Baschet，2021）。

[image] MAREZ = Municipios Autónomos Rebeldes Zapatistas = 反叛萨帕塔自治市镇。注：5 个地区的自治区议会轮换频率并不相同。

其他部门也介入了自治的运作，如各区的监督委员会（CCRI），即EZLN的隐蔽原住民革命委员会（Baschet，2019）。政治组织的权力下放和普通民众的参与避免了国家和代议制固有的某些问题，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割。后者导致实施的政策不一定符合公民的期望，而只符合当权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自治制度中，每个人都能够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进行自我管理。因此，萨帕塔社区成员可以授权他人执行政治任务，但这种直接授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自我宣告，没有选举中的自我代表，也没有政治专家。萨帕塔的男男女女亲自参与决策，这使他们能够直接回应社区的利益。

因此，萨帕塔主义的自治是一个社区参与项目，包括公民对社区生活的内部参与，以及社区对更广泛政治秩序的外部参与(Dumoulin 2010)。萨帕塔主义者通过“拒绝的政治”与墨西哥国家互动，并在多个层面实施参与形式，包括与国家和国际政治行为体对话（莫拉，2017 年）。因此，在这里，“参与”并没有被简化为政府为延续现有制度合法性而使用的政治工具。相反，这里的参与是旨在挑战政治组织模式，首先是挑战在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所有生活领域中构建角色和等级地位的社会秩序。事实上，自宣布自治以来，妇女在政治和萨帕塔社会中的地位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此外，自治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是一种有能力适应社会现实的实践（Baschet，2019）。它不是一个由必须严格执行的理论原则固定下来的体系。恰恰相反，它是一项由具体经验构成的具体政策，必须能够适应所遇到的环境。这一概念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治提供了可能性（同上）。

> 「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治的政治逻辑与建立一个容纳多个世界的世界愿景是一致的：它不仅从经验的单一性出发，而且帮我们认识到，不可能只有一种单一的方式来思考资本主义的退出。因此，它要求承认世

> 界的多元性，同时也要求倾听、翻译和相称的艺术，以便这些世界能够相互协调、相互学习并掌握其可能的分歧。(Baschet 2019, 378)」

萨帕塔主义者认为，为了真正实现激进意义上的人民自决民主，权力就必须立足于基层。也就是说，相对于国家、政府或任何寻求权力的政党和组织而言，社会必须能够控制和制裁那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并使他们对民众的关切做出回应（Chapdelaine，2010）。这正是该运动通过自治政治努力实现的目标，通过人民有能力组织和管理自己这一理念，自治政治允许所有人有效参与。

[image] 被称为“彩虹种子”的集体商店。

政治能力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能力”并不是指某个人是否有能力参与政治，因为能力或合法性的概念本身就是由社会构建的。换言之，分析政治能力意味着确定社会对某些能力的认可过程，即参与式政治所必需的能力。在此，我们采用布迪厄（1979, 465-466）等人提出的概念，他将政治能力定义为：

> 「.....可以或多或少地认识到政治问题是政治性的，并通过对政治问题作出政治性反应的能力，即 基于适当的政治原则（而非道德伦理原则）的能力，与一种或多种完全意义上的能力密不可分，即 被社会公认为有权处理政治事务、对政治事务发表意见、甚至改变政治进程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活动的社会分工是建立在这些由社会构建的能力的不平等分配基础之上的，因此个人的参与程度和政治化程度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相关。因此，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 —— 尤其是社会阶层和（正规）教育水平 —— 对他们获得这些能力的机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他们被社会认可为更“合法”地表达政治观点和干预公共政策的决策或制定。

不仅在选举或议会政治中，而且在参与式民主的实验中，熟练掌握

“政治语言和模式”（Lagroye et al. 2012, 351）也会加强中上层阶级成员的参与，他们的社会化和正规教育使他们将资产阶级文化的规范、修辞和知识参考内化于心。与此相反，受社会支配的个人和群体的“无能”—— 同样是指在资产阶级的规范方面的能力不足，而非客观上的无能 —— 表现为他们“不参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公民’活动”（第**348**页）。因此，强调政治化的不平等是解释工人和穷人很少参与“参与式民主”实验的一种可能方式。

在这方面，萨帕塔经验中特别有趣的一点是，政治活动和专业知识（从技术能力的意义上讲）并没有被专业化（或职业化）。正如皮埃尔·拉斯库梅（2002, 377）所解释的那样：

> 「我们可以认为，专家实践的未来与他们变得更加民主的能力有关，即真正开放他们的方法来接受不同的观点，特别是组织多元的专业知识，而不仅仅局限于专家网络，并且要知道如何为非专业人士提供真正的位置。」

而萨帕塔主义者似乎强调政治任务和公共职能的去专业化。巴斯谢（2019, 362-363）认为：

> 「萨帕塔主义者的经验使我们能够坚持以下几点：短期的、不可延期的、可随时撤销的授权；不存在个人化、共同履行职责；由其他实体控制；有限地集中制定决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大会共享；集体伦理和倾听能力。然而，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政治任务的有效去专业化，政治任务不再由特定群体（政治阶级、以金钱为基础的种姓、具有特殊声望的个人等）垄断，而是尽可能普遍地流通：“我们必须轮流治理”（Maestro Jacobo）。如前所述，这意味着，除其他外，放弃将代表的选择与对个人能力的评价联系起来的想法：假定民选当局并不比其他人更了解公共事务，这是很难接受的条件！- 政治完全去专业化。」

[image] 国际妇女节的游行

因此，如上所述，重要的是不要将萨帕塔组织模式视为一种完全或纯

粹的水平主义。巴谢认为，萨帕塔主义者实行的是一种“非分离”的授权形式或模式，与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分离的授权形式不同。他认为，这种分离是 “现代国家政治代表制” 的特点，相当于 “有条不紊地组织被代表者的有效缺席”（同上，362）。他总结道，有必要强调萨帕塔制度所代表的'纵向指挥'与'横向共识'之间的敏感平衡（同上，74）：

> 「这并不是一个由集体中的一部分人垄断并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真正权力问题，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横向性问题 - 那有可能因缺乏主动性或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而解体。相反，对萨帕塔经验的观察使我们认识到两个原则的衔接：一方面，决策能力主要由各级大会掌握；另一方面，这些大会以轮流和可撤销的方式承担着主动性和推动力的特殊角色，作为集体与自治能力之间的中介，而这一角色的行使存在着不足或过度的双重风险。(同上，361）。

然而，由于存在权威/领导地位，这种潜在风险在萨帕塔人自治中受到了非凡的集体责任感的限制：一种互惠的社区精神，例如莫拉（Mora, 2017）在其对 Diecisiete de Noviembre 的民族志研究中记录的那样。更具体地说，它是包含在 “mandar obedeciendo”（“通过服从被领导者的声音和愿望进行领导”）这一通用短语中的一套原则。这项在萨帕塔反叛之初制定的一般政治原则似乎源自泽塔尔和托霍拉巴尔社区古老的土著文化习俗（Mora，2017：191）。

在最具体的意义上，**“mandar obedeciendo”**意味着当权者要对人民负责，并组织人民在大会上做出的决定： 当局有责任执行那些在大会上协商一致达成的决定，而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去做决定"（莫拉，2017，191页）。这与自19世纪以来一系列革命运动或事件的长期强制性授权原则相似。例如，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不仅是代表，就连被指派担任各种公共职务的人（如治安官和法官）也都是根据这种可撤销的授权而发挥作用的。

根据查德莱恩（2010年）的说法，**mandar obedeciendo** 允许 "克服政治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导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系统性分离，并使政府形式失去意义。(同上，41）。正如莫拉的精彩论述所指出的（见该书第 5 章），在萨帕塔主义者的日常社会交往和文化实

践中，政治能力被明确构建为去专业化的基础：

> 「关于善治委员会的成员，萨帕塔人可以这样说："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专家，尤其不擅长政治"（SDR）。这种去专业化导致承认权力的行使是在无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们坚持认为，他们最初的感觉是，面对落到他们头上的任务，他们束手无策（"没有人是政治专家，我们都必须学习"）。但他们马上又强调，正是因为接受了"无知"，才能成为一个"好当局"，努力倾听每个人的意见并向他们学习，知道如何认识错误并接受社区对决策的指导（GA1）。根据萨帕塔主义者的经验，将政府的任务委托给那些没有特别能力执行的人，是 mandar obedeciendo 得以发展的具体基础；这是抵御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分离风险的坚实防线。(Mora 2017, 35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她的断言，即 **mandar obedeciendo** 原则颠覆了"我们在西方古典政治理论中最常见的命令-服从逻辑"（同上，192）。她比其他作者更进一步，认为有必要超越大会的框架，观察 **"mandar obedeciendo** 如何在不同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构成社会生活政治化的一部分"（同上，228）。例如，她在民族志中描述了她在 Diecisiete de Noviembre 妇女生产集体中观察到的政治化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mandar obedeciendo" 与作者称之为"库克斯莱雅政治"（Kuxlejal politics；"Kuxlejal"在泽塔尔语言中是"生命"的意思）的政治和文化实践（同上，19）相关/相等：

> 「当我问毛利球斯"生命"在泽塔尔语中的意思是什么时，他解释说，它大致相当于 Kuxlejal，即"生命的存在"。当 Kuxlejal 作为表达集体生活概念（stalel jkuxlejaltik，作为一个民族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方式）的术语的一部分，以及作为"以有尊严的方式生活的日常愿景"（lekil kuxlejal）这一术语的一部分时，它只是一个赋予意义的锚点。作为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lekil kuxlejal "及其对应的托霍拉巴尔词语"sak'aniltik " 的奋斗目标不仅指个人的存在，而且指个人与大地、与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的共同联系。如果没有土地，没有种植和收获足够食物的能力，没有对

祖先的不断怀念，没有与未来的联系，也没有对大地的敬畏，那么为生命提供充实意义的元素就会消失。

当萨帕塔社区成员将自治的政治实践与创造新生活联系起来时，他们指的是 lekil kuxlejal，即涉及这些相互关联领域的生活政治。因此，自治作为生活政治的基础，体现在捡拾掉落的树枝作为柴火、在田间收获玉米、祈祷丰沛的水源 —— 既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只要能让玉米和豆子在田间茁壮成长就行、在森林中采集可食用的树叶或在后院菜园中采摘蔬菜、照顾孩子和老人、分享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从而产生改变现在的知识。正是这些活动的总和使生命得以有尊严地繁衍，这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也是一系列文化进程，使“kuxlejal”以集体的形式和集体的力量得以延续。」

[image]

结论

总之，对于萨帕塔主义者来说，“民主是自下而上，与每个人一起建立起来的”（Chapdelaine 2010, 46）。他们的革命性自治使得恰帕斯州部分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得以全面重组，墨西哥土著居民直接参与了直接影响他们的政策和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恰帕斯州以土著和农村社区为主的环境与欧洲（尤其是更城市化的地方）的参与式民主实验的环境之间的反差不应妨碍我们反思贯穿所有这些参与形式的问题。虽然萨帕塔人的经验显然不能照搬到其他环境中，也不能与其他环境进行严格比较，但其 “自下而上”的激进民主形式有助于更多人发现在其他环境中所谓的 “参与式民主” 可能存在的局限或障碍。政治与社会其他部分，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分离似乎是区别于其他大多数情况的主要方面之一。

我们认为，在萨帕塔主义者中，参与能力与合法性的构建在于一种集体意愿 —— 体现在恰帕斯州土著居民争取自决的斗争中 —— 即在活动与责任去专业化以及捍卫自身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实现一种社区民

主形式。巴斯谢（Baschet，2021 年）认为，这些萨帕塔生活形式的核心在于三个词：社区、土地和领地。

[image]
□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 of Posts	22
[image] Posts	[image]不“民豆”, [image]颜色革命, [image]成瘾物品, [image]权力败坏了最好的人, [image]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 [image]摆脱自由派女权, [image]城头大王旗, [image]美国大选和“左右”政治, [image]虚无主义, [image]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如何清除法西斯蟑螂，[image]你反对的是统治本身还是某个独裁者？你厌恶的是独裁行为还是被“谁”采取的独裁行为？, [image]关于AI, 失败的向量 —— 乌克兰和香港的共同点, 回复提问：「德国选举中是否有与中国变革直接相关的议题/看点？」, 不论您是哪种“主义者”，都应该能理解的基本局势，[image]转帖：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回复提问：「新的一年开始，是否有新的“维稳方向”？可能是什么？」, 回复：关于关税（贸易战）- 粉黑纠缠蒙蔽了整个反动时代, 权威, [image]回复关于马斯克组党：所谓的“第三势力”并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东西, [image]不是“个人问题”
[image] 说明	“纸条”类目来自合作的中国朋友认为日常交流中较多涉及到的议题，并由大家收集、编写和整理。我们希望进步派社区能具有这些基本共

识。

[image]
[image]

不“民豆”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0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中国 代议制 冷战 反对派 天安门广场起义 安全 建制派 改良 新冷战 民主 策略 防御
[image] 编辑	[image]iyp

代议制民主再现了压迫性的权力制度。民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为了争取民主，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 Table of Content

本纸条转载《三十五年后，我长大了... 天安门广场起义35周年研讨》，评论-4

[image]

中国所谓的海外民运，可以对标俄罗斯目前的纳瓦尔尼遗孀尤利娅以及维亚切斯拉夫·马尔采夫等这些人，很是相似。在俄罗斯有一个专门的词描述这种角色，叫：特氟隆反贼。比中国人所说得“民豆”更形象也更深刻。

特氟隆有毒，但只危害想吃饭的人 - 即变革需求者，它本身保护锅具 - 即体制/系统，它所隔离的是那些真正能对系统产生影响的物质 - 即意识形态信仰的反建制的力量。

特氟隆不破坏系统本身 - 对体制来说都是安全的；它保住了权力在 精

英 内部的连续性。且鉴于特氟隆的表演欲望和表现力方面往往格外突出，其存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主动宣传 —— 有幸于 后冷战及新冷战玩家的嘴炮需求 。故，对各方体制来说，特氟隆都是低成本高聚光的优选之品。

尤其是，保住这些特氟隆反对派的持续聚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隔离/并有可能削弱那些对系统真正形成挑战的解放力量 - 即那些反建制的具有意识形态信仰的力量。

说它“有可能”削弱而不是“绝对会”削弱解放力量，是因为，作为镇压系统用来申请维稳资金的首选工具，这些特氟隆也的确同时起到了保护/隔离解放力量的作用，他们的“舞台”吸引力了镇压的火力，形成了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彼此需要的“平衡态”。

这两天来看到不少人在谈论食用油污染的那个新闻，比较之下长毛象居民就明显比墙内灵醒得多，不少象民能意识到该消息 “可以/被允许” 在微博抖音等始终都被严格控制的舆论舞台上保持住热搜地位，至少说明它并非是某种能够挑战系统的异议。其他的都可以不猜了。这绝不等于袒护罪行 - 作恶者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 - 而是意味着，真正的罪恶之源很可能已经被袒护妥当了。

我依然建议重新读下这个帖子，关于“为什么说中国这种体制没有反对派”。这个定义在中国有很深刻的误解。切勿小看术语的使用，叙事就是政治，在冷战/新冷战时期叙事是最强大的政治工具之一。使用某个术语，就意味着进入了/皈依了该术语创造者获益/或引领的政治。所以建议说话前请先判断下，该术语是否符合您自己的战略利益。再再再一次，这需要您始终战略清晰。

Iyp在此前解释局势时最后倒数第二段的那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在目前类似中国这种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

1、建制左翼 —— 即 精英内部造反，也就是依赖于系统内掌握资源的所谓 “健康力量” 以改写游戏规则。再分配 —— 把曾经只对A有利的规则改为对B有利，或者对AB都有利。而边缘C，则仍然是边缘。顺便说，保持“边缘”的足够大规模，对任何建制来说都是最有力的选项，您不必亲自成为委内瑞拉的毒枭政权也能意识到这点（毒枭势力

将该国需要依靠救济才能活下去的人口比重提高到并维持在超过总人口一半的规模下，以确保自身在选举中的多数地位。同类手段的案例在地球上可以再找到一大堆。）

关于什么是左，“35年”这本书里也写得很清楚了。

2、无政府主义 —— 即 主张彻底离开这个拜占庭游戏。结束城头大王旗，结束权力，结束等级压迫，没有人能统治剥削其他人，而不是满足于换一个新的统治者和新的压迫方式。

显然，第一个方法更“快”，虽然历史上无数经验都能证明这不是终极解决方案，但作为过渡方案，依然最容易得到支持。第二个方法则慢得多，且需要持续在第一个方法的支持势力中进行抗争（体制内健康力量上台后首先做的就将是加强维稳而不是减弱，以铲除任何有可能动摇权力宝座的动态，尽可能降低其夺权成功的可复制性。）

但只要越多人了解第二种方法的存在、及其可行性和价值，迷信第一种方法的人就会越少，其能“控制”住的支持率就会越低。

换句话说，我们目前为止最需要努力的部分是，让更多人意识到继续往前走的必要性，即 直接民主 的必要性。而不是满足于拿到选票和现统治者下台。

需要注意的是，现政权会重点防备 - 真正的重点防备 - 上述两种方法的支持者，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两种方法有任何一致性（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承认第一种方法作为步骤的策略有可商讨空间）。

[image]

对于缺少政治实践的中国人来说，当前最急需更正的问题就是：要·努·力·避·免·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这个误解年深日久。记得IYP也反驳过多次（比如在反渗透技术技巧中），至少这一误解甚至已经导致了不少所谓的资深异议对安全措施的“故意”忽视，连带危害了周边同道的安全利益、令运动本身的可持续性受损。

将被打压视为“有价值” 这一误解的起源很是可怜，恰恰是因为中国这

类政治环境下无法诞生真正能挑战现政权的反对派力量，而那些事实上并没有挑战性的异议却遭到了和真正的挑战一样的惩罚性镇压力度。可怜的人们只能将这种镇压力度本身视为“价值”，至少可以虚构一种“士气”，获得些许欺骗性的心理安慰。

而另一个角度上可以说，这一误解之所以能从久远的曾经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强烈存在着，恰恰说明不论是资深的老一代还是‘不怕虎’的新一代，都没能切实找准自·己·的·战略方向，他们始终都跟在党国的屁股后面跑，仅仅是去做党国不喜欢的事情，而没有充分考虑那些事情本身与我方 - 与解放运动战略 - 的相关性和价值。党国的恶意愚蠢能完全控制住人们的行动和思维逻辑，这是我们能遭遇的所有不幸中最严重的一个。崇拜米莱只是一个最新的典型案例。

iyp也多次说过，“献忠”作为一种镇压辅助工具的作用·远·高·于·其他作用，如果它还有任何“其他作用”的话 （沿 #张献忠 标签找到相关内容）。也就是“35周年”这本书中提到的“狼队”的道理。所以我认为对于陈一新所谓的“新五反”，将张献忠纳入“恐怖主义” 镇压项目的可能性至少短期内依然很低。而相比下，上述“两条路”被系统性镇压的可能性和效率要远高于张献忠 —— 别忘了张献忠从来没有和没能令任何达官显贵和权力支柱受到任何伤害。

2020年的年终 “打破Matrix的路” 对话专门解读了中国和美国的高堡奇人关系 —— 它既不是意识形态旧冷战也不是竞争性对抗。查尔斯·邓斯特对此的描述也暗示了高堡奇人，虽然以他的身份很难更清晰表述。

我觉得这个议题在4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不断强调，因为缺少战略主动性的中国异议是最容易深陷高堡奇人Matrix 的 —— 宣传战是兰德所言之 “代理冲突” 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同时也当然最容易被特氟隆所操控 —— 缺少战略性敏锐和相应的价值判断能力乃跨代际的缺陷；不客气的说，包括那些以讽刺民豆为荣的人，同样不具备取代“民豆”的实力，上述只是主要原因的一部分，少数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不切实际的自信，小提醒下。

总之，整体上，这种普遍的认知环境已经让很多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疲惫不堪。不论是三十五年还是五十三年，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依然有愧于天安门广场起义的血汗成本。

[imag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erHJcqlryoSOoFBItcyMpfbCL8tvyMk/view?ths=true&pli=1

□

[image]
[image]

颜色革命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1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暴力非暴力 民主 精英 颜色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Saul Bright

[image]

"颜色革命" —— 即通过群众抗议向领导层施压，以相对“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的方法 —— 并不总能带来民主化。它更多只能实现赞助人总统制。

赞助人总统制具有三点要素：

- 1. 总统通过定期的选举产生；
- 2. 总统比政府其他部门拥有更多的正式权力；
- 3. 总统还拥有广泛的非正式权力。

更重要的是，总统高度依赖于精英的忠诚，但精英也同样依赖于总统对他们的忠诚。因此，总统可以操纵精英，利用矛盾，保持 "仲裁者" 的地位。总统手中几乎集中了绝对的权力，这使他可以执行任何决定。

然而，如果总统宣布即将卸任，他的权力就会锐减。这样一来，精英

们就不再惧怕对反对派活动可能采取的惩罚措施，并开始寻找其他权力中心。

此外，精英们可以尝试自己担任总统，这将为他们提供与前任相同的绝对权力。

仲裁者消失了，在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中， 公众舆论 仅仅被作为将一个或另一个精英推上总统宝座的资源。

然而，总统制度本身仍然是专制的，这就决定了"颜色革命"后不久就会恢复到以前的局面。

只有在 "颜色革命”后能真正削弱总统的正式权力，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化。

https://youtu.be/3sfnwFV92XY

【2024年12月2日更新】

[image] https://mastodon.social/@MitteKeegi_/113578300428425773

IYP：回复上述 ——

在 “颜色革命”的情况下，抗议活动的第一阶段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应该可以在统治的本土贵族中造成分裂的局面。如果出现了这种分裂，那么在抗议活动急剧激进化的第二阶段，就可以通过瓦解由分裂精英积极创造的控制体系来获得革命成功的机会。然后，一切都取决于由此导致的治理崩溃的彻底程度。以及分裂精英的决心。

目前在格鲁吉亚，一切仍在按计划进行：在暴力抗议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不仅在首都，在其他城市也是如此），上层社会开始出现分裂。除了辞职的外交官和其他高官外，格鲁吉亚的大型企业也开始表示支持抗议活动。

距离抗议活动的关键时刻 - 也就是本月中的总统选举还有两周时间，

因此预计这一分裂还将继续扩大，规模也将扩大。总统已经成为格鲁吉亚抗议活动的结构中心，因此格鲁吉亚抗议活动进程的系统性显而易见。

但“颜色革命”并不意味着能确定民主化的实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开端。

□

[image]
[image]

成瘾物品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2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反抗 心理学 成瘾
[image] 编辑	[image]iyp

每一种成瘾物品的使用都是逃避现实的手段。

我们需要考虑的不是成瘾物品本身，而是，为什么人们急于逃避现实。

极具紧张的政治环境加重了更多人的挫折感。没有机会主导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无法真正决定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换句话说。成瘾物品依赖的普遍化与其他所有形式的毁灭行为具有同样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因为外部因素而无法做自己，包括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控制点就会向内转化，导致包括成瘾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心理问题。

孤单被动，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社区互助，也没有政治活动，满心只剩下对镇压的恐惧，这样的人就会成为被动的 “植物人”。时间越久状况越糟，挽回越困难。

所以我们经常说， 反抗 不仅仅是理论构想和政治态度，也是维护人的基本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

[image]

[image]
[image]

权力败坏了最好的人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3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国家 权力 等级制 统治
[image] 编辑	MMartinez

“国家”不过是统治和剥削的规范化和系统化。让我们假设一个建立在自由契约基础上的“理想国”，由少数人 —— 起初是你所喜欢的聪明且忠诚的少数人 —— 管理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度，你就可以看清这一点。

假设政府完全由“最优秀的公民”组成。起初，这些最优秀的人享有特权并不是因为权利，而是基于事实 —— 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因为他们最聪明、最机智、最勇敢、最忠诚，从被视为‘人人平等’的广大群众中脱颖而出。一开始他们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群因天性而独特的人，并因此而被人民挑选出来。他们的人数必然非常有限，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具有如此卓越品质、能够自动赢得一整个民族一致尊敬的人都是非常少的。人民总是被迫从他们中间选择统治者。

在这里，社会被分为两类，甚至可以说是两个阶级，其中一类由绝大多数公民组成，他们自愿地服从“民选领袖”的管理；另一类由少数特权阶层组成，他们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接受，并被授权管理人民。他们依赖于人民的选举，起初与广大公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被选中的品质，他们自然也是所有公民中最忠实、最有用的人。在最初，除了按

照人民的意愿行使他们被赋予的特殊职能之外，他们还不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至于其他方面，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他们生存的条件和手段，他们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因此，所有人之间仍然是“平等的”。

但这种平等能长期保持住吗？我们认为不能，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证明的了。

对于人类的私人道德来说，没有什么比指挥命令的习惯更危险的了。即便是最优秀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无私的人，最慷慨的人，最纯洁的人，都会在这种交易中被毁掉。权力中固有的两种情绪总是会导致这种毁灭，即：蔑视群众和高估自己的优点。

一个人对自己说："群众"，"认识到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国家，所以选举我作为他们的首领。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公开宣布了他们的劣势和我的优势。在这群人中，几乎没有人可以与我平起平坐，只有我有能力主宰公共事务。人民需要我，他们离不开我的服务，而我自己却可以过得很好；因此，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必须服从我，而我屈尊认同他们，就是在帮他们的忙"。

这一切不正是让一个人失去理智和心灵、并因骄傲而变得疯狂的原因吗？因此，即使是最聪明、最有德行的人，权力地位和指挥他人的习惯也会成为智力和道德失常的根源。

—— 《权力败坏了最好的人》，米哈伊尔·巴枯宁，1867年

[image]

[image]
[image]

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4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国家 政府 政治竞争 无政府主义 权力 民主 独裁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从理论上讲，"民主"意味着民众政府；意味着通过所有人的努力为所有人服务的“政府”。在民主政体中，人民必须能够说出他们想要什么，提名有可能帮他们执行愿望的人，监督那些人的表现，并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实施罢免。

当然，这意味着组成一个国家的所有个人都能够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且能够就他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发表意见。这意味着每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独立的，因此没有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服从于他人的意志。

如果存在着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级和个人，并因此依赖于垄断这些生产资料的其他人，那么所谓的“民主制度”就只能是一个谎言 —— 一个用来欺骗大众，并让他们驯服于表面上的主权的谎言，而特权和统治阶级的霸权实际上是得到了挽救和巩固。这就是“民主”，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从君主立宪制到所谓的直接统治，始终如此。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和生活资料社会化，所有人干预公共事务的权利建立在每个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和保障之上，否则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有“人民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似乎是最能保障公

正、协调个人独立与社会生活需要的制度。对于那些在君主专制时代为自由而战、受苦受难不惜献出生命的人来说，似乎尤其如此。

但事实上，从事物的真实面目来看，“全民政府” 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组成人民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和愿望，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所有人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因此，"全民政府"（如果我们必须有政府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是多数人的政府。而 “民主派”，无论是否社会主义者，都愿意同意这一点。他们补充说，的确，我们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但由于是多数人在决定这些 “权利” 到底是什么，因此少数人只有权做多数人希望和允许做的事。对多数人意愿的唯一限制就是少数人知道并能够进行的抵抗。这意味着社会斗争始终存在，其中一部分成员，尽管是“多数”，有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将所有人的努力都束缚在自己的目的上。

在此，我想旁敲侧击地说明，根据过去和现在事件证据所支持的推理，在有政府（即权力）的地方，“权力属于多数人” 的说法根本不成立，而在现实中，每一个 "民主"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 “寡头政治” - 少数人的政府、独裁政府。不过，就本文而言，我更愿意站在民主派一边，假设真的会有一个真实的、真诚的 “多数人政府”。

政府意味着有权制定法律，并以武力将法律强加于每个人：没有警察部队就不会有政府。

现在，如果多数人有权利和手段用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顽固不化的少数人”，那么这个社会能够为了所有人的更大利益而和平地生活和进步吗？

顾名思义，多数人是落后的、保守的、与新事物为敌的、思想和行动迟缓的，同时也是冲动的、不节制的、易受暗示的、在热情和非理性的恐惧中显得轻率的。每一种新思想都源于一个人或几个人，或多或少会被少数人接受（如果可行的话），只有在被新思想和新需求所取代，并且已经过时，成为进步的障碍而不是推动力之后，才会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如果有的话）。

那么，我们想要一个少数派政府吗？

当然不是。如果说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阻碍进步是不公正的和有害的，那么少数人压迫全体人民或以武力强加自己的思想就更不公正、更有害了。

此外，还请不要忘记，现实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少数群体”。有自大狂和恶棍的少数派，也有狂热分子的少数派，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并以完全善意的态度试图将他们认为是唯一的救赎之道强加给他人，哪怕那是事实上的愚蠢之举。反动派中也有少数人试图让时光倒流，他们对反动的途径和限度存在分歧。还有一些革命的少数派，他们在革命的手段和目的以及社会进步的方向上都存在分歧。

哪个少数派应该接手？

(权力斗争) 始终是一个蛮力和阴谋手段的问题，最真诚、最致力于普遍利益的人的成功几率反而是最低的。要征服权力，一个人所需要的品质很少会是确保正义和福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所需要的那种品质。

但我在这里将继续给其他人以质疑的空间，假定有少数人上台执政，在所有那些渴望执政的人中，我认为他们的想法和建议是最好的。我想假定社会主义者上台执政，如果忽略矛盾的话，我还想假定无政府主义者上台执政。

这是最糟糕的吗？

是的， 为了赢得权力，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意识形态信仰丢在路边，摆脱自己所有的道德顾忌。然后， 一旦掌权，最大的问题就只剩下如何继续掌权了 。人们需要在新的事态中创造一种共同利益，将执政者附着在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身上，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压制任何形式的反对。这也许符合国家利益，但结果却总是破坏自由。

一个建立在多数人被动共识基础上的既有政府，在人数、传统和情感（偶尔真诚）上都是正确的，可以为自由留出一些空间，至少只要特权阶级不感到威胁。一个新政府，如果只依靠往往是寥寥无几的少数人的支持，就不得不采取专制的手段。

只要想一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就很清楚了，他们要么背叛了自己的原则和同志，要么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号装点门面招摇撞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支持多数派政府，也不支持少数派政府；既不支持民主，也不支持独裁。

我们主张废除宪兵。我们支持所有人的自由和自由协议。当没有人有能力强迫他人，所有人都参与到社会的良好运行中时，自由协议就会为所有人而存在。我们支持无政府主义。

——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1926年5月

[image]
[image]

摆脱自由派女权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5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伊朗 女权主义 库尔德 新自由主义 消费主义 父权制 等级制 自由派 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iyp

「广告商必须让年轻女性相信，她们需要不断被"改善"，同时又不影响年轻女性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自主的和平等的人。诸如 "赋权"、"自决"和 "独立"之类的流行语被大量撒播在广告牌上。

但是，这些看似进步的言辞却只是被用来推销产品和观念，让女孩们以适当的"女性方式"进行性别活动，导致她们只能是复制而非挑战性别等级制度。

例如，一则脱毛膏广告告诉女孩们，她们 "独一无二、意志坚定、势不可挡"，因此她们不应该 "满足于.....砂纸般的皮肤"。女权主义对政治和经济平等的要求 —— 以及拒绝屈从于低工资、暴力和二等公民身份的斗争 —— 在消费主义这里被演变成了"拒绝屈从于不能丝绸般光滑的皮肤"。

伪女权的语言试图令年轻女性相信，她们可以通过买买买各种名牌服饰和美容品来"增强"自己的能力。」

—— 《贩卖女权主义，消费女性气质》

[image] 消费主义的“占领”。

「“女权主义”的失败是其被自由派吸收的结果，从而被掏空了意义。吸收的目的是为打掉其牙齿，令其变得不那么激进，以至于不再能威胁到统治现状，甚至跟统治阶级谈笑风生眉来眼去。这就是他们所言之，“女权是流量密码”。是啊，被阉割的女权基本只剩下刷流量这一个用处了。

你能看到很多人穿着印有性别平等豪言壮语的T恤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鼓舞人心的句子。但是，几乎同样多的人，他们并不愿意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真正组织起来。

自由派女权主义并无法解决基本的压迫问题，他们只会专注于“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矫情，专注于 身份政治 ，从而延续 父权制 观念，而不是挑战父权制观念。

人们一直在被引导相信父权制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就像资本主义一样，他们告诉你“没有替代品”。

并非如此。深究其起源就能发现，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 讨论父权制的起源也意味着讨论私有财产和农业的开端，它们通常被视为父权制的摇篮。父权制交叉并促进了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制度。没有父权制就没有资本主义。伊朗的革命者深刻且清晰地指出了这点。

自由派女权主义和自由派的所有其他运动一样，它们都不会挑战现行制度 —— 任何旨在挑战现行制度的行动都迫切需要探索抵抗的替代方法 。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解决方案往往来自于遭受 殖民化 、 剥削 和同化最严重的社区。正如 库尔德妇女运动 正在为妇女建立一个全球民主的联邦制；将妇女的自主权视为实现解放的手段。克鲁泡特金说过：如果妇女不自由，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自由。

库尔德人的口号 Jin Jiyan Azadi（女人、生命、自由）激励全世界。

但要真正了解/理解这句口号，就首先要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的所有故事，~ 不只有压迫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了解被压迫者们是如何一步步坚定信念摆脱自由派的迷雾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从俄罗斯到库尔德斯坦，“母亲”都是在抵抗占领和抗击暴力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角色。这并非巧合。

换句话说，被压迫得如此深刻的中国女性在刚刚进入女权觉醒的最初就被自由派收割而导致武力全废，这是不科学的。」

—— 来自中文网络

[image] [image]

□

[image]
[image]

城头大王旗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6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国家 改良 政府 统治阶级 革命

并不是说社会条件一旦改变，政府的性质和作用就会改变。器官和功能从来都是一体的。想要剥夺一个机构的职能，要么机构消亡，要么职能重建。在一个既没有理由也不害怕战争（内战或外战）的国家组建一支军队，它就会挑起战争，或者，如果它的意图没有得逞，它就会崩溃。在一个没有犯罪需要侦破、没有罪犯需要抓捕的地方建立警察部队，它就会不断发明出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否则它自己就将不复存在。

在法国，有一个机构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那就是现在已经并入林业管理局的"狼队"，其官员负责消灭狼和其他有害生物。没有人会感到惊讶，正是由于这个机构的存在，法国才会持续有狼，并且即便是在特殊的冬天里狼群也会造成严重破坏。公众几乎不担心狼的问题，因为有灭狼专家来对付它们，他们当然会捕杀狼，但他们捕杀得很聪明，让狼穴有足够的时间养育幼狼，从而防止斩尽杀绝。事实上，法国农民对这些捕狼人并不信任，他们更多地把这些捕狼人看作是狼的保护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了狼，捕狼专家们又拿什么谋饭呢？

政府，即一群受托制定法律并有权使用集体力量迫使每个人遵守法律的人，已经是一个特权阶层，从一开始就是与人民隔绝的。正如任何组成机构都会做的那样，政府毫无疑问会本能地寻求扩大自己的权力，超越公众的控制，强加自己的政策，优先考虑自身阶层的特殊利益。由于政府处于特权地位，它自存在起就已经与人民产生了矛盾，而人民的力量是由政府支配的。

无论如何，即使政府愿意，它也不可能取悦大众，即使它设法取悦了少数人。它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不满者的攻击，因此需要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没有夺取土地，也一定会夺取专门设立的重要职位，并对资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

习惯于发号施令的统治者不希望自己再次成为公众的一员，如果他们不能牢牢掌握权力，他们至少会确保在必须将权力移交给他人时让自己保持占据特权职位。他们会利用当权者可以利用的一切手段，让他们的朋友亲信当选继任者，继任者又会支持和保护他们。这样，政府就会在同一批人手中转来转去，而所谓的全选政府 —— 民主，就会像往常一样，最终变成寡头政治，即少数人的政府，一个阶级的政府。

一个全能的、压迫性的、无所不包的寡头政治一定是这样的：它拥有一切社会财富，一切公共服务，从食品到火柴制造，从大学到音乐厅。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美国大选和“左右”政治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7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专制 反法西斯 右翼 左翼 建制派 意识形态 改良 无政府主义 法西斯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iyp

1、历史上“左翼”这个词所指的从来都是政府的左翼，坐在国民议会左侧的人。时至今日左翼和右翼也都是政府力量，因此它们都在真正的反专制运动中缺席 —— 这种运动相信社会的自我组织，而不是竞争中央权力。即便有“议会外左派”的存在，它也不过是在政党政治的边缘运作的一种辅助性的力量，最终仍然会将街头运动重新引向政府大厅。

2、尽管如今“左翼”更激进的党派也有水平主义的意图，但左翼本身仍然扮演着完全相同的角色。这绝不是说建制是参与激进左翼政治的人的唯一角色。相反，我认为这是阻碍他们前进的关键因素。

如果想要理解过去几十年中错失的机会、士气的低落和失去的动力的原因（所有人的失败，不分国籍），就必须对“左翼”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认识到主流化/同质化在社会控制过程中的重要性。

面对右翼咄咄逼人的攻势，新思想比老错误更有价值。

3、每当激进的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却陷入高原期的时候，改良派左翼的提法就会重新出现。事实上初步胜利后本该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刻，但它们却往往成了人们放弃自我组

织、忍气吞声、再次把希望寄托在最新的“进步政党”身上的转折点。当这些政党无法实现目标时，毫无疑问右翼就会卷土重来。

4、美国大选是一个政治教育的好时机，尤其对中国人来说。选民投票率较低，党派忠诚度较低，左翼的代表更多是非政府组织而非任何政党，这本该是好事。而在保守派总统的领导下，分散的左派只会专注于单一问题的减害项目，比如试图将死在边境上的移民人数降到最低，而回避边境本就是用来杀人的这个根本性问题。

在中间派总统（如民主党）的领导下，自发组织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到无党派地方人士）与权力拥有者（非政府组织、党派活动人士、自封的社区领袖）之间的冲突就会浮出水面，前者试图用直接的方法解决问题，而后者则劝说人们耐心等待，强加一种纯粹象征性的抗议模板，并利用媒体和警察来分化对手，将沉默但合法的选民群众与 “外部煽动者” 分隔开，就像哥大的镇压经验：先锁门。这个操作非常具有系统性特征。

5、这种模式与19世纪粗糙的政党机器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在欧洲磨练出来的精良的社会民主复兴方法，但它仍然非常有效，而且只要当地人民继续无法将真诚的社会反抗者与居左的职业活动家和党务人员区分开，这种模式就会继续有效。

北美的情况表明，仅仅坚决反对政党政治是不够的。在平息濒临沸腾的社会冲突方面，最积极的维稳力量来自议会外的左翼，他们并没有凝聚成像玻利维亚MAS、西班牙Podemos 或者希腊SYRIZA 这样的新政党；他们只需防止正面攻击民主党及其各种改良努力，以阻止这类社会运动产生其真正所需的自治权，而在非营利工业综合体大肆砸钱并不断界定冲突格局的情况下，那些被民主党除名的组织或任何主流“NGO”团体都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最新的安抚策略的传声筒。

6、左翼和右翼是国家的两只手，但它们并不平等。在西班牙语中，“tener mano izquierda”（使用左手）的意思是含蓄、聪明、避免直接冲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左翼的目的是收买反叛的民众运动并将其制度化。这就是为什么右翼可以与伊朗达成秘密交易，与俄罗斯调情，或者公开政府间谍的身份，而不会产生持久的后果，相比下左翼却总是被仔细检查是否有叛国的迹象。在主流社会中，左翼的忠诚度总是受到质疑，他们必须不断通过把更多的俘虏带到谈判桌上来

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有效性。就如BLM积极分子。BLM最终被收编的结果与其说是民主党的“战术”倒不如说就是其职能。

极右翼在国内制造的杀戮比所有左派和圣战组织加起来还要多得多，但他们不会被当作“恐怖分子”对待。相反，媒体和警方会把他们说成是得意忘形的极端分子，不让人们系统地追究这个问题。那些真正反抗社会秩序或批评国家权力支柱的人，反而会被当作恐怖分子起诉，并被关上几十年 —— 即使像环保活动家马里乌斯·梅森那样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未来的斗争不可能仅仅满足于把白人至上主义者吓得尾巴缩回去，不可能仅仅是推广那些断章取义的“减碳”技术，不可能仅仅是为长期存在的父权体制带来政治正确和表面的平等，也不可能仅仅是寻求平衡资本和劳工的需求 —— 法西斯主义者提出的那些让人惊恐的问题早已存在。反法西斯的根本方法是用解放斗争的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放弃对主导体系的任何认同或共同利益的幻想，从根本上打击压迫和剥削，并开始建设‘人’而不是‘民’想要的世界，不再向任何那些将人视为资源或手段的体系妥协。

[image]

[image]
[image]

虚无主义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8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虚无主义 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iyp

虽然虚无主义在现代有很多含义，但起源于俄罗斯的“虚无主义”概念最初更像是一场革命运动，它试图否定和摧毁腐朽的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

正如伦佐·诺瓦托雷所说，"虚无主义意味着否定" —— 但不是否定生活本身；而是否定所有扼杀生活的东西，所有与生活相反的东西 —— 国家、法律、资本主义、父权制、过时的道德等等。

诺瓦托雷： "我不放弃生命。我赞美和歌颂它"。

> “虚无主义肯定个人权利，否定一切虚伪，只是迈向更高层次的人类的第一步，他们同样自由，尤其为伟大的事业而活。”—— 彼得·克鲁泡特金，《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899）。

现在很多时髦客以 “虚无主义者” 自居，以至于这个词已经变得没什么意义了……

它现在只是一个流行语，它根本不会吓到那些机构。就像相关的存在主义哲学一样，今天它已经变得完全被去政治化和无牙。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虚无主义接近的是死亡崇拜者 …… 而它最初绝对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它曾经是创造性的，是为了创造一种根本性不同的新社会秩序。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9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代议制 倡导 团结 改良 无政府主义 策略 自治 自由派 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Saul Bright

[image]

鉴于当前的局势，关于 “团结各政治派别的反对力量” 的讨论不绝于耳。即便是最极端、最激进的政治潮流也承认“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或者说在采取民主话语的问题上有足够大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接触点，既不会引起各方的排斥，同时又能使天平倾向于分权自治的自由，而不是代议。

众所周知全世界的选票箱对国内公众的吸睛度（尤其是美国，嗯）。看起来选举制度似乎是唯一的接触点了。作为制度形成的因素，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准备好了在 “总体民主议程” 的框架内实现自治的目标（不论分几个阶段），也许需要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做出妥协：财产、经济、术语、符号，和其他问题，视情况而定。毕竟，在通过适当的选举制度实现真正的自治之后，各社区本身也必需根据当地的条件在当地解决这些问题，并就总体上的市际自治级别达成一致。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才能做到在捍卫自治理想的基础上影响一般的“民主”议程。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会/不该出现领袖

—— 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就不利于这样做。即使出现了类似领袖的角色也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变革取决于个人时，无论他/她过去有什么功绩，都不见得是好事。不论如何统治者始终都会千方百计打压任何反国家的代表人物，这也不利于革命领袖的出现。

因此，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踏踏实实的基层工作，在民众中进行切实的倡导，而类似这样的倡导更多在基层进行大范围动员时才能取得成功，也就是当那些有魅力的潜在积极人士在他们特定的社区开始动员工作，并形成了足够高程度的公众舆论、以及城市/自治市出现积极分子骨干的情况下。

这种倡导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现有政权的停滞不前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给我们争取到了时间以更详细地为实现变革的全方面策略做准备。这也很可能是实现社会突破的唯一途径 —— 先通过直选，再开展运动，采取具体措施以实行自治。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可持续性，不要仅仅为了解释无政府主义的所有问题和微妙之处而大肆宣扬。

现在无政府主义理论正在吸引更多的人，新的同道快速出现，因为人们的确厌恶了 改朝换代的权力游戏 ，对 宣传 和 营销 越来越敏感，而且真正想要掌握自己的人生了。这对我们的动员工作来说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的倡导必需以具体解决现有的问题为导向，让人们看到我们的真诚。

通过直接行动，将不同派系的异议尽快上升到反叛盟友的层面上 —— 淘汰那些作为统治阶级的镜像的伪反贼，再通过协商妥协来实现总体民主议程。当然这是最理想的过程。倡导工作也应该包含尽可能促成这种理想状态。

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有领袖，但应该有一个底线问题，为此牺牲其他一切都可以接受 ——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以多级授权为基础的选举制度。

由此，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对手将是自由派公众，他们毫无疑问会照

搬代议制模式。我们可以通过倡导示范的工作和广泛讨论/辩论来接触彼此，以实现互相理解。比如我们这个互助学习项目，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倡导模板。显然这项工作必须由无政府主义者在当地倡导工作中形成的舆论领袖来对抗自由派公众，这也是个人自治战术的结果，活动家们通过个人的解放行动来扩大支持者的队伍 —— 再一次，示范而非说教，这样形成的结构不容易脆弱。

因此，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基层的积极人士必需强化安全训练，KOL化的风格不可取（我能理解2023年终那本书里“进步派咋就不行呢”章节的所指，但我觉得它可能会产生不恰当的激励，尤其是对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长大的这代人来说，摆脱流量经济的价值观围堵首先就是一道坎）。无政府主义运动力量薄弱，很难承受因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性行为而失去队友的后果。

活动家的一切努力都应着眼于扩充队伍增加人数，并通过在各自的社区或其他未被自治价值观覆盖的地区进行倡导工作，以便在社会中尽可能大范围地建立无政府主义观念。

零工工人的反抗和对阶级不平等的愤怒、996对剥削的控诉、对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厌倦、对内卷的根源和消费主义的领悟等等，都是很好的倡导切入点，应有助于促进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以授权自治为基础的更广泛的平等正义运动的一部分。推动自由派公众开始思考分权的方法，将其作为一种“民主”准则。毕竟，地方自治本该是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1985年的《欧洲地方自治宪章》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该宪章实际上是对自治的一种限制，但仍然可以作为与自由派异议组织互动的一个锚点，一个建立建设性合作的共同点。

—— 来自中国朋友

[image]

如何清除法西斯蟑螂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1月24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Antifa 反法西斯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法西斯 秩序 资本主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法西斯主义者最初是由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无产者组成的，墨索里尼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了民族主义路线。当时他们并没有立即得到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支持，直到他们开始在阶级斗争中为富人阶级提供服务，如破坏罢工和保卫私有财产。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NSDAP）的前身是民主行动党（DAP），由一群工人和退伍军人组成的，甚至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怀疑（希特勒最初是作为间谍认识他们的）。纳粹党并不是在克虏伯家族的支持下才出现的，而是在克虏伯家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它的大部分早期成员，如希特勒、罗姆等，都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失去地位的人。

事实上，在逻辑层面上法西斯主义甚至可以是一场革命运动，一场挑战大资产阶级和旧社会势力的运动。毕竟它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的社会大众联合起来的，他们的地位的丧失就是金融资本的责任。在此你可以找到对法西斯主义反资本主义成分的解释，包括第三立场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综合。

纳粹党试图改造社会，扼杀金融资本的力量。第三立场主义因素虽然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代表了党员的一些共同情绪 —— 由于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党内的广大阶级都面临着地位的重大损失。

然而，但是，纳粹党的政策并不是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发展，相反，它是阶级合作。它并没有取消阶级落差，而是建立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制度，他们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取消阶级利益的对立，从而使他们“团结起来”。这就是纳粹党所说的建立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根据党内希特勒派的意愿，1933年《授权法》颁布后，这一政策在纳粹党掌权后得到了巩固。它倾向于允许大资产阶级和旧势力加入他们的联盟并使之制度化。而革命派则肯定会试图摧毁旧秩序。所以纳粹党事实上是反革命的。

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为了消除大资产阶级盟友的疑虑，并使他们对党的控制具体化，希特勒派组织了1934年的长刀之夜，暗杀了恩斯特罗姆和纳粹冲锋队领导层，以及格雷戈尔·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和其他第三立场主义者。

❤ 🩹

在殖民关系被彻底摧毁之前，那些其生活水平是由殖民的超额利润换取的“劳动阶层“是不可能革命的。劳动阶级中最主要的革命部分是被殖民者，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是最显而易见的。广义上的革命党， 特别是反法西斯运动，必须有利于这些群体； 殖民地 人民在反法西斯运动中的角色必须是保护被殖民者免受殖民者的暴力侵害。

任何声称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力量，都必须首先与 资本主义父权制 的性别分工作斗争，并支持反对这种分工的运动。如果你忽视了这个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物质性的、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 （放下那些主义先），你就会把它让给 资产阶级自由派 ，让父权制及其意识形态继续制造忠实的 法西斯走卒 。

只要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秩序依然存在，法西斯主义就会继续抬头。只有当法西斯崛起的条件被摧毁时，它才会真正被打败。

[image]

[image]
[image]

你反对的是统治本身还是某个独裁者？你厌恶的是独裁行为还是被“谁”采取的独裁行为？

[image] **Publish Date** @2023年3月22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I BigTech 垄断 大数据 威权主义 社交媒体 科技右翼 算法

[image] **编辑** [image]Saul Bright

[image]

I

社交网络是非社会性的。居于其中的我们并没有直接交流。在我们之间有一层厚厚的“中间人”。其中之一是某种 算法，它决定了一个人在分享自己的信息时，会看到什么，和以什么顺序看到。

该算法的代码是 专有的和机密的。我们这些人都不可能知道它是 如何工作的。甚至那些在此 赚到钱 的人（营销人员）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得到一些指标，他们试图从中找出策略和做法，以提高覆盖率、参与度和 所谓的转化率。这样做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最终，它只是专业算命师的 被动活动。

该算法由一家公司拥有，并完全为其 经济利益 服务。同时，这些一直在从我们身上获利的 公司，并因此而拥有巨大的 权力 和 影响力，却 不 对我们负责。私有制和商业秘密为一个 不透明和不民主 的结构

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它的管理原则 就是一党专政的计划经济。可悲的是，那些本知道应该对一党专政计划经济吐口水的人类，在听到 “董事会” 这个词时，却又都举手同意了。

II

通讯在进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速度、规模和质量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思考、以及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传播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理应以对待核电或基因工程一样的责任来对待它。然而，事实上，大众传播 被极少数 几个人 垄断和控制着，而这些人并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也不受制于任何我们能完全说清楚的规则。

我们 被要求 要么接受这一点，去信任那些只关心利润的公司（忘记了社会并没有沦为商业领域，也不能只受商业利益的指导）；要么，停止使用那些事实上 本不适合我们的手段，但却 又不得不 以此作为融入社会的方式，放弃它们相当于脱离了商业关系 ……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给自己披上的任何“民主”的象征，无论是彩虹还是BLM，都不是 在提议这些手段的 民主化。

III

在通过算法的过滤垫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意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有到达我们手中的都是短语的碎片，孤立的词语，加起来就是 半信半疑模棱两可的意思 和支离破碎的思维。

每一个设法突破过滤垫的词，就会获得重量。你看到某个帖子的事实本身成为衡量其质量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个帖子写得更好，这张照片很成功，那个视频很重要；我们看到它，看到它得到多少个赞，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 然而，任何SMM都知道这是一个假象，什么能通过并获得收益而什么不能，是受许许多多与内容本身 完全无关 的因素影响的。然而，我们“允许”/默许由企业来 支配 等级、地位和文化，就好像他们的算法的判决表达了数学真理一样。

社交网络是一个 歪曲的镜子王国，在那里你只是被持续灌输你昨天点赞过或翻阅过的东西，把目标受众快速推向 泡沫。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拆解成市场的外壳，并有针对性地 出售我们的数据和广告。这不是科技。这一切只是生意。

最糟的不是 市场，也不是商品。而是当社会和人类除了市场和商品之外什么都得不到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最糟的。当文化被一种解决公司营销任务的算法所支配时，那就更糟了。它购买了文化。我们以一刀切的方式开始“沟通”：前三秒钩住，15秒前结束，以免危及成功率……一个箭步，两下跺脚，三下耳光，一声脆响，就见血了。

这就是白痴出现的方式 —— 一群被动的生物，毫不犹豫地吞下头顶上滚滚而来闪闪发光的尖叫声；一群被情感驱使的焦虑的婴儿，在形式上获得了所有的信息，但却不仅无法将其概括为知识，而且根本就没有这样去做的愿望。他们只是在吞下别人填喂给他的东西，却还认为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类生物很容易被控制 。

IV

最不幸的是，以上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不断叨念了十几年，一篇篇的论文、一本本的 书 / 纪录片、一堆堆的 论坛，甚至有过一场场的抵抗运动，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依然感觉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否则，为什么一群被“训练”了几十年的人类所生成的数据“训练”出来的聊天机器人，再次成为这些被“训练”了几十年的人类的“新”玩具，这意味着什么？

目前翻看到的评论，礼貌的说是，都太天真了。所有语种。包括3年前读到的那篇 “世界末日的聊天机器人”，以及5年前的那些书，如“当机器决定民主”、“看不见的工人阶级” 等等，如今都已显不足。

我知道，我现在写下的这些字依然不会起作用，因为它继续通过那些过滤垫，继续被边缘和消解。

但至少，能看到这段文字的或者还记得那些链接中的内容的人们，知

道该怎么办。

【**IYP** 注】昨天再次被问及“如何看待GPT的走红？”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它只是在中文网络走红。其他语种对聊天机器人、数据资本、AI帝国这类议题的热议已经持续多年了，GPT并没有让这些话题及观点出现太多突破性（关于其升级所带来的可能的挑战性和反思，我们已经总结了**3**个部分内容，见：**https://www.patreon.com/posts/guan-yu-ai-79856615** ）。

在性质层面上，它没有新意。

中文网络对**GPT**的兴趣，似乎类似于对其他所有大国竞争话题的兴趣一样，它受到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技术本身。这种偏离让人们对百度和微软的比较的兴趣远高于对算法暴政和新专制的警惕。这对推动民主进程没有帮助。

[image]
[image]

关于AI

[image] Publish Date	@2023年3月11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AI BigTech 大数据 科技右翼
[image] 编辑	MMartinez

—— 转帖 ：来自华语用户 ——

I

我并不反对人工智能。像往常一样，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它的使用方式和使用对象。

写小说、谱曲、画风景的机器，如果有的话，仅仅会在经济而非创造性的意义上威胁着艺术家。当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适当的物质条件，艺术是无法完成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AI**。

在艺术的意义上，机器绝对不可能成为艺术家的竞争对手。因为机器不能爱，它不能痛苦，不能恨，不能欢喜。机器没有感觉，而感觉才是艺术的源泉。感受决定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它是主观感受赋予我们的客观现实的反映。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一点，有人喜欢把感觉和思想对立起来。但是，即使是思想，也是机器根本无法触及的。机器只会捕捉、积累、计算、

组合，它不创造。"智能”这个词，礼貌的说，至少非常非常不成熟；一台机器很容易盲目地重复它所知道的东西，但这不是什么智能，它只是大量收集相关数据的结果。对诸如“机器学习”和“ AI”之类的术语的炒作，仅仅是对类似 “统计” 和 “通用编程逻辑” 等术语的重命名。

思考和计算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就在于感觉的存在， 没有感觉就没有思想。没有感觉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文化。没有对艺术本身的需求。机器没有所有这些，也压根不需要 。

可以说，感觉是人的大脑做出的一团“计算”。但产生这个“计算”的基本条件是，我们是凡人，我们会担心某个事，并想说点什么。这些机器都没有。它没有经验。不受影响。不会神经症。没有恐惧。机器可以从人类这里模仿出这些东西，但如果你想让它画出一匹马，人类就首先必须给机器提供所有组成马的材料，并教会它如何组装。

那可能是一匹在技术上完美无缺的马，但是在其完美的组合中，它将缺乏基本的神经，而正是这种神经满足了从事创造性的需要。

要欣赏这种完美，你需要一个人类看着它并说出："这很美” 。而如果人都已经饿死了，还怎么评价呢？谁需要这些生成器？谁会按下这个按钮？为什么？

[image]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秩序上，在这种秩序中，已经挨饿的艺术家沉沦于荒凉的贫困，不得不放弃艺术，创作实践成为了专业人士的特权，文化失去了多样性的声音。

“进步是不可阻挡的！” 那些试图控制未来的家伙们总是这样告诉你。但这里面没有任何进步的东西 —— 恰恰相反，它是文化向更早的、前专制的、 “贵族" 的、 “封建" 的阶段的一种回归。

“进步” 的并不是用机器人取代收银员，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其中自动化释放了收银员的时间，或者至少确保收银员去做更好的工作。

与 "卑微工作” 不同的是，"卑微工作” 应该被委托给机器，只要它们

的人类前辈被保证有另一种收入。艺术是一个领域，机器的作用应该被限制在作为面向人类服务的工具的功能上。

创造性实践的民主化才是“进步的”，而不是它们的精英主义。手段的民主化才是进步的，而不是手段对人的取代。

这是一个关于 "进步" 的伦理和人文的权宜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类正在成为“多余的”，并被冲到陷阱里，只能听着那些迫使你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是“正常的”反社会分子的冷嘲热讽。请不要忘记，"正常"是一种建构，是契约的主体。什么是正常是由社会决定的。

□

是的，技术在进步，但我们必须不断地问自己，它是如何进步的，为了什么目的？是为我们服务的吗，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了吗，还是把我们推到了这个生活的边缘？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控制的问题，民主的问题，控制自己命运的问题。

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是可能的，但人类为什么要去追求这样一个世界？这样的 "进步"和自杀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不介意数百万突然变成“多余”的人就这样死去，给机器让路 —— 那就说吧。但请记住，你的同意为未来打开了大门，在那里，你自己也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变成“多余”。

[image]

II

今天的人们如果用点儿心的话就会能发现，很多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似乎比2020年代的电影拍得更“好”，尽管后者的纯技术质量更高。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也许您会认为，正因为技术发展了，变得更容易获得：有更多

的人开始去拍电影，因此也有了更多的电影 —— 于是遇到平庸者编造的垃圾的机会也增加了；其次，你今天看到的流传自1960年代的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筛选的，也就是说它来自收藏夹。不过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

文化是一个复制和挪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演变 —— 在传播中不断偏离源头，从而产生新东西。当前状态的悖论是，在过去**30**年里复制和挪用信息的手段经历了一连串的技术革命，这似乎也应该产生相应的文化革命 ~ 新事物的浪潮，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应该产生有意义的新东西。但这并没有发生。为什么呢？

请不要忘记，20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文化突破都是由战后的福利主义支付的。而 以市场为主导的热潮 成功地关闭了它，剥夺了艺术家实验和生产新文化的必要手段。美国前卫艺术的所有成功都与“亲爱懒汉”们为Soho和东村的住房付出的代价密不可分 —— 是这些代价让艺术创作成为可能，让创作者有机会去思考一些 "功成名就"和 “盆满钵满"/“养家糊口”以外的东西。

这使得60年代的音乐与70年代的 Kraftwerk 相比听起来就如同废品回收站里的电子管，90年代初的 aphex twin 在80年代末的耳朵里是无法想象的，尽管这些 "无法想象" 之间只有5-10年的差距。

而今天的情况是，“新”的音乐听起来就像之前的一切，而绝不像根本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分析家们所详述的停滞和危机，其 "形式上的怀旧"、"历史的终结"、"未来的取消”，以及旨在让一切成为现实的“电影”滤镜 “温暖”、“真实”，**“great again”**。

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相机还很复杂，那些少数能够接触到相机的人不得不解决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实践改变了劳动所需的努力，影响了大脑和手的质量。

被改变的不只有作品，也包括创作者。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可以在小木板上写出第九交响曲，而诸如坎耶韦斯特那种资源雄厚、先进技术

傍身的家伙，却除了泡沫什么都没产生出来。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在于技术的人为复杂化，而在于发展实践、教育， 以及如何更多为人的创造性工作创造条件 。 其中之一就是要控制创造的手段 —— 无论是在用户界面设计的意义上，还是在 所有权 和 民主化 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

[image]

III

毫无疑问 自动化 和 人工智能 技术可能具有巨大的积极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对与之相关的 威胁 视而不见，并盲目相信那些用“新工作” 和生产力增长图表的白条承诺来软化其现实的企业说客们。

仅仅在美国，自动化威胁着5500万工人，人工智能威胁着1400万。即使你的职业还不属于高风险领域，这些数字也应该让人担心。还是那句话，—— 不是为了阻止未来，而是要根据我们文化和文明的那些信条来创造未来，这些信条肯定了人类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首要地位。

可以为市场理性牺牲人类价值的这种逻辑，可能是对我们的私人经历漠不关心的机器逻辑。然而，我们不是机器。也不是反社会者，对他们来说，社会是像一堆土豆一样可以被随意摆弄的东西。

👷

每一项技术革新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答案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给出的。以及我们通过行动做出的选择。

作为早期智人物种，生活在4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照顾残疾人：独臂的、畸形的、无法自理的。试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 —— 所谓的“野蛮人”，生活在日常生存危机和无休止的资源斗争的模式中，同时照顾着那些 最没有生产力的和成本最昂贵 的部落成员！完全义务，毫无

收益！这不能用市场体制的 "理性"来解释。甚至不能用 "合理性" 来解释。但现在我们这些人类都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应该明白！不是吗？因为这些 "人" 生活在一起，彼此处于社会关系中，尽管他们社区的个别成员有身体缺陷。这就是做为“人”的意义。

另一个例子是苏格兰奥克尼群岛的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葬地（新石器时代遗迹，已有5000年历史），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髋部骨折的人类的遗体。患有这种骨折的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是无法移动的。对这些遗骸的分析表明，这些遗骸所属的人类是由他的同族人远距离抬到这里埋葬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把他埋掉，并不是简单地减去一个人，而是在他死后还表现出关心和尊重。这些是古人，他们的人生远远地早在你我了解到 “人文主义” 和 “人权” 这些字眼所代表的具体内容之前。他们生活在一个任何微小的差池都可能意味着大家一起完蛋的世界里。他们的处境远比我们现在这些人更加岌岌可危。但是他们从未放弃对彼此的关心。我们呢？

也许你认为那具被埋葬的骸骨属于某个部落领导人？好吧，那么再说一个故事。在伊拉克的Tepe Gawra 墓地（距今6000年）发现了有严重脊柱畸形的人类的遗骸。所有这些人都不是简单地作为 “多余的嘴” 被扔在坑里的，他们被尊重地埋葬。秘鲁的印加人和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人都有对残疾人的公共照顾的做法 —— 那些所谓的“健全人”把资源和时间都 分配 给他们的残疾同伴，而不考虑他们自己的任何所谓的 社会地位。这就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意义所在。

这不仅仅是怜悯或慈善。这种做法是 强大的社会联盟 的条件，其力量和可持续性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其参与者不是孤立的单位的总和，一有机会就互相踩踏，而是一个共同生活和互相关心的大群体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理性，而不是穿西装的愤世嫉俗的暴徒们所描述的那种。

只有当进步与人类利益紧密结合时，它才是*进步的。人们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手段，而不是在时代的磨刀石中 被磨死 。毕竟，我们创造文化和社会并不是为了生活在 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中 ，对彼此的命运摆手耸肩。

进步应该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把我们变得畜生不如。

[image]
□

失败的向量 —— 乌克兰和香港的共同点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3月14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乌克兰 国家主义 战略 技巧 民主 民族主义 香港
[image] 编辑 MMartinez
[image]

乌克兰革命分为两个阶段（2004-2005年，和2013-2014年），有三个源头（上世纪革命理论家所言之'三元素'）。这三个源头分别是：赋予革命以面貌和名称（"尊严革命"）的泛民主运动（又称为反腐败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顽固地拒绝承认，但华盛顿则看得很清楚）；以及，由那些不在乎自己生活在哪个帝国之下、只要吃饱喝足就行的人所推动的消费主义运动（莫斯科非常了解这一点，但华盛顿却不太了解）。

相比之下第三个部分的规模最大，但也最被动；另方面，从一开始，泛民主派和民族解放派之间就一直在争夺主导权。 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2013-2014**年，这些驱动力的向量是重合的。

在乌克兰战争的第一阶段，泛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和宗旨的一致性得到了重申，这就是为什么能确保对侵略的高度抵抗。在战时条件下，加速形成的'乌克兰民族' —— 即以价值观而非语言、血缘和宗教为基础的共同体 —— 呈现出令人鼓舞的趋势。这里最重要的是，泛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目标的结合确保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革命的支持。1922年的奇迹就是在这种支持下才得以发生的。

正是泛民主价值观（戈尔巴乔夫所言之“普世价值”）在战争第一阶段的盛行，才使得西方舆论将这场战争视为“我们西方人的”战争，视为一场为了自由世界的原则和理想而战的战争。也只有这些公众情绪才会推动（那些总是持怀疑态度的）西方精英们采取了具体行动。

不幸的是，我们 目前正在看到的 （绝非仅限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这部分） 西方公众情绪的逆转 ，并非毫无缘由。归根结底，这是对乌克兰革命本身矢量变化的反应 —— 到**2022**年秋天的时候，这些变化已经显而易见了，到**2023**年夏天时更是一目了然。 这些变化的实质是民族主义部分完全压制甚至已经瓦解了泛民主部分。

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乌克兰境外比在乌克兰国内的影响还要更大。随着泛民主价值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或者说，只是作为口号和装饰品而存在），国家主义的目标和目的逐渐凸显出来，人们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欧洲人和美国人绝非同情普京和俄罗斯，而是不再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人的战争”，而开始将其视为“乌克兰的战争”。毕竟，革命军队的旗帜上写的究竟是“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还是“你们都该死”，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image]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泽连斯基在面对最残酷的侵略时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即在民族情绪上下注，损害了乌克兰革命最初的泛民主目标和目的，这被视为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而现在，要改变任何事情都已经太晚了 —— 他已经被困在历史中...

如果您还记得2019年我们对香港起义如何失败的分析，将很容易理解本帖希望讲述的原理 - 它们是近似的。“西方”在这里并不是关键词，建议您把它理解为我们曾经在“反抗者工具包（3）”中解释的“所有可联合力量”。

意识形态 战略性是一场运动的灵魂，不仅意味着它对整体的指导性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它必须是“活”的，且可控，尤其对组织者/成核点的定力和时局敏感度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我们将在本项目的未来阶段对相关战术进行更具体的说明。您随时可

将本议题和相关议题纳入您的研讨活动。

□

https://www.patreon.com/posts/zhuan-tie-wu-fu-110564485

[image]

回复提问：「德国选举中是否有与中国变革直接相关的议题/看点？」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2月26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中国 德国 意识形态 技术官僚 直接民主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iyouport: 有一个比较关键的议题。与中国的相关性程度如何，取决于中国的变革思想目前的进度条。

可以从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说起。从根本层面上说呢，她不像一个’政治家’，她更像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受众和粉丝群的媒体名人，“政治网红”。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可以说很像纳瓦尔尼 —— 零意识形态，百分百的政治技术解决方案。于是可以认为她的粉丝群目前已经达到了最大值，已经饱和，如果继续如此（很可能是），未来只会越来越少。

现代各国的政治潮流都在朝着这样的政治技术结构靠拢，一方面可以在其中积累政治光谱的边缘部分，另方面，也正是因为缺乏有助于构建和扩大选民基础的意识形态基础，在选举政治下它们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担忧。

这不是新发明。这是在不同政治文化中都存在的相当标准的过程。

还是以俄罗斯为例。一来是中国朋友比较熟悉的，尤其是，俄罗斯是一个反对党众多的地方，却一事无成，可谓典型的前车之鉴。

在俄罗斯，除了纳瓦尔尼的FBK之外，上述这种纯粹的政治技术解决方案还包括 “亚博卢”党（Yabloko），该党如今由于某些自然原因已经非常萎缩了。 该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表达一个非常特殊的、纯粹苏俄式的 “厨房知识分子” 阶层的利益，作为一个反精英的参考范例 ——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群体没有可以 “插入” 政治议程的国家发展计划。FBK 则是城市 “创意” 阶层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除此外它几乎没有其他同情者群体。纳瓦尔尼的去世导致了FBK的瓦解，因为他的支持者很难自动成为他的遗孀或者列昂尼德·沃尔科夫的支持者。粉丝群是同样的结构。

回到德国，莎拉·瓦根克内希特的话题，从本质上讲，即使她的“政党”进入了议会，前途也不够明亮，改变这点的可能性较低。正因为她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技术，一方面的确没有意识形态包袱，但另方面也因此会被排除在制度安排之外。

如果一个“政党”的结构是其领袖的个人魅力/ 粉丝团，那前景就很堪忧。要理解这件事，可以想象中国朋友熟悉的“饭圈”。比如一个非常走红的童星演唱组合，在多年里粉丝量位居第一位，但对于该组合来说这份影响力并没有前景，因为粉丝群的基础是对萝莉的偏好，而童星会长大，作为偶像而“转型”，继续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童星出现去喂饱粉丝团。

相反，意识形态是比偶像更有生命力的东西，尤其是对选举政治而言。尽管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萎缩很久了，资本主义似乎并不需要意识形态就能延续自身，它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只要人们必须参与其中才能生存，它就不需要去说服人们相信它。

但法西斯却有意识形态基础（不管是德国还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这是他们能快速扩充支持者范围并对进步左派形成挑战的原因之一。我们曾经分析过一些关于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极右翼更容易动员而不是左翼，比如这里、这里、这里，意识形态问题是曾经没有谈过的。

这不等于我们支持意识形态化。无政府主义对意识形态多数时候持反对立场。我们抵制意识形态是要停止将想法视为有意义，而是要把想法付诸实践的努力视为有意义；抵制意识形态也意味着摆脱二元评估，避免作为一个纯粹的吃瓜群众/消费者对一切做出单纯的赞同或谴责的点评，而是要去研究各种力量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 —— 就如本帖正在做的这件事，以便为总体战略行动提供信息。

总之，我们抵制意识形态意味着不断重新考虑习惯性的战略和战术，不断挑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观念，不要太沉迷于自己的声音。

同时我们完全承认，彻底否定意识形态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想法它本身就以某种“思想和理想的体系”为前提。意识形态并不是你可以逃避或驱逐的东西；充其量我们可以对自己保持健康的怀疑。对这个议题IYP将在未来进行更详细说明。

本帖是想要提醒，目前中国异议群体中流行的，不论是粉丝团/网红领袖模式、还是政治技术解决方案，在选举政治中的前景都不乐观，甚至不如当前火热的“灵修团”现象 - 这不是在开玩笑。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能感受到有更多的中国朋友开始更深入思考路经问题了，甚至更细节的议题也有出现，已经离开吃瓜点评的消费者位置，这是显著的进步。本项目一期工程的“反馈”板块中收录了一些来自华人朋友的有代表性的优秀见解，尤其是，每一个话题都有充分的延展空间，期待未来这些议题能得到更好的发育。比如：

- 关于海外“民运”和组织结构的观察：https://iyouport.notion.site/12d34ca2d46d80cbb3dec3b769eb7f41
- 关于变革的期待模版：https://iyouport.notion.site/12d34ca2d46d80f1b070e86a738eb451
- 关于变革步骤/进程的推断：https://iyouport.notion.site/12d34ca2d46d80fc9656c75227a996f1
- 关于专业人士在民主进程中作用：https://

iyouport.notion.site/12d34ca2d46d8099bde7e5e1eb477839

…… 等等更多。

对于中国目前的情况，诚实地说，几乎没有可能实现一步到位的直接民主，选举政治作为过渡期基本上必然的。这点就是德国选举与中国的关系。意识形态可以帮助进步派更快速形成自己的结构、扩充支持面并由此获得更多稳定，具体战术我们将在未来进一步说明（在战术专题站点中详解）。

不管您怎么看， 选举政治 就是如此。

我们当然始终期待能有更多朋友意识到《 超越权术 》的重要性，和《 直接民主 》作为总战略方向的意义。

所以，这里的终极问题并不是“需要还是不需要意识形态”，而是：统治，还是无治。

[image]
🌐

不论您是哪种“主义者”，都应该能理解的基本局势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3月1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Antifa 国际政治 新秩序 新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 民主国家

[image] 编辑 [image]Evelyn Parker

[image] [image]

本帖希望能以参与者的立场重申一些事情，而不是站队。

首先需要再次明确的是：当前的世界冲突并不是沿着国界进行的 - 就如我们在一年前战争总结中强调的，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国家在参与，但实际上并不是，故而解决方案也不在国家层面上。

在目前大众的视角上，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未来计划之间的冲突 - “根据施瓦布”的全球项目和MAGA版法西斯项目。这两个项目对人类来说都不是好兆头，都是对这个世界已然出现的难以管理的复杂性以及在任何复杂程度上对被管理对象的控制循环的错误的反应和回应，而非解决方案。尽管类似局面不是新鲜事，历史上多次出现。

从本质上讲，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当今所有的统治集团要么是家族宗族，要么是行会集团；要么是陈旧的发展阶段，要么是传统的发展阶段。工业阶段从未创造出自己的精英统治集团。因此，它们解决了一个共同的任务：通过复古化将世界空间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这两个未来计划的目的和目标基于对世界秩序必须降低到何种水平的

不同理解。施瓦布和全球主义者打算将设置重置到中世纪早期的状态，以便尽可能彻底地清理建筑工地；特朗普和那些信奉他的法西斯观点的人打算回到带有殖民主义特征的早期帝国主义状态。

在这场斗争中，民族国家扮演着工具的角色，因此，如果仅谈论美国、欧洲、中国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就是将情况过于简单化了，忽略了当前这场冲突的本质。今天，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被迫站在更广泛的全球性矛盾的一边。要么站在冲突主体的立场上，要么站在冲突客体的立场上。但冲突本身并不受影响。在冲突得到解决之前， 世界灾难的状况 只会更加恶化。

无政府主义者截然不同，就如我们在去年选前强调过的：我们反法西斯的理由和战略与自由派截然不同。IYP在《天安门起义35周年》和I&T新项目一期工程中的工作都是专注于这点的努力。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人们能够看到 在国家之外 、 在政权之外 的 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并诠释其 必要性和可行性 ；与此同时，政权和国家都在努力争夺人们的眼球，把人们钉在吃瓜消费者的座椅上，缝合进二元极化的小屏幕里。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工作：起钉子，剪短缝合线，帮助更多人离开吃瓜座椅，理解到还有另一条战线存在，人类还有其他更好的可能性。值得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流量和权力游戏）花费精力和智慧。

[image] [image] [image]

□

[image]
[image]

转帖：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3月8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Antifa 全球化 国家主义 新秩序 新自由主义 极右翼 特朗普 特朗普主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整个世界，或者至少是位于大西洋两岸和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相当一部分世界，正在进入全球反应的展开阶段。“萌芽”阶段始于2007年的普京和慕尼黑；“成熟”反应阶段则始于2025年的特朗普和慕尼黑（如此前所描述的）。总体上可以说，整个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在抵制，抵制得精疲力尽，却正因如此，现在才会出现这样如此大的补偿性反应热潮：抵抗失败相当于“失去”时间。

那些对特朗普和普京的风格和举止感到震惊的人应该记住，我们目前面对/应对的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打过疫苗”后的反应。在一两百年前，类似的局势过程都伴随着一系列的血腥革命，就像深层地壳动态导致的大地震那样席卷各大洲。如今，至少在目前的开始阶段，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因为打了百年的疫苗，这个疫苗就是，选举政治。

[image]

如果此前的一般假设是正确的（见这里，一定程度上还有这里），那么这里可以做出三点补充性的假设/说明，以预测这一内容在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将如何体现：

1. 必须重申，右翼浪潮只是纯粹的破坏，这里不会有任何建设性的东西。在政治行动领域，右翼浪潮本身不会产生任何“新世界” —— 因为在右翼这里，顾名思义，“新世界”就是旧世界，未来就是过去，最好的起重机就是推土机，他们认为时代的意义不在于创造，而在于修正、平整、制动。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反动的时代会随之结束。

2. 特朗普（和之前的普京一样）都是反动的导火索，但都不是原因。他俩都是暗流抛向政治表面的一块碎片。反动时代极有可能比特朗普的政治时代持续得更久，尽管他下台后媒体的热闹程度会下降，于是在被媒体操控的公众的感官里可能没那么太吸睛了，但事实上一切都在持续中。除非特朗普在反动计划的最初阶段出现意外（类似政治暗杀那类情况），也就是在反动计划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动力之前他的政治就结束了，才能让上述算法失效。

3. 特朗普主义（不只有特朗普本人）最不可能的后果就是回归旧常态。对特朗普主义的否定将是人们在反动年代里发明的某种新现实 —— 就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对选举政治的反思、对统治的反思、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束后的替代系统的热切构想。在这一阶段里，反思很可能是建设性力量的唯一职责；而当行动的时刻到来时，新思想将被快速付诸实践。

那么，反动时代会持续多久？在历史上的同类情况下，一次修复的尝试以及其可能性的失败需要一代到几代人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认为历史动力学可信的话，那么，历史时间正在加速，现在向某种新范式的过渡可能会比以前快得多。当然，主观因素也很可能介入 —— 尤其是反统治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预示性政治实验和主动革命，它们会像防波堤一样切断正在崛起的反动浪潮，使其无法全面展开。当然还有其他突发的可能性，都在此框架内。但不论如何，问题的本质不会改变，那就是 —— 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不管喜不喜欢，所有人都在走向“新”的常态。一些中国人可能对新自由主义有太多幻觉，尤其应该尽快清醒。

□

[image]
□

回复提问：「新的一年开始，是否有新的“维稳方向”？可能是什么？」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1月1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无政府主义 权力斗争 镇压 防御 革命
[image] 编辑	ssaosaowu

[image]

iyouport: 维稳部署在执政当局认为薄弱的位置上；对薄弱位置的评估基于局势，而不是日历。

目前最重要的局势是，旧的发展模式已经枯竭，而新的模式可能什么样仍然不清楚；统治者会出于本能继续奉行将人民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严格控制任何公共活动的政策。（关于原理，这个帖子的描述是清楚的）

原因显而易见：保住权力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任何其他主体构想的/和可能提供的任何未来版本浮出水面。有想法的人每时每刻都想要填补这个空洞，为当前的死气沉沉提供另一种选择。

当然，有想法是一件事，有资源能实现想法，则是另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一期工程的反馈中收纳了涉及变革流程的预测。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轮维稳会朝向资源所有者，包括有能力并显然

正在积极积累资源的人。目标是彻底消灭任何不属于体制的主体，以更加严格地控制公共空间。事实上它已经开始了，对教培行业的打击等等都是（原理见这里）。我并没有说被打击的行业都清白无辜一点毛病没有 —— 肯定不是，如您所知，但那都不是他们被打击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手段都不会阻止衰败的进程。相反，资源领域的萎缩会更容易引发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这是一种很棘手的矛盾。它意味着执政者对统治阶级的整体进程失去了掌控权。这里是战争的可能性加大的直接因素。因为，制造持久性危机将是重新拿回控制权的快捷且有效的方式。但副作用是，这些危机反过来会在执政环境中产生新的矛盾，并加剧现有的矛盾。弹簧被压得越狠，其反弹的力度就越强。

矛头向内可以称得上好事吗？如果只是对于吃瓜来说，也许是。但对于正在设想未来的人来说，压力比预想中更大。

必须说，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 “人民领袖”（包括并不限于汉族人）——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建立自己独立的组织结构。在幸运的情况下也只能作为代理人存在（要么是外部参与者，要么是内部参与者。其实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而第一种之所以看起来更多，只是由于在冷战框架下它更值钱而已，它们在现实中的作用力很低）。

这里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代理人”经常以独立的面目出现，甚至被支持者脑补为“独立的”。顺便说，大众对领袖的需求有一种很强的惯性，这种惯性很难通过自治主义理论层面的倡导工作来消解。但示范则更容易带来改变，以及耐心。无政府主义者治愈型的心理素养应该在此具备优势。

以上，这不是2025的“新”趋势，它已经延续几年了，并且将继续下去。至于其何时能终结，并由此迎来新趋势的倒计时 —— 则取决于斗争；斗争的战略、方法、参与方、规模 ……

总之，变革不可阻挡；但变革方向是否有利于您，取决于您在这一动态中所站的位置。

Take care and good luck!

[image]

回复：关于关税（贸易战）- 粉黑纠缠蒙蔽了整个反动时代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4月5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代议制 全球化 关税 反动 地缘政治 无政府主义 特朗普 直接民主 自主 自由主义 贸易战 资本主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特朗普试图通过残暴的关税来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这在理论上也许合乎逻辑，但在实践中，他的计划很可能会彻底失败。当然，现在还不能确定，也许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绝对不是这些天里人们所谈论的那样。

这里的问题在于，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业经济体，而是进入了更高的后工业化发展水平。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生产（主要是在高科技领域），但回到最初的工业阶段，坦率地说，是一个世界上没有人进行过的项目（至少因为其荒谬性），这很像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实验，他们通过强行回到乡村的生活方式，将柬埔寨的城市社会置于铡刀之下。波尔布特最终犯下的罪行众所周知 —— 种族灭绝。他到死也没能找回旧秩序，但他确实屠杀了200万城市居民。

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屠杀所造成的创伤可能不会那么大。这里的问题在于，任何转型都是一场大地震。从工业经济到后工业经济如此，反过来也一样。在转型过程中，旧的体系被摧毁，但新的还无法正常运转，只有在彻底摧毁原有的秩序之后，新的才能成为一个体系稳定下来。因此，任何一种“过渡”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在英国的圈地运动中，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英国工业，这对英

国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造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导致全国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全国（至少在农村地区）人口锐减。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德国的 “特殊道路”也极其艰难，法国在转型期间经历了革命和战争，給整个一代人留下血的烙印……

毫无疑问任何转型都是代价高昂的。其区别仅在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因为你现在投入了相当多的实际资源，而这些资源只有在整个过程结束后才能得到回报。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能保证成功。因此，你将投入资源，但如果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你将失去所有资源，同时社会体系也将被彻底摧毁。在这里，一切都非常 “单薄”。

只有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才会尝试进行大规模的变革（假设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试错的代价极高，或者说成本极高。所以只能在预期收益比“极高”更高的情况下，才值得。

现在就站在一个“危急情况”的大门口。旧的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出路了，而新的是什么众说纷纭却没人能肯定。一切都在混乱中，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清醒！

也正是为什么需要强调：回到以前的发展水平本质上是不合理的 —— 你不仅会再次经历一系列的灾难，而且即使成功了，你也只是回到了每个人都想逃离的地方。工业化经济体的效率总是（这里要强调“总是”）低于后工业化经济体。 哪怕是跪着向上爬，也永远都比站着跳下悬崖，更有意义。

这里最可笑的部分在于，统治阶级中似乎没有人明白哪个方向是 “向上”。事实上，特朗普式的 “MAGA”和施瓦布式的 “新常态”这两个全球项目都是一种回归 —— 都是向下；区别仅在于回到了不同的时代。特朗普想回到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白人特权的辉煌时期），施瓦布则想更深地进入封建主义 —— 通过近十年来一步步削减中产阶级。是的这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目前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样子。代议制自由主义民主只有在具有强大稳固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当中产阶级被削弱、工人阶级被摧毁，只剩下极少数贵族亿万富翁和大批的流氓无产者的两极分化时，政治制度的法西斯化就是注定的。我们此前从不同角度解释过为什么法西斯极右翼的选票越来越多，以及其与中国的关

系，但必须说快速加深的结构性不平等是根本原因。

尤其是必须说，除上述这两个项目之外的确没有其他全球层面的项目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没有什么意义 - 它并不是全球项目，纯粹只是中国的。中国人只是为自己而建造，他们没有扩大规模的能力，而且它永远不会成功，就像外星人在敌对星球上建造空间站只为自己一样，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接纳其他物种在那里生存。

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不能让其想法“成功” —— 是他所理解的成功 —— 为什么？因为在这种形式下，他并没有在谈论未来，而是在谈论相当遥远的过去，而且需要通过“回到过去” —— 回到‘新’的殖民征服、新的地方战争、地区战争，然后甚至世界大战，再然后才是 —— 重新 “向上” 的新过渡。不论是两到三个世纪，还是一个半世纪。

这就是我们此前强调的《 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也是为什么要阻止他和他们 —— 不要沉浸在川粉川黑的肤浅争议上，不要被特朗普一个人的疯狂表演消耗精力 —— 我们的对手不只是几个统治者 。 我们要阻止的是整个倒退路线， 反消费 / 直接民 主、追求人类经济而不是商业经济、 反国界/反驱逐 迁徙自由、抵 抗一切等级制度 / 性向自主 、 气候正义 、 互助而不是竞争 ……等等，都是其中不同层面的战略。

直接行动是唯一的办法。架空统治。因为今天活着的我们这代人有义务捍卫我们自己和后代的福祉，我们的福祉不该被极少数人的利欲熏心所葬送。

本项目将《超越民主》系统性革命实验的理论和经验安排在一期工程，就是要强调我们的方向 —— 强调在这个危急时代可能的选项并不只有倒退。人类完全可以前进，只要我们联合起来解除极少数人植入给所有人的权力幻觉。

本站多数内容都值得作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实验的起点。 在此感谢所有目前已经开始运行研讨和实践的朋友们！

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身边最爱的人，保持清醒和自决，努力降低数字

垃圾信息的干扰；我们每个人的自由自主程度越高，我们连接起来后的力量就越强大。

权威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4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无政府主义 权威 等级制 辞典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权威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性的，另种是非理性的。

理性的权威以能力为基础，专注于帮助所有依靠他发展的人获得发展和进步；
非理性的权威建立在权力之上，专注于剥削所有奴属于他的人。

我们反对的“权威”是后一种。反对那些享受着特权待遇替主子说话以欺瞒老百姓的“专家”，反对那些高高在上压榨劳动者的政客和老板，反对强制背诵“正确答案”的灌输式教育，反对那些要求你无条件服从的交易和规则……

巴枯宁弗罗姆等人都认同这个观点。用弗罗姆的话说就是，“对于权威，要么占有，要么成为”。
占有和成为的区别是这里的关键。

“成为权威”意味着这个人有能力有知识可以在这个领域挑大梁解决难题。

相反的，“占有权威” 是指建立在由等级地位上而不是个人能力所产生的地位和权力之上的社会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能力虚假或者不成为获得地位的理由，而是说，最初的能力被转化为权威的头衔和地位后它就与个体没有关系了，比如被制度化。

非理性权威就是等级制度 —— 等级制度将社会中的权威制度化。等级制度导致无权者被边缘并弱化，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去依赖另一部分人，这份被生造出来的依赖性被继续作为施加权威的辩护。权威使支配者对所有被支配着肆意施加刻板印象 —— 某些人“就是不行”、就是“需要”被管制、“无能小卒不足信” …… 久之，被支配者就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即便被允许亲自来拿主意，也会感到无所适从。

身体器官必需被经常使用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人脑尤其如此。等级制度将决定权限制在上层人士手中，意味着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听命者。肌肉如果不被使用就会变成脂肪；大脑如果不被使用，创造力、理性思维能力和意志力都会变得迟钝，大脑将转移目标到边际活动，比如运动和时尚 —— 奶头乐。“消费者”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 通过杀死那个独立思考自主行为的自由人。

正如科林·沃德所言，制度制造了它自己的低能儿，然后再藐视和惩罚低能，以加速强化普遍的低能。

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所有这一切灾难都不是注定的，而是人为的，并且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image]

回复关于马斯克组党：所谓的“第三势力”并不是一种实际可行的东西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7月6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原理 反精英 变革 精英 颠覆
[image] 编辑	[image]Saul Bright

[image]

iyouport:

1、美国的两党结构早已是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的重要部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都建立在两党二元的基础之上，贵族家族及其客户都围绕着这个结构形成。

要想改变这种结构，除非经历一场自我毁灭级的灾难。尽管现在两党都面临着明显的危机，但到今天为止都还完全不具备这样做的先决条件。

2、马斯克并不属于美国贵族圈子。特朗普也基本上不是贵族圈的一员，但现在看来，旧贵族家族将被迫接受特朗普这个非常庞大的家族进入他们的圈子，即使不是他们的组成部分。

这就好比中世纪的私生子：他们没有机会继承任何东西，也无权占有别人的家族产业和土地，但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现在就是这里

特殊情况很容易出现的时候。

3、总的来说，所谓的“第三势力”这个概念本身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可行，因为它假设在一个稳定静止的系统里会出现根本性的新平衡。这从定义层面上来说就是不可能的。

4、历史上无数人犯过这样的错误，即想要通过“加入”系统从而改变系统。他们都失败了。要么被系统同化掉，要么从一开始就被消灭。

5、

📌

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先颠覆，用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精英/反精英。

反精英具备充足的自身条件 - 最基本的包括： 新的发展项目 、掌握 可实现该发展项目的 具体资源 、以及 管理该项目的实际能力 。缺一不可。

反精英一直处于“潜伏”状态，一旦发生社会灾难，就可以立刻取代现有的精英。

更多见：♣乐观情景，反对派的分裂，和民主战略

为此，反精英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反精英必须拥有自己的组织结构，
- 必须拥有与精英截然不同的未来愿景，
- 必须拥有在短暂的混乱时期内快速推行和传播自己理念的机制。

- 当然，还需要一场灾难（作为“机遇”），否则精英阶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权力。

换句话说（重申我们多次强调过的）：

光是等待灾难，一点用都没有，再大的灾难也不会直接等于变革；

异议不等于反对派 - 绝大部分社会知名度/尤其是网络知名度， 都·不·会 转化为组织结构，社会结构产生于您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反对派不一定等于反精英 - 具备上述条件的才是。

6、 本帖无关对马斯克或者特朗普或者美国本身的任何立场。一如既往我们有我们的唯一战略。即我们在对德国选举的分析中使用的战略：

[image]

[image]

不是“个人问题”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9月18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3 纸条
[image]	**标签**	关系结构革命 战术 等级制 组织

[image] [image] [image]

如上图，所有这些选项也许都存在，但它们都不是根本性原因。

您可能也经常奇怪于某些人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但如果把这些现象归因于个人问题，那就会错过很重要的东西。人的行为方式基本都是伴随其成长过程的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天性”。

[image]

制度性越强天性就越弱。越近距离的关系，对人的影响就越强。

换句话说，是社会关系形成了个体而不是反过来。

如果只是把集体拆开还原成个体，并不会帮你弄懂个体，也不会弄懂集体。

因为集体不仅包含个体，更重要的是还包含个体之间的关系，是这种关系结构在对集体中的个体产生影响。

掌握权力的人通过剥夺其他人的权力而产生。通过对身体的胁迫、对经济的支配、以及对心理层面的限制的总和，社会制度和惯例影响着其中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地位和对整个世界的观察方式。

专制主义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把社会分为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被统治者，导致后者的普遍贫困 - 这种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有精神、情感、欲望等等所有方面的被亏欠。

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际关系的烙印是权力，而不是自由。于是在这里，一切都是基于权力的，这种社会关系不会也不可能自由地教育人。

[image]

只有对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参与 - 自我管理，即自主 - 才能自由地教育人。

异议人士社区/团队如果不能从自身组织的关系结构层面反叛专制主义 —— 如果你们之间也保留着等级制度、吹捧和压制、竞争和虚伪 —— 就只会根本性地失败。

这里的失败从立场层面开始，意味着该群体只是在复制它本该反叛的系统，所以它已经不能被称为反对派。

包括论坛在内的等等都属于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是行动也可能是运动的一部分。但只能是先有组织后有项目；如果一个组织的人际关系结构只是专制体制的复制品，它形成的任何项目的受益人都将是专制体制本身。

中国朋友喜欢说的“体制内/外”，如果指的仅仅是职业和福利待遇区别，那就太窄了。我们认为“体制内”应该指的是在任何方面复制和帮助延续系统特征的行为。“体制外”则相反，应该是变革的尝试者。

[image]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 of Posts**	16
[image] **Posts**	他们可以通过给你选票来堵住你的嘴, 我说“海外民运不行”只是在客观陈述, 专业人员如何摆脱政治冷感的陷阱以站到民主一边？, 乐观情景，反对派的分裂，和民主战略, 那些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 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 特朗普的2024总统任期对罗贾瓦意味着什么？, 多数决定制是一种粗糙的算法, 海外民运和狮子舞, 当冷战重来遇到民主危机, 大转型开启 - “中产阶级不行了”, 转帖：写在方济各之后，“三战”之前, [image]【转帖】恐怖作为统治手段…‘官不聊生’、社会暴力、事故频发的背后, [image]关于“民主”，美俄中，内战，和未来, 冲破中产改良主义幻觉，走进变革时代, [image]细胞总是知道…
[image] 说明	选取标准在于：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对解决问题的积极思考，且深度接近本站点基础水平。我们欢迎从任何侧面深入的对问题的探讨和对现结构的反思，这里的关键字是“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问题”，而不是解决“人”。【免责声明：如涉及私密团体内部细节，IYP不对来稿中的陈述承担责任。并建议您坚持“数据最小化”原则。】

[image]
↖

他们可以通过给你选票来堵住你的嘴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9日 01:00 (GMT+8)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代议制 公投 协商 投票 民主 电子民主 直选 自治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我曾经看过一份住宅区管理公司的月度报告。一大堆内容详实、色彩丰富的文件，有数字有图片，关于小区居民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可以一目了然。初看上去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吸引人，多好的管理啊是吧。这个住宅区有接近两千个单位。

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在实践自治吗？

结果我发现，文件的附件里只有大量的投票记录。就是说，业主们只能通过投票来做决定。对物业公司的工作做出评价 - 打分；围墙要粉刷啦，你喜欢什么颜色 - 投票……

你也许觉得这听起来很常见？所以，它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问题就在于，它不是自治。更糟糕的是，它是自治的拙劣替代品。

简单解释下为什么这样说。

想象一下，居民们面临着如何改善小区大院的问题。居民和物业公司提出的所有方案都要进行表决。如果居民之间没有横向的讨论和对共同事业的理解，那么每个人都会把决定当成个人意见，投对自己有利的一票。其结果将是一个机械的个体偏好的总和，它并无法表达居民的共同利益（甚至什么都没表达出来），却让人们感觉着好像自己有什么决策权似的，好像在对什么东西负责。

自治与这种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理论中的一个神奇词汇 “协商”：如果有一个充分的意见交流过程，人们就可以在考虑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调整自己最初的个人偏好。比如，没孩子的年轻有车族业主和上点年纪的父母更有可能投票赞成将大院变成停车场，但如果他们参与到与邻居讨论各种方案的过程中来，他们就会注意到还有一些人有其他重要的需求，需要与他们做出妥协。

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的例子（换句话说它可以无限复杂化），我经常讲这个故事来说明民主的集体性质及其与政治的“服务”概念（政治被认为是“一种服务”）之间的区别。当人们共同决定如何生活在一起并管理共同物品时，自治就发生了。投票可能是批准一项共同决定的技术工具，在复杂的民主进程中有其适度的地位，但是，一旦仅仅用投票来代替寻求和商定共同解决方案的整个过程，那自治就不复存在了。

所有的权力篡夺者都知道这个对抗民主的软秘诀：不要让人们见面和交流，让他们相信权力是一种服务，他们是权力的客户/消费者，可以“直接用手机端投票”。 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更容易被操纵 —— 其中的人们失去了理解 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 的能力。

再说那个住宅区。我想说的是，如果居民们不是单独投票，而是能够参与自治，他们肯定会重新考虑许多管理问题。而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并不在于小区的规模（2000单位的规模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已经相当舒适了），而在于小区的结构偏向于掌握权力的物业公司，以及相应的将生活视为“个人服务消费”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民主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关于 “电子民主”的这一基本弊端，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早有表述：

> 「为什么要强调自治大会的重要性？像瑞士那样的全民公决还不够吗？当'自主'的个人可以在自己家里舒适地聆听辩论然后立即投票时，为什么不能像技术狂热者所建议的那样通过电子方式做出决定呢？＜…＞问题在于，在个人投票箱中进行的全民公决将民主简化成了一种私人行为，从而破坏了民主。将投票作为私人偏好的登记（就像选洗手液或者牙膏的品牌一样），会导致公民身份、政治、个性以及作为信息相互交流过程的思想形成的完全量化。简单的投票只反映了我们的看法和评价的一个预先确定的'百分比'，并没有使它们得到充分的披露和表达。」（《从城市化到城市：民主地方自治的政治》 147-148 页）

在过去的30年中，技术乐观主义者对这一问题束手无策，因为纯粹的技术手段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顺便说，对个人偏好的机械求和并不能带来民主，这一观点在自由主义理论中由来已久，不需要是激进分子也能明白这一点。

我觉得真正想要了解民主的人（不是哪个国家“版本”的民主，是民主本身），尤其是缺乏民主经验的人，从布克钦开始入门也许是个好办法。

[image]
□

我说“海外民运不行”只是在客观陈述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9日 04:00 (GMT +8)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建制派 无政府主义 民主 海外民运 精英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移民的海外异议人士经常就各种事情争执不休，虽然多数时候都比较低沉，但几乎所有争吵的主题都很无聊（不论是身份政治还是“谁的钱”等等），尽是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吵。很多旁观者只是从最初的惊愕逐渐变得冷漠麻木了而已。要说这也不奇怪，至少在普通移民范围内，这属于正常现象 —— 争执作为存在感来源的补充是符合心理机制的。即便是其中更聪明的人（字面意思，且屈指可数），也只是在争吵的内容上更偏向于智力层面而已，但激烈程度也是不遑多让。智力层面不等于“实际意义”。

这里的确存在一些政治能力问题 —— 此处仅指建制派角度的政治能力。现在这些人和百年之前的政治难民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几乎没有政治能力。他们中极小部分人可能也形成了一些“组织”，但这些组织对国内没有反射性的影响力，更不用说倡导力了；其开展的诸多怀旧风项目更像是商业项目（你懂我的意思），而不是政治项目。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少在理论问题上（更不用说战略性的理论问题了），相反它充其量只是体现了价值层面的竞争。换句话说，不管这些争执最终导致谁输谁赢，对变革计划都没有影响。

即便政权明天就垮台（先假设一下，反正早晚的事儿），这些人马上

回去，也基本上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关于他们的一切都停留在35年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头脑也是如此，但必须说甚至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们是个人身份行为者。

这是什么意思？"实际意义"是指什么？为解释这件事让我来举几个著名的例子。

巴拉迪，可以说是西方最有名的埃及人了，在埃及国内也颇受尊敬，他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前负责人。他是个严肃的人，有深刻的关系网络，对埃及的统治精英来说也是挺熟悉的。但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是以个人身份回埃及的。他期望迎接他的是红毯鲜花，直接通向总统府。当然选举什么的只是小程序。所以埃及起义一开始，他就这样直接飞过去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什么都不会有。

但为什么他后来能上台？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而是背后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结构，该组织在埃及的乱局中瞬间就凝聚到数百万的支持者。顺便说，这也让埃及的重臣们感到不快，因为他们此前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等注意到时就为时已晚了。还有另个问题是，在赢得选举后，穆斯林兄弟会被迫玩起了硬件游戏，结果发现自己在游戏中处于弱势，先是被挤压，然后干脆被摧毁。但这是另外问题值得单独讨论。

华人"海外民运"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资本都接近于零。不客气的说，从知识、到组织、再到意识形态等等各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而且从表面上看，它仍将继续是零。这不是侮辱，而是客观陈述。

从这里大致就能看到原籍国未来的崩溃和重组的性质了 —— 在最初阶段，最有可能的是毫不含糊的精英内部重组（尽管"精英"这个概念对今天国内的政治局面来说意义很低，但我还是想用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已经掌权的人和机构，就是说假设动荡能导致有利于他们的资源重组。无政府主义者的基础设施和资源都空缺太多了，很抱歉无法在这个阶段被考虑在内）。

毫无疑问，在任何这类级别的动态中都会出现今天还不为人所知的全新人物，"乱世英雄"，但新社会主体第一阶段的集结逻辑会将新人推向边缘，新人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机会。因此，"下一代"统治者更可

能是今天的权力阶级内部的熟脸。可能中间有一些过渡期，也可能不需要过渡。（作为机会窗口，不可细说……）

无论如何，在第一阶段，没有理由突然出现一支能“直接夺权的”有组织力量，尤其是能提出全新的发展方式的那种有组织力量。相反，理想的话，这样的力量可以在第一阶段的过程中形成。他们必须满足两个必要条件：展示自己的未来形象和计划，切实赢得群众基础，并设法迅速组织自己的运动。然后，经典法则就会生效（在社会系统中非常有效的经典法则）：结构性更强的系统将摧毁和吸收结构性较弱的系统。只有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第二阶段才会到来，届时新的社会力量将摧毁现有的统治集团。

在乌克兰，泽连斯基就是这样上台的。在第二阶段，他掀起了一股彻底否定乌克兰上一代破产政客的浪潮。泽连斯基最终未能完全组织起自己的运动，未能充分应对新出现的和遗留的挑战，那是另一回事。但他做了这个位置上的人必须做的事 —— 他摧毁了整个上一代人，并令其至少目前为止都几乎没有机会卷土重来。

我并不是在说“新的肯定更好”。（会不会更好，有多好，取决于人民对整件事的理解，创造力，和能动性。）但新的肯定会有所不同。

乌克兰的海外民运在 “泽连斯基之后”会有机会夺权，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有一个能够将自己融入乌克兰社会的结构。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就不会有“机会”。这种结构甚至可以是非政治性的（就目前而言），但必需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提出一种意识形态和未来形象 ——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未来形象。比如乌克兰的阿列克谢·阿列斯托维奇就是这样一个公众人物，他拥有一个名为 “Apeiron”的教育机构。如今，该机构已脱离政治，但它是一个机构，这意味着它可以成为政治重组的基础。

同样道理，这也是为什么埃尔多安能快速意识到，法图拉·葛兰和他的“软实力”结构、他的所有学校、慈善和社会组织及机构，都可能成为政治工具，因此葛兰被预防性地宣布为“土耳其的敌人”，目的就是击碎他的结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创建之初也是一个教育机构，但当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迅速被改组为政治机构，而且不止一个。

这就是“实际意义”。

相比下中国海外“民运”基本一无所有。他们全心全意地分享怀旧风的人设和角色，忙于争吵，忙于突出个人。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联合”的时候，不管是跨代际的还是跨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的，我想提醒一句，别忘了问 “what for” —— 联合计划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以组合哪些必需资源、为了什么而组合，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如何才能补充 …… 我们甚至不需要辩论理论，或者把它放在后面（环境和结构就能改变认知，效果比说服可快多了），更不用说其他无聊的争执了，但必须对这些问题心里有数。

我不是害怕或者讨厌争执，也不是对任何“个人”有意见（那都没有意义）。我是想要节省大家的时间和精力。因为，时机越来越近，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浪费了。

IYP 附：

我们在《从未"文明"：自古至今的全球加沙》中介绍的最后一本书来自无政府主义作家兼记者伊利亚·法尔科夫斯基（Ilya Falkovsky）。伊利亚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作家和艺术家。他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在当地大学任教，并撰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除了上述介绍过的殖民主义主题作品之外，还有关于藏族和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珠江》，以及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故事。伊利亚还在东南亚生活过，写过关于缅甸和泰国的文章 “独裁者与抵抗、草根自组织和少数群体的斗争”。

这里有一个他关于中国话题的访谈：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想要什么、梦想什么？在高科技的帮助下，国家真的可以完全控制人口吗？中国“半合法的反对派”在做什么？维吾尔族发生了什么？中国人如何回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他们是否怀念 “文革 ”时代，是否对苏联和斯大林记忆犹新？他们如何看待普京和现代俄罗斯？…… 以及更多话题。访谈视频：

https://youtu.be/wkDR3sJDvcs

[image]
🎨

专业人员如何摆脱政治冷感的陷阱以站到民主一边？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9日 11:00 (GMT＋8)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专业化 专家 技术官僚 政治去专业化
[image] 编辑	[image]iyp

《萨帕塔自治和无国家参与式民主》中提到的政治去专业化我比较感兴趣。我主张规划领域的整体去专业化。

并且专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外行人没有的作用。但前提是，这些人必需能摆脱政治冷感。

在专业界内部众所周知的 “置身事外与选边站”之争中，存在着有利于第一种立场的结构性偏见。技术官僚的结构是这样的：其中的专家只有在采取不带任何同理心的“吃瓜”立场 - 即保持政治冷感（＝站在上司一边闭眼听指挥）的情况下，才能混得下去，进而才有可能对某些事情产生影响，否则就会很快被淘汰。这就是他们的陷阱。

加拿大规划师马修基尔南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想法以摆脱这种陷阱。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人士对其职业被去政治化的结果进行反思的范例。但最有趣的部分在最后。

基尔南的论点如下：

- 1) 规划师在工作时通常不自觉，也就是说，不思考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妨碍了他们践行自己内心关于规划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的想法。基本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或多或少。这就会让他们产生挫败感。

- 2) 将规划工作视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儿，即像做数学题那样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案，这种幻想倒是的确帮他们减轻了挫败感。这种幻想的意识形态由两部分组成：万能理性/综合范式，和“公共利益”的大一统模式。

- 3) 如果不想继续作为官僚机构和资本的工具和玩物，规划师就需要重新考虑对其专业技艺万能理性的信念，并放弃对“大一统公共利益”存在的信念。在意识到自身职业的政治性之后，规划师必需在政治斗争中站到正确的位置上。

这是需要普遍接受并反复咀嚼的基础。在理论上，几乎所有规划师都同意这一点，但在实践中，由于技官僚主义的陷阱，他们什么也没改变。

基尔南就此向他的同事们抛出了一个想法：你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拥有垄断权，政客和管理者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让他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 我们现在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而不是压迫者一边，以迫使他们做出不同的决定。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天真，但我认为这至少是在被驱逐到边缘 /和被迫俯首称臣之间的第三条路。当然，与其他任何集体行动一样，专家们的这种 “罢工”只有在适当的团结的程度下才能奏效，否则那些极少数站出来反抗的人立刻会被拿下，其位置被更听话的专家所取代。这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最后还可以想象一下，是否有可能像历史上某些变革期那样通过宣传倡导将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组织起来，结合到民主革命的结构中？理论上不是没可能，而实际上的可能性取决于其行业内部阶级矛盾的激烈程度。并且这一程度是可能被“推动”的...... 你知道。

[image]

[image]
♣

乐观情景，反对派的分裂，和民主战略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29日 14:00 (GMT +8)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倡导 制度 反抗 团结 开倒车 政变 政治竞争 民主 秩序 策略 选举 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iyp

[image]

局势动态中有三种经典的情景：乐观、惯性和消极，其中只有“乐观”情景下可以进行有效的思考，因为在其他两种情景中都是束手无策的状态。在“惯性”的情况下，通过缓慢地延续当前的专制趋势，现政权将继续维持二三十年；在“消极”的情景中，它会变成一个更加僵化的独裁政权，伴随着孤立和更大的恐怖（今天还在开“排华”玩笑的人，将见识到真正的“排华”）。

所以你应该推动乐观情景的出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乐观”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虚无主义者请勿喷，听我说完先。

今天，我认为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大限度是，随着当前的统治者下台（出于某种原因），政权将适度自由化，而这将由原统治阶级内部的部分精英来执行。毕竟这些人手里掌握资源，而革命派直到今天还没有具体可行的方案，更不用说跟统治阶级竞争公众支持度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

1) 在自由派化的过程中，政权将收编目前各地反贼中的一部分人，也就是说，它将给某些人提供参加选举和担任地方官职的机会，用利益来分化整个异议社区。这种收编是最强的维稳手段，尤其是对中国异议这种经验很少的情况来说，几乎毫无疑问会中招。所以我认为《披荆斩棘》这篇文章很重要，建议在最活跃的异议圈子中学习一下。

2) 与此同时，毫无疑问，仍将存在更激进的反对派，不管是建制派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将支持通过深入的系统性结构性革命来实现真正的转变。对他们来说，仅仅召开集体大会和投票选举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1)中的精英阶层将努力把(2)中的革命派反贼推向并保持在政治边缘位置上。

沿着（1）和（2）之间的界线，目前的反贼异议圈子将彻底分裂。真正的分裂 —— 我认为这是所有各种裂痕中最好的一种；诸如左右范式、阶级的共识现实、甚至性取向或者代际什么的，都属于没有意义的且多余的裂痕。

3) 同时，这个自由化的开篇将为民主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提供机会。所有曾经遭到残酷镇压的民主运动都会重新开始萌芽，并且催生新的创造性的活动，比如“共生”组织描述的那些，都不难实现。

4) 民主运动发展的主要渠道最初基本肯定会从各级选举开始。但很快，人们就会对选举产生幻灭感，别看大家现在如何表达对选票的渴望，真正拿到选票后就会发现，选举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权力在精英阶层内部轮换，而不是让人民参政（继续剥夺人民对自己的生活的控制权）。 简而言之，人们会发现自己被耍了，选举给他们带来的只是表面上的施舍，选举的结果是由政治技术专家和来自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决定的。

5) 在人民对选举失望的背景下，新的自由主义政权将试图再次打出“去政治化”的经典牌，让人民回家去“闷声发财”，并向他们灌输“专业人士会帮你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没必要抱怨，慢慢来一切都会好起来” 之类的洗脑。这将是恐怖的专制主义重生之路，能持续不少于未来几十年。一旦如此，今天在这里读文章的我们这些人都看不到

天亮了。

6) 要想避免这种噩梦，民主运动的能力和政治意识至关重要。

如果民主运动被选举政治的虚伪游戏冲昏了头脑，失去了地方社区和工会的基层支持，那么政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吞噬，整个社会也将失去走出专制的机会。

相反，如果民主运动能成功巩固基层社区，并建立群众性的再政治化，那么它就能推翻这个自由派政权， 进行根本性的民主变革 ，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我觉得这就是“ **Initiatives & Tactics** ”这个项目的意义吧。

[image]

那些无法抵达的“幸福彼岸”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0月30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代议制 瑞士 直接民主 直选 选举 革命
[image] 编辑	[image]Saul Bright

倾向于模仿的懒人真的不要太多，从历史上复制，从地球其他地方照搬，并且幻想远高于事实 —— “那个无限幸福的彼岸啊”，作为某种似乎无法实现但又应该为之奋斗的理想。

在这里看到很多“直接民主”的标签。其实信仰直接民主的人中也不乏这种彼岸式幻想（尽管其抵抗代议制的精神和认知水平已经很卓越）。就像中国保守派对美国的选票箱子的幻想差不多，直接民主的追求者幻想的是“瑞士模式”。

对此必须说两件事。第二件事更重要。

1、瑞士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直接民主”的理想范本。但同时，毫无疑问地，它为争取理想民主的斗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瑞士公民对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它总体上仍然是一种代议制，在这种制度下，由职业政客和技术官僚组成的执政团体将权力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社会/选民可以影响这个团体（影响力绝对比美国那种大得多），但仍然不能确保平等的人民自治（即我们应该追求的那种“民主”）。尽管它为民主进步提供了更高的可能性，但获取民主进步需要人民另外做出努力，而不是靠坐在屋里投票来实现。

事实证明，全民公决和联邦制可以与社会分层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压迫悄然共存。这就是“瑞士模式” 跟我们想要的 “民主” 之间的微妙区别。

瑞士的制度似乎具有巨大的民主化潜力。然而必须认识到它尚未实现。与其他代议制选举制度一样，阻碍民主化的障碍在这里也同样存在：缺席、政治参与向特权社会群体转移、金钱对投票结果的影响仍然很大等等。

2、大多数提到 “瑞士直接民主” 的人都不知道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但这恰恰说明他们对自己的理想持开放态度。

民主人士经常抱怨的一点是，他们不能把如何组织民主的完整计划摆在桌面上，即便有也不可能太具体。但请注意，“瑞士模式”的支持者往往并不知道瑞士的政治体制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只能用 “人民直接统治瑞士” 这样笼统的词语来解释自己的立场。所以，你还觉得计划书真的重要吗？

实际上，这些人，我是说那些的确在认真思考变革项目的人，脑子里很可能有一个“繁荣的民主社会”的形象，他们愿意在不了解细节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方向（了解细节通常会让他们失望）。因为与指导性理想相比，细节其实是次要的（或者说，细节是可以解决的）。

人们向往的不是类似瑞士或者美国的实地，而是以其作为标签的“榜样”，然后把自己的理想/幻想塞进这些标签里，于是现实具体如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瑞士确实是一个繁荣、和平和衣食无忧的国家，没有战争或政治暴力，于是就很容易认为那里的民主已经是理想态。

但事实上要实现我们的社会政治愿景就必须能处理我们现在面对的所有难题，那就需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而那些“幸福的彼岸梦想”只是一个回避现实的舒适的避难所。

[image]

[image]
♟︎

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1月7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代议制 反法西斯 新自由主义 民主 特朗普 美国大选 身份政治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Saul Bright

[image] 巴黎，反法西斯壁画

新自由主义者将继续装13：拼命让自己居中，一手压制左翼，另手淡化右翼；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厕所标记符号学的争执上，而不是无家可归者日益增多的帐篷；血腥冒险遍及世界 -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法西斯主义铺床。这并非人类史上首次发生。

可笑又可悲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争霸战，甚至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此，从宣传文案的字里行间挖掘自嗨的幻想。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去全球化、民族主义、地区化，保守派言论爆发，以及由此带来的仇外和厌女，都毫无疑问，但最重要的是：一个好战的市场。

特朗普的胜利导致股市飙升。投资者欢呼雀跃。这是现实。但谁是酷儿、谁是工人、谁是身份政治终结者，都被归为私人传记，被深度去政治化取消了所有系统性意义！

民主党的失败是幻觉和文化主义的结果，是对世界秩序的痛苦视而不见的结果。

🚨

左翼如果不能坚决脱离中间，就注定一无所获。那些把赌注押在维持现状上的左翼，只能说活该泪流满面。特朗普领导下的法西斯将带领所有人进入一个新达尔文主义的技术封建主义时代。

怎么办？要么举手投降，要么抱团取暖，要么奋起战斗！ - 但必须超越曾经。

□

[image]

https://x.com/DoubleDownNews/status/1854101883255701828

[image]
□

特朗普的2024总统任期对罗贾瓦意味着什么？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1月7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特朗普 罗贾瓦 美国大选 自治

[image] **编辑** MMartinez

一位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DAANES）生活多年的自治政府同志介绍了他们对特朗普第二次担任总统后与土耳其力量对比的简要分析。希望这能为那些担心特朗普会为土耳其第四轮入侵DAANES开绿灯的人提供一点有用的概览或研究起点。—— Organise

[image]

以下是选举后的简要分析，以防有人担心：

上一次埃尔多安通过在经济上威胁特朗普，成功地让美军暂时撤军，但由于政府其他部门的反对，他没能坚持超过几个月。现在他可能拥有同样的权力，可以再次采取同样的行动，但在局势有利于入侵之前，他不会想这么做。

“有利于”的情况意味着：

- 完成理清被占领土上的内讧，以便当地的代理人（çeta）可以执行占领任务；

- 结束在巴苏尔（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行动，以便特种部队可以使用；

- 解决巴库尔（土耳其占领的库尔德斯坦）和土耳其目前的内乱，以便能调用其余军队。

埃尔多安可能会暂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巴库尔，因为阻止当地民主是他的首要任务。力量对比也不同了。2019年时，他有一大批 çeta 部队可用作占领者和炮灰。作为注定失败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美国人还摧毁了我们沿边界的大部分防御工事。

现在，çeta的人已经四分五裂，消耗殆尽，很多人死于土耳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而友军已经建立了一个足够令人印象深刻的防御工事网络，其中许多工事需要高素质的部队才能清除。这意味着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速度会更慢，伤亡人数会更多，而且要为占领的土地付出更高的代价。

由于土耳其拥有制空权，我们很难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找到外交解决方案之前，以最小的地面损失拖住他们还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俄罗斯一直在寻求扩大其在当地的影响力，目前正为土耳其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忧心忡忡。

总之，事情的确比较糟，但还没到那一步，并且也不会像上次那样。

By Organise

https://prod-files-secure.s3.us-west-2.amazonaws.com/531add87-fc78-41ca-9a54-b203f8ee73fd/64d3bd3d-79fa-405b-b3b9-584cb65a3805/FILE_2024-11-09_171248.mp4

11月1日，数千人抬着科巴尼抵抗运动的圣火穿过苏黎世，纪念十年前科巴尼的解放。

由三十多个左翼组织组成的联盟联合呼吁举行这次示威活动。

科巴尼是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当时来自不同运动的人们前来这里参加游行，这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革命性的罗贾瓦项目是在废墟上逐步建立和扩大的。

土耳其法西斯国家最近的袭击表明，为罗贾瓦而战的艰苦历程仍在继续。

虽然罗贾瓦革命项目遭到各种势力的围剿，尤其不断受到来自大国的威胁，但它今天依然屹立不倒。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为争取罗贾瓦生存所需的空间做出贡献。

[image]
~~□

多数决定制是一种粗糙的算法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1月11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代议制 投票 民主 选举
[image]	编辑	MMartinez

[image]

多数决制是一种粗糙的算法。它是一种预测方式，我们使用这种方式预测走哪种路线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比如，当你想要决定看哪部文艺作品时，如果只根据多数/热门程度进行选择，看到糟糕作品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了解这一点的观众会参考多种维度的数据，如作品的评分、被观看次数、近期热度、其他人的评论等等。评测网站会打磨他们的算法，给予不同的指数以不同的权重。每家评测网站都有一套独特的排名算法来取得相对不错的结果，不错的结果是指对观众来说选择排名靠前的作品会可能有更高的概率获得良好的体验。

这些排名算法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哪个算法仅仅根据好评数来决定排名，因为这样只会让糟糕作品排在前面的概率更高。无论如何排名，都不会让每个人满意。在实际观看前，谁也不能确定你一定会喜欢。对观众来说，最有趣的作品不一定最受欢迎，但它应该最适合你。

在选择文艺作品时，我们收集的“投票”只是一种参考意见。我们根据意见选择要体验哪种作品。收集意见和选择是两个流程，但为什么在政治活动中，我们会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流程？这里究竟

是什么遮蔽了我们的思维和感知？

类似情况

在此，可举例另一种类似情况。

其实大多数职业者都持有两种技术，一种是职业者的专业技术，另一种是破坏系统的技术，前者让他服务他人，后者才能让他赚钱。破坏系统的技术通常形式是罢工或者拒绝为没付钱的人提供服务（可以说拒绝为没付钱的人服务是一种个人性质的罢工）。两种技术混合运用时，我们就是在通过劳作来筛选对我们的生存有利的人。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也提到这点，“我们因此可以说匠人之所以得到报酬，是从他们在运用了自己的特有的技术以外又运用了一种挣钱之术而得来的。”

我认为大卫格雷伯所抨击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是破坏系统的技术过度运用的结果。

大多数人都被教育，只要学得一门技术就可以挣钱，然而当他们真正实践后却发现，实际上挣钱之术是另外一种。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对这种挣钱之术的失望。

那么是什么原因令人们把服务他人的技术和破坏系统的技术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最后

当我们把投票切分为“收集意见”和“选择路线”两个流程时，也许就能可以获得更大的灵活度，可以使用比多数决制更高级的算法，也可以在选择路线时无视参考意见根据直觉去选。众所周知科学史上许多颠覆性的发现来自于少数人违背主流进行的探索。

把工作切分成专业技艺和破坏之术两部分，让我们有可能重组这些要素，构建更好的合作机制。

如果我们找到导致这两种感知遮蔽的原因，或许可以找到更多解锁新现实的方法。

□

[image]
💰

海外民运和狮子舞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1月20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中国 天安门广场起义 建制派 海外民运 统治 革命
[image] 编辑	MMartinez

我说“海外民运不行”只是在客观陈述

日前俄罗斯移民异议在柏林举行了反对俄罗斯政权的集会。据说大约有1500人参加了集会。我就想起早前看到的上面这篇帖子。

这类活动的表面意义只是为了证明赞助资金分配的合理性。而其实际价值基本为零。

在国内举行群众运动的意义在于动员群众支持并向当局施压。但把同样的形式搬到国外去的意义在哪呢？

在国外，建立并维持一个有能力的组织结构是有意义的 ，这样的结构可以在任何合适的时机登陆原籍国，展示自身及其创造的意义，从而迅速增加资源，并击败其他竞争性结构。

移民在这方面完全失败了。他们的绝大多数活动只证明了徒劳的和表演性的存在。

这种活动的水平跟跳狮子舞差不多。产出是零，但可以拍几张照片贴在网上收点赞。 这跟某些体制内的投机活动没什么区别 - 提出一个讨好元首的倡议，然后去党的库房里拿钱。经常有人说什么体制内体制外之别，如果你一直在做着跟体制一样的事，那你就是体制内。

移民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有人发动革命，然后感谢他们过去的功劳，派飞机把他们直接接到中央政府大楼里去 - "我们地大物博啊奴才济济，唯独缺个元首，赶紧来统治我们吧！"。你对这种五行缺爹的人群的兴趣在哪？

我并不是在纯吐槽。之所以还有槽可吐，是因为事情本可以不这样，可以不继续这样。我不知道IYP你们这个项目能对此带来多大改观，我对那些高高在上24小时静等朝拜的海外大佬们真的是零期待。希望有人跟我不同。

[image] [image] https://t.me/iyouport/13985

□

[image]

当冷战重来遇到民主危机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1月23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他者 民主 统治
[image] 编辑	MMartinez

“你一生的故事”基于语言学里一个挺傻的假说，于是其故事逻辑有待商讨。但是，它想要反应的议题是值得推荐的，那就是：为什么人类会不假思索地把“外来”的所有一切均视为侵略性的、危险的、卑劣的、别有用心的、必需被立刻阻止的……？

记得某次聚会上有一个倡导者说，“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一个包容彼此差异的系统，甚至包容这个词都不再需要存在，因为每个人都能理解共生的重要意义”。他说，目前几乎所有声称民主的运动都不过是在试图用自己的东西去取代/压制/打击其他所有人。

人类之间的所有争斗都是虚构的权力作祟。所谓的多元化、包容、反歧视等等，喊了几十年，一直被归为品德范畴/甚至政治正确，这正是为什么它们都只是花俏的烟雾，因为它们从未试图改变统治的权力机制。

生活是科学吗，如果是，那就必须遵循让思想和信息完全自由交流的科学精神，0摩擦0障碍。而不是把一切货币化，然后争夺，撕咬，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牺牲许多人的利益。

[image]

↪

大转型开启 - “中产阶级不行了”

[image] Publish Date	@2024年12月25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代议制 反法西斯 民主 法西斯 秩序 选举
[image] 编辑	MMartinez

+

[image]

中产阶级正在失去其在上层社会中的地位。显然旧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这意味着这个体系不再是静止的，而是开始动起来了。进入转型期。

事实上特朗普是试图减缓/阻止这一动向的人 - 而非令其赢得选举的“变革者”人设，他的支持者们早晚会知道这件事（或者已经知道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新鲜事，请记得，历史上的法西斯经常模仿左派运动的话术/叙事、甚至方法/形象，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如今依然有很多中国人搞不清楚所谓的极左极右。原因不只有法西斯的狡猾，也有历史上左派运动的糊涂和自我催眠，结果导致被法西斯残酷调戏（还记得德共的口号吗？-“先希特勒，后我们”。就是傻成这样的。这是仅举一例）

人们之所以押注特朗普 - 同样的自我催眠 - 是因为民主党没有能及时提供出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模式。

民主党和全球企业看起来热火朝天的监视资本主义经济/即数字经济只是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因为它既不能自给自足，也不可持续（在

此，信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反抗是部分成功的）；总体上讲，数字经济起到的是一个局势控制作用，也就是维稳，以争取时间，以便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并为过渡到稳定模型创造先决条件。

顺便说在这个逻辑上，特朗普也有一个 “等待时机”的解决方案，但其结构性明显很差，而且相当模糊，因此难以评估。

无论如何，旧世界确实即将终结，它已经完全耗尽了自己的资源；现在的问题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以及人类过渡到这种新状态的难度有多大。

最后，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是：对于建制派来说，这里所言之“人类”事实上只是全人类中的一小部分（没办法，他们就信任帝国力量平衡的那种秩序模式）；只有在没有等级制度概念的无政府主义者眼中，“人类”所指的永远都是全人类。

当然，转型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无法推测任何方向（别听那些骗流量的家伙的话，谨慎投资）。就目前而言，当前社会生活体系崩溃的迹象正在不断积累。与顶级寡头相比，中产阶级重要性的下降是最准确的标志之一。

□

[image]
†□

转帖：写在方济各之后，“三战”之前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4月26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基督教 战争 方济各 法西斯 自由主义
[image] **编辑**	[image]Evelyn Parker

[image]

教皇方济各经常被指责前后不一，尤其是在自由还是不自由的问题上。但那些指责他的人往往忘记了，他的前后不一就像生命本身的前后不一一样。既然他认为生命是上帝赐予的，那么他把自己的前后不一视为上帝的恩赐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些珍视自由、特别是热衷于自由主义的人是自私的；在这点上，他们与那些主张不自由的人和狂热分子非常相似。在这个世界到达悬崖边缘之前这一点并不明显。但是，一旦到了悬崖边，所有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多数 - 求生欲望让他们试图从悬崖边爬离开；另一部分是少数，他们不仅准备自己跳下去，还要把其他人也拉下去。

当然，毫无疑问，光明骑士们的战斗号角与黑暗骑士们的激动呐喊绝对是对立的。但是不得不说，欧洲是否能成为解决方案 - 而不是下一个因“比恶”而崛起的灾难 - 仅靠光明斗篷可不够用。

我们这些对MAGA深恶痛绝的人都应该意识到，MEGA（让欧洲再次伟大）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MAGA 旁边。在这种普遍的疯狂中，那些

准备为自由而跳进深渊的人和那些准备为不自由跳进深渊的人之间的界限将逐渐模糊。两者都会把那些不想跳进任何地方只想活下去的人作为自己信仰的人质。

当然，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在跳进任何地方。毕竟，自由行家和不自由行家都认为，深渊只是一种幻觉、是神话、是一种欺骗。一些人虔诚地相信疯子不敢用核弹，而另一些人则坚信西方已经腐朽，因此一定会屈服。“你只要更大胆地跳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不跳的不是爷们儿”。

在这种背景下，教皇方济各呼吁珍视生命 —— 不管政治立场是什么/自由还是不自由 —— 绝对不像看上去那么平庸。如果仔细想想，就会突然意识到，自由迷们所崇拜的价值观，绝大部分都是由那些生活在不自由环境中的人们创造的。他们本可以直接跳下去，死得漂亮，但那样就不会有类似《日瓦戈医生》等等经典了。如果每个人都决定为自由（或者为不自由）而死，那么不管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就全没有了。至少是所剩无几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中毫无疑问必须有这样一个重要结论得出，即：生命比自由主义或者民族自豪感或者任何意识形态衍生品都更有价值。这仅仅是因为生命是一切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在下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提醒那些呼吁人们为了啥啥更高的名义去送死的人：那些名义可能很高，值得仰慕，但并不比生命 —— 尤其是他人的生命 —— 更重要。 没有人有权为了他或她个人所理解的价值而无条件地处置他人的生命。

□

[image]

【转帖】恐怖作为统治手段…‘官不聊生’、社会暴力、事故频发的背后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8月4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中国 俄罗斯 原理 变革 战争 权力结构 统治
[image] 编辑	MMartinez

[image]

对于上图，还是用俄罗斯来举例，以减轻转载风险。

在俄罗斯，一直存在着某种真实的纽带，就像“传承”一样从一种制度延续到另一种制度保持不变。这里说的并非虚幻的所谓“传统价值观”，后者的解释会根据新的指令而随机变化，全凭一张嘴。相关例子太多了，这一术语被权势所操纵，它可以非常灵活，于是在此并不重要。什么“国民性”都是屁。

这里所言之“真实纽带”，指的是通过继承传递的纽带，指的是官僚机构与武力阶层在权力结构中的利益平衡。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总是存在冲突，因此，当利益天平朝向其中一方倾斜时，就必然会引发与另一方的冲突，并积累越来越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点在危机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在社会灾难全面爆发时，它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简言，只要还有统治存在，这一纽带就会继续传承，跟政治体制是啥并无关系。

武力阶层总是通过收紧内外政策来寻求摆脱灾难的出路，甚至不惜诉诸全面而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或战争。1905年失败起义之后就是如此，苏联解体前也是如此，目前也正在出现同样的情况 —— 国内恐怖主义的程度已达到临界点，同时正在进行全面的外部战争。

相反，官僚机构认为，摆脱灾难的出路在于放松管制和软化体制。请注意，这跟“人道主义精神”一点边都不沾，仅仅是因为自由化能提供回旋余地和妥协空间。决策空间得以扩大，甚至达到此前难以想象的程度，以稳固权力结构。对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尼古拉二世的十月十七日宣言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化的受益者都是官僚阶层，而且官僚阶层几乎把改革利用到了极致 —— 导致苏联解体，被全世界描述为巨变，但事实上他们借此掌控了国家主权，以及附带的好处 - 将本应属于全民的财产塞进自家腰包了。随后，当然，武力阶层进行了报复，其后果现在每个人都能看见。

总之，现在这个国家正面临同样的选择。灾难状态已经到来。根据灾难的定义，维持现行体制是不可能的，已经很少有人在这一点上抱什么幻想了。就连普京自己也是如此。他2020年1月15日的演讲以及试图（但极不成功）启动权力转移和彻底重组整个权力垂直体系的尝试，恰恰是（尽管听起来奇怪）朝着自由化方向的举措。其结果本应出现某种“开明”专制（甚至可能是世袭的），最重要的是让武力阶层和官僚阶层之间的平衡得以恢复。这需要对臭名昭著的“垂直”权力结构进行重大改造。如果能完成，将在实际上标志着前一政权在“相对可控的”计划框架内走向终结。然而，它并没能实现。具体原因很难讲，但有两个主要因素相叠加的状态是明显的：外部因素是“疫情”，内部因素是武力阶层在权力转移中看到了对其统治的真正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新冠在俄甚至得到了支持。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迅速大封锁。

乌战已经巩固了武力阶层的地位，并通过全面恐怖的方案来应对迫在眉睫的灾难。该方案目前仍在实施。

恐怖手段作为统治工具的缺陷总体上显而易见：它是有限的。事实上，恐怖手段只是在压缩社会，而由于这是一个无法停止的系统，因此无限压缩也是不可能的：当恐怖达到临界参数时，系统就会进入亚稳态，任何先前微不足道的因素都将导致其以最自然的情景发生连锁崩溃。例如，波多尔斯克处于瘫痪状态的供暖系统，或新西伯利亚供暖系统中反复发生的局部灾难，都导致（并将继续导致）管网各环节在单一事故中崩溃。这种情况如今每个冬天都在发生。

至于社会系统何时会发生同样的连锁崩溃，无法断言，但这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想想委内瑞拉，那只是所有崩溃方式的一种。

如上图，总之，恐怖统治是有限的，但由于恐怖统治的崩溃导致国家崩溃将具有完全的自然性，于是这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后果。逻辑上讲，官僚机构会试图通过接管管理权并转向更自由派的模式来解决问题，不过，在当前国家的状况下，这种模式也无法带来什么好结果。除了，这种模式可能让目前被恐怖状况压得喘不过气的地区官僚集团参与进来，也就是说，至少出现了一个小机会窗口。但还是那句话：能准确使用才是“机会”，否则就无效。

该国目前已到达或即将到达一个抉择点：是继续恐怖统治，无论对政权本身构成何种威胁和后果，还是将管理模式朝着更自由化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模式只是虚幻的，但至少还有机会将灾难转向不那么极端的状态。武力阶层当然坚决反对，因为首先， 他们正在趁机积极重新分配财产（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样，他们在恐怖统治期间几乎占领了伊朗经济中资源最丰富的40%），而且安全考虑也显而易见：改变政策意味着要找出导致旧模式崩溃的罪魁祸首。没有人愿意背所有锅，因此对任何放松管制措施的抵抗都将极为激烈。

最后，对于灾难性过程来说有一个公理：灾难中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只有在糟糕和非常糟糕之间做出选择。想要有回旋余地的话，首先就是尽可能避免进入这样的局面。一些国人对局势的想象是错误的。

[image]
[image]

关于“民主”，美俄中，内战，和未来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11月4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代议制 内战 反法西斯 反统治 国家 地缘政治 无政府主义 普京 权力 民主 直接民主 美俄中 美国 颠覆

[image] 编辑 MMartinez

> 无政府状态并非关乎未来，而是关乎当下。它并非关乎提出诉求，而是关乎如何生活。
> —— 古斯塔夫·兰道尔

- Table of Content

  1
  2
  3
  4
  5
  6
  7

[image]

借此重申几个点，都是眼下的重点（和重点错误）。

1

对美国，这一年多来我没有预测过内战，相反多次反驳其他人对内战的设想 - 尤其是在法西斯和布尔什维克两级逐渐形成之后舆论环境中这一设想更为突出了。见下图1。

[image] 图1

说实话这个局面让我也有点心怯，因为理论上，内战对掌握行政权力但没有系统整体控制权的特朗普来说是一个趁手的兵器。

但现在我依然不预测内战。事实上的状况可能比内战更令人焦虑 —— 华盛顿现在享受着右翼的政治洗发水和左翼的护发素倒进同一个民主瓶子里的效果。这意味着一个落陷。

2

下面标注，是去年这个时候大选开票的时候写下的。主要是为提醒为变革做准备（而不是为复辟做准备！因为预测到了复辟的蠢蠢欲动）。遗憾的是，这一年多来可见之处大部人都被主导复辟的思想所牵制（至少是影响着）。这是一种反动的懒惰，也许不久后就会吃到真正的亏。

[image]

返回：[image]转帖：反动时代远大于“特朗普时代”

其实也不能埋冤大家，至少复辟的势力这些年来一直在致力于掐灭任何“第三种可能性”的想象力和实践，以至于已经有的方案、甚至已经开始实验的项目，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当你不知道替代品什么样的时候，守旧就是最踏实的选择对吧（或者说没有选择）。

3

没有联盟 —— 美中俄统治者的确有很多共同点，但共同点并不意味

着可以同盟。

美中俄不存在联盟（至少目前到几年后都不。再将来的可能性也很低～想象一下即便“俩西方”系统真正成型，中俄会如何？见下图2）。

[image] 图2

目前的“联盟”修辞是复辟势力操弄的。美中俄是互相利用互相防备互相竞争的关系，没有任何东西超出我们这十五年来使用的“高堡奇人”描述。

尤其是！必需要知道，并不是“反民主”，它们都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 —— 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民主“阶段”，后面再细说 —— 而不是“反”。事实上如果能真正出现“反”的话，才有机会 - 可以借势，所谓不破不立。也是为什么这个修辞话术引起的是令人尴尬的沉默。

[image]

重点强调：对于想要推动中国借力变革的人们来说，真正好的方法是加入反法西斯全球联盟，而不是押注三战。因为后者有太多你我无法掌控的部分以及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把赌注放在你没有控制权的东西上，至少不能全放！

4

汤因比曾经写道，历史进化（就像个人发展一样）遵循一种出发和回归的模式，其中每次飞跃之前都伴随着一种落陷。如果这种现象没有消亡，它就会重新出现 —— 通常以一种几乎无法辨认的形式。我怀疑这完全适用于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所熟知的所有政治民主。在今天的民主状态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都表明它已经准备好“离开”了。

结果会如何，现在还不好说。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绝大多数因素并不可见。（小心那些给出确定性答案的人）。

尤其，重点问题是：还有多少时间。

如果没有时间限制，那么政治万花筒的无休止的重新排列迟早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稳定的“民主”结构 —— 一个可能再持续几个世纪的结构。当然，那不会是回到过去，绝不会，而是一种全新的“民主”——一种解决摧毁旧的代议制民主的挑战的新“民主”。

请注意！这里的“新”并不确定更好，也是为什么要倡议《超越民主》，而不是“修补民主”。以便让“新”靠拢解放斗争战略。

这是一个赌注。

对此，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历史不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如果在进化有机会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东西来取代旧东西之前，左右两级的疯子都在设法推动自杀，那就……

[image]

返回：极右翼、左翼，和选举政治陷阱 - 终结新纳粹时代的路经

5

再一次，至少直到今天，我依然不预测美国内战，而是创造一个新词：冷内战。

见下图，是去年底的解释。俄罗斯经历了同样的事 —— 美俄冷内战有着相同的触发因素。
这只是处于演变的早期阶段。

[image] 图3

除非美国政治体系内部某些深层的、内置的安全制动器爆发式启动，否则情况很可能不会就此停止。它将走得更远 —— 沿着俄罗斯已经走过的路走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那场枪杀后东欧的无政府主义者立刻动员起义，甚至可以说“热”内战，因为那是一个机会窗口，否则，极有可能俄罗斯化。热内战的结果并不确定（正因为这个不确定，当时的倡议响应不足），但如果不能，只会更糟。

6

再再次强调：一直以来绝大多数人嘴里喊出的“民主”，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人民自治。

[image]

返回：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lr--5ae

这是一种精心调校的机制，精英阶层通过民间社会结构得以巩固，并在整个社会的监督下治理政治国家。正如卡尔·施密特所指出的，没有哪个稳定的民主制度是纯粹民主的；它总是结合了民主、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元素 —— 而正是这种平衡赋予了它持久性。

而当下大众传播技术现在 正在破坏的正是这种微妙的平衡 —— 将曾经的三维系统扁平化为二维，仅由两点定义：领导者和群众。随着体系向内崩溃，政治精英被挤出 —— 就像碾平了的牙膏管那样。

俄罗斯已进入这一进程的最后阶段。美国现在正徘徊在起跑线上，但进程遵循着相同的模式。

7

下一个“民主”的发展不是出于当今的需要，而是出于克服威权主义遗产的需要。

再次强调：如果谁真想让中国赶上这一变革浪潮，那就忘了民族和国家先。让构想期待的战略目标指路。见下面。

[image]

返回：

[image]

冲破中产改良主义幻觉，走进变革时代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12月18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中产阶级 代议制 公民社会 反统治 改良 无政府主义 权力 自由派 身份政治 革命
[image] 编辑	ssaosaowu

这场危机非但没能深化社会分化、没能揭露压迫的根源问题、更没有催生要求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反而导致这些矛盾被掩饰和隐藏，从而催生并发展出一种虚假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远没能挑战统治体系，反而强化并支撑着统治体系：这场危机停滞于中途 ……

经济跟政治相辅相成这是基本事实。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果是：真正的政治本质上必须是经济的 —— 市场经济必然对应着市场政治；支配世界市场的权力，在外交与内政领域对国家实行着事实上的控制，这种控制同时存在于地方和国家层面。

事实正是如此：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政治稳定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政党制度随发展进程演变。当发展高速推进的时候，政治往往呈现两党形态 - 一个在位一个在野，甭管它承不承认都是如此；而当发展停滞的时候，政治格局就会趋于多元化，就好像这

里面有某种稳态机制在起作用。

资本，作为一种最初建立在剥削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如今已经完全覆盖了人类的所有活动，从吃喝拉撒到爱恨情仇，而且还渗透到了所有领域：文化、科学、艺术、日常生活、休闲、政治…… 人类社会的所有角落都被商品化了，从人心到牙膏、从生理到情感，一切明码标价皆可交易 —— 这一事实意味着，生活本身的所有方面都遵循商业标准运作，或者说，一切都受资本主义逻辑支配。

在具有此类特征的市场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经典意义上的阶级（相互对立的独立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同质化的且可塑性很强的群体 —— 资本阶级（资产阶级）的界限不再清晰，其意识形态已经普遍化，其价值观开始超越阶级差异地“规范”所有行为。

[image]

这种模糊阶级界限的特殊形式，绝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消减；恰恰相反，社会不平等反而更加凸显了，但矛盾的是，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却愈发模糊，结果导致，真正的斗争性被大幅减弱。

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至“非”资产阶级群体（我称之为“心理资产阶级”），从而消解了激进变革的诉求。

没有工人阶级了，变成了工薪阶层“小老板”，工薪阶层不再渴求其他生活方式或社会形态，至多只期望在现有社会体系中获得更“好一点”的地位 —— 请注意：这仅仅意味着更强的购买力！

暴力对抗被边缘化了：当今最尖锐的矛盾根源于排斥而非剥夺。社会剧场乃至历史的主角，已经不再是市场中的被剥削者，而是那些被市场驱逐的或主动脱离市场的人群 ——那些游离于"体系"之外的、且往往采取破坏性行动的群体。

大众社会是一个标准化的却极具等级制度的社会。其“统治阶层”并非由所有者或食利者构成，而是由构成真正“管理阶层”的执行者占据。决策权集中于社会等级的顶层；压迫则主要以不稳定就业和排斥的形式存在，并针对社会等级的底层肆虐。

[image]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5-9e6?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中间阶层既感受不到压迫的刺痛，也不关心此事，他们只是默许！但那是风平浪静之时。

而在经济危机时期，压迫现象就会沿着社会阶梯向上蔓延，将中间阶层一同拖入深渊。

[image]

延伸：↪大转型开启 - “中产阶级不行了”

这些通常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群体，按理说，由此便可以从麻木状态中觉醒过来了 ——请注意，政党体系正是建立在这种麻木之上的。

中产阶级开始渗透社会运动，并通过组建新的联盟和政党展开政治行动。

敲黑板：请注意，这些政治行动的目标显然并非解放无产阶级！也并不是建立自由生产者组成的自由社会 —— 事实上其目的非常非常世俗：他们唯一想要实现的，仅仅是拯救中产阶级本身，即，阻止其沦为无产阶级。

[image] [image]

资本主义的地理和社会扩张，伴随着工资劳动者阶层的扩大—— 这跟生产过程的合理化、经济中三级产业的发展、公共生活的专业化、以及官僚体制的国家化，密切相关：政府官员、顾问、专家、技术人员、白领管理人员、记者、自由职业者等。

🚫

他们的地位源于学术训练，而非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古典社民主义将这些新兴"中产阶级"视为稳定因素，认为其为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提供了可能；随着这些阶层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进程得以在相对顺畅的状态下最大化推进。

学生人数的指数级增长是其繁荣的最有力证明；而大学毕业生失业的现象则昭示了其教育价值的贬损，因而成为其骤然“无产阶级化”的指标。

中产阶级的应对策略自然不具反资本主义特征——这跟他们的本质格格不入—— 而是，体现在对政治格局的温和修正上，同时对过去的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保持着炽热的依恋。

[image]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b8d?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处于现代虚假意识的核心，却不曾审视自身特有的处境；他们一直以为这种处境具有“普世性”。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视角观察一切，而危机更使这种倾向加剧。

就其心态而言，就是“人人皆中产”，必须使用思想家们（奈格里、葛兰西、福柯、德勒兹、德里达、鲍德里亚、墨菲等）为其预制好的语言表达自我。至于其政治立场，那就是“人人皆公民” —— 即选举政治工具/选民共同体的一部分 —— 必须热忱参与选举及动员选民的技术机制：既是后现代意识形态的愚昧，也是技术装备下的戴仨表式愚昧。

主要问题在于，其世界观导致支持者无法将社会冲突理解为阶级冲突；在他们看来，此类冲突源于资产分配失当，于是他们认为解决之道“掌握在国家手中”，因而取决于最能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阵营能否建立政治霸权。

中产阶级在反对派中重塑其政治身份，其反对对象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种姓" —— 即 将国家视为私有财产的政治寡头集团。而其他腐

败阶层，如银行家、开发商和资本家等等，则退居次要地位。

[image]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91a?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中产阶级是充满恐惧的阶级；恐惧驱使他们行动；野心或虚荣心经常与自信和安逸并存。其阶级热情完全耗尽在代议制中了；选举斗争是他们唯一考虑发动的战役，因为其计划中不存在与恐惧根源——即权力——正面交锋的空间。

[image]

延伸：由此，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对手将是自由派公众，他们毫无疑问会照搬代议制模式。我们可以通过倡导示范的工作和广泛讨论/辩论来接触彼此，以实现互相理解。比如我们这个互助学习项目，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倡导模板。显然这项工作必须由无政府主义者在当地倡导工作中形成的舆论领袖来对抗自由派公众，这也是个人自治战术的结果，活动家们通过个人的解放行动来扩大支持者的队伍 —— 再一次，示范而非说教，这样形成的结构不容易脆弱。

[image]

“公民身份”的概念在资本摧毁工人阶级社区的同一个地方提供了替代性的身份认同。

公民身份是公民的品质，即拥有投票权的个体，其敌人显然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国家！！而是那些老牌多数党派 —— 这些阻碍着举步维艰的中产阶级向国家机构进军的最大障碍。

然而，作为遭受全球市场压迫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公民社会的理论并不是斯大林式工人主义的变体，而是后现代版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因此就成了社会倒退的“先锋”。它甚至不愿意仅仅为了维护公共人设而表演式地认同反资本主义 —— 它视其为“过时观念”—— 相反，他们更倾向于拥抱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社会自由主义。

这是因为公民社会意识形态的症结在于中产阶级的衰落及其真实诉求的消解 —— 尽管它可能借助面临排斥风险却迷失方向而无法自主行动的群众的支持，以及那些力量薄弱到无法推动公民社会在经济跟国家之外进行重构的社会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新”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和传人，尽管怀揣着受挫的领导欲望和自卑情结，却依然顽强存续 —— 它保留着自身某些威权主义的怪癖，并且借助各种符号来确立身份认同。这就是身份政治暴涨的根本原因。

“公民社会”纲领是暴发户的纲领：它极具弹性。原则无关紧要；其策略是自觉的投机主义，因为，尽管它几乎利用了所有失业的政治投机者，但其队伍主要还是由政治舞台上的新晋投机分子组成，那些人只提出短期的目标。

[image]

没有任何“公民社会“项目会主张生活资料的社会化，他们绝不会主张普遍的自决，也不会支持政治专业化的废除，更没有委员会管理、共同体所有制或人口在土地上的均衡分布。公民社会政党与联盟仅仅仅仅主张重新分配"财富"以扩大中产阶级基础，即：通过特定制度性预算分配来缓解劳动的不稳定性，并吸纳多数失业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这些意图绝不构成与过去决裂的威胁！它只是纯粹的改良。

他们甚至从一开始就不会以敌对姿态进入政治舞台。这意味着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跟其中某些政党达成交易。他们深知，一旦组织结构稳固且在媒体领域拥有足够的影响力，下一步就是以比以往更清晰高效的方式管理现有体制。

事实上他们对维稳具有高度热情。他们不赞成任何破坏秩序稳定的措施，因为公民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必须“证明”，如果由他们掌舵国家这艘巨轮，经济将更平稳地发展。

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经济救赎的希望，因此其发展蓝图将“进步”仅仅等同于生产力 —— 本质上是发展主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主张通过工业与技术增长来创造就业、重新分配收入并增加出口——

无论这需要通过税改实现，还是依靠对地域资源的密集开发。

[image]

这些方案至少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将缺乏社会价值，

无法满足真实需求。

经济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并与他们的政治现实主义相辅相成：

政治之外别无他物，市场之外别无他物！

——一切都在为市场服务。

[image]

公民社会运动的相对高涨 —— 包括其国家民族主义的变体 —— 事实上表明了经济危机的相对加剧。

这场危机非但没能深化社会分化、没能揭露压迫的根源问题、更没有催生要求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反而导致这些矛盾被掩饰和隐藏，从而催生并发展出一种虚假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远没能挑战统治体系，反而强化并支撑着统治体系：这场危机停滞于中途。

[image]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095?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延伸：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6f0?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然而，社会压迫和异化根深蒂固，长远来看，它是无法伪装成政治问

题的，终将作为社会问题浮现（可能是爆炸式的浮现）。

[image]

[image]

社会问题的爆发取决于真实社会斗争的回归 —— 这种斗争跟媒介和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源于最底层群众的自发行动。

这些群体如果决心斩断跟中产阶级的羁绊，抛弃资产阶级对自然的偏见，

就能几乎无所顾忌。

然而当下，这些潜在的革命力量似乎疲惫不堪，丧失了自主组织的能力。正因此，改良主义的“公民社会”运动在其阵营中肆意蔓延，不断叩响既有体制的大门，乞求准许其入内。且真的被不断收编。

如果说激进左翼在选票箱子里的抬头有任何正面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似乎让更多人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形成脉络，顺利的话，一些真正的抵抗会在几年内蓬勃发展出来。

请尽快前走一步，做好准备。

[image]

□

[image]

细胞总是知道...

[image] Publish Date	@2026年1月12日
[image] Category	Category 4 读者反馈精选
[image] 标签	化学 反统治 国家 无政府主义 民主 社会学
[image] 编辑	[image]Evelyn Parker

[image]

陈尚书指出康熙算错了账：「朝廷养吴三桂只要花一个银子，但防吴三桂却要花两个银子」。如果你还记得这句台词及其故事背景，就不难看懂上图中这篇论文的关键部分。哪怕你跟我一样并不是化学科学的专业人士。在化学的角度上我绝对不敢说“完全理解”这篇论文，但我可以看到，其中至少一部分信息与我的社会学政治学知识遥相呼应了。

下面简单说说。

如你所知，生命体都是细胞组成的。用细胞的生命抉择理解和预测社会是常见方法。不过这篇论文指出的问题带有陈尚书的洞见 —— 它研究的是细胞内代谢所消耗的能量，或者换句话说，细胞生存和自我复制所需的有益反应所消耗的能量，作者就像陈尚书一样指出很多人算错了账，即只计算了“已发生的事情”所消耗的能量成本，而忘记了计算“没有发生的事情”所消耗的能量成本。

这需要解释一下。

一个细胞包含数量庞大的分子，理论上分子们彼此间可以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异口同声

地）倾向于一种方式 —— 就是研究者实际观察到的那种方式。这意味着有某种因素阻碍了它们实现其他的方案。

妈妈咪鸭说拉屎要努力，它忘了说，憋屎也要努力。

也就是说，“阻止某些方案的实现” 也需要消耗能量，需要“努力”才能阻止某些事情发生。这意味着，除了服务于已经实现方案的成本之外，阻止其他方案的实现还存在隐性成本。

在正常状态下，对细胞而言，避免对抗其他方案、不强迫进化走上特定路径，是最有利的。换句话说，对细胞这一生命的基本单位来说，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状态是最有利的形式。因为这样所需的努力最少。

那么，为什么细胞会偏偏选择某条高度专业化的、需要很大能量消耗的路径呢？论文作者认为，这一切都与催化剂有关。催化剂简化了某些过程，使某些反应比同时同期的自由态扩散效应更有“优势”。

现在把眼界放开。

对于社会而言，正如对于细胞而言一样，在缺乏“社会催化剂”指引其他能量消耗较低的方案的情况下，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状态是能量利用率最高的行为方案。这就是为什么说不论人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都不会真正“掘弃”自由意志主义，它只能被压制，无法被废除。

它会在任何一个可能的条件下瞬间爆发出来。

那么“催化剂”是什么？- 应该是制度。制度本质上是专门的行为准则，它们触发社会沿着特定的路径发展，并切断（至少是限制住了）所有其他的选择 - 包括理论上最优的选择。这个结论显而易见。但这里真正重要的理解是，制度是社会中一种资源消耗极大的运作机制。正如细胞所示，限制社会沿着其他路径发展是有代价的 - 在契丹它被泛称为“维稳费”。有点过泛了以至于不够准确。

so 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意味着，制度对社会的价值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只有当制度运作（即遵循相应规程）带来的“效益”明显超过防止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状态所需的能量消耗时，社会才会选择制度化发展的道路。

这个可能的结论有利弊两面，根据你我的政治立场不同可能利弊完全相反。请自便。

……

本帖主要想给下图这篇旧文添点儿信心 BACK [image]总体民主议程：那些不能对自由派让步的东西

我们作为“本能”的信心。关于为什么说“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状态才是人之本能”，至少相比之下我们不是最应该焦虑的那部分人，争权夺利的改良派们才是。

[image]

[image]
[image]

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 of Posts**	16
[image]	**Posts**	[image]你反对的是统治本身还是某个独裁者？你厌恶的是独裁行为还是被"谁"采取的独裁行为？, [image]关于AI, 为什么技术有利于暴政？ —— 一场你必须参与的政治斗争, [image]无形的极权主义, [image]剥削压迫、血汗工厂、强迫劳动、生态破坏 …… 高科技背后的现代奴隶制, 不要坐以待毙！您可以做这八件事来阻止ICE, 第一次妥协就是最后一次妥协, 极右翼、左翼，和选举政治陷阱 - 终结新纳粹时代的路经, , 不要无所作为，不要等待 - 犹太无政府主义者介绍反法西斯经验, 其实，冲在前面才安全:采取攻势反暴政, [image]新法西斯时代，警惕实用主义者的"存在即真理", 从旧时代的灰烬中破土而出 - 反革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重生, 回复：关于关税（贸易战）- 粉黑纠缠蒙蔽了整个反动时代, 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 美国的权威和美式民主, [image]冲破数字时代的性压抑 - 七夕2025：面对新法西斯世界，唤醒身体
[image]	说明	这里是本项目一期工程的新增栏目，将从理论原理和战术技巧等多方面讲述这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战斗如何与您密切相关：尤其是，

您可以借助的机会和使用的武器。这场战斗对中美两国至关重要，且只对这两国最重要；正如华语朋友在我们年初动员期间的讨论中所提到的；「这个世界的秩序正在变成两个法西斯之间的对峙、平衡、协调和合作，……华人Antifa的崛起将成为我们翻身的起点。」

希望本栏目能有助于更多华语地区的进步人士补充洞察力，并提升战斗力。

（本项目未来还将有一个单独讨论战术问题的专题站点，而将要收录在本栏目中的战术原理会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该栏目才刚开启，后续将有更多重要内容进入。也许进程不会很快。如果您准备复制本数据库，可晚些再操作。

[image]
⛓️

为什么技术有利于暴政？— — 一场你必须参与的政治斗争

[image] Publish Date	@2018年11月17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I BigTech 反抗 技术 民主 自由主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在古代，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因此政治就是控制土地的斗争。在现代，机器和工厂变得比土地更重要，因此，政治斗争的重点是控制这些重要的生产方式。而在21世纪，数据是比土地和机械都更为重要的资产，因此，政治将是控制数据流动的斗争……

- Table of Content
  一个新的无用的阶级？
  数字独裁统治的兴起
  权力的机器化转移
  那我们该怎么办？

支持者经常用这样的话来鼓励自己，说“民主是为满足以人为本、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民主没有什么“不可避免”的。尽管民主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取得了所有成功，但如果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们仍然只是昙花一现。君主制、寡头政治和其他形式的专制统

治，依旧是人类治理的常见模式。

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与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种理想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这些理想比我们所认为的要脆弱得多。他们在20世纪的成功取决于可能被证明是短暂的独特技术条件。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自由主义开始衰落。关于自由民主是否真的能为中产阶级提供能力的怀疑越来越大; 政治变得更加部落化;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其领导人表现出对蛊惑人心手段和专制的偏爱。这种政治转变的原因很复杂，但它们似乎与当前的技术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

支持民主的技术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所谓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可能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信息技术正在继续飞跃; 生物技术开始为我们的内心生活提供一扇窗户—— 我们的情感、思想和选择。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将共同造成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动荡，侵蚀人类的机构，并可能颠覆人类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变得“过时”。

普通人可能不会详细了解所谓的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但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未来。1938 年，普通人在苏联、德国或美国的状况可能是非常严峻的，但他经常被告知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是未来（当然，他必须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犹太人或一个女人。是的，那个时代的歧视问题比如今更严重）。他看着宣传海报—通常以英雄姿态描绘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并看到自己出现在那里：“我在那张海报上！我是未来的英雄！“

在 2018 年，普通人感到自己越来越无关紧要。许多神秘的术语在 ted Talks、政府智囊团和高科技会议上兴奋起来—— 全球化、区块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普通人，无论男女，都可能怀疑这些术语完全与他们自己有关。

在 20 世纪，群众反抗剥削，并试图将其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转化为

政治权利；现在，群众担心的是被无关紧要，他们疯狂地想要利用自己仅存的政治权利，但为时已晚。也许在 21 世纪，民粹主义的起义不再是针对一个剥削人民的经济精英，而是针对一个不再需要他们的经济精英。这可能是一场失败的战斗。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革命仍处于起步阶段，它们对当前自由主义危机的负责程度值得商榷。伯明翰、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和孟买的大多数人，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兴起及其对生活的潜在影响。然而，毫无疑问，现在正在积聚动力的技术革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面对人类所面临的最艰难的考验。

[image]

一个新的无用的阶级？

让我们从工作和收入开始，因为无论自由民主的哲学诉求如何，它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实际优势：在政治和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的分散决策方法允许自由民主国家超越其他国家，为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富裕。

自由主义通过向每个人承诺更大的一块馅饼来实现和解。随着不断增大的馅饼，这是可能的。馅饼可能会继续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可能无法解决如今由技术破坏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因为这种增长恰恰是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迅速膨胀的颠覆性技术发明。

当然，人们对将自己赶出就业市场的恐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这种担心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人工智能与旧机器可不同。过去，机器主要以手工技能方面与人类竞争；现在，他们开始在认知技能方面与我们竞争。还有任何第三种技能吗？如何让人类始终拥有优势？

至少再过几十年，随着计算机接管更多的常规认知工作，人类的新创造性工作也将继续出现。这些新工作中的许多可能取决于合作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工智能团队可能不仅对人类有优势，而且对自己的计算机也有优势。

然而，大多数新工作可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独创性，因此可能无法解决失业的非熟练劳动者或只能以极低工资就业的工人的问题。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水平不断提高，即使是需要高智商和创造力的工作也可能会逐渐消失。国际象棋世界是事物可能走向何方的一个例子。在 IBM 的计算机 Deep Blue 在 1997 年击败国际象棋高手加里卡斯帕罗夫之后的几年里，人类象棋选手仍然蓬勃发展; AI 被用来训练人类神童，由人类和计算机组成的团队被证明更具优势。

然而近年来，计算机已经变得如此擅长下棋，以至于他们的人类合作者已经失去了价值，并且可能很快变得完全无关紧要。2017 年12月6日，Google 的 AlphaZero 计划击败了 Stockfish 8 计划，实现了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16 年，Stockfish 8 赢得了世界计算机国际象棋冠军。它可以获得数百年来人类在国际象棋方面积累的经验，以及数十年的计算机经验。

相比之下，AlphaZero 没有被人类创造者教授任何国际象棋策略，相反，它使用最新的机器学习原则通过对抗自身来教会自己国际象棋。由于没有从任何人类身上学到任何东西，因此它的许多获胜动作和策略似乎都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它们可以被描述为创意，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天才的话。

[image]

你能猜到 AlphaZero 从头开始学习国际象棋、准备与 Stockfish 8 的比赛，并发展其天才本能，花了多长时间吗？四个小时！

要知道几个世纪以来，国际象棋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荣耀之一。AlphaZero 在四小时内就从完全无知到创造性掌握，而且没有任何人类指南的帮助。

AlphaZero 并不是唯一富有想象力的软件。今天在国际象棋锦标赛中捉骗子的方法之一就是监控玩家展示的原创性水平。如果他们发挥了特别创造性的举动，评委们通常就会怀疑它不可能是人类的举动，而是一台机器。至少在国际象棋中，创造力已经被认为是计算机而不是人类的商标了！

今天在国际象棋中人类 AI 团队发生的事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在警察部

门、医学界、银行和许多其他领域的人工智能团队中。

更重要的是，AI 享有独特的非人类能力，这使人工智能与人类工作者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大，而不仅仅是程度。**AI** 拥有的两个特别重要的非人类能力是连通性和可更新性。

例如，许多驾驶员不熟悉道路上所有不断变化的交通规则，他们经常违反这些规定。此外，由于每个驾驶员都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当两辆车接近同一个交叉路口时，驾驶员有时会误会彼此的意图并因此发生碰撞。相比之下，自动驾驶汽车将了解所有交通规则，并且不会故意违反规则，并且它们都可以相互连接，能更清楚彼此的意图。当两个这样的车辆接近同一个交叉点时，它们实际上并不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单个算法的一部分。

同样，世界卫生组织可以确定一种新的疾病，或者一个实验室可以生产一种新药，但是他们不能立即更新世界上所有人类医生。然而，即使你在全世界拥有数十亿的 AI 医生—每个 AI 都在监测一个人类的健康状况—你仍然可以在瞬间更新他们所有，并且它们之间都可以就最新的发现相互沟通。连接和可更新性的这些潜在优势非常巨大，至少在某些工作中，用计算机替换所有人类可能是有意义的，即使一些人类医生仍然比机器做得更好。

> 可能使数十亿人类在经济上变得无关紧要的相同技术
> 也同时使人类更容易被监控

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自动化革命不会包含单一的分水岭事件，比如之后就业市场将进入一些新的均衡。相反，它将是一连串更大的破坏。旧工作将会消失，新工作岗位将会出现，但新工作岗位也将迅速改变并消失。人们需要重新训练并重塑自己，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

正如 20 世纪政府为年轻人建立了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在 21 世纪，他们需要为成年人建立大规模的“再教育”制度。但这真的够吗？改变始终是压力，21 世纪初的繁忙世界已经产生了压力的全球性流行。随着工作波动性的增加，人们真的能够应对吗？到了 2050 年，可能会出现一个无用的阶级，他们不仅是因为缺乏工作或缺乏相关的教

育，而且还缺乏足够的精神耐力来继续学习新技能。

[image]

数字独裁统治的兴起

由于许多人类失去了经济价值，他们也很可能因此失去政治权利。可能使数十亿人类在经济上变得无关紧要的相同技术也同时使人类更容易被监控。

AI 吓坏了很多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它会保持顺从。科幻小说充分发挥了计算机或机器人发展意识的可能性—此后不久将尝试杀死所有人类。但没有特别的理由相信 AI 会随着它变得更加智能而发展出意识。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反对恐惧 AI，因为它可能总是服从它的人类主人，永远不会反叛。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和武器，不像人类开发的任何其他武器; 它几乎肯定会让已经强大的人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权力。指出这点的人就是最有可能获得权力的人类。

考虑监视。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很多民主国家，正忙于建立前所未有的监视系统。例如，以色列，就是监视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并在被占领的西岸创建了一个全面监视制度的工作原型。

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打电话、在 Facebook 上发布内容、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旅行时，他们很可能就会受到以色列的麦克风、相机、无人机或间谍软件的监控。

算法分析收集的数据，帮助以色列安全部队查明并消除他们认为是“潜在威胁”的任何东西。巴勒斯坦人可以管理西岸的一些城镇和村庄，但是以色列人掌控着天空、电视广播和网络空间。因此，要想有效地控制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大约 250 万巴勒斯坦人，所需要的以色列士兵可以很少。

- 延伸阅读：在这里看到全球监视审查最全面的报告《数字威权主义的起: 灾年之畔》

在 2017 年10月的一次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劳工在他的私人 Facebook 账户上张贴了他自己在工作场所的照片，上面有一台推土机，并写着："早上好！"

然而，Facebook 翻译算法在音译阿拉伯字母时出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小错误"。算法将这些字母识别为 Ydbachhum（意思是"伤害他们"），而不是 Ysabechhum（意思是"早上好"）。

以色列安全部队怀疑这名男子可能是一名打算使用推土机将人送过来的"恐怖分子"，并迅速逮捕了他。在他们意识到算法出错之后，他们释放了他。即便如此，被认为"违规"的 Facebook 帖子也被删除了—— 是的，你永远不会因为小心翼翼而避免灾祸。

并且，要知道，巴勒斯坦人今天在西岸所经历的事可能只是数十亿人类最终将在全球经历的灾难的一个原始预览版。

例如，你可以想象一下，朝鲜目前的政权在未来获得了这种技术的更高级版本。朝鲜人可能需要佩戴生物识别手镯，接受当局监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以及他们的血压和大脑活动。利用对人类大脑日益增长的理解并利用机器学习的巨大力量，朝鲜政府最终将能够衡量每个公民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如果一个朝鲜人看着金正恩的照片，而生物识别传感器发现了愤怒的迹象（血压升高、杏仁核活动增加），那么这个人第二天可能就在古拉格了。

[image]

> 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数据处理系统之间的冲突—— 而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将优势转向后者

然而，至少在有些时候，这种锋芒毕露的战术可能并不是必要的。即使公众对现实的控制越来越少，一些国家表面上仍然可以选择自由投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操纵选民感情的尝试并不新鲜。一旦某人（无论是在旧金山、北京还是莫斯科）获得了操纵人类心灵的技术能力—— 可靠、廉价和大规模的—— 民主政治将彻底变成邪恶的木偶剧。

- 延伸阅读：这就是我们曾经在《定制人将终结民主》一文中强调的噩梦。现在 Facebook 正在努力提起实现这种民主灾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都不太可能有机会面对有感觉的机器的反叛，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那些知道如何比我们的母亲更好地按下我们的情感按钮、并使用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的大量机器人。

人类精英，试图向我们推销一些东西—— 无论是汽车、政治家还是整个意识形态。而机器人可以识别我们隐藏最深的恐惧、仇恨和渴望，并用它们对付我们。在黑客通过分析有关他们的数据和利用他们的偏见来学习如何操纵个人选民时，我们已经在全球最近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中预先了解到这一点了。虽然科幻惊悚片带来了大火和烟雾的戏剧性启示，但实际上，我们更可能会仅仅通过几个点击就能面对平庸的大型灾难。

最大的和最可怕的人工智能革命的影响可能是民主国家和独裁政权的相对效率。

从历史上看，独裁政权在创新和经济增长方面面临着严峻的障碍。在 20 世纪后期，民主国家通常胜过独裁统治，因为他们在处理信息方面要好得多。我们倾向于将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冲突视为两种不同道德体系之间的冲突，但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数据处理系统之间的冲突。

民主分配权力来处理信息并在许多人和机构中做出决定，而独裁统治将信息和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鉴于 20 世纪的技术，在一个地方集中太多的信息和权力是低效的。没有人能够足够快地处理所有可用信息并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为什么苏联做出比美国更糟糕的决定的原因之一，以及为什么苏联经济远远落后于美国经济。

然而，人工智能可能很快将钟摆摆向相反的方向。AI 可以集中处理大量信息。实际上，它可能使集中式系统比漫射系统更有效，因为当机器有更多信息需要分析时，机器学习的效果更好。如果您忽略所有隐私问题、并将所有与十亿人相关的信息集中在一个数据库中，那么您将获得比尊重个人隐私更好的算法。命令其所有公民进行 DNA 测序并与某些中央机构分享他们的医疗数据的威权政府，将获得巨大的优势。那么，人权呢？

20 世纪专制政权的主要障碍—— 将所有信息和权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的愿望—— 可能成为 21世纪政权的决定性优势。因为技术到位了。

[image]

当然，新技术将继续出现，其中一些技术可能会鼓励分散而不是集中信息和权力。区块链技术以及由其启用的加密货币的使用目前被吹捧为针对集中化权力可能的平衡力。但区块链技术仍处于萌芽阶段，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真正能抵消人工智能的集中化趋势。

请记住，互联网在早期曾经也被宣传为一种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可以让人们从所有集中系统中解放出来—— 但现在，它已经准备好让集中化霸权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了。

- 延伸阅读：《互联网究竟是什么》

权力的机器化转移

即使某些社会表面上仍然是民主的，算法效率的提高仍将越来越多地把权力从个人转移到联网机器。我们可能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更多权利，因为我们将从经验中学习到比信任我们自己的感受更多地信任算法会更靠谱，最终失去了为自己做出许多决定的能力。

不信吗？想想看，在短短二十年内，就有数十亿人将最重要的任务委托给 Google 的搜索算法：找到相关且值得信赖的信息—— 即 决定数十亿人的认知。我们更多地依靠 Google 来寻求答案，我们独立定位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今天，所谓的“真相”是由 Google 搜索算法的最佳结果定义的。人们要求 Google 不仅要查找信息，还要引导他们。自动驾驶汽车和 AI 医生将进一步做同样的事：虽然这些创新将使卡车司机和人类医生失业，但他们更大的重要能力在于，继续将权力和责任从人类转移到机器。

人类习惯于将生活视为决策的戏剧。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个人视为一个不断对世界作出选择的自主代理人。艺术作品—— 无论是莎士比亚戏剧、简奥斯汀小说、还是俗气的好莱坞喜剧—— 通常都围绕着英雄做出一些关键决定。生存还是毁灭？听我妻子的话杀死邓肯国王，或听取我自己的良心并饶过他？嫁给柯林斯先生还是达西先生？基督教和穆斯林神学同样关注决策的戏剧性，认为永恒的救赎取决于做出正确的选择。

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可以做出更好的职业生涯决策，甚至关于人际关系的决策。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依靠 AI 决定学习什么、在哪里工作、与谁约会、甚至结婚，人类生活将不再是决策的戏剧，我们的生活观念将被彻底改变。

那时候，民主选举和自由市场可能不再有意义。大多数宗教和艺术品也是如此。想象一下 Anna Karenina 拿出她的智能手机并询问 Siri 究竟应该与 Karenin 先生结婚，还是与潇洒的 Count Vronsky 私奔？或者想象一下，你最喜欢的莎士比亚玩 Google 算法做出的所有重要决定？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生活会更加舒适，但这些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否有能够理解这种生活的模型？

[image]

议会和政党能否克服这些挑战并阻止黑暗的情景？目前这似乎不太可能。技术混乱甚至不是政治议程上的主要项目。在 2016 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直接解决自动化的潜在影响。唐纳德特朗普警告选民墨西哥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因此美国应该在其南部边境修建一堵墙 ……但他从未向选民发出警告说算法会抢占他们的工作，他也没有建议在加利福尼亚（数字极权的总部集中营）周围建立防火墙。

那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如何培养自己的智慧和同情心。如果我们在人工智能上投入太多而在开发人类思维方面投入太少，那么非常复杂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并培养我们最糟糕的（也可能是最强大的）冲动，其中有

贪婪和仇恨。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我们投资于改善人工智能的每一美元和每一分钟，应该被明智地用来探索和发展人类意识。

更实际、更直接的是，如果我们想要防止所有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小精英手中，我们就必须规范数据的所有权。在古代，土地是最重要的资产，因此政治就是控制土地的斗争。在现代，机器和工厂变得比土地更重要，因此，政治斗争的重点是控制这些重要的生产方式。而在21世纪，数据是比土地和机械都更为重要的资产，因此，政治将是控制数据流动的斗争。

- 延伸阅读：《政治的未来：当机器决定“民主”？》

不幸的是，我们在管理数据所有权方面没有太多经验，这本身就是一项比管理土地或机器更困难的任务。

数据无处不在，它们可以以光速移动，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意数量的副本。收集的关于我的 DNA、我的大脑和生命的数据，究竟是属于我、还是属于政府、属于哪些公司或人类集体？

积累数据的竞争早已开始，目前由谷歌和 Facebook 以及中国百度和腾讯等巨头领导—— 即 中美均分的 FATBAG（Facebook Amazon Tencent Baidu Alibaba Google）。

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充当了“注意力营销客”的角色—— 他们通过向我们提供免费信息、服务和娱乐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他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给广告商。然而，他们真正的业务不仅仅是销售广告。相反，是通过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设法积累了大量关于我们的隐私数据，这些数据比任何广告收入都更有价值。我们不是他们的客户—— 我们是他们的产品。

普通人会发现很难抵制这个过程。目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乐于赠送我们自己最宝贵的资产—— 我们的隐私、也就是基本人权—以换取免费电子邮件服务和有趣的猫咪视频。但是，如果以后，普通人决定试图阻止数据流，他们就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麻烦，特别是因为人们可能已经开始依赖网络帮自己做出决策，甚至是关于基本健康和生存问

题的决策。

政府将数据国有化可以遏制大公司的力量。但是，历史表明，人类很大程度上不会在一个富有的政府手中活得更好。所以，我们最好要求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哲学家、律师、甚至我们的诗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个大问题上：即 你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

目前，人类已经变得与家养动物越来越相似了。我们曾经培育了生产大量牛奶的温顺奶牛，但远远不如其野生祖先，他们不再那么敏捷，不那么好奇，而且资源明显不足。而机器，现在正在创造驯服的人类，他们在巨大的数据处理机制中产生大量数据并作为高效芯片发挥作用，但几乎没有最大化其人类潜力。如果我们不小心，最终被滥用的机器将对人类自己和世界造成严重破坏。

如果你发现这些前景令人担忧—— 如果你不喜欢生活在数字独裁或一些同样堕落的社会形式中—— 那么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找到防止将过多数据集中在太少的人手中的方法，并找到保持分散式数据处理比集中数据处理更有效的方法。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实现这些目标就是民主的最佳保障。

[image]
[image]

无形的极权主义

[image] Publish Date	@2019年3月20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I 大数据 极权主义 社会控制 算法
[image] 编辑	[image]Saul Bright

技术不是中立的。如何使用它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反映了特定文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在世界各地，算法和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通常会复制社会不平等并为强国的利益服务 —— 而不是创造一个更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社会民主的范式。

[image]

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感知算法，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都在被算法所包围着：它们控制着我们与设备交互的方式，控制我们使用计算机和 ATM 以及移动世界的一切。

位于计算机程序和AI深处的算法有助于管理主要道路和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模式；银行和其他贷方也使用算法来确定一个人是否该被视为“有价值”；算法还决定了 Google 等搜索引擎上被显示的结果、以及通过 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信息。五角大楼与私营工业联合正在开发的算法将赋予无人驾驶飞机自主决定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致命武力对付人类 ……

技术不是中立的。如何使用它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反映了特定文化的社

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在世界各地，算法和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通常会复制社会不平等并为强国的利益服务—— 而不是创造一个更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社会民主的范式。

计算机算法产生这些结果的具体方法是什么？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如何成为了传播种族和性别偏见观念的手段？在一个“大数据”和算法无处不在的时代里，这些技术和实践如何真正破坏了民主—— 并同时推进了威权主义和其他极右翼运动的事业？社交媒体和其他形式的数字技术是否通过让人们更加孤独和疏远社会而抑制了反抗的动力？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最近采访了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教授 Safiya Noble，她最近写了一本新书，题为《压制性的算法：搜索引擎如何加强了种族主义》。Noble 教授还是 Stratelligence 的合伙人，该公司专门研究信息和数据科学挑战。她还是信息伦理与公平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该研究所为致力于将其信息管理实践转变为更公正、合乎道德和公平之结果的组织提供培训。

以下是这场对话的简洁版。

Q：在这个政治时刻，当民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受到围困时，你会更广泛地阐述 *Facebook*，*Twitter* 和互联网在其中充当的角色吗？

A：我们的社会正在全面数据化发展—— 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被跟踪，我们的每一种感觉和每一次接触都被收集和描述，它正在改变我们所有人并颠覆我们的自由。

这些进程真正破坏了我们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这是一个让公众变得麻木失去控制的彻底时刻。而且，甚至失去了了解自己正在被控制的能力。这是专制独裁政权的全面完美时刻。我们正在世界各地的独裁运动中看到这一点。

例如，当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在 Facebook 爆发时，我与人们交谈，他们告诉我，“好吧，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必须有[Facebook]。” 退出参与这些大数据项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已经被武器化了并用于对抗公众。

人们崇拜这些监视资本主义巨头公司，他们的主要文化认同就在于这些公司，而不是社会运动或价值观和想法。

我曾经做过广告工作，现在我是一名学者。几十年来我注意到人们如何失去了个人控制和权力。人们现在谈论他们的权利的方式实际上是为大公司腾出空间以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这个社会系统失败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们将不得不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

Q：孤独是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类型的专制政权的先决条件。研究表明，孤独和社会异化无疑是选民涌向极右翼的原因之一。社交媒体技术在创造和培养这种社交萎靡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A：孤独可能更多是我们与这些技术接触后的副产品，而不是说孤独或异化是前兆或存在于自身。总的消费者体验是，当你失去真正的社会力量和真正的经济机会时，你需要一种方法来解决你感受到的异化。

那就是社交媒体或技术—— 这些数字干扰—— 成为了处理这些感受以及做其他类型的情感劳动的好方法。例如，我教我的学生关于“快时尚”。如果你和时尚学者谈过话，他们会这样告诉你，“嘿，听着，当你无力上大学时，因为现在获得学位是10万美元。哥们，在 H&M 买20美元两件的毛衣真是太棒了。“

这就是人们正在经历的现实。你怎么能不觉得肯定会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你的内啡肽中获得高值？当然，我们知道人们在社交媒体中获得的即时满足感很重要，它触发了人们在生活中其他方面无法获得的心理和情感兴奋剂。

孤独问题更多是源于没有住房、缺乏实际工资、缺乏负担得起的教育等因素带来的。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孤独，唤起了人们绝望的真实感受。他们没有停下思考，而是转向了其他地方以获得安慰。

Q：“互联网作为一种伟大的社会平等者和创造机会与自由的空间以拯救我们“，这种错误观念从何而来？

A：早期的互联网用户和传播者总是把互联网视作为一个解放的网站，也就是那种无国籍、无国界、无阶级、无性别差异的地方。的确是，但那是早期的商业化前互联网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全面商业化了，互联网成为了 Facebook、互联网就是谷歌。普通用户无法真正了解互联网之外的内容。人类被归为了 Google 及其产品，作为人们所依赖的基本知识或感知的工具。

人们已经开始将它们视为一种既热闹又悲惨的民主形式。人们与互联网互动，互联网又是另一个拥有众多参与者的企业商业空间。当然，我们知道互联网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是种族化的、它是性别化的、它是一种基于阶级的经验。

所有这些限制将被消除的承诺都是骗人的。

不幸的是，很多人误会了觉得他们在网上的参与是“参与真正民主的一种方式”。太多人实际上相信这点，因为他们可以评论或以其他方式进行在线参与，它伪装成了一个完全自由和民主的空间。

而人们看不见算法。算法是隔离和创造的市场，是谁能看到哪些类型的消息或广告的消费者市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不是自由的。这是一个被高度策划了的空间。

相对于技术和这些平台的“民主”并不能取代任何层面上的真正民主—— 它们会排除人们的批判性思考的可能性（如果批判性思考曾经存在的话），因为在这些空间中移动的是广告驱动的内容。这实际上与基于证据的研究、或对民主至关重要的其他形式的知识，都非常的不同。

Q：算法和相关技术如何重现了社会不平等？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A：这些平台的兴起与公共信息领域的日益萎缩接连发生。例如，公共信息领域包括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公立大学和公共媒体，这对于在我们的社会中建立共同教育和共同知识基础非常重要。这些也是

公平代表、历史准确性和报告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其他挑战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场所。

在巨头公司控制的媒体扩张的同时，公共领域正在萎缩。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拥有最多资本的公司参与者能够将他们的内容优化到信息堆的顶端。搜索引擎尤其如此。具有大量技术技能的个人和团体也能够优化他们的存在。例如，白人民族主义者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技能，你不会相信他们在控制有关种族和种族关系的语话方面有多高效。他们擅长诋毁 Black Lives Matter 等社会运动以及其他类型的人民运动，因为他们也得到了右翼组织和亿万富翁的充分资助。

这就是一个拼资本的世界。

如果你既有资本又有技术技能，那么你就可以用第三种力量来控制世界，那就是硅谷，人们正在开发这些平台。这些工程师和其他设计师中的许多人甚至在相信他们自己正在开发据称将成为伟大的解放者或知识解放者的平台时，甚至无法识别这些社会力量。

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混乱，我认为，这是导致新型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这些想法正在网络上被规范化。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那些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被钉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政策十字架上的人并没有很多资本，他们也可能没有很多技术实力，他们当然更没有深深植根于硅谷。

Q：人们认为这些技术是“中立的”，它们不可能是“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你如何反驳？

A：这是典型的奥本海默式反应 —— 我们不得不制造氢弹，因为它是“科学”。“我们必须处理符合科学最佳利益的事，如何应用这些研究取决于政治家。”这些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通常是硅谷工程师谈论他们所做工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建立工具，他们是中立的。如果它们被破坏，那是因为人们与他们接触并使用它们的方式所造成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计算机语言被称为语言，正因为它们是主观的。如果编程语言是主观的，那么它们是高度可解释的。例如，搜索引擎是特定类型的AI。

AI 是关于自动化决策的。如果存在这些条件，则应采取这些措施。如果没有主观的思考优先级和时间优先级的过程，就无法进行逻辑和自动决策。

这些不是数学问题。它们非常主观。事实上，谷歌本身已经表示，有超过200个因素可用于开发其搜索技术以及如何排序信息的优先级。那么，这些因素究竟都是什么？我们看不到它们—— 包括谷歌为中国制造的“蜻蜓”，但我们当然可以看看结果。

代码试图迎合大多数人的感知，这就是为什么“女孩”在搜索引擎结果方面成为色情内容的同义词的原因之一 ：因为想要以特定方式寻找“女孩”的观众最有可能是寻找色情内容的男性。这是通过算法和AI的设计做出的主观决定。

Q：关于谷歌和其他搜索引擎如何加强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如搜索词“黑人女孩”所示那样，对此我们知道些什么？

A：多年来，直到2012年秋天，第一个结果都是“sugaryblackpussy.com”，其次是一系列色情网站或其他深度性感的网站。这是第一页上80%的内容—— 当然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多数人通常不会继续翻找下一页。多年来，色情内容是搜索“黑人女孩”的主要结果。

拉丁裔和亚洲女孩也是如此。由于引发了严重争议，谷歌改变了“黑人女孩”的算法。几年来一直有很多关于它的讨论。通过这些搜索引擎结果，色情内容是非白人妇女和女孩在线搜索结果的主要代表内容。这与主流的陈规定型叙述高度一致，这些叙述被用来合法化对美国和全球社会中非白人妇女和女孩的公民权剥夺。色情制品不仅不是性解放，更是资本主义和对女性身体和女性性行为的暴力控制的功能性反映。

Q：在生成这些搜索引擎结果时，算法会做出哪些类型的决策？

A：谷歌的网络抓取工具正在寻找流行的东西，他们也希望看到什么带有大规模超链接，他们还试图找出什么是欺诈性的。谷歌有一个认真和真实的努力，例如不能将某些类型的内容放到首页，因为“这在内容某些国家可能是非法的‘。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您可以使用 Google Adwords 等工具优化内容的排序。有些人会付钱给谷歌以让自己的内容更加醒目和获得高位排名。

当我们谈论民主时，这一点非常重要—— 少数族裔永远无法获得这种优势，特别是如果他们无法获得货币和其他类型的资源时。在政治游戏里方面这种能力非常重要，因为某些参与者能够确保他们的信息被广泛传播，无论它是虚假的、危险的、性别歧视的、种族主义的还是其他类似的。由于人们试图购买关键字并将最糟糕的内容优化到搜索排名的前几位，就完全可以影响所有人的思考方式。

Q：最近有一个案例，由于人工智能与互联网上的用户互动，它“学会”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是“垃圾中的垃圾”的典型例子吗？

A：如果人们能够将某些事物变得流行或通过付钱让某些类型的想法变得流行，那么这就将成为训练AI的主导逻辑。“人工智能”是个可怕的概念，因为人类的智慧不仅仅是文本分析、图像分析或图像处理，我们还有感情和情绪。

神经科学家会告诉你，技术网络的任何数量的映射都无法产生人类智力的那些维度。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能的这种观念是一场闹剧，因为人类的多个维度无法被机器复制。机器正在接受有偏见的数据培训，数据很危险，数据甚至可能不是真实的或根本不是事实，然后它们却被用来取代人类的逻辑。

这部分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因为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算法歧视你，你就不能把它告上法庭。”我们也没有法律和社会框架来干预这些项目。当AI侵犯我们的人权时，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权利组织可

以让我们提出申诉。

Q：美国社会存在着数字素养的危机。公民素养也存在危机。我们还有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他们知道如何制造机器和编写计算机程序，但他们往往缺乏任何哲学、道德或伦理框架来指导他们的研究。你会如何解决这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A：如果你对社会一无所知，你就无法为社会设计技术。我们将不得不让那些对社会有深刻了解的人参与其中。这些是研究后殖民主义、民族研究、妇女权利研究和相关社会学的学者。人文主义者—特别是研究道德和伦理的哲学家—将不得不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以制止技术正在做出的一些错误选择。

技术是在研发实验室设计出来的，从来没有经过公开讨论关于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是否需要甚至是否想要这些东西。当然，也没有关于这些新技术的社会后果或政治后果的长期研究。

注：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 IYP 对伪知识分子的危害深表遗憾。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学、哲学、传播学和伦理学专业知识的协作，技术就无法控制在为人类服务的范围内。当你看到中国伪知识分子转发并倡导对谷歌的赞美和崇拜时，你就很难不陷入这种深度的焦虑。

□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theyre-always-watching?utm_source=publication-search

---

[image]
[image]

剥削压迫、血汗工厂、强迫劳动、生态破坏 …… 高科技背后的现代奴隶制

[image] **Publish Date** @2021年7月29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I 不平等 专制 中国 劳工运动 新冷战 科技右翼 自动化

[image] 编辑 MMartinez

“云” 的背后是什么？

哪里是强迫劳动的根源？

所谓的“自动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如何更清楚地理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全球化？

中国的电动汽车开发公司风头正劲，每次融资新闻都是几十亿的计数，这些汽车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什么才是全球性的专制和不平等加剧的凶手？

工人运动、环境正义运动、人权运动，为
什么必需必然紧密结合在一起？……

[image]

我们在此前的《工作是个什么东西》中指出过这点，所谓的科技进步并没有解放人类，全球工人的平均工时反而更长了，人们甚至相信996是“福音”，因为至少证明你有工作，有活儿干，如果你失业了，那就是没顶之灾，没有人能帮你。

科技发达到卫星满天飞，有钱人准备着移居火星，酒店前台是机器人服务员，而我们这些工人为什么依旧活得如此苦逼？

这是有原因的。也是当下最重要的反抗项目。

此前我们发布了另一本今年出版的新书《行星矿》，本文推荐的新书和一系列相关研究则从每个人最基本的生活入手，帮助人们切身体验到所谓的高科技背后的暴行。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未能被解决而愈演愈烈的状况。

不论是近期被成为热点的新疆 “强迫劳动”、曾经引起全球关注的富士康跳楼、还是数不清的全球奴役压迫、剥削和污染，反抗和暴力镇压，它们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本性原因。

[image]

在阿根廷广阔的盐碱地下，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锂储量—— 至少目前是这样。盐水以每天200万加仑的速度被泵入一系列太阳能蒸发池，其长方形的形状与不对称的六边形山脊交相辉映。

锂是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电动汽车中的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的基石，但它从南美阿塔卡马地区到我们的电子设备的旅程细节却非常模糊。追踪它需要不懈的决心 —— 搜寻公司文件和公共登记册，从公司代表那里哄骗信息，并慢慢建立一个连接生产商、加工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地图。

在过去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追踪那些为我们的数字生活提供动力的巨大的人类劳动、数据和自然资源网络。从 Kate Crawford 和 Vladan Joler 的 “解剖人工智能系统” 到 David Abraham 的 “权力元素”，这些调查对全球供应链惊人的复杂性所掩盖的剥削行为进行了新的揭示。

学术界和记者长期以来一直对记录从糖到T恤衫等各种商品的漫长而曲折的旅行感兴趣。但是，技术的供应链甚至更加令人目不暇接。苹果公司公布了其前200名供应商的名单，他们在总共1000多个设施中工作。三星表示，它与世界各地约2200家供应商合作。这些供应商有自己的网络，包括数百甚至数千家供应商。

这种对供应链的关注—— 或一些人称之为供应研究—— 植根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与技术的关系不能单纯地从我们如何利用它的角度来理解；相反，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调查金属、炼油厂、工厂、航运集装箱和仓库，它们不仅制造和交付我们所有人使用的电子产品，而且，还形成了组织我们社会的基础设施。供应研究试图提炼出这些全球网络并使其清晰可见，这些网络的复杂性掩盖了它们造成的伤害。它为理解我们每个人使用的设备的真正来源和真正影响，提供了一个关键的镜头。

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起源于军事背景，在16世纪末变得更加重要，当时欧洲军队的扩张使得部队在敌方领土上难以获得食物和物资。在20世纪，物流开始认真地支配战略，工业战争的大量弹药需求需要可靠的运输网络和系统。

军队的组织要求和公司的组织要求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没有被忽视。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供应链管理成为公司业绩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部分原因是更多的生产被外包，但也是由于电子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巨大改进，使得预测和调度更加精确。今天，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被视为商学院的重点专业领域。其目标是优化货物的流动和转化，从原材料到用户手中的最终产品。

通常情况下，供应链是从那些管理供应链的人的角度来讨论的，其框架是提高效率和最小化破坏。然而，最近，地理学、信息研究和媒体研究等学科的学者已经从一个批判性的—— 而不是 “如何做”—— 的角度开始研究全球供应链。如果企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缝的供应

链，以至于消费者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那么这些研究人员试图把这个过程翻出来，揭露被华而不实的设计和包装，或者像“云”这样模糊的概念所掩盖的人类和环境成本。

媒体历史学家 Matthew Hockenberry 的供应研究网站包括一个广泛的大纲，展示了该领域的广泛工作，包括学术出版物（Deborah Cowen 的《物流的致命生活》）、调查性新闻（Tim Maughan 的“世界小工具工厂—深圳的变化”）、倡导工作（The Enough Project）、纪录片（Frank Piasecki Poulsen 的 Blood in the Mobile）和模拟游戏（Molleindustria 的 Phone Story）。

全球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民族志研究确实有广泛的历史，特别是在人类学中（见 June Nash 在1979年对玻利维亚原住民锡矿工的研究）。此后，媒体和通信理论家对这种方法进行了调整，将实地调查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以审视技术对象的物质历史。

在他们2018年的文章“解剖人工智能系统”中，纽约大学AI Now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凯特·克劳福德和诺维萨德大学的新媒体教授弗拉丹·约勒绘制了一个单一产品的供应链，即亚马逊Echo—— 通过采矿、加工、组装和运输，以及培训虚拟助理**Alexa**所需的众包数字劳动。

该项目旨在表明，即使是据称“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服务也会带来大量的工人剥削（克劳福德在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image]

像许多供应研究的学者一样，克劳福德和约勒在公共渠道分享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促进了围绕我们经常认为理所当然的小工具的大众认知的转变。

参与社会活动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作品中处理物流和供应链问题。未知领域部门是由 Kate Davies 和 Liam Young 领导的工作室，与其他艺术家和设计师合作，对“错位的风景”进行考察—— 这些地方虽然在地理上远离全球北方的城市居民，但却通过开采过程与我们所有人紧密相连。

这个团体通过艺术来表达他们的发现，包括一套用有毒粘土制作的明式花瓶，这些粘土是从内蒙古的一个稀土矿物提炼厂产生的放射性尾矿池中收集的。这些矿物被用于生产消费技术 —— 例如，铈被转化为用于擦亮触摸屏的氧化铈。

揭秘现代供应链是出了名的困难，但一个位于柏林的名为“战术技术”的组织帮助公众进行自己的调查，该组织有一个免费提供的工具包，简称“工具包”。

其他的文章则放大了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提醒读者注意生产设施的恶劣劳动条件，以及矿物开采对环境和健康的不利影响。

在《华盛顿邮报》关于阿根廷和智利锂矿开采的专题报道中，托德·弗兰克尔和彼得·沃里斯基研究了像 Minera Exar 这样的跨国企业与当地村庄之间谈判的不公平交易—— 为了换取从他们的祖传土地上开采锂矿的权利，该公司将对六个原住民社区中的每一个社区进行补偿，每年支付9,000美元至59,000美元不等。而同时，该业务预计每年将产生约2.5亿美元的收入。随着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也开始关注开采自然资源所带来的人类损失。

许多供应研究的作品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们的作者让自己——以及读者—— 沉浸在生产和分销的现场，而这些现场往往是被偏远的地点所掩盖的，或者是隐藏着工厂、仓库或服务器农场的不显眼的建筑。他们还参加行业会议和培训，以便更好地了解供应链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有时，生产地点是虚拟的，而不是实体的：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米里亚姆·波斯纳讲述了她参加40小时在线培训课程的经历，学习使用SAP SCM，一种领先的供应链管理软件解决方案。Posner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和数字人文学科的助理教授，她从一个企业供应链经理的角度参与到全球装配网络中。她观察到该程序的目录和电子表格如何提供了一个抽象的观点，脱离了实地工人所浏览的复杂现实。

人们已经不断被警告过，无人机袭击将战争游戏化，使操作者对杀害他人的可怕行为不敏感。供应链管理软件也有类似的影响：实现更快

的周转开始感觉像是在解决一个逻辑难题，而不是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或取消休息时间。

媒体报道特别针对富士康，这家台湾拥有的公司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之一，特别是在2010年中国大陆的工厂发生了一系列工人自杀事件之后。这家电子制造商因其不人道的做法而受到审查，包括将工人安置在拥挤的工厂宿舍，让他们接触危险化学品，并创造一个高压环境，要求长时间工作而没有适当的休息或加班费。

工人们从事重复性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一位卧底调查员在轮班时只能用一只蘸有酒精的牙刷来清除1400个亚马逊 Echo Dot 扬声器上的灰尘颗粒。

富士康的曝光—— 包括查尔斯·杜希格和大卫·巴尔博萨2012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英国广播公司2014年的调查纪录片—— 标志着许多消费者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他们可能将 **iPhone** 与便利性和功能性、或史蒂夫·乔布斯和硅谷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现在不得不为装配线上的中国青年和为防止工人从工厂屋顶跳下而安装的黄色安全网的形象留出空间。

[image]

对与全球供应链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道德关注并不新鲜。例如，在17世纪末，来自加勒比海的奴隶种植的糖受到了约30万英国人的抵制。这场运动唤起了人们的良知，呼吁个人发挥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力量，支持废奴运动。

历史学家托马斯·哈斯克尔认为，市场经济的兴起产生了两个看似矛盾的效果：它以自我利益的名义剥削劳工，同时也扩大了道德责任的限度。对一些人来说，这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他们首先是公民，还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他们的角色只是做出满足自己需求和欲望的选择。然而，作为公民，他们对公共利益有更广泛的义务，即使这意味着损害自己的利益。由于认识到当地的行动越来越有可能影响到远方的个人和社区，从而将公民的范围扩大到全球，这种两难的局面进一步复杂化。这种认识解释了将巴巴多斯的被奴役者与莱斯特的居民—— 帮助组织抵制食糖运动的伊丽莎白·海里克的家乡 —— 联系起来的商业网络是如何引起一些人的内疚感和个人责任的。

最近，像耐克这样的服装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抨击，导致了为改善其供应商网络中血汗工厂的残酷工作条件所做的公关宣传工作。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是纳奥米·克莱因1999年的畅销书《No Logo》。

克莱因描述了"轻装上阵"的口号在跨国公司中的兴起 —— 当他们将资源注入品牌营销时，他们也尽量减少对自己工厂的依赖，用合同工和临时工取代全职员工，并加大了外包力度。

这意味着工资低、安全风险大，以及在分包的生产设施中使用童工。克莱因和其他反全球化活动家强调的动力在许多供应研究项目中被放大了，这些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寻求扭转企业试图通过精心打造品牌来隐藏材料来源的做法。

在许多方面，以技术为重点的供应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通过它来理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等既定的问题。以钶钽铁矿石为例，这是生产大多数电子设备所需的电容器的一种关键成分。人类学家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在他对刚果自给自足的采矿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将钶钽铁矿石作为一种数字矿物来考虑的理由。通过强调嵌入在我们使用的技术中的人、地方、文化传统、经济关系和政治背景，将其定义为数字矿物，有助于打击将虚拟身份和互动等同于非实体化的持久特质。

消费者往往被阶级和地理因素与参与生产的个人和社区分开，因此被屏蔽在由他们的设备产生的压迫和环境破坏之外。一双跑鞋和一部智能手机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通常被理解为是"经济转型"的一部分，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基于信息的活动。当我们购买一台新的 MacBook 时，我们可能认为它是一台等待我们指示的机器，或者是我们个人收集的文件、照片和视频的一个空容器。这样一来，我们就忽略了它的构造环境，而只关注它如何调解我们自己的解放。科技公司以这种说法为基础，鼓吹远程工作和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的变革潜力。

但在神奇的幻觉背后，是工人们的劳动—— 以及他们的存在—— 不被承认。对供应链的批判性分析试图将技术建立在其物质基础之上。如果继续忽视对自然资源、人类劳动和基础设施的依赖，会让人误以为数字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与物理世界不同。

[image]

供应链研究和倡导加强了对政府的压力，要求其通过新的立法，并要求像亚马逊和苹果这样的公司改变其做法。一些公司现在定期进行供应商审计，以确保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伙伴公司遵守环境、劳工、健康和安全标准。仅在2019年，苹果就在49个国家进行了1142次供应商检查。审计工作的上升表明，科技公司可能终于被逼着为外包和海外工人的困境承担责任了。

虽然政府法规和更大的公司问责制可以产生一些积极的结果，然而，现代供应链是如此复杂、不透明和分散，以至于改变往往像与多头蛇作战：每解决一个问题，似乎就会出现两个或更多的新的问题来代替它。电动汽车经常被作为一个例子，说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往往会重现不公正的现象。虽然被宣传为比温室气体排放车辆更“绿色”的创新，但是，为电池提取和加工锂会污染土壤和水，扰乱生计，并破坏当地生态系统。

正如许多关于供应研究的作品所表明的那样，当面向消费者的公司还希望其供应商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的产出，从而对劳动条件和工资施加向下的压力时，像供应商审计这样的公司举措是远远不够的。提高利润率的驱动力也鼓励了不那么可持续的做法。在 Peter Whoriskey 的《华盛顿邮报》关于石墨工厂（锂离子电池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附近的中国村庄的广泛污染的报道中，他指出，净化通常使用有毒物质，而不是采用更环保但略微昂贵的方法。

供应研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为读者说明维持我们生活的相互依赖的网络。文学学者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认为，这可以诱发一个短暂的意识时刻—— 一个激增的洞察力，“一个人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巨大而复杂的社会整体的受益者。” 这产生了不适感，并且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我们很快又回到了日常的习惯中，在几秒钟前造成这种剥削奴役的设备上继续滚动和敲击。罗宾斯将这种动态称为 ”血汗工厂的升华”。但是，也许在面对我们作为个人的局限性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与试图对整个系统进行自上而下控制的企业供应链管理相比，我们的力量在于自下而上的集体动员。

虽然技术生产的问题不能仅靠个人消费选择来解决，但供应研究的兴起似乎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扩大自己的道德责任的限度。该领域

的一个前进方向是浮现工人和社区活动家反击人权迫害和环境侵犯的故事，以补充对侵犯行为本身的报道。这是普罗维登斯学院助理教授 Thea Riofrancos 采用的方法，她撰写了关于拉丁美洲反对资源开采的多利益攸关方基层联盟的文章。虽然 Riofrancos 承认，在全球分散的供应链中建立联盟必然具有挑战性，但传播关于现有努力的知识可以加强团结，增加政治压力。

https://iyouport.substack.com/p/791

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典型目标是 “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产品送到正确的地点”。但是，“以合适的价格” 实现这一目标往往是以牺牲地球资源、健康生态系统以及个人和社区的权利和自主权为代价的。通过展示我们的技术的真实成本，供应研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 —— 每个项目都是一个特定的窗口，可以看到隐藏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抛光产品背后的纠结的剥削网络。借用威廉·布莱克的话说就是，供应研究使我们有可能在iPhone或亚马逊Echo中看到一个世界；将其巨大的暴行握于掌中。

By Reallifemag

□

[image]

不要坐以待毙！您可以做这八件事来阻止ICE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2月11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反法西斯 反驱逐 法西斯 特朗普 直接行动 移民
[image] 编辑	MMartinez

ICE特工经常携带行政逮捕令，而不是司法逮捕令。他们希望你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其实并不一样。

如果ICE特工没有司法授权令、不持有他们想要拘留的特定人员的所有正确信息，他们就无权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入私人区域，包括工作场所的私人区域。

与您的同事沟通，让每个人都明白哪些区域是公共区域，哪些是私人区域；竖立告示牌，关好门。制定一项政策，规定如果**ICE** 来到您的工作场所，该如何应对。有关如何应对工作场所突袭的更多信息，中文读者见这里。

- Table of Content
  了解您的权利 - 教育您的社区
  审核信息 - 制止谣

言
组织快速反应网络
组织互助 - 支持保释基金
打击犯罪 - 不要警察插手
声援 ICE 被拘留者 - 为废除 ICE 而斗争
联系社区
建立抵制ICE和国家镇压的文化
了解您的权利：

特朗普政府正在为大规模驱逐铺平道路，他们建造新的监狱集中营，并援引《外敌法案》（Alien Enemies Act），该法案曾在二战期间被用来为拘禁日裔美国人辩护。在本土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的驱使下，斯蒂芬·米勒和其他官员正试图对美国进行种族清洗，而科技巨头和监狱公司则从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中获利，企业则继续剥削移民劳工。特朗普深知大规模驱逐将带来毁灭性的代价，因此他主要将精力集中在芝加哥和丹佛等由他的政治对手统治的城市。

[image]

目前人们正在组织起来。

美国各地的社区正在动员快速反应网络，以应对突袭并为那些成为国家暴力目标的人提供支援。全美各地的学生正在罢课；人们正在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抗驱逐。

如果我们今天不声援那些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列为目标的人，那么同样的镇压基础设施最终也会被用来对付其他人。

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

尽你所能，融化 **ICE**。

[image]

了解您的权利 - 教育您的社区

在与ICE和执法人员的互动中了解自己的权利。特朗普官员曾抱怨说，人们了解自己的权利会让他们的突袭行动 "非常困难"。维护我们的权利可以打乱他们的计划，拖延他们的行动，并改变与执法人员遭遇时的权力动态。

在你的社区分发 "了解你的权利"卡片和传单。组织团队将传单送进学校和工作场所。在当地社区中心、教堂或工会大厅举办培训。这些活动本身也是在创造一个机会，可以让人们聚在一起制定战略，讨论如何完成本清单中的其他任务。

审核信息 - 制止谣言

当人们感到恐惧时，谣言就会迅速传播。设立热线电话、Signal环路和社交媒体账户，以审核信息、核实有关ICE活动的报告，并发布可靠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已经开通了热线电话，请自愿帮忙维持其运行。

不要散布谣言；当你看到假消息传播时，要及时揭穿。

有关ICE活动的报告应包括目击的确切时间、日期和地点、特工人数，以及对其制服、车辆和徽章的直观描述，最好还能提供照片证据。

[image]

组织快速反应网络

组织一个快速反应网络，通过记录ICE的活动、为目标群体提供支持以及组织即时反应，动员起来抵制**ICE**的突袭。

事实证明，记录ICE的活动有助于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有助于在法庭上使用。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阻止或减缓ICE的行动。过去，由快速反应网络动员起来的人群曾封锁ICE的驱逐车，并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设施外进行抗议。

你可以在这里和这里了解一些快速反应网络的实践。

组织互助 - 支持保释基金

ICE的突袭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拆散了家庭。许多人因害怕被 ICE 绑架而不敢上学或上班。

组织互助计划，为藏匿者和赚钱养家的人被绑架的家庭提供支持。启动免费日用品计划。送餐。与现有的支持网络和组织建立联系，扩大他们的工作范围。支持保释基金，帮被捕者尽快离开监狱。

打击犯罪 - 不要警察插手

与警察的普通互动是 ICE 目标人群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一个虚假的刑事指控可能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即使在法庭上永远站不住脚。

鼓励邻居和同事不要报警。组织社区网络、组建冲突解决项目和其他方式来解决社区需求，而无需让刑事“司法”行业参与其中。

揭穿关于“犯罪率上升”的虚假说辞 —— 这些说辞只是扩大镇压范围和增加投资人利润的借口。 解释声援那些被定罪的人对每个人都有什

么好处。公开羞辱那些向出价最高者出卖伤害能力的警察和其他雇佣兵。

声援 ICE 被拘留者 - 为废除 ICE 而斗争

声援那些被关在ICE设施内的人。支持他们组织起来的努力。

许多ICE设施中的囚犯在组织绝食抗议和停工，要求获得更好的食物、更好的条件、医疗保健和法律代表。

组织起来阻止建造新的拘留设施。动员起来反对与ICE合作、抵制为其提供技术的承包商。

将反对ICE的斗争与监狱内部的其他组织活动和反监狱的整体斗争联系起来。

联系社区

如果你在社区中与那些面临直接风险的人一起实施这些策略，可以使这些策略最为有效。

例如，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平台，分享你所在社区内经核实的 ICE 目击事件，除非信息能传递到那些最需要信息的人那里，否则效果甚微。加强被ICE盯上的人与社区其他人之间的联系。

建立抵制ICE和国家镇压的文化

在你的社区、学校或工作场所建立抵制文化。用贴纸和海报让社区的墙壁说话。

鼓励人们拒绝与ICE合作。

与社区中的其他人一起制定策略，讨论如何支持那些面临镇压的人，并对那些将无证人士作为替罪羊的人采取攻势。

每当**ICE**想要攻击你的社区时，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活动将被记录和报告，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人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行为将承担后果。每一次行动都会让他们付出比上一次更多的资源。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尽己所能，我们的努力就会积少成多，拯救生命，保护社区。

[image]

了解您的权利：

您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如果移民局工作人员敲门，请勿开门。

如果移民局工作人员试图与您交谈，请不要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您有权保持沉默。

请勿在未与律师交谈的情况下签署任何文件。您有权与律师交谈。

如果您当时不在家中，请询问工作人员您是否可以离开。如果他们说可以，请离开。

把下面这段文字打印在纸上，交给**ICE**特工。如果您当时在屋里，请站在窗口前，将写有这段文字的纸举起来让窗外的人能看到，或者从门缝塞出去：

I do not wish to speak with you, answer your questions, or sign or hand you any documents based on my 5th Amendment rights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 do not give you permission to enter my home based on my 4th Amendment rights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unless you have a warrant to enter, signed by a judge or magistrate with my name on it that you slide under the door. I do not give you permission to search any of my belongings based on my 4th Amendment rights. I choose to exercise my constitutional rights.

[image]

第一次妥协就是最后一次妥协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2月17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ntifa 战术 无政府主义 直接行动 起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那些认为自己只需低调忍耐等待特朗普政府下台的人是在自欺欺人。

俄罗斯人在普京崛起时就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忍忍就过去了”，看看他们现在经历了什么。

特朗普寻求专制权力。他不会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让步。他会攫取他能攫取的一切。如果我们现在不抗争，以后他积累了更多权力、而你处于弱势地位时，你就将不得不在一个极为不利的位置上背水一战了。

第一次妥协就是最后一次妥协。

本文将列举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经验，也许您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您想要的东西。

[image]

在这里下载演示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KmQBdRclVC2avUIPAlhc6O1lWVEzpur/view?usp=sharing

解除咒语

人民被施加了一种咒语：私有财产的咒语、政府合法性的咒语、虚无绝望的咒语。这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真实；它们的真实来自于人的集体信仰和活动。你必须被催眠，才能相信财产比人类的需求更神圣、政府的决定比你自己的判断更合法。

要想打破这个魔咒，就得施展另一个魔法。这一魔法就是预示政治。

当开始有少数人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对另一种现实的想象中时，他们就为其他更多人也投入到这种变革性的想象中开辟了空间。

它不一定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只需要传播开来，直到创造出可能的现实条件。9月17日占领华尔街的最初号召就是这种魔咒的一个例子。

想想我们如何才能更进一步？

找到彼此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但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

仅仅传播信息与建立联系与使人们能够共同行动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在社交网络被有效映射和控制的时代，在你惯常的社交环境之外建立这些联系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颠覆；你周围的一些朋友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而其他人的战略目标可能与你大相径庭。

我们不能指望别人离开他们的舒适区，除非我们先准备好离开自己的舒适区。

团结起来我们将无所不能

准备一场革命并不是少数想要改变世界的积极分子如何积累技能和资源的问题；而是，当我们足够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时，我们就能获得整个社会的知识和资源。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去协调斗争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只需要创造渠道，让颠覆性的实践和动力能够通过这些渠道流动起来。准备工作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因为世界一直都在不断变化 —— 流通才是最重要的。

秘诀在于真正去开始

除非有新的事情发生，有能够打破现状的事情发生，除此外的任何事我们都没有理由去关注它，没有意义。不要被分散精力。

试图在真空中展开对话是不够的；要让人们认真对待对话，就必须有东西可谈。

不要只是高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是要把它表现出来，让每个可能期待变革的人都能相信其存在的可能。不要只是谈论废除什么；选择一个压力点，放手一搏，看看谁会加入进来。

树立意愿

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不习惯依靠自己的能力；有一种想法认为自己总是会被打败。

而掌权者的力量就大多建立在我们的失败主义之上。

而事实上，一点勇气就能感染他人。一旦人们习惯于共同行使权力，他们就不会再轻易放弃。

第一次妥协就是最后一次妥协

曾经的行动和运动一次又一次地被妥协所破坏。

你一旦让步，就会开创了一个先例，而这个先例会一再重复，让所有镇压者和下跪主义者更加加大胆和勇猛，他们永远期待我们保持被动。向前冲不确保赢，但后退几乎肯定会输。

如果在你挺身而出时，警察没有逮捕你，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你，也并不是因为人民一夜时间就拥有“合法权利”，而是因为你已经动员了足够多的社会力量，让他们退缩了。

我们的任何怯懦、顺从、和对安抚的接受，都只会削弱这种影响力。

面向 99%，而非 1%

面向当权者的诉求只会将注意力从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上转移开；而另一方面，联合行动能增强我们的力量，并创造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将分歧转化为集体的力量。

用“占领”运动的语言来说，为什么要向资本主义金字塔顶端的 1%的人提出要求呢？为什么不向其余 99% 的人提出建议？—— **99%**的联合力量可以让那 **1%** 的人的权威变得毫无意义。

无数的课堂、报纸和求职面试都在教导人们，要以“上级”的语言和逻辑来表达一切。这是一种自我维稳。无数曾经的抗议诉求都是自我维稳者梦想着主人的锤子能拆毁主人的房子。

要想真正的变革，我们最终就必须学会说我们彼此的语言，提出符合我们自身共同需求的建议，而不是在统治者的框架内提建议再被指责为“不现实”。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从现行秩序中继承的所有合法性概念 —— 不仅仅是政客和法院的权威，还包括学术声望、中产阶级的 “常识”和活动家的资历 —— 转而建立一种价值体系，使我们的声音和我们根据自身条件进行的抵抗合法化。

超越目标

通常情况下，为了实现具体的小目标，我们必须把目光放得更远。有时我们很容易就完成了既定目标，但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接下来出现的新机遇。

让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都指向我们想要的世界，让我们有能力继续朝着这个世界前进。

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实现了眼前的目标，而是，每一次参与都如何让我们为下一轮的进取做好准备。

极右翼、左翼，和选举政治陷阱 - 终结新纳粹时代的路经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2月18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ntifa 左翼 无政府主义 极右翼 民主 直接行动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iyp

受资本主义和选举主义的束缚，国家主义左翼在危机和重组时期无能为力 —— 将战场留给了法西斯分子

[image]

在这里下载演示版本：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QeuhKMqCPlbb36Vno-v48PY5tXl0_YV/view?usp=sharing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们目睹了一种熟悉的历史模式再次出现 —— 工人阶级和贫困群体越来越多地转向特朗普和勒庞等极右翼人物。除美国外，奥地利也是极右翼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最新例证之一，在2024年9月29日的选举中，反移民、亲俄罗斯的自由党（FPÖ）取得了胜利，投票率高达80%，令人印象深刻。这证实了之前在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巴西和法国等国家都已经出现的日益增长的趋势。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效仿，包括阿根廷，该国于2024年11月选出了极右翼自由派哈维尔·米莱为总统。

主流左翼圈子经常将这种转变解读为他们自己在解决工人阶级的问题上“失败”的结果。常见论点之一是：“阶级逆转”已经发生，左翼政党

被受过教育的新自由主义精英收编；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左翼放弃了经济分析，转而支持身份政治。

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选举民主制度本身的失败。背叛感和幻灭感源于国家主义左翼在历史上从未能挑战选举政治的奇观，而选举政治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阶级制度。相反，在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中，社会民主理想崩溃，左派政党利用了那一时期的起义和动荡，并由此，左派（如今侧重于绿色新政、身份认同和人权）将自己定位为霸权政治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支柱是右派（侧重于否认气候变化、民族主义和宗教）。

现代国家主义左派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悲剧。受 选举主义 的束缚，它被 新自由主义 的治理网络所缠绕，既不能提供真正的 替代解决方案 ，也不能在 危机 和 重组 时期有效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 —— 而这个时期本应是在 新道路 上前进的 最佳时机 。

与此同时，精英阶层通过转移工人对直接行动的注意力，引导他们转向极右翼选举方案或精心策划的排外骚乱，通过如此得以继续控制局面。这些转移注意力的做法为统治阶级赢得了时间，以重组生产和政治体系，适应气候崩溃和生态灭绝的严峻现实。

讽刺的是，靠虚假承诺发迹的并不是左派，而是极右。极右翼领导人用反体制的言辞来掩饰自己，把自己定位成 “被遗忘的”工人阶级的拥护者。他们利用 “大取代”等神话和西方文明的退化，将工人阶级的愤怒引向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他们的议程再次分裂了工人阶级，将其按照种族、民族和国家切割开。极右翼一旦掌权，就会利用最初推动其崛起的经济绝望情绪，实施紧缩政策和反工人政策，进一步加深不平等。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加强了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壁垒，保护堡垒内的特权阶层不受被排斥的 “他者”的影响，并在壁垒两侧同时散布恐惧和仇恨。被排斥者被拒绝进入欧洲堡垒内的繁荣地带，而国家则对 “繁荣”的人口实施控制，对任何想要突破压抑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界限的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

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改良”左翼选举党派使其与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崩溃的节奏保持一致。相反，解决之道应该在于开展一场运动，彻底摒弃选举政治的整个框架。

答案在于 直接行动 、 互助 、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活动，既拒绝极右翼的仇外心理，也拒绝左翼的空洞承诺。只有激进的阶级意识和反独裁的组织才能瓦解不断背叛我们的资本主义和国家结构。

□

不要无所作为，不要等待 - 犹太无政府主义者介绍反法西斯经验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2月24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ntifa 战术 无政府主义 自治
[image] 编辑	[image]iyp

公共空间并没有消失。公共活动也没有。只要您擅长战略性地组织和联合。

本文旨在激励每一位为了实现一个没有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而努力奋斗的人 —— 无论他们是否是犹太人或无政府主义者。请自由、广泛地分享这本手册。

- Table of Content
在这里下载演示版：
1、Doikayt 的促膝
2、小点心和汤是有灵魂的媒介
3、用爱结盟
4、有退路，更踏实
5、挫败国家暴力
6、让墙说出你的心意
7、横向，就是无障碍
8、从自助、自主，到自卫，再到互助

9、情绪作为纽带
10、“做”革命
11、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可以依赖彼此
12、学习和反思，胜过懊悔虚无
13、带娃也能成为组织动员的机会
14、在系统外繁荣
15、共同记忆的仪式感
16、展现截然不同的现实
17、成为彼此的臂膀
18、“我能”
19、让反叛更具吸引力
20、无限地前进

[image]

在这里下载演示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pR4Og-VI41le5W38OKCtVJOlXEY4eG0/view?usp=sharing

法西斯主义掌握了美国的权力，从而影响了整个大陆乃至全球，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诉诸国家 - 不论任何国家 - 都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当去年**11**月的“选择”是在两个版本的法西斯主义之间进行时，整个世界就已经输了。

我们提供了一些想法的样本，鼓励您亲自思考和尝试行动，彼此合作，因为 这是唯一的制胜策略 。如果您觉得这里的任何想法本身似乎还不充分 —— 那么请帮助升级它们。

Pirkei Avot（《先贤篇》）可能是最广为人知和最常被引用的犹太教教义，在大约两千年前写成。在那段时间里，许多形式的专制主义 —— 帝国、君主制和民族国家 —— 兴起又衰落。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犹太人，我们并不孤单，即便仅仅在道德上，我们也必须与各种权势搏斗。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地球上各种肤色、性别和文化的人们都曾共同抗争，抵制强制的、等级森严的暴力。最重要的是，千百年来，人们自主地组织、捍卫和实践了无数形式的互助、集体关怀和自治 ——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预示性政治”。同样信仰直接行动的前辈们并没有推迟和等待他们想要看到的世界，相反他们主动去做了，他们活得就像是已经自由了一样。

作为散居国外的反叛者，我们的犹太特性教导我们依靠超越国界的团结。我们的教义迫使我们依靠“他者”的群体，过上有价值的生活，无论我们是在哀悼还是在庆祝，还是在反复思考解放应该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什么样子。每周的安息日就是一次长达二十五个小时的对 “未来世界”实践；安息日结束后我们用辫子形的祭品（面包和蜡烛）举行仪式。在这个时代，这样的 “辫子”彰显了我们每一个想要摧毁法西斯主义、实现解放性社会变革的各行各业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必要性。

愿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们都能通过更好地相互关爱，肩并肩朝着这些愿望前进。

[image]

以下是你能为反法西斯运动做的二十件事 —— 是的，就是你！是的，就是现在！梦想并付诸行动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但这里应该是一个开始。

1、Doikayt 的促膝

意第绪语中有一个概念叫 Doikayt，它指的是 “无论身在何处，犹太人都会跨越分裂彼此的界限，结成联盟，共同努力实现普遍平等和正义。”

反法西斯行动的第一条方法就是：建议您在自己的各种一对一关系中实践 Doikayt。

对话，而不是站队。

根据自身当前的状况，与您的每一位挚爱进行交流，用爱与对方沟通关于你们希望建立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构想；从思想、言语和行动上确定必要的基本改变措施，让这些变革种子发芽，茁壮成长。

2、小点心和汤是有灵魂的媒介

给人们做吃的，邀请人们来吃！一直这样做下去，融化城市的水泥森林，重新找回共同生活的乐趣。

3、用爱结盟

建立一个支持网络。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组织起来，重质不重量；少数几个忠实的同志可以比一个庞大却冷漠的团体走得更远。

把亲密团队做成艺术。坚信你的支持网络、你的朋友和家人的爱，是无限的，总是可以更加广阔；有意识地倾尽心力去扩大它。

为此创作出更多的艺术作品，让静物帮助我们“说话”。

尝试新的行动：与人交谈，询问他们的感受；分发资料；组织学习小组；张贴贴纸或一起散发种子炸弹。

我们每建立一个爱的纽带、每创作一件新的艺术作品，都会让我们从困扰我们的恶魔——无望、讽刺和自满——中脱离出来一些，找到可能性的火花。

尝试，失败，再尝试，再失败，然后继续尝试。

4、有退路，更踏实

为各方面准备Plan B。打个比方如抵抗ICE，我们不仅要普及抵抗方

法，也要做好准备万一抵抗失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的Plan B —— 如何紧急撤离、如何藏身、如何维生，等等。

通过购买、积存或以其他各种可能的方式来获得PlanB，为自己和他人保管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在您的社区建立一个“B 计划分发中心”。对其他可能难以获得的且与您和团队的身体自主性密切相关的东西，也要采取同样的做法。

总之就是，全力前进的同时，尽可能保证退一步有路，让安全感更扎实。

5、挫败国家暴力

给在监狱和拘留所中的人写信，给他们寄书，和/或为您所在社区中面临国家镇压的人提供监狱支持和声援。

在应对冲突和伤害时，以及在与他人的日常关系中，都要以挫败监禁逻辑的方式行事。

犹太教中来世被称为Olam Haba（“将来的世代”），那就是一个革命后的世界，寄托了变革者所有最美好的预期，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没有监狱或警察的世界。

6、让墙说出你的心意

制作艺术品并在公共场合展示。

绘制、描绘或书写一个色彩斑斓的标语，表达你的梦想、对更美好世界的憧憬，或可以单纯地庆祝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型的队友也没关系，我们都不是全能的，但

肯定各有特长。如果可以的话，和其他人一起做这件事；分享艺术材料、空间和想法。

在公共场合粘贴（或喷涂）你和同伴合作完成的作品 ——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

现在，你已经对周围环境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所有这些创作都会让人们微笑。它会让人们不再感到孤独。

它会让人们看到你的抗争力量和愿景。

黑暗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们总是能做出更多。

7、横向，就是无障碍

采取具体的步骤去建立超越国界的关系，加强与价值观相同的人的全球团结。

不要以为这有多难。很简单的起点就可以帮助你快速推进事项，比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并与其他学习你的母语的人安排相互练习的时间；这些技能很可能也会被证明有助于帮助那些面临更大威胁的人。

联系世界其他地方与你有共同语言的人（或集体、项目等）—— 如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无所有的人和流离失所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酷儿等等 —— 看看你们之间是否有任何可以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忙着就某个肤浅的新闻话题争执不休）。

寻找过去和现在与专制政权斗争的人们 、或逃 离专制政权的人们 ，听取 他们的故事 ；学习 他们的经验 ，并参与讨论我们当前 面临的挑战 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各种策略。

8、从自助、自主，到自卫，再到互助

学习新技能，分享新技能，并帮助他人学习新技能，以实现我们所需要和渴望的一切 —— 人人享有、彼此互助，没有匮乏和不公。

学习成为医护人员、调解员、助产士和临终关怀师、电工、电影制片人、作家、为当地反法西斯团队挖掘信息的研究员，等等。

再比如，学习如何止血、养花种菜、占用空置房屋/或建房、净化水、制作杂志、缝制衣服、修理汽车、使用户外工具、制作堆肥厕所，以及，为大家做饭。学习如何帮助人们寻找避难所、如何进行心理安抚、如何建立数字安全系统、获取激素药物等等。（IYP提供过一些教程的书籍，请在物料站点《炫》中搜索“生存指南”。）

9、情绪作为纽带

感受你的情绪。而不是升华它们。感受它们，这可以帮助你与每一个曾经绝望过的人联系在一起。

情绪是重要的纽带，与他人一起体察、感受这些情绪，让每个人都不再孤单。

建立同伴支持网络，比如开展仅限周末工作的情绪护理诊所、或者为期一天的情绪援助技能分享会（心理互助会/IYP将开启这一专题栏目进行具体指导），或者建立一些简单的社交空间，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其他人，一起喝东西，促膝畅谈，让彼此的心灵得到温暖，哪怕是暂时的，积累起来将具有强大的力量。

10、“做”革命

了解并开始实践替代性决策结构和团队程序，这些结构和程序在过去曾为那些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服务。

实践萨帕塔主义者称之为“善治”（buen gobierno）的良好程序。

了解萨帕塔自治社区、切兰（Chéran）、罗贾瓦（Rojava）以及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其他自治范例，以此作为灵感来源和努力方向。

11、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可以依赖彼此

收集并分发免费的 N95/KN95 口罩和 COVID 检测试剂，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支更广泛的减轻伤害队伍。

收集并分发纳洛酮、芬太尼检测试剂条、清洁针头、安全套和润滑剂等物品。

在您的社区中，将健康保护措施以及其他大家间彼此照护的方式常态化。

参加户外活动，摆放桌子并分享有关集体安全和减少伤害的各种小册子。（本项目的物料总站《炫》中的前三个专栏都可供打印）

12、学习和反思，胜过懊悔虚无

调用您本地的反法西斯、对抗国家和镇压机构的悠久历史，仔细找肯定有，强化他们，强化所有关于自由的传统节目。

比如犹太人都知道的传统意第绪语歌曲“Daloy Politsey”，讲述了自19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和波兰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斗争。只要把歌词中的主语改成“警察/Polizei”，就可以使用在监狱噪音示威或巴勒斯坦声援行动中。你也肯定能在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找到类似的使用方法。

成立一个学习小组，从这些故事中寻找灵感 —— 然后付诸行动。

加入反法西斯防卫和反警察防卫行动，或者在你的社区或城市发起这些活动。努力构建基础设施，为社区自卫做好准备，自卫可以有多种

形式和规模。（本项目未来将有一个“安全”专题站点，目前正在进入准备工作）

13、带娃也能成为组织动员的机会

如果你正在照看一个或多个孩子，请与一个或多个同样在照看孩子的人合作，创建一个互助小组（如果还没有的话）。

在学校、日托所或当地游乐场的接送点散发多语种的传单，以便找到其他照护者参与进来。

计划每周或每两周在孩子们常去的地方（如公园）聚会一次，分享需求和资源。

只要有战略性，你就会发现，各种普通的日常都可以成为组织方式。

14、在系统外繁荣

意第绪语一个词叫“什台泰尔”(shtetel) 指的是大屠杀前在东欧的犹太人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后来在大屠杀期间被纳粹摧毁。什台泰尔是一种成功的自治项目，它运营一种互助基金/网络叫卡西（**kassi**），曾经在邻里间支撑了很多人维持生计的努力。

在最近十几年来对抗选举主义反动势力的运动中，美国的自治主义行动者也构建了类似卡西的系统 “共同基金”。

是时候将它扩大到更广阔的实践空间中了。

借鉴祖先们的互助传统/历史，通过加强与邻居和同志们的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切实建立起现实生活中的社区。

15、共同记忆的仪式感

记忆是一件武器。花时间悼念你们的损失，哀悼逝去的同志 —— 这与为生者而战和组织活动密不可分；追忆是修补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设立临时和持续的公共祭坛。

绘制壁画涂鸦，纪念逝去的朋友和战友。借鉴几千年来维系生命的哀悼仪式的深邃智慧，让仪式成为反抗的一部分，不论是集体组织还是自我组织。

把这些仪式带到你的社区 —— 河边、街角、DIY 空间或激进书展、森林保卫战或更多直接行动中。

16、展现截然不同的现实

为人们提供免费食物。寻找你附近的无等级制的互助项目的分支，与他们取得联系（横向联合为宗旨的项目都有非常多的分支，他们会尽可能延伸到所有边缘社区），请主动加入到收集食材、烹饪和/或提供食物的行列中来。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真的没有这样的组织，那就亲自去组织一次免费野餐；张贴海报，鼓励大家都来，也可以让大家每人带一道菜。

与一起分享食物的人交谈很重要；任何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就要抓住它。

—— 当有人开始理解食物可以是美味的、免费的，可以在没有限制、没有义务、没有资格标准准入门槛、也没有被预支期望的情况下分享时，你就打开了通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的窗口。

17、成为彼此的臂膀

如果您的朋友或熟人有自杀的念头并向您求助，请主动放下一切，陪伴在他们身边。

请相信微小的同伴支持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把自己当成他们的“止血带”。

比如，你可以为他们留出空间；不要深化问题，也不要表现得很害怕，而是简单地让他们分享感受，尤其是在不用担心报警的情况下。

或者只是简单地陪伴，帮助照顾他们当天的基本需求。都是很有效的且切实的工作。

提前让朋友和其他你信任的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给你打电话，告诉他们可以信任你，只要他们提出要求，你会尽全力提供帮助。

是这种安心，而不是在斗嘴中站队，将成为凝聚你们的强大力量。

18、“我能”

与其他几个邻居家庭一起组织一次门廊义卖活动，甚至是定期的门廊义卖活动，并将资金用于满足团结工作的物质需求，如堕胎或保释基金，或用于手术或在罢租运动期间帮助人们。

问问你自己：“我可以轻松地捐出哪些时间和物资，从而产生指数级效应，让我与社区中的朋友和邻居可以积极会面并组织起来？”

筹款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责任或慈善活动，它更是一种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爱和联系网络的方式。

19、让反叛更具吸引力

与他人一起参与游戏，将其作为想象这个世界的其他可能性并努力尝试实现那些可能性的途径，同时培养友情和善意。

举办游戏之夜。自创集体“运动”，如球赛、夺旗赛等等，把大家聚集在公园里，尽情狂欢。

自发组织一次酷儿演讲或其他 DIY 戏剧活动，简单地表演几个段子——用幽默的形式阐述这个社会秩序的弊端，并想象它可能崩溃的各种方式。

在你的标语、活动、组织和行动中加入游戏性。 拒绝枯燥 ，让人们愿意加入你。

20、无限地前进

慢下来。聆听犹太人的智慧：休息的日子和时间是神圣的。

聆听残疾人的智慧：你的工作与你的价值完全无关！

祖先们一直都在努力建设不那么糟糕的社会结构，并毁掉一个又一个最糟糕的社会结构。子孙后代们仍将继续建设、清除和改变。

而现在的我们，彼此间只有 极其脆弱的相连性 ，我们能编织出什么呢？

信任需要数年时间的积累。而冲突会一瞬间撕毁一切。因此，不管是反法西斯还是解放运动，切记要有耐心，要坚定：慢慢编织，记得享受休闲时光，大快朵颐，与你的同志们一起在河边歌唱。

□

其实，冲在前面才安全:采取攻势反暴政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3月2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ntifa 倡议 反法西斯 战术 无政府主义 起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面对日益加剧的压制和国家暴力，人们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即认为可以通过避免正面对抗来寻求安全，甚至自我审查和自我维稳。但很多时候这并不是有效策略。

“虽然这听起来违反直觉，但在混乱的情况下，往往最好的地方 —— 甚至可以说最安全的地方 —— 就是前线，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清楚地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

—— “What I Do for a Living” 对2003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举行的欧盟峰会抗议活动的描述，发表于《滚雷》第1期。

[image]

[image] [image]

我朋友的祖父在20年代在德国长大。作为犹太人，他参与了激进组织，有时与纳粹发生肢体冲突。几十年后，他在为家人记录的回忆录中描述了纳粹上台时的情况：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总理。当时我还以为马上要发动革命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共产党 —— 通常是成批地 —— 倒向纳粹，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解散了他们的组织。”

1933年5月，他20岁时，得知自己即将因在街头斗殴中打碎纳粹分子的鼻子而被起诉。为了避免在纳粹控制的司法系统中受审，他当晚8点立即办理了护照，登上开往荷兰的火车。

几年后，他家里的其他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个故事简洁地说明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普遍现象。如果我朋友的祖父一开始没有与纳粹公开对抗，如果他谨小慎微避免麻烦，他可能仍然留在柏林，接下来就是与亲人一起遭遇同样的命运。他没有。相反他主动出击了，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 但从长远来看，这却比安于现状要好得多。

同样，加入犹太抵抗运动 地下游击队 的成员是少数在纳粹摧毁华沙犹太区后幸存下来的人。他们组织起来直接面对 纳粹的威胁 ，培养了强烈的自主意识，当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下水道系统从被围困和被烧毁的犹太人居住区大胆逃脱时，只有这些游击队员具体战术优势。

对于受针对的群体成员来说，最初的冲动往往是退缩，躲藏起来。然而，在个人和集体自我保护方面，在事情发展方向仍可影响的时候，采取主动的行动可能更明智。即使结果不好，在敌方变得更强大之前，将冲突立即激化也很可能是更有利的决策。至少，这种策略可以避免在威胁加剧时陷入虚假的安全感。

虽然不能说始终如此，但很多时候，在最前线反而更安全。

[image] 珍妮·霍尔泽 (Jenny Holzer) 的作品。

那是2001年4月20日的中午。我和我的战友们与其他数百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一起在魁北克市拉瓦尔大学集合，准备加入阻止建立 “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峰会的抗议活动。在市中心，在数英里长的

防护栅栏和数千名防暴警察后面，乔治·W·布什和他的同僚们正在密谋推翻劳动法和环境保护法，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让他们的赞助人致富。

那天阳光明媚。越来越多的抗议者来到出发点。有一伙人甚至拉起了弹弓。警察不见踪影。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焦虑。我的大部分暴力经历都是亚文化的 —— 与光头党搏斗、硬核表演这类。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直接跟警察部队交手。在前一天晚上的一次会议上，当地的一位组织者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接近峰会周围的围栏 —— 那里有太多的警察，有太多的盔甲和防爆武器。

当人群开始走出大学走向街道时，我咨询了一位更有经验的同志。“我们是否应该退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问道。

他当时坚定地回答：“如果真的想要看清发生了什么，就必须走在前面。”

我们直接走到山顶周围的栅栏前，把它拆了。警察无法阻止我们。“美洲自由贸易区"从未获得批准。

[image] 2001年4月，无政府主义者在魁北克市“美洲峰会”的抗议游行上。

四年后，在乔治·W·布什开始第二任期的那天，我朋友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那天晚上，继白天反对就职典礼的游行之后，第二次游行在亚当斯摩根（Adams Morgan）附近涌动，打砸银行和公司企业，并袭击了一个警察分局。一些参与者在一栋大楼的外墙投下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 “从华盛顿到伊拉克 - 占领带来抵抗”。我们试图迫使布什政权结束对伊拉克的占领，这一占领造成了无数平民伤亡，并在后来促成了伊斯兰国的灾难性崛起。

游行队伍散去后，我和一位同志融入在人群中一起穿过小巷。在我们前面，警察出现在出口处。

当时我们本可以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跑。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站到人群后面去了，就会导致看不到我们正在奔向什么。“跑，向前跑！"我对同伴喊着。我们已经开始跑了。

我们冲过警察身边时，他们正好把警戒线拉到巷子口。“挡住，别让他们再出来了！”，我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吼道。

冲在最前面的我们是最后一批得以逃脱的人。警察对小巷的另一侧也进行了封锁。他们强迫走在我们后面的那些人在雪地里跪上几个小时。多年后，被拘留者从市政府那里赢得了一点赔偿，但不论如何还是能逃走比较好。

[image] 华盛顿特区，2005年1月20日 [image]

2008年8月25日，在丹佛举行的反对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示威游行中，几百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了一次已经宣布但从未组织过的游行。当时我们仍在抗议对伊拉克的持续占领和整个资本主义。

武装警察以每组十几人的规模部署在公园和周围的街道上，人数超过了围坐在一起、穿着黑色运动衫的年轻人。本来有一辆车要运送标语，但据说警察扣留了司机。然而，就在我们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几个年轻人拉起头巾，开始高喊。

这些人是谁？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在数百名防暴警察的包围下，他们戴着面罩，手挽着手，身后还有便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不管怎样，其他聚集在一起参加游行的人还是和这几个年轻人重新集合起来，开始向公园外行进。他们刚走到马路边，离得最近的一队警察就排成一排，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向他们喷射辣椒水。当时还没有发生抗议活动，我也没有听到驱散命令，而警察已经在使用化学武器了。

我和一位同志沮丧地看着这一切。我们大约还有两百多人，但警察正

从四面八方逼近，人群迷失方向，缺乏协调。这是一场灾难。

我们在人群的后面。但后方也可以变成前线，这只是一个主动性的问题。当时跟我一起的同志开始大喊倒计时。其他人也本能地加入进来。倒计时集中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期望、尤其是坚定了我们对自己是一支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集体力量的认识。随之，我们三十多人在草地上发起冲刺，远离了警戒线。

看到这一幕，其他人群也跟了上来。几秒钟内有数百人跑过公园，来到草坪远处的十字路口，那里的警察还没有聚集。

现在，空气中充满了活力，与刚才的萎靡和犹豫不决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穿过十字路口，一些有魄力的年轻人把一个市政标志拉到路口，上面写着“道路封闭”—— 我们已经接近了商业区。

傍晚时分，当我们看到前方一个街区的十字路口有一排防暴警察时，同样的原则对我们大有裨益。我和战友们没有丝毫停顿，立即朝向他们冲了过去。我们冲到警察队伍前，在他们挡住我们的去路之前，从他们中间躲了过去。警察奉命设置障碍，而不是追赶我们。我们安全了。

[image] 丹佛，2008年8月25日

[image]

2017年1月20日上午，我和另一位同志参加了在华盛顿市中心举行的反对唐纳德·特朗普就职的游行。自布什第二次就职以来的几十年间，全国各地的警察都已军事化，获得的预算越来越多，即使政客们声称没有钱做其他事情。这一次，街上挤满了 28,000 个条子。

游行一开始就与警察发生了公开冲突。警笛的呼啸声、近距离闪光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胡椒喷雾的刺鼻气味、警用摩托车的轰鸣声、肾上腺素咝咝作响 ——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恐惧，但我们周围的示威者却如鱼得水。我们的想法是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天就树立一个抵抗模板，向所有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任何人都不应被动地接受暴政的加剧。

我们在街头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危险。当我们再次经过富兰克林广场，在原路折回时，很明显，我们被包围只是时间问题。

在特区市中心，十字路口之间的街道就像建筑物悬崖峭壁之间的峡谷。我知道警察想把我们包围起来。每当我们通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我都会瞥一眼两侧一个街区外的十字路口，看看是否有警察在平行的街道上跟踪我们，准备切断我们的撤离路线。每当我们离开一个十字路口进入另一段“峡谷”时，我都会观察前后的十字路口是否有警察。每次在十字路口之间穿梭时，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攻击。

当我们接近第13街时，骑着摩托车的警察从我们左侧的人行道上经过，试图超过我们，抢占前面的十字路口。我们当时离路口还有几百英尺远。我催促同伴和我一起往前跑，我们冲过游行队伍的前方，冲过自行车警察和摩托车警察，他们开始用车冲撞紧跟在我们后面的人。当警察看到我们几个人已经在他们后面时，他们放弃了排成一排的努力，再次集中精力在我们前面狂奔。警察最讨厌被包抄，他们不能冒自己被包围的风险。

十字路口的冲突表明，游行队伍已经无法控制周围的地盘。是时候撤离了。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前不久，我们跑进了右边的一条小巷。其他一百多人也这样做了。继续前进的人在下一个十字路口被一排警察挡住了去路，转过身来才发现是两头堵，后面还有一排更强大的警力挡住了他们。

在长达两分钟的时间里，人群在混乱和沮丧中停顿了下来。游行队伍后面的一些人已经脱掉了装备，希望冒充平民混在人流中离开该地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四面八方围困。这种镇压方法叫水壶。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则继续穿戴着装备，手挽手。有人喊道："一起来倒计时！” 他们从十到一快速倒数，直接冲向前方的警戒线。冲在最前面的人撑开一把薄薄的雨伞，径直向前跑去。不知怎的，这把伞真的就保护了他们，让他们躲过了接踵而至的胡椒喷雾。

其中50人冲破警戒线逃了出来。而那些徘徊不前、等着看冲锋队是否能冲出重围再考虑是不是加入的人，则仍被困在水壶中。

后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条幽默的评论，大意是 “J20 抗议模拟器”的作弊码就是始终举起锤子冲向警察”。但这是有道理的。事后，在警方在随后的法庭案件中向被告公布的录像时，我们看到，即使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收紧了警戒线之后，仍有一个人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冲向他们，钻了出去，从而逃过一劫。

每个被拘留的人都被指控犯有八项重罪，最高可被判处八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在骚乱的游行活动中被集体逮捕。少数人接受了认罪协议，但大部分人都团结在一起，制定了集体辩护计划，正面对抗法律制度。最终，经过两次审判，所有被告都被宣布无罪，剩下的被告也都获得了指控撤销。多年后，他们都收到了州政府支付的赔偿金，以了结由此引发的诉讼。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比喻，但我想说的既有字面上的意思，也有比喻的意思，即：无论是游行还是打官司，冲在前面往往更安全。

[image] 华盛顿特区，2017年1月20日

几年后，我在亚特兰大参加了 “阻止警察城” 动员活动。抗议者一直试图阻止建造一座耗资数百万美元的设施，以进一步将警察军事化。作为报复，警方杀害了一人，并随意逮捕了大量人员，指控他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还以莫须有的敲诈勒索罪名起诉了其中 61 人。

在正式行动之前，在当地的贵格会社区中心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审议。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我们的目标是试图进军森林，占领建筑工地。我们都会被捕吗？我们是否也会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和敲诈勒索罪？讨论绕了一圈又一圈，人们试图预测会发生什么，并就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协商，但都毫无结果。

会议决定，游行队伍中将有三个自发组织的团队：基本上是前方、中间和后方。官方的说法是，这种区分并不是基于预期的风险，因为组织者无法预判警察会怎么做。但是，没有人能够在不回溯到更大问题的情况下考虑加入哪个团队 —— 我有多害怕警察和司法系统的暴力？我准备为这场运动牺牲什么？

只有少数敢于与恐惧和平相处并承诺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人显得从容不迫。即使在 “中间” 的团队内部，也有很多人在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我会站在中间，但不会站在中间的最前面……”

那天晚上，我向家人解释了如果我参加示威后没能平安回家，家人该怎么办。我的两个亲密关系都问我，参加这次游行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就不能把这个机会留给年轻的活动家吗？

走在前面更安全。我想起了以前动员时说过的这句话，但仔细想想，我又不那么确定了。直接冲进警戒线怎么会更安全呢？这句口号提炼了我自己的经验教训，但在进入另一个危险境地时，我还是心存疑虑。

动员日当天上午，我们在公园集合。尽管有几分节日的喜庆，但气氛还是很沉闷：几百人冒着受伤、被捕和入狱的危险，为的却是一场陷入困境的运动的荣誉。许多人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家里。我们列队走出公园，每个人都恪守自己在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的特定立场。只要我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行进，这样做还说得过去，但当我们走上主干道，向建筑工地前进时，这样做就不那么说得过去了。当我们接近警察和装甲车封锁的道路时，我们本应分散开，形成一条宽阔的战线，但没有，人群几乎排成了单行线，就像排队待宰的羔羊。

尽管如此，走在最前面的人还是加快了速度，他们用加固的横幅组成一个 V 形楔子，把雨伞指向前方，挡住了警察的视线，直接冲向了小规模战斗队伍的盾牌。我们其余的人拖在后面，坚守我们承诺的阵地—— 不能少，也没有更多。

[image] [image] 2023年11月13日，人们聚集起来开始“阻止警察城”游行。

手持加固横幅的人们将第一排警察击退，直到第二排警察增援。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松懈，而是继续向警察推进。警察们挥舞着警棍，但仍然节节败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群团结在一起，相互保护，顽强地前进。也许他们害怕，但恐惧没有影响他们坚定地行动。

从他们身后望去，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走在最前面，不需要做决定。警棍可怕，牢狱之灾可怕，重罪指控可怕，但真正可

怕的是责任。人们为了逃避责任，会在生活中忍受很多负面影响。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我们能够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我们就必须对自己负责。无论你是走在前面还是走在后面，甚或你根本没有出现在街头，在这点上都没有区别。

我看着前面的人把两排警察往后推，一直推到了由未来冲锋队组成的第三排。警察的制服下看不出任何人性的痕迹，甚至连眼睛都看不见。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社会。

冲锋队的条子们拿出了催泪弹。我眼看着他们把催泪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过走在最前面的人的头顶，扔进游行队伍的中间 —— 扔进我们这些希望别人替我们承担风险的人中间，扔进我们这些只想成为别人的机构附属品的人中间 …… 也许走在前面应该会更安全一些？

然后，一切都消失在一片有毒的白雾中。

我们狼狈不堪地踉踉跄跄地往回走，呛得直咳嗽。但冲锋队也对其他警察施放了毒气，而其他警察没有戴防毒面具。他们也撤退了。最终，这场战斗以平局收场。

最后，当天唯一被捕的人是一个选择在远离行动现场的地方充当支援角色的人。他被扣留在我们出发的公园附近的一辆车里。没有人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或敲诈勒索罪。

在我们的焦虑中，我们忘记了最大的风险，那就是：我们可能什么都不做，我们可能会被自己吓得放弃街头。在这么多人已经面临离奇指控的情况下，在建筑工地上游行是一个冒险的提议 —— 但如果允许国家镇压这场运动，就会开创一个威胁其他运动的先例，使当局有胆量在其他地方使用同样的镇压战术来对付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

有时候，只有冒一次险才能知道风险有多大。这一次，我们很幸运。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通过了一次考验。

[image] 2019 年万隆五一游行活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摄影：Frans Ari Prasetyo。 [image]

前线可能不安全。不如待在家里更安全是吧？—— 至少，在放弃反抗的长期后果显现之前，待在家里更安全。然后就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了。事实证明，趁早冒一些小风险以抵抗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才是最好的选择。

2017年8月，前往夏洛茨维尔对抗 “团结右翼” 集会的Antifa活动家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其中一人丧生，数人重伤。但是，如果他们留在家里，如果他们允许法西斯分子控制街道，整个世界都只会变得更加危险。我们今天有可能被迫重新打一场同样的仗，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为我们赢得了八年相对安全的宝贵时光。

即使一切真的无可救药，一般来说，最好还是大胆行动起来，像喀琅施塔得起义者那样，向世世代代发出希望的信号弹。这样做，你至少保留了一种可能性，即其他人会受到鼓舞，继续尝试建设你们所期望的世界，这样，有一天，你的梦想可能会实现 —— 即使那时候没有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你的努力。

我们今天的处境远非绝望。我们的确面临着强大的对手，而大多数人，包括政权的许多支持者，都有充分的理由与我们一起反对他们。如果我们能将人们团结起来，如果我们展示有效的反击方式，将我们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交由更大的斗争来支配，那么最终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在未来尚未定论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急于美化殉难、更不该接受失败。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冲锋在前。那会让人精疲力竭。但前线并不是一个空间位置。正确理解“前线”，这里并不一定需要您某种特定的体能或技能；“前线”是一种与事件打交道的方式，是一种专注于我们自身的方式，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采取主动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对对手的举措做出反应。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找出统治秩序中的漏洞并发起进攻，以开辟出一条新的斗争战线。 战线越多，我们就越安全。

面对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法西斯活动家不知从何入手。在上一届特朗普政府期间，我们与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对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却发现胜利被懦弱的民主党人从我们手中夺走，他们急切地接替了共和党人的工作，这一结果令许多人失望，以至于特朗普得以重新掌权。但这并不是我们这次放弃斗争的理由 —— 这恰恰表明，一直以来，我们对权力本质的认识是正确的，我们有责任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

在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形式的专制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大多数人并不一定支持当局；他们只是变得萎靡不振，习惯了被动。与自由派相比，无政府主义者更习惯人数和武器的不足、习惯于与难以置信的困难作斗争。当民主党人为法西斯分子找借口，甚至拥护法西斯的议程时，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应该证明，采取有抱负的、有原则的行动进行抵抗是可能的。

如果你感到绝望，如果你感到被打败，如果你发现自己心不在焉或只关注压迫者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你自己能做些什么 —— 这就是敌人在你内心占据领地的表征。

不要轻易让敌人拿走任何东西。专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每时每刻，无论你身处何地，你总能做些什么的 。照顾好自己和身边的人。留意机会，抓住机会。我们在战斗 —— 要相信这是一场我们可以赢得的战斗 —— 冲在前面，更安全。

[image] 2017年1月20日的雨伞冲锋 [image]

□

By Crimethinc

[image]

新法西斯时代，警惕实用主义者的“存在即真理”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3月31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ntifa 实用主义 新自由主义 普京 法西斯 特朗普 资本主义
[image] 编辑	MMartinez

[image]

下图这两天好像挺火的。但刘小枫教授这门生意其实不奇怪，而且相比下已经很弱了。与其并行的另一门生意更邪，也更危险。你可以称之为“存在即真理”，即它通过把当前的“新”法西斯政治之流行解读为有效甚至必要的存在，从而夸大其强韧性；一手虚无，另手反动。它能用正确的逻辑加事实，得出错误的结论。厉害就在这里。

接下来我会以简要的方式模拟一下这个思路，以方便您将来遇到时能及时识别它及其变体。

[image]

「1、这是一个经验证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模版。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 政治独裁。对多元化政治的阻挠，即使仅仅是幌子的多元。持续的技术性镇压，使人们不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了。

- 结合物质奖励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这种意识形态是民族

主义、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用政策手段对那些不坚定的人进行“再教育”- 逼他们去生孩子，或者送去参军。

- 国家军事经济，私营企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须严格受控。国家不怕花钱，但要保持预算平衡。“自由市场"不再是一种迷信，但仍是一种重要工具。

2、显然，上面这三点是相辅相成的。当经济强劲时，人们抗议的动力就会减少，因此镇压的成本也会降低。只有通过压制才能强化意识形态，人们接受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意识形态化有助于迫使人们接受国家的经济优先事项（例如不包括教育和医疗）。等等。

3、重要的是，起初并不清楚这一计划的可行性。一个在严厉制裁下国家机器质量参差不齐的国家能否实现这样的经济路线？镇压会不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意识形态化会不会造成相反的效果 - 疲劳和排斥？不会。都不会。

4、所有这些都是普京通过投资“新”法西斯主义实验而 “发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其他国家会试图复制普京主义 - 俄罗斯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模式，也就是采取作为极化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形式来维持资本主义的寿命。并且，这一计划被证实既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又能自己创造环境，从而刺激其他国家效仿。把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就不需要做任何事了。

5、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战争本身。战争给克里姆林宫提供了一个寻找新的社会重组方案的机会。而其他国家将试图复制一个军事化的俄罗斯，但没有战争。然而，好战的民族主义与经济军事化相结合，这种情况真的能避免吗？

6、欢呼吧，这就是普京的伟大，他已经打破了整个星球，很快到处都会有普京主义万万岁。显然，这种普遍的右转和法西斯化还有许多其他的先决条件，但军事普京主义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完。就是这样。

为新法西斯主义唱颂歌之所以能成为生意，是因为它能跟死不悔改的中间派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信徒的甩锅大法完美结合，前者有钱后者有嘴，死的都能说活了。

法西斯主义不论其目前状况如何、无论其形式或文化如何，它始终是仍然是绝对是毫无疑问是一种超级恐怖独裁 —— 是所有现有治理模式中最无效的最愚蠢的最邪恶的一种。

无论他们在那个时代如何气喘吁吁地呼喊“皮诺切特”和 “改革”，实验早已证明，恐怖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它就会自动导致其内部建立的体系崩溃。最终所有的“有效性”都被证明是虚张声势而已。

……

这一邪恶论述在期待“改变”的特朗普支持者身上可能会非常有效。他们中很多人只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纯粹的法西斯。理论上有可能在预示性的革命方案中找到真正的出路，但前提是，他们能识别类似这样的邪恶论述。

[image]

从旧时代的灰烬中破土而出 - 反革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重生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4月4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ntifa 中国 反动 反革命 左翼 新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 美国 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近一个世纪之后，无政府主义是如何从一个“边缘现象”发展成为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核心力量的？本文探讨了无政府主义如何在反革命时代获得重生。对于当下正处于新一轮反动时代大门口的我们这代人来说，本文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和见解值得更大范围周知 —— 以帮助您发觉和团结身边更有希望的革命力量。

本文和其他相关资料在近期的反法西斯社区新成员学习组中采用，现分享给所有读者。其中嵌入的链接中很多是相关书籍的免费下载地址，并将部分书籍封面作为插图以方便您寻找。这些书籍都有一定代表性，我们视其为推荐阅读，尤其是对于初步接触进步派思想的朋友来说。在华语读者熟悉的马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反动的两种主导气候中，这些书籍可能不常见。

- Table of

Content

第一部分：1960年代后的反革命
第二部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无政府主义
1. 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
2. 无政府女权主义
3. 生态无政府主义
4. 无政府主义与朋克
5. 革命的社会无政府主义
结论

[image]

无政府主义在1999年的西雅图战役中大放异彩。职业媒体只是在关注黑群行动组砸碎玻璃窗的壮观场面，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无政府主义在幕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这场战役中，活动家们组织起了自己的亲密团队，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虽然自我认同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整场运动中仍然占比少数，但反全球化运动因其拥护 “常识性”的无政府主义价值观和实践而闻名。

在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近一个世纪之后，无政府主义是如何从一个“边缘现象”发展成为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核心力量的呢？

本文探讨了二十世纪末美国无政府主义的地下发展。随着反动反革命重塑社会、新左派被暴力镇压殆尽、苏联解体，许多激进左派重新评估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政治。新一代激进分子与许多**60**年代的老兵一起，对失败的马列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努力应对社会、政治和经济

生活中的根本性变化。随着统治阶级奉行新自由主义和压制性的法律与秩序政治，大部分左翼人士放弃了建党和夺取国家权力的方向。他们对社会变革和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分析推动了许多激进派人士转向拒绝国家，20世纪末，无政府主义政治在整个激进左翼蔓延。

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打败“漫长的20世纪60年代”激进潮流的右翼反革命。借鉴科瑞·罗宾（Corey Robin）和保罗·维尔诺（Paulo Virno）关于保守主义和反革命的理论，本文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新右翼反革命看作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创建，它重新恢复了曾经激进主义的被扭曲的元素，而新右翼反革命正是对激进主义的反应。在美国，其表现形式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核心家庭的道德辩护并行不悖的男子气概个人主义、对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某些元素的重拾，以及将大规模监禁作为激进左翼和经济危机“解决方案”的压制性法律和秩序政治。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探讨激进左翼在这一时期的演变，以理解从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常识的日益转变。

在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漫长岁月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失败之后，进而讨论了无政府主义复兴及其在各种运动空间的地下发展的五个例子：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从被监禁的前黑豹党人中诞生；无政府女权主义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兴起；生态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朋克在普及无政府主义中的作用；以及全国性革命社会无政府主义组织（如“爱与愤怒”）的成立。通过这五个案例，文章分析了激进左派向无政府主义政治的转变 —— 无政府主义政治重视并摒弃国家，支持基层双重政权、直接自决、互助和取消等级制度的组织结构。只有将这种重新定位置于20世纪60年代后反革命的大历史变革背景下，才能理解这种重新定位。本文最终认为，无政府主义在 20 世纪末得以复兴，是因为它为反革命和国家社会主义危机引发的新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非国家导向的答案。

[image] [image]

第一部分：1960年代后的反革命

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1981-89年）经常被称为“里根革命”，这一

点很有说服力。这一说法表明，对20世纪60年代长期激进主义狂热的反击并没有简单地使美国回到60年代以前的状态，而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正如新右翼历史学家丽莎·麦吉尔（Lisa McGirr）所言，这场运动并不仅仅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而是 “传统主义与现代性的奇怪混合体”，“既是一种被动的力量，也是一种主动的力量”。

然而，麦吉尔的分析可能还不够大胆。新右翼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社会的改造最好被理解为对20世纪 60年代漫长的潜在革命的反革命。从1968年尼克松当选开始，到里根时期达到顶峰，反革命以暴力摧毁了有组织的左派，并将其某些诉求的变态版本纳入到新社会的构建之中。

本文对反革命的分析主要借鉴了两个理论框架。首先，政治理论家科瑞·罗宾（Corey Robin）认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并非真正反对变革，事实上，它总是呼吁对社会“进行意义深远的变革”，其目的是对抗激进运动。罗宾分析了美国历史上的这一趋势，并得出结论：

「面对革命的挑战，美国反革命分子不会从左到右。他们是从右到左。虽然他们反对政治平等主义计划，反对利用国家权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但他们通过披着“自由民主”的斗篷来推进他们的反对。他们采用并调整自由民主的文化和话语，使用权利和改革的语言是为了倒退和反动。」

[image] [image]

这是理解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反革命的一个有益起点。右派夺取了政权，并将其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披上了“自由民主、自由和平”的外衣。

我们可以借助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保罗·维尔诺（Paulo Virno）的观点更进一步，他指出：反革命不仅是新事物的创造，其本身也是由其所反对的革命运动的轮廓所塑造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反革命实际上是反向革命”。[......]它积极建立自己的 “新秩序”，塑造新的精神、文化习惯、品味和风俗，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占领并殖民了对手的领土；它对同样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

维尔诺继续论证道，“反革命颠覆了那些似乎与国家权力的萎缩和激

进自治的内在性有关的群众实践……这就是为什么批判性史学……必须试图在反革命的每一步和每一个方面中认识到潜在革命的轮廓、内容和特质”。

因此，为了理解无政府主义在这个时代的复兴，有必要确定国家将进步目标转变为反革命政治的主要轮廓。

[image]

美国反革命的每一个显著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 20 世纪 60 年代长期激进主义的扭曲阴影为开端的。尽管反革命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归结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具体变化，但它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重塑了从工厂工作组织到个人主体性的一切。

这场反革命包括对左翼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暴力镇压，但同时也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在核心家庭的背景下倡导男子气概个人主义，恢复民权运动的某些方面，并建立了一个被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称为 “黄金古拉格 ”的庞大监狱系统。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自由主义是一场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革命可能性的全球性反革命。新自由主义总是既试图恢复想象中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又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以“法律和秩序”为名义实施大规模国家暴力为共同特征创造一个“新社会”。

[image] [image]

反革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扭曲了劳工运动左翼的解放冲动。在整个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大多是由试图控制其工作条件的工人推动的。他们抗议福特主义工厂制度下非人性的工作条件，破坏流水线上非人的工作节奏。持不同政见的工人为争取尊严和对工作场所的民主控制而斗争。

这种工人反抗与种族正义斗争紧密相连，因为工会为运动提供了物质支持，黑人工人倡导工作场所的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

资本非常愿意拆除福特主义工厂，因为它可以通过外包和生产方式改变获得更多利润。最重要的是，生产本身的特征也被重新塑造，以纳

入被扭曲的工人诉求。黑人工人在工作场所获得了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但却同时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之外。生产被分散化，转向以小型“团队”为基础的工作，同时保留了其整体的等级制和反民主特征。最重要的是，工会组织的力量被削弱了。里根在**1981**年臭名昭著的阻止了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这是权力关系发生更广泛转变的征兆。这些经济变化和有组织劳工的历史性失败为更广泛的反革命提供了基石。

[image] [image]

反革命的社会核心是重申新自由主义的男子气概个人主义，同时在道德上捍卫 “传统”的核心家庭，将其视为抵御共产主义、女权主义和性解放等“邪恶异端”的堡垒。这也恢复了60年代某些激进主义的元素。由于学生和工人都拒绝接受自己的社会角色，个人对战后大众消费主义异化现象的反抗十分普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对早期 “人文主义 ”马克思的推崇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深度，而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等无政府主义者则探讨了战后社会中 “荒诞成长”的问题。

60 年代的激进分子，尤其是 “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中的激进分子，努力为了从资本主义劳动、国家官僚机构和令人窒息的核心家庭的束缚中找回个人人性而斗争。但反革命却继承并扭曲了漫长的 60 年代的激进个人主义，重新赋予家庭反动的角色。个人反抗首先被纳入 70 年代自恋的“自我十年”，然后被纳入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这种粗犷的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男性固有的，并与福利和其他社会项目的女性化和种族化受助者形象相抗衡。个人权利 —— 被认为是白人和男性的权利 —— 在社会和经济权利遭到否定的同时得到了促进。这也与 “养家糊口的保守主义”（丈夫/父亲可以通过辛勤工作养家糊口）的男性意识形态中对核心家庭的推崇密不可分，这种意识形态被视为抵御所谓女权主义对基督教道德攻击的堡垒。 对个人解放的扭曲和对“核心家庭”的重新确立是反革命社会转型的关键。

[image]
✂

女权运动的自由派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收编并击败。虽然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设法赢得了小规模的战斗，但她们输掉了更广泛的斗争。甚至在里根之前，女权运动的激进派就已经让位于更加去政治化的文化女权主义了，这种文化女权主义拒绝接受革命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激进女权主义，转而支持分离主义的文化机构。全国妇女组

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和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等团体中的主流女权主义者在融入民主党的改良派世界时，将其组织专业化和制度化。

为了应对新的社会和政治限制，这些大多属于 中产阶级 的白人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试图在避免挑战 整个资本主义父权制结构 的情况下，通过非营利组织或在《财富》500强企业中制定“反性骚扰政策”来促进妇女的利益。

正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劳拉·布里格斯（Laura Briggs）所描述的那样，妇女解放运动的变革愿景已经丧失，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 “时间/工资/生殖劳动危机” 则 “代表了特定女权主义和种族正义政治愿景的失败”。

主流女权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后卫战斗，以减轻这种变革的最坏影响，但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那个时代的框架限制，放弃了激进变革的希望。

[image] [image]

反革命的灵活性突出表现在它对民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反应上。“合法”的民权相对容易恢复。虽然民权对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但民权并不一定会挑战种族资本主义本身的运作。事实上，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法律上的不平等既阻碍了资本主义的顺利运作，也阻碍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共运动。

虽然拆除了吉姆-克罗的正式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重大胜利，但白人至上主义在反革命中被保留下来了。尼克松拥抱 “黑人资本主义”作为对黑人权力的回应，是应对黑人自决冲动的狡猾转向，为取消福利和其他社会计划提供了掩护。

工作场所在法律上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而对老板和工人之间实际权力动态的挑战却受到了压制。这样，国家就能够恢复民权运动中不那么激进的一派，并将其与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更激进的一派区分开来，而国家原本打算彻底摧毁后者的。

因此，国家能够吸收**20**世纪**60**年代漫长的种族正义运动中的某些元素，在正式的法律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幌子下将其诋毁和收编，并转而镇压和摧毁最具颠覆性的挑战。再次强调科瑞·罗宾的观点：反革命“是为了倒退和反动而使用权利和改革的语言”。

[image] [image]

虽然反革命在某些领域歪曲了自由主义的诉求，但它以法律和秩序政治的更新补充了有限的恢复，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监狱社会。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监狱大发展既是对60年代漫长的激进主义的直接回应，也是对政治经济危机的更广泛 “修复”。正如露丝·威尔逊·吉尔摩 (Ruth Wilson Gilmore) 所言，将监狱视为边缘化的 “边缘”空间是错误的；事实上，她说，“监狱”实际上处于当代社会混乱的中心。

国家扩大监狱系统是为了解决三个历史“问题”。首先，监狱数量的增长是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镇压激进派运动的核心。随着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左翼分子开始采用游击战术，抓捕监禁激进分子成为当务之急。其次，监狱的转型是为了应对囚犯本身，尤其是黑人民族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情绪。随着监狱数量的增加，监狱也进行了有限的改革和内部改造，以孤立和瓦解黑人激进分子。

最后，监狱被用来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监狱被认为是吸收 **1960** 年代后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人员、土地、资本和国家能力'过剩的最佳选择。

大规模扩张监狱系统为资本投资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回报，同时还能解决新自由主义将工作外包导致的日益绝望的失业人口问题。

要强调的是：监狱国家的发展是反革命的核心要素，因为它既遏制了左派， 又为**1970-198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 。

[image]

总之，新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极大地重塑了美国社会。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重塑了生产体系，并部分地通过恢复反对福特主义工厂的斗争，消灭了劳工运动。随着福利制度受到冲击，反动的男性气概个人主义被重新灌输，妇女运动的自由派被资本主义制度吸收。黑人获得了形式上的法律平等，而民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却遭到暴力镇压。最后，监狱系统的扩张既是为了遏制激进左翼，也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这场反革命为激进左翼在 20 世纪末走向无政府主义奠定了基础。

[image] [image]

第二部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无政府主义

20世纪末社会的变迁给左派带来了危机，动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产生了反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

危机主要有两种形式。

首先，国家对激进组织和革命战士发起了全面攻击。从联邦调查局的渗透和破坏，到长期监禁，甚至直接暗杀，国家对其认为所有来自革命力量的威胁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黑豹党到"地下气象员"，国家基本上击败了所有新左派的革命力量。

在这种正面攻击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和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也动摇了马主义左派的分析和纲领。生产离岸外包到全球南方，削弱了老左派的工业工人阶级基础，而镇压则使民族解放运动迷失方向，而民族解放运动曾是20世纪60年代漫长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对许多激进分子来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工厂工人的传统方法不再可行。此外，夺取国家似乎不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夺取国家是不可取的，这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早先几代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批判如出一辙。

苏联的衰落和解体、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向、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1983年 “转向紧缩政策”的 “背叛”、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1990年在尼加拉瓜的选举中的失败，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在去殖民化世界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失败，都促使全球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模式进行重新评估。

[image]

新一代激进派批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转向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没有消失，但无政府主义发展得更快，重新获得了激进左翼和更广泛社会运动的关注。

这既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对马主义左派的摧残，也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新理论和新实践的发展。

正如安德鲁·康奈尔（Andrew Cornell）在他的《美国无政府主义历史》中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和重塑经典的无政府主义政治，但他们在更广泛的左派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明显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马克斯·埃尔鲍姆在其关于60年代后新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性历史研究中所言，到**20**世纪末，无政府主义在民众运动中的影响力已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黯然失色。

经过几十年的地下发展 ，世纪之交的全球正义/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标志着无政府主义政治的复兴。

[image]

除了下文即将讨论的正式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之外，无政府主义精神已遍布激进左翼。正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2010年所说那样，“对于活动家来说，‘无政府主义进程’已成为如何促进集会或组织街头行动的基本原则的同义词”。 这种无政府主义进程包括基于共识的决策、以横向和无等级的方式组织、以网络和自下而上的联盟（而非民主集中制政党）的形式凝聚起来，以及致力于多种形式的直接行动。

那么，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如何从边缘力量成长为世纪之交社会运动中激进派的“常识性”主导因素的？

[image]

20世纪末是对激进实践进行重新评估的时期，也是产生新理论以分析资本主义和国家不断变化的性质的时期。本文的最后将分析有助于重振无政府主义的五种政治倾向，它们体现了激进左翼各阶层对无政府主义的普遍转向。首先，讨论的是几位前黑豹党政治犯对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化，他们将无政府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

【注 - 关于术语的说明：“黑人无政府主义”和“新非裔无政府主义”这两个术语在这一传统中存在争议。有些人自认为是其中之一，而另一些人则完全拒绝这些标签。考虑到这些分歧，本文仍然认为将其确定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倾向是有帮助的，这种倾向与大部分白人无政府主义运动不同，并选择将其称为“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

其次，无政府女权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获得了牵引力，因为她们的批判扩大到了对国家的分析，指出国家本质上是父权制结构，必须拆除而不是夺取。

第三，生态无政府主义出现在激进环保运动的中心，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马主义。

第四，无政府主义在朋克亚文化中孕育并进一步发展，而朋克亚文化本身就是对60年代后反革命时期不断变化的社会状况的一种反应。

最后，谈及的是大陆社会无政府主义联盟的崛起，主要是“爱与愤怒”，其运作规模是20世纪初以来从未见过的。

结尾时，本文将反思反革命是如何为无政府主义政治的复兴提供条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乔迪·迪恩（Jodi Dean），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复兴不过是“不满青年对新自由主义的镜像”。在谈到占领华尔街时，她笼统地声称 “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治，吸引了在新自由主义

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他们曾被教导要赞美自己的独特性”。

本文认为，这种批评并不能充分解释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和对革命左派的持续吸引力。相反，无政府主义之所以重生，是因为它为反革命和国家社会主义危机导致的新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却无法做到这一点。20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为无政府主义在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中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image]

1. 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

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诞生于反革命的核心：监狱系统。如前所述，蓬勃发展的监狱系统是右翼反革命的核心。监禁众多革命者有助于瓦解激进组织，而更广泛地说，大规模监禁的诞生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并且与此同时监狱也是黑人激进传统的核心。正如丹·伯杰（Dan Berger）在《被囚禁的民族：民权运动中的黑人监狱组织》（2014 年）中所指出的，监狱是黑人运动政治发展的关键场所，从1950年代民权运动中将南方监狱重新概念化为运动空间，到1970年代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

伯杰对黑人监狱政治的兴衰进行了扣人心弦的描述，涵盖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倾向。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从未提及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在监狱中的发展，尽管他经常提到和引用最著名的黑人无政府主义者之一阿散蒂·阿尔斯通（Ashanti Alston）的话。包括阿尔斯通、库瓦西·巴拉贡（Kuwasi Balagoon）和洛伦佐·科姆博阿·埃尔文（Lorenzo Kom'boa Ervin）在内的前 “黑豹”组织成员将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理论化为20世纪末黑人革命斗争的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

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者批评了他们所认为的黑豹党的缺点，将无政府主义与黑人民族主义相结合，并将黑人公社理论化为黑人自决的革命形式。虽然他们称赞黑豹党是20世纪60年代漫长岁月中的领导组织，但也批评了该党的专制主义、等级制和父权制倾向。他们对黑豹党的失望导致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黑人民族主义方法的更广泛的批判，这促使他们转向无政府主义。

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综合了黑人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坚持反国家的民族主义。他们认为，美国黑人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但民族解放可以而且必须在不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进行。阿善堤·阿尔斯通认为，革命者必须 “超越民族主义，但不能没有民族主义”。正如他所说，革命黑人民族主义者或许拥有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政治。然而，阿尔斯通也强调，我们必须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去除等级制度的方式阐明民族自决，这样民族自决才不会被国家所俘虏。

[image] [image]

在《无政府主义与黑人革命》一书中，洛伦佐·科姆布亚·埃尔文（Lorenzo Kom'boa Ervin）于1979年在狱中首次撰写了一系列小册子，提出了 “黑人公社”计划，该计划由地方社区控制，通过嵌套公社联盟进行协调（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 “公社的公社”，重点关注黑人解放）。

埃尔文出狱后，在“爱与愤怒革命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协调下，于1993年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宣传该书的新版本，联合会还在其报纸上刊登了该书的节选。

虽然埃尔文不久后脱离了“爱与愤怒”组织，但他仍然活跃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他的作品为有色人种无政府主义组织和倾向奠定了重要基础。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黑人无政府主义的每一位主要理论家都是前黑豹党人，他们在监狱高墙内批判了黑人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等级制度。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是反革命压迫及其抵抗斗争的产物。虽然他们在 20 世纪晚期的黑人社会运动中相当边缘化，但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在这个时代（与黑人女权主义和黑人马克思主义等更大的倾向一起）为最近黑人无政府主义和废奴主义的普及奠定了一些基础。

2. 无政府女权主义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等级制度，但无政府女权主义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作为一种明

确的政治倾向发展起来的。

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将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等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和舒拉米丝·弗里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等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对父权制的批判扩展为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和压迫的全面否定。除了批判公开的男性主导地位之外，她们还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国家本质上都是等级制和父权制的。因此，妇女解放必须摧毁它们。除了自我认同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外，妇女解放运动更广泛地奉行海伦·艾伦博根所称的 “直觉无政府主义”。

女权主义者对既定的社会传统持怀疑态度，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力持谨慎态度，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等级制度。在实践中，女权运动是无中心的、无等级的，主要通过协商一致的决策来运作。正如林恩·法罗（Lynne Farrow）1974 年在女权主义杂志《极光》（Aurora）上写道的那样，“女权主义实践着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image] [image]

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主要通过伊萨卡的“提亚马特集体”等分散的小团体开展活动。提亚马特（1975-78年）既是一个提高认识的团体，也是一个对外的政治组织。他们发行了一期名为 “无政府女权主义笔记” 的全国通讯，并于1978年在纽约州伊萨卡组织了一次无政府女权会议。这次会议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无政府-女权主义团体，以发展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建立个人关系，协调运动。

尽管一些女性批评这次会议的参与者主要是白人和中产阶级，但它却是无政府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回过头来看，它标志着无政府女权主义在更广泛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开始走向终结 —— 里根对女性的攻击所带来的反革命反弹正在开始，女权运动面临着历史性的失败，这改变了女权主义和左派的特征。

无政府主义者为在反革命时代保持女权主义的活力而斗争。与开始将活动专业化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继续在激进运动中开展活动。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加入了反核运动和其他生态运动，特别是参加了 “蛤壳联

盟”（Clamshell Alliance），该联盟反对在新罕布什尔州建造核电站，并帮助引发了整个反核运动。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一起，传播了去中心化的、以共识为基础的亲密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定义了这场运动（尽管布克钦对共识政治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

更广泛地说，无政府女权主义者参与了1980年代的各种左翼斗争，包括中美洲团结工作和生育自由运动。她们继续在妇女健康诊所、家庭暴力庇护所和其他妇女基础设施中工作或担任志愿者。她们形成了非暴力革命直接行动运动的前沿，并在新左派失败后帮助塑造了反对派社会运动的特征。

学者和活动家都认为，（无政府）女权主义者的实践为20世纪末无政府主义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基础，从亲密团队组织到基于共识的决策制定。她们还在更广泛的“新社会运动”中普及无政府主义的分析和实践，这些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越来越多地接受无政府女性主义对统治和等级制度的分析。

[image]

3. 生态无政府主义

20世纪 60-90 年代发展起来的激进环保运动的核心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猖獗的工业化，以及倾向于将环保行动推迟到“革命之后”。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如著名的“地球优先”（Earth First!） 运动的活动家朱迪·巴里 (Judi Bari)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环境的做法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反映了所有国家都将经济增长和稳定置于环境健康之上的事实。

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化是更广泛尝试修改 新时代无政府主义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无政府主义对生态的关注也扩大了它对新一代环保活动家的吸引力，这些人看到了激进变革的迫切需要。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淡化了环境斗争的重要性，甚至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政策，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反击对地球造成的灾难性破坏。

[image]

各种无政府主义立场竞相争夺激进环保运动的领导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默里·布克钦提出了“社会生态学”理论，将社会无政府主义与生态思想相结合，主张采取分散的政治行动来建设生态社会。

与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相反的是生态驱动的“无政府原始主义”，以《第五阶层》报纸为中心，它超越了新左派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略，直接批判工业文明本身。这两种倾向都对上述反核运动产生了影响，无政府女权主义也是如此。后来，“地球优先”和“地球解放阵线”等组织在对深层生态学日益深入的投入中，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

当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信奉素食主义和动物解放，部分原因是出于环境原因，并进一步发展出一种“全面解放”的交叉愿景。

[image]

生态无政府主义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地球解放阵线”行动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在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活动中，卡车司机和海龟工会（工会和环保主义者）的联盟也备受赞誉。无政府主义对生态的关注有助于解释它在环境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为什么越来越有吸引力。

[image]

4. 无政府主义与朋克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反革命时期，朋克是无政府主义发展的重要渠道。社会学家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在其关于英国亚文化的经典著作中指出，朋克在很多方面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反革命的背景下诞生的。

朋克场景在一代心怀不满的年轻人中灌输了反叛、另类文化和激进政治。当然，并非所有的朋克都是无政府主义的 - 远非如此。它所表达的愤怒和疏离感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去政治化的青年人甚至纳粹光头党。我们也必须承认，许多无政府主义朋克对反社会的姿态比对建立革命运动更感兴趣。然而，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在亚文化中努力将 DIY 的反权威精神传播到了有组织的激进左派的世界之外。

[image]

在“性手枪”（Sex Pistols）等团体早期的风格反叛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亚文化场景朝着更加明确的政治方向发展。Crass、Nausea、Reagan Youth等乐队都以无政府主义歌词为特色，在歌曲中穿插政治演说，并在演出中分发激进文学作品。

朋克“自己动手”的精神本质上也有很深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与主流音乐界不同，朋克是自发组织的，并没有企业唱片公司。乐队自己录制和发行音乐，自己预订演出，睡在集体宿舍的客厅地板上。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杰西·科恩（Jesse Cohn）称朋克为“无政府主义抵抗文化”，它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从根本上被疏离的世界”面前“预示了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世界”。

尽管非裔朋克具有解放潜力，但其创始人詹姆斯·斯普纳（James Spooner）则强调说，美国的朋克“非常非常白人”；像坏脑乐队（Bad Brains）和洛斯·克鲁多乐队（Los Crudos）这样的特例只是更加印证了这一点。这限制了朋克支撑广泛革命运动的能力。

[image] [image]

在去政治化和反动潮流的背景下，无政府主义者在朋克世界中培养了激进的形式和内容。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杂志《亵渎的存在》（Profane Existence）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政治朋克复兴中起到了关键的催化作用。编辑部集体在一篇名为《无政府状态、朋克和乌托邦》的文章中解释说，"我们完全相信‘自己动手’的朋克伦理是一种革命伦理。如果你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你就必须 **DIY**"。

这意味着要组建'自愿、无等级、平等、直接民主、鼓励所有集体成员全面参与、与其他革命集体开展互助活动'的集体"。

[image]

《亵渎的存在》编辑、《恼怒的鼓手》（Pissed drummer）和未来的《爱与愤怒》（Love and Rager）作者乔尔·奥尔森（Joel Olson）鼓励朋克拥护革命政治，与被压迫人民建立联盟。奥尔森的《新朋克宣言》发表于1992年的《亵渎的存在》上，是无政府主义朋克政治发展

的开创性文献。

他描述了朋克是如何“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废料堆中生长出来”，“让我们在后工业化世界中生存下来，同时挽救了我们的独立、自由、创造力和人性的完整性”。

朋克通过建立激进网络、传播反叛文化和普及无政府主义的直接行动精神，预示了未来的非商品化世界。吉姆·多纳吉（Jim Donaghey）称之为“朋克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战争”（英国）和“犯罪组织”（美国）为朋克无政府主义提供了组织形式和宣传手段，从而使朋克和无政府主义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image] [image]

5. 革命的社会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在里根担任总统期间重建了一个协调的全国运动。1986年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集会是为了纪念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一百周年而举行的（在该事件中，多名无政府主义者因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劳工示威活动中投掷炸药而遭到诬陷和处决，引起了全球的愤怒），这次集会引发了在明尼阿波利斯、多伦多和旧金山举行的一系列年度集会，普及了革命性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新思潮。

这些集会在1989年达到高潮，促成了一份名为《爱与愤怒》的大陆无政府主义报纸的创立。该组织进而展成为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并于1993年成为一个会员制联合会。《爱与愤怒》于1998年解散，其分支机构遍布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它是二十世纪末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组织，对当代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轨迹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爱与愤怒”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的老成员，该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从托洛茨基主义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这体现了这一时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无政府主义的持续转变。

https://youtu.be/g4YyNxuxZ5Y?si=s0pkW7nAD8R0eGzr
[image]

“爱与愤怒"试图为新时代重新构想革命无政府主义。该组织的政治声明印在每份报纸的开头，它解释说：“我们支持推翻一切形式的威权社会关系，建立一个以合作、团结和互助为基础的社会”。

在这份声明中，他们谴责国家、资本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专制和不公正。他们还表示支持女同性恋、双性恋、男同性恋和青年人的斗争。

“爱与愤怒”是为数不多的明确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之一，这些斗争在《第五阶层》和《无政府状态：武装欲望杂志》等主要无政府主义刊物中经常被批评为“无可救药的国家主义”。他们建立在六十年代白人反帝国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同时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重新想象。

虽然该组织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白人，但许多成员都拥护种族反叛政治 —— 这是诺埃尔·伊格纳季耶夫（Noel Ignatiev）等人提出的一种种族革命理论，旨在削弱白人特权，从而废除白人这一社会类别。在阐述这些斗争时，“爱与愤怒 ”提出了一种交叉性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

然而，尽管他们致力于革命，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并非主要面向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对工人运动的摧残 —— 实际上是对大部分工业工人阶级本身的摧毁 —— 导致激进派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找革命基础。

[image]

“爱与愤怒”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将他们的革命战略建立在构建基层双重权力的基础上。他们反对《第五阶层》和《无政府状态》等主要无政府主义出版物中的反组织的个人主义，强调有必要制定协调一致、纪律严明的战略。

在1998年一篇关于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的文章中，联合会联合创始人克里斯·戴（Chris Day）提出了在美国建立双重权力的愿景。虽然“双

重权力”主要与列宁主义的俄国革命传统有关，即工人苏维埃在夺取国家权力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建立平行的权力结构，但戴通过带有萨帕塔主义者色彩的草根无政府主义对其进行了重新构想。建立无政府主义的双重权力意味着建立无等级的机构和组织，以对抗并最终取代国家和资本主义。

它借鉴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试图 “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立新世界”的传统：这个新生世界将与国家霸权抗衡，但并不试图征服它。

“爱与愤怒”还大量借鉴了西德自治派和西欧其他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验，他们建立了像寮屋和信息商店这样的激进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衰落的劳工运动中挣扎。

[image] [image]

“爱与愤怒"是更广泛的革命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群体的一部分。与 “爱与愤怒”组织有联系的 “反种族主义行动”（Anti-Racist Action）发展了以行动为导向的反种族主义实践，是当代美国反法西斯主义的先驱。

“黑人自治联合会”（Black Autonomy Federation）深受之前讨论过的 “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无政府主义组织之一，这些组织为被主流白人无政府主义疏远的有色人种发展无政府主义政治提供了空间。

每个组织还受到女权主义理论的启发，这些理论支持妇女和非二元的解放，并批判男性主导的政治。

革命性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是左翼复兴的核心，因为它为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传统提供了一个交汇点，这些传统共同为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创造了一种革命性的交叉政治。

[image]

结论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会在这个反革命时代发展壮大？最后本文将强调的是促使无政府主义重生的关键发展。

首先，暴力镇压摧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为无政府主义再次扎根留下了空间，这是20世纪初以来从未有过的。其次，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失败，以国家为导向的左派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失去信誉。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批判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方面，国家日益被视为专制的工具；另方面，国家作为权力和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的地位日益下降。同样重要的是，全球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为无政府主义的重生创造了条件。

无政府主义者在反革命中幸存下来，并针对 20 世纪不断演变的社会状况提出了新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他们为反革命带来的新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同时也从新旧左派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

黑人/新非裔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了黑豹党，创造了黑人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新融合，进而又影响了有色人种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当代废奴政治。无政府女权主义者将父权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并推广亲密团队组织和基于共识的决策。以生态为导向的无政府主义者将社会生态学理论化，批判工业文明 —— 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遗留下来的灾难性环境问题 —— 并使日益壮大的环境正义运动更加激进。朋克发展了自己动手的实践和反对派网络，有助于向一代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灌输无政府主义价值观。

最后，革命性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 “爱与愤怒”组织，在大陆范围内发展了革命性的交叉无政府主义运动。

这五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激进主义复兴的核心，表现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正如19世纪末的第一个全球化时代那样，无政府主义再次成为激进左翼的驱动力。

By 斯宾塞·贝斯维克，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无政府主义

和左翼的历史。

[image]

反法西斯的五个历史教训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4月20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ntifa 不平等 代议制 反法西斯 国家 国家主义 左翼 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 无政府主义 极右翼 民族主义 法西斯 资本主义 选举

[image] 编辑 [image]iyp

所谓的不稳定阶级是最原子化的阶级 ……"不稳定阶级内部自相残杀。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指责另一部分人的脆弱和不值得的生活方式（例如，临时工反感下层服务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底层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人们相互对立，使他们难以意识到社会和经济结构本身才是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民粹主义政客和新法西斯主义呼吁所吸引，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过程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展开……" —— 盖伊·斯坦丁

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并且可能很重要 - 忽略阶级复杂性只会让进步派进一步失败。2024年被称为全球大选年，但是，70场选举中的大部分都是反民主的，它们只会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专制和保守进一步上升。阶级不是全部原因，但它应该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本文和其他相关资料在近期的反法西斯社区新成员学习组中采用，现分享給所有读者。

- Table of Content

  1. 法西斯革命从未成功。法西斯分子是合法掌权的。
  2. 许多战时反法西斯领导人和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传统反革命政治的变种。他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直到为时已晚。
  3. 由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原因，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领导层在准确评估法西斯主义威胁方面往往慢于其党内普通成员，在倡导激烈的反法西斯对策方面也慢于其党内普通成员。
  4. 法西斯主义窃取左翼意识形态、战略、形象和文化。
  5. 形成法西斯

主义并不需要
很多法西斯分
子。

[image]

本文简要分析了许多反法西斯人士从历史中汲取的、或者被认为应该汲取的五条主要教训。每一个教训都从对特定现象的事实描述开始，然后进入反法西斯对相关历史事实的解读。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这些事实可以有多种解释。本文并不声称是这段历史的“全部”教训，但它们揭示了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些历史基础。

[image]

1. 法西斯革命从未成功。法西斯分子是合法掌权的。

首先是一些重要事实： 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不过是将其之前已经存在的政府邀请合法化。希特勒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惨遭失败。兴登堡总统任命他为总理后，他才最终掌权。议会通过了授予他全部权力的《授权法案》。

对于激进的反法西斯活动家来说，这些历史事实让他们对自由派左翼的反法西斯方案产生了合理的怀疑。该方案的基本内容是：相信理性辩论能够抵制法西斯思想，相信警察能够抵制法西斯暴力，相信议会政府机构能够抵制法西斯夺权的企图。毫无疑问，这一方案有时候也许有点儿用，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其他很多时候它都毫无作用。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以情感化的、反理性的诉求出现的，其基础是关于重振民族活力的男性式承诺。虽然政治论证对于吸引法西斯主义潜在的群众基础始终很重要，但在面对拒绝理性辩论条件的意识形态时，其锋芒就会被削弱。理性并没有阻止法西斯或纳粹。虽然理性总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从反法西斯的角度来看，理性本身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历史表明，议会制政府并不总是法西斯主义的屏障，这并不奇怪。恰恰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它更像是一条红毯。当战时的经济和政

治精英们感到革命前景对他们构成了足够的威胁时，他们就会求助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来无情地镇压异己以保护私有财产。

虽然将法西斯主义完全归结为濒临灭绝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手段并不十分准确，但其构成要素在资本主义命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当战时的专制领导人感觉受到的威胁小得多时，他们往往自上而下地实施法西斯政策。对于大多数革命者来说，这意味着反法西斯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他们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继续煽动阶级之战，法西斯主义就会作为解决民众动乱的独裁方案始终在背景中若隐若现。

至于对"警察抵制法西斯暴力"的想法 —— 有些时候警察的确可以逮捕和压制法西斯分子，但是历史记录显示，警察与军队一样，也是最渴望 "恢复秩序" 的人群之一。研究表明，在过去多年中，投票支持 "金色黎明"和 "国民阵线"的警察比例很高。 在美国，许多警察显然欢迎特朗普成为 "Blue Lives Matter" 总统，允许执法部门继续不受阻碍地骚扰和谋杀有色人种。最近有消息称，联邦调查局几十年来一直在调查白人至上主义对执法部门的高度渗透，这令人惊讶（尽管并不意外）。此外，无论美国警察队伍的构成如何，它从南方奴隶巡逻队和北方镇压劳工运动发展而来这一事实，足够让人们对其在白人至上主义刑事 "司法"系统中的作用有了深入了解。

综上所述，法西斯起义总是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能减少人们对法西斯起义的担忧。意大利法西斯的 "紧张战略"、美国三K党领袖路易斯·比姆（Louis Beam）提倡的 "无领导抵抗"的独狼概念的发展，以及乌克兰Maidan起义双方发展起来的法西斯武装斗争，都证明了法西斯暴力叛乱的实质危险。

必须强调的是，从历史上看，法西斯主义进入权力殿堂并不是通过砸碎大门，而是通过说服守门人礼貌地打开大门。

[image]

2. 许多战时反法西斯领导人和理论家在不同程

度上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传统反革命政治的变种。他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直到为时已晚。

只要有革命，就有反革命。每一次巴士底狱的暴风雨，都会有一次“热月”。巴黎公社之后，数百人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和驱逐出境。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五千多名政治犯被处决，三万八千人被监禁，同时还发生了690起反犹大屠杀，造成三千多人死亡。欧洲激进派活动人士和少数族裔对传统反动暴力并不陌生。

然而，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一种新事物。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技术和官僚主义方面的创新为帝国主义和种族灭绝提供了载体，欧洲曾将这些东西输出到世界各地，继而将其歼灭战带回国内。

毫不奇怪，许多左翼评论家最初将法西斯主义概念化为现有的反革命力量。根据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说法，意大利法西斯分子 “在严格意义上是白军”，指的是俄国革命中的反革命分子；英国共产党称他们为 “意大利版的黑棕部队”，指的是爱尔兰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反革命势力。20世纪2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匈牙利共产党人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对 “白色恐怖”的分析，认为墨索里尼的中队只是统治阶级的非意识形态堡垒。

另一方面，一些评论家确实强调了法西斯主义的独特之处。他们承认法西斯的民族主义调戏了社会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的新颖性。他们观察到，传统地主和资产阶级资本家等以往对立的阶层如何能够形成一个联合的反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关注法西斯主义潜在的阶级动力，揭示了这一令人费解的新理论中中间派观察家未能把握的一些要素。然而，这种关注也倾向于将法西斯主义可能造成的潜在危险限制在了其作为统治阶级保镖的所谓角色范围内，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其他人未能预见到法西斯主义的暴力范围将如何大大超出保护资本主义企业的 “必要”范围。此外，尽管战时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在上层阶级的支持下从中产阶级选民中发展起来的，但随着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它们有时会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 马克思主义者迟迟未能完全接受这一事实。

然而，无论他们的分析内容如何，许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家在领导时并没有把他们运动的存亡视为岌岌可危。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于1921年与墨索里尼签署了《绥靖条约》，他们和共产党人都认为墨索里尼的上台“只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古老而有节奏的钟摆中“最新的一次右摆而已”。在这方面，他们和20世纪20年代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军政府合作的大多数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并无二致。在德国，当20世纪30年代初的 “总统政府”开始通过法令进行统治时，共产党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已经到来。然而，无论是所谓的法西斯 “总统政府”，还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总理职位，都没有让党的领导层相信他们已经面临着生存威胁。对于德共领导层来说，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而是要求耐心等待。他们的口号是 “先希特勒，后我们”。在世纪之交，左派应该也必需能预见到，镇压的时代会来来去去。法西斯主义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

1934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发动 “二月起义”，反抗专制总理陶尔斐斯（Dollfuss）对社会主义中心的袭击（由墨索里尼策动）。这是人们对法西斯危险本质的第一次实质性认识。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造成200人死亡，300人受伤，该党被取缔。然而，他们的“英勇事迹”鼓舞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矿工，他们于当年晚些时候在阿斯图里亚斯发动了起义。他们的口号是 “维也纳比柏林好”，在那里，希特勒的上台没有遭到武力的反对。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人们普遍认为反法西斯是一场反抗灭绝的绝望斗争。

左派理论家和政治家倾向于根据传统的反革命范式对法西斯主义进行过度概念化，这阻碍了左派适应其所面临的新威胁的能力。由于抵抗的形式必须始终与被抵抗对象相适应，反法西斯行动有责任根据极右对手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变化，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理论、战略和战术武器库。马修·莱昂斯（Matthew N. Lyons）通过批评那些认为 “另类右翼”只应被称为“新纳粹”的作家，将这一教训付诸实践了。虽然许多另类右翼显然是新纳粹，但莱昂斯认为这 “体现了一种会导致不幸的错误想法，即白人至上主义政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了解我们的敌人。” 用过时的范式来理解敌人曾经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某个时候，随着我们离二十世纪越来越远，极右翼的演变甚至可能意味着完全超越“法西斯主义”的框架。

[image]

反法西斯活动家必须对法西斯主义有清晰准确的认识。然而，为了理解反法西斯政治的稳健性和灵活性，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反法西斯行动众多范畴中的两个主要范畴之间的关系：分析范畴和道德范畴。

- 分析范畴包括调动有历史依据的法西斯主义定义和解释，以制定适合应对意识形态法西斯团体和运动的具体挑战的反法西斯战略。对抗新纳粹团体的方法可能对其他极右翼组织没有意义。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应有助于战略和战术的选择。

- 道德范畴是从战后时期“法西斯”这一称谓的修辞力量中发展起来的 —— 将某人或某物称为“法西斯”。当反法西斯的视角被应用于从技术上讲可能不是法西斯、但却是法西斯主义的现象时，它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例如，黑豹党称肆无忌惮杀害黑人的警察为 “法西斯猪”，如果这些警察个人角度上并不持有法西斯信仰，或者美国政府并非真正的法西斯政府，那么黑豹的描述是否错误呢？在马德里的一次反法西斯示威中出现了一面彩虹旗，上面写着 “仇视同性恋就是法西斯主义” 的标语。非法西斯的纯恐同者的存在是否会使这一论点失效？如果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西班牙的佛朗哥或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在技术层面上并不是法西斯，那么反对这些政权的游击队称他们的斗争为 “反法西斯” 是否有误？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对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更多案例进行逐一的和精细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反法西斯的道德准则理解了 “法西斯主义” 是如何成为一种道德符号的，那些与各种压迫作斗争的人们利用这种符号来强调他们所面对的政治敌人的凶残，以及它们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所共有的连续性因素。与法西斯主义本身相比，佛朗哥的西班牙可能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军事政权，但对于那些被国民卫队追捕的人来说，这种差异并不重要。

界定法西斯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使得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分析性范畴包含道德批判，正如道德范畴需要对特定压迫来源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松散的分析一样。尽管 “法西斯主义”这一称谓如果被过于广泛地使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力量，但反法西斯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在于组织起来抵抗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政治，声援所有遭受苦难和进行斗争的人们。

定义问题如果有任何影响的话，应该是影响我们的战略和战术部分，而不是我们的团结。

[image] [image]

3. 由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原因，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领导层在准确评估法西斯主义威胁方面往往慢于其党内普通成员，在倡导激烈的反法西斯对策方面也慢于其党内普通成员。

由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起初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传统反革命政治的变种，因此他们对彼此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法西斯敌人的关注。两派都[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将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那么他们可能面临的右翼障碍也就不重要了。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一些普通的社会主义者留在反法西斯组织'人民阿迪蒂突击队'与意大利的黑衫军作战时，党的领导层却退出了，以便继续沿着其法律化的选举道路前进。当这条道路被彻底堵死时，该党又奋力改弦更张。

整个时期都是如此： 德国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坚持严格的法律路线，尽管党员们越来越感到不安。尽管黑红金国旗团（Reichsbanner）和后来的钢铁阵线（Iron Front）中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推动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但迟钝的党机构却没有能力考虑其他战略。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面对极右翼分子的猛烈进攻，奥地利社会主义的普通党员也竭力推动党的领导层采取激进的自卫行动。在英国，工党和工会大会的普通党员不顾领导人的劝诫，在街头与法西斯分子直接肉搏。工党领导层甚至谴责参加凯布尔街战役的工党成员（当时多个团体在伦敦东区犹太人聚集区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黑衫军对峙），领导层还拒绝支持许多加入西班牙的国际纵队的工党成员。正如历史学家拉里·塞普莱尔（Larry Ceplair）所言，社会民主党人 "玩议会游戏玩得太久了，[他们的] 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心理上都已经无法组织、命令或批准武装抵抗或预防性革命"。

[image] [image]

尽管如此，许多社会主义者个人似乎对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况更加敏感，也更加渴望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他们远没有受到法治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和选举策略总体规划的束缚。

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认为，革命的当务之急是明确区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这样他们才能领导似乎已经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起义浪潮。随着1928年共产国际“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一目标再次凸显出来。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组织模式规定了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到国家政党再到地区支部和社区干部的纪律严明的指挥系统。这种模式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统一行动，但也往往意味着莫斯科党内精英之间的内讧对政策的影响要远大于当地的实际情况。

“社会法西斯主义”路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许多国家领导人勉强采纳了这一路线，但随着 1935 年共产国际转向人民阵线政策，他们又急切地放弃了这一路线。普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者彼此之间一般不会像他们的领导人那样相互憎恨。事实上，例如在法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早期团结倡议都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例子都能表明等级制度化的组织天然具有的弊端。

[image] [image] Under the Shadow of War: Fascism, Anti-Fascism, and Marxists, 1918-1939, By Larry Ceplair

4. 法西斯主义窃取左翼意识形态、战略、形象和文化。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发展源于意大利和德国政府希望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男子气概从“腐朽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手中解放出来，并从“堕落的”社会主义左派手中夺取集体主义的大众政治。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工人党就在旗帜和海报上使用了大量的红色，党员之间互称“同志”。这产生了反意识形态、反理性的悖论，如“国家工团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左翼"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人在其政党获得权力并与经济精英们亲近后遭到了清洗，但民族主义对工人阶级民粹主义言论的采用在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纳粹党人利用自己与商人的良好关系，建立了自己的劳工交易市场，为失业者提供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工会作为行业就业门户这一角色的阶级合作主义变种。纳粹 “风暴兵”酒馆显然是从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酒馆传统发展而来的。

纳粹还在大萧条时期为支持者提供免费食物和住所。这与传统的保守派明显不同，后者对穷人和失业者不屑一顾，最多只是偶尔向非政治的或宗教的慈善机构捐点钱。

希腊极右政党“金色黎明”、意大利“卡萨庞德（Casapound）”、马德里 “社会之家(Hogar Social)”、和英国 “国家行动（National Action）”组织都采用了这种极右政治慈善模式，开始只向希腊裔、意大利裔、西班牙裔和 “白人”发放免费食物和日用品。“卡萨庞德”的活动分子甚至开始模仿自治主义的占屋行动，占据废弃的建筑物，而马德里极右翼“社会之家”不仅也模仿占屋活动，甚至有时还组织反对驱逐西班牙裔人的活动，显然是想利用西班牙活跃的左翼住房权利运动的影响力。

更广泛地说，战后法西斯继续向革命左翼寻求战略启示。“第三位置”法西斯分子试图将毛泽东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论应用于 “欧洲解放”的目标，这就需要强行清除 “非欧洲人”。20世纪80年代，法国 “第三位置”（Troisième Voie）的一个派别试图利用“‘托洛茨基主义’战略”打入国民阵线，以便从内部接管该阵线。乌克兰法西斯分子试图利用乌克兰无政府主义领袖内斯托尔·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政治遗产，而西班牙新纳粹组织“自治基地”（Bases Autónomas）则称赞无政府主义者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Buenaventura Durruti）。

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欧洲各地的法西斯分子甚至开始效仿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黑群战术，但在2000年代末逐渐壮大。这些身着黑衣的 “自治民族主义者”有时甚至会使用带有国家社会主义口号的反法西斯旗帜标志，有时则佩戴巴勒斯坦卡菲耶头巾，他们试图模仿激进左派的号召力，在德国、希腊、捷克、波兰、乌克兰、英国、罗马尼亚、瑞典、保加利亚和荷兰等国倡导反资本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2013年前后，这一趋势在西欧开始衰

退。“民族国家无政府主义”是这一主题的另一种新变体 —— 其滥用无政府主义的自治概念，主张建立独立的、同质的 ”民族飞地"，包括种族主义的“白人家园”。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反法西斯运动不仅要大胆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还要像亚历山大·里德·罗斯（Alexander Reid Ross）这本奇妙著作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防范法西斯主义的蠕变。这些例子还证明了左翼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不确定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那么 “自治”、“民族解放”甚至 “社会主义”等概念，以及寮屋行动、组织食物募捐或组建黑群等战术，都可能在我们眼皮底下被收编。

[image] [image]

5. 形成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很多法西斯分子。

1919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只有100名成员。1922年墨索里尼被任命为总理时，意大利人口中只有约7%至 8%的人属于他的国家法西斯党（PNF），五百多名议员中也只有三十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第一次参加德国工人党会议时，该党只有54名党员。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只有约 1.3% 的人口加入了 NSDAP（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最近，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最近的移民潮之后，许多以前规模较小的法西斯党派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这表明当环境变得有利时，极右翼势力有可能迅速壮大。

当然，这些政党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都是通过赢得保守派精英、焦虑的实业家、被疏远的小企业主、失业的民族主义者等人的支持来实现的。战后抵抗运动的胜利叙事可能会否认除了最坚定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主义者之外还有任何其他人支持墨索里尼或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但事实上，这两个政权都设法培养了广泛的民众支持，从而模糊了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的含义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的确是由许许多多的法西斯主义者共同缔造的，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在获得如此广泛的民众支持之前，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只是意识形态的小团体。

但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当墨索里尼组建了一个由一百名愤慨的退伍军人和古怪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希特勒为争夺小小的德国工人党的领导权而展开激烈斗争时，意大利和德国似乎正处于社会革命的边缘。左派不该对这两个事态发展视而不见。

[image]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当时所了解的情况，他们没有理由在法西斯主义早期投入任何时间或注意力。然而，人们可能会好奇，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能认真解决的反事实问题，而且过分纠缠于此，忽略了为法西斯主义崛起奠定基础的更大的社会因素。尽管如此，反法西斯斗争还是会得出结论，既然未来是无法书写的，而法西斯主义往往产生于边缘化的小团体，那么每一个法西斯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都应该被当作墨索里尼的一百个法西斯、或者是为希特勒提供第一块垫脚石的德国工人党的五十四名成员。

现代反法西斯运动的悲剧性讽刺在于，它越成功，其存在的理由就越受到质疑。反法西斯的最大成功处于一个假设的边缘：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有多少凶残的法西斯运动被反法西斯组织在其暴力蔓延之前扼杀在萌芽状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 这的确是件非常好的事。

By 反法西斯手册

[image]

美国的权威和美式民主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4月24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MAGA 代议制 国家 国家主义 地缘政治 政府 极右翼 民主 法西斯 爱国主义 特朗普 经济学 美国 资本主义 选举
[image] 编辑	MMartinez

> 「美国的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其普遍的政治影响将在美国得到反映。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资本可能会再次试图通过帝国手段来解决危机，从而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抢占革命性变革的先机。 」
> —— 德国革命家和理论家保罗·马蒂克

本文发表于**1979**年冷战中期。一定程度上可帮助今天的我们理解全球政治正在经历的 这场动荡的急转弯 ；更好的是理解到本专题栏目的战略 **-** 即新时代革命的迫切需求、及 升维斗争的必要性 。

本文和其他相关资料在近期的反法西斯

社区新成员学习组中采用，现分享給所
有读者。

[image]

下载PDF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UQzTnziKbVQYu_QwvBZ65MnggHKonY/view?usp=sharing

下载EPUB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Pjz4ruUh4-MigXY4m3URevl3rBfuz5W/view?usp=sharing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反思新政时曾说，他的政府 “做了希特勒所做的一切，只是用了其他手段”。然而，这些其他手段并没能克服导致美国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大萧条。最后，只有诉诸希特勒的手段 —— 即参与帝国主义战争 —— 才克服了无情的危机。

尽管如此，美国的国内形势与法西斯国家仍有很大不同。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实践中都保持着“民主”，没有恐怖措施。社会共识和战争的有效进行无需过多干预传统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当然，也有一些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如将日裔美国人关押在集中营。但总的来说，政府专断的歧视行为与极权主义政权的独裁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为制造的大规模歇斯底里情绪再次出现，但表现得更为低调。战争的实际爆发使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团结起来了，以支持其热衷于战争的政府。民众的默许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问，这种默许部分是基于对战争将结束经济萧条的直觉性认识。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经济危机，它试图通过政治和组织手段来维护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手段必然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为新的帝国主义冒险创造先决条件。这就需要摧毁现有劳工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以建立阶级协作和民族团结，这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政治解决危机所必需的。在阶级战争愈演愈烈的当前危机条件下，不可能再指望劳工运动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自愿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必须提出一种显然是针对交战双方阶级的新意识形态，将阶级利

益再次转化为国家利益。这种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政治斗争，通过建立和发展新的组织，最终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才能得到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表达了资本主义对全面控制劳动人口的需求，而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似乎已无法实现。

美国完全没有以阶级为导向的工人运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即使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也能坚持民主。这种缺失的原因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性。尽管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被危机和萧条打断，但它仍在不断向前发展，直到美国成为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因此，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不容易形成反资本主义运动，因为事实证明，它能够在迅速积累资本的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欧洲国家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但与美国的情况相比，在那里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的是更为严重的剥削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无论如何，欧洲的特殊条件导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形成，甚至在条件开始改善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和组织依然存在。

[image]

在此，我们不再赘述阻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相当复杂的原因，而只是将缺乏此类运动作为美国的一个具体特征。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组织的零星出现和消失与这一特征并不矛盾，这些组织有时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共鸣。这些组织并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愿望，他们甘愿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的制度。唯一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运动是工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利用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和工作条件做出一点改善 —— 这点上没有受到质疑。它没有政治野心，但对美国形式的民主（即两党代议制）的条件感到满意，这种民主只是提供了传统欧洲意义上的民主的表象而已。政治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事情，是解决资产阶级阵营内部那些不影响其共同需求的分歧的问题。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幻想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摩擦能为工人阶级提供一个杠杆，让他们可以通过支持某个资产阶级政党来影响政策。一种勒索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斗争。

美国劳工缺乏政治主动性，这反映在工会和产业工会的政治冷感上，导致这些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体系。当然，正如资本竞争在其集中和集权的大趋势下继续进行一样，尽管劳资双方表面上是共同体，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这是一场争夺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社会产品份额的斗争，双方都同意维护和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工人群众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反对资本主

义制度对工资的压力，在他们看来，这种压力是由雇主的贪婪而不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他们准备为维持曾经达到的生活水平而斗争，甚至为分得更多的蛋糕而斗争，但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斗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公平地”对待劳资双方，因此，工资斗争往往以极大的战斗性进行着。随着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润和工资都可能上升，即使只是不平等的上升。因此，过去的经验至今仍然决定着美国劳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

[image]

只有少数美国工人加入了工会，而工会本身在谈判能力及其官僚机构的特点方面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工会都排除了其成员的有效控制；也就是说，工人接受工会的方式与接受整个美国资本主义的方式相同。随着工会的合法化和制度化（这可以追溯到大萧条时期的新政），“有组织的劳工”本身也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成为工人无法控制的客观现实。工会会费的缴纳与给政府纳税具有同样的精神，但既没有参与工会事务的途径，也没有参与工会事务的要求。一切都留给了官僚机构，就像政治留给了资产阶级一样。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民主“形式”往往通过选举和全民公决得以维持，但这并不影响政府或工会的专制控制。人员可以改变，但制度不变。

美国资本的集中和集权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大公司的具体利益决定着整个体系的命运。有人说，“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这不是开玩笑，因为经济是扩张还是萎缩，确实取决于通用汽车公司以及所有其他类似大公司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是“公司国”，兴亡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无论国家与资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都早已不复存在；国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本身也是“国家”。正因如此，担任政府职务或任何公职的人都不必迫于大公司的压力而听命于它们，他们会自觉地这样去做。此外，国家和资本的人员是可以互换的；公司经理可以进入政府部门，而国家官员则进入公司管理层。

[image]

如果说政府和资本是一体的，那么参议院和众议院就是这个实体的支持者。通过选举制度产生的国会议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国家。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信念，也是因为他们直接的资本主义利益。正如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言，“美国的国事就是生意”，因此政治本身被视为另一种赚钱的事业，可以通过拓展其他

业务或维持现有业务来补充。1978年5月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项关于几乎所有国会议员个人经济利益的电算化研究，该研究表明，这些人同时也是各种企业的投资者，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官职来推进自己的商业利益。由于研究报告所依据的信息是由国会议员提供的，这些数据当然是低估了的，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掩盖他们真实但不确定的财务状况。不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项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民的代表也是资本家，他们通过民主程序获得特权。

[image]

将所有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收归资本及其政府之手，尚未摧毁美国民主的神话。人们可以投票，而那些投票的人 —— 仅大约占合格人口的一半或更少 —— 可以把民主党的政府和总统换成共和党的政府和总统；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一组人换取另一组人，而这些人同样坚决维护这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又决定了所有这些政客自身活动的范围。因此，尽管大企业主宰着美国，除非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否则无法将其赶下台，但大企业却继续为其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

事实上，民主的意识形态越是得到滋养，它对现实的影响就越小。最初，政治民主是新兴资产阶级的目标，它表达了资本主义竞争的政治方面，却从不关心构成整个资本主义大厦根基的剥削阶级关系。然而，在欧洲国家，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劳动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减轻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困境，甚至可能允许组建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府，从而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国，这种幻想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关系总体上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尽管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大公司资本主义、并出现了资本垄断，甚至排除了普通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民主，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image]

在美国，民主始于投票箱，也终于投票箱。但人们也认为民主涉及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一般来说，这些公民自由不会受到干涉，因为它们都不会被用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时不时爆发的抗议活动要求的是改良而不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如廉洁政府、降低税收、公民权利以及最近的环保诉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诉求并不是由工

人提出的，而是由中产阶级提出的，表达了中产阶级的特殊挫折感。中产阶级的上升空间日益受限，他们不甘心被淹没在工人阶级之中，因此他们想象着一个能够满足所有社会阶层的、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欧洲国家，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与中产阶级自由派的福利意识形态相比，美国工人则显得反动，他们对社会事务毫无兴趣，只关心自己的工资。因此，中产阶级中具有政治觉悟的人的意见注定是荒野中的声音。

中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即使在有限的意义上，它们也仍然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背后没有物质力量。不过，只要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民主就会成为一种现实，并对事态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假象支撑着资本的一元化统治。因此，没有必要取消民主保障，即使这有时会带来不便。无论如何，它并不代表政府压迫的普通手段无法应对的危险。因此，民主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资产而非负担而得以维持，但又因后者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受到限制。这往往会导致暴力，一方面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觉，即通过维护民主权利有可能使政府偏离特定的行动路线；另一方面是基于政府为回应抗议而维护的权威。然而，每一次这样的紧急情况过后，美国民主都会恢复原状。

任何暂时废除民主权利的行为都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因为民主与“美国主义”是一致的。任何超过口头反对的行为都会立即被打上“攻击民主”的烙印，这大概反映了普遍的共识。它被视为 “非美国式”，因为它超出了美国发展起来的既定的、尽管无效的民主规则。既然是 “非美国”，它就被视为一种外来的植入物，不可能源自美国本土。起初，未被同化的移民被认为是美国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后来，效忠于美国以外的社会制度被认为是将不满情绪的萌芽带入美国社会结构的罪魁祸首。因此，要让世界 “对民主安全”，就必须同时打击民主的内部和外部敌人，也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敌人。即使是普通的工资斗争也常常被斥责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杰作，一心想要破坏美国民主的境外敌对势力。尽管这些政治潮流实际上微不足道，但美国还是通过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法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连民主的社会党也被宣布为非法，而这一切都是以“美国民主”的名义进行的。

[image]

如果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它不会像在欧洲那样需要民众的参与。它甚至可能直接被称为“反-法西斯主义”，就像美国法西斯分子 休伊·朗

（Huey Long）所宣称的那样，或者干脆被称为“100%美国主义”。没有民众的参与，也就不会有反对派；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定。镇压措施可以在美国民主的框架内实施，在保留其形式的同时，将其内容一扫而空。简而言之，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些本应遏制权力垄断和资本寡头绝对统治的工具，成功地实现了专制控制。

阶级社会意味着系统地操纵“舆论”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必须让统治阶级自身的具体利益看起来就像是普遍利益。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思想也是商品，其生产者和传播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中才能找到市场。因此，学校、大学、教堂、报刊、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介完全迎合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竞争，意识形态专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们的商品，尽管所有商品都必须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即在意识形态上支持现状。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专制条件下，这些单一主题的变种支撑着民主幻想。最反动的思想都坚持自己符合“民主的理想”，即使这种理想指的是过去的条件而非当今的现实。

[image]

尽管存在垄断条件，政治仍然不仅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竞争性的生意。这种竞争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尽管每个人都认同美国民主的优点，但对于如何更好地为民主服务却没有一致意见。这就形成了美国政治中的主观因素，即政客们为进入政治机构或提高其在政治机构中的重要性而进行的斗争。政客们的主观努力掩盖了他们客观上被确定的相同职能这一事实。但是，他们的滑稽行为往往会引起广泛的反响，尤其是在符合政府政策和特定资本主义利益的情况下。非理性的假设有时会成为现实，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红色恐慌”和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追捕颠覆分子是一种宣传噱头，目的是促进时任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 Mitchell Palmer）的总统野心。但与此同时，在俄国革命及其国际影响的背景下，捏造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威胁不仅可以用来揪出初露端倪的激进分子，还可以用来制服整个工人阶级。同样，麦卡锡主义尽管源于其创始人的私人政治野心，但它之所以能够传播得如此之广，是因为它符合帝国的意识形态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民主很容易受到在极权国家里制造群众癔症和恐怖恐惧的同类煽动性言论的蛊惑。只不过，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或多或少已成为常态的规则在美国都是例外。但这是一种随时存在的可能性，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本质上的专制性质的另一种

表现。与潜在的但大多是潜伏的极权主义倾向相对应的，是少数族裔偶尔超出法律限制的零星爆发 —— 他们在一个以剥削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不平等为基础的制度中争取平等。他们从经验中知道，"民主"与他们自身的处境毫无关系，也无法解决他们的特殊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有可能通过有组织的抗议、和以主流民主意识形态为依据的行动，迫使该制度做出一些让步。但是，如果认为有必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妨碍采取最赤裸裸的专制措施。镇压机器 —— 军队、国民警卫队、州警察、地方公共和私人警察部队 —— 足以应对此类动乱。

虽然镇压机器时刻都在准备着，但由于广大民众对美国制度有着压倒性的积极认同，因此可以将其保留下来。即使政府的特定政策遭到质疑或反对，或者政府本身失去了社会各阶层的信任，这种认同感也不会改变。例如，越南战争一般不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方面，而是被哀叹为一项"道德上错误的政策"，或者仅仅是"参与战争的政府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本可以选择另一种行动方案来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但是，这场战争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声称是为了防止极权主义政权的进一步蔓延，因此美国的自由民主派甚至 "社会主义"分子一开始就为这场战争进行了最激烈的辩护。就工人阶级而言，只要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明确表达，他们就会对战争带来的工作保障和更高工资的机会感到满意。反对的声音来自宗教团体和和平主义者，很快，不愿意为帝国主义的遥远利益牺牲事业乃至生命的反叛学生运动也加入了反战行列。然而，这场运动借助民主的措辞揭露了民主在这一特殊场合的实际缺失，只是表达了在美国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真正民主的乌托邦式追求。

恕我直言，这场反战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看似毫无意义的冲突扩大和延长的反感，但战争的结束并不是对民主反战情绪的回应，而是由于美国军队的失败、战地士兵的厌战情绪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为在东南亚捍卫"美国民主"这一难以理解的目标而牺牲生命的意愿。事实上，战争本身已成为一种商业行为 —— 不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扩张需求服务，而是更狭义的、更直接的军方及其顾问为中饱私囊而普遍腐败的行为 —— 这一事实也助长了这种厌战情绪。最后，结合当时存在的帝国主义力量的组合，这场战争很可能只有冒着全球性战争的风险才能取得胜利，而美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头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是资本本身结束了战争，表面上是为了回应国内的反对，但实际上是因为战争的代价与战争成功结束后可能带来的任何可想象的未来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image]

尽管如此，战争的结束仍被庆祝为“美国民主的重申”、“人民力量对抗政府力量的标志”，甚至那些起初认可战争认为是美国对民主原则的承诺的人，现在也加入了庆祝的行列。在国内，随着理查德·尼克松在所谓的 “水门事件”后被迫放弃总统职位，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尼克松政府输掉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一个腐败的政府被另一个腐败的政府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言辞给人的印象是，民主再一次成功地击败了它的践踏者，民主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政治制度，可以满足国家的需要，抵制没有良知的政客篡权。据推测，被唤醒的 “公众舆论”已经战胜了政府的暗中操纵，政府无视民主的 “公平竞争”，企图确保其永久存在。民主权力的这一新迹象所带来的兴奋情绪，引发了对其各种滥用的全面猛烈抨击，甚至达到了通过法律让政府调查机构接受其受害者监察的怪诞地步。

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越来越多地辅之以更直接的行政警察措施，而在美国，镇压手段似乎已经淡化，而更开放和参与性更强的政治生活则更受青睐，尽管/或也许正是因为很少有人利用这些手段。如果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民主礼仪的空洞性、民主意识形态已经耗尽，那就大错特错了。一般来说，公众仍然相信这种制度优于其他任何制度，并以美国民主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并不为这种制度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而苦恼；相反，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简化使得美国民众在威权的社会条件下能够长期保持自满情绪。

这种自满情绪不足为奇。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只是依稀记得，然后将其视为天灾，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相关结论。从那时开始，直到最近，美国一直都是世界的宠儿，战争的胜利者，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的受益者，这让劳动力和资本都受益匪浅。人们炮制出各种理论，确保经济进一步增长，并通过国家对市场规律的干预消除商业周期。诚然，苦难依然存在，尤其是少数族裔的苦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苦难也会被克服，从而证明美国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普遍的乐观主义催生了 “后资本主义”、新的 “技术结构”、“意识形态的终结 ”以及 “单向度人” 的到来等各种概念，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无论出现何种微弱的不满情绪，都将被一个真正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吸收，而不会出现阶级矛盾，在这个社会中，权威与民主之间的区别已经失去意义。

[image]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以美国资本的不断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扩展为前提。战后形势的特点不仅在于为捍卫世界自由市场而遏制极权主义政权蔓延的各种尝试（有些成功，有些失败），还在于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主要是打着美国旗号的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化（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将美国经济扩展到了世界各地，这对于将美国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联系起来具有重要意义。只要专制仅限于政治体制，商业在专制和民主条件下就都同样可以蓬勃发展。企业在这方面没有偏好，尽管有些商人可能偏好其中一种。事实上，大量美国资本都在专制制度下运作，只要这些制度能够确保和持续保证其投资的盈利性，它们就对这些制度的长期存在有着直接的兴趣。

当然，专制主义有两大类：一类是国家控制的制度，这意味着对私人资本的征用（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以及某种形式的中央经济计划；另一类是在依赖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输入的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中盛行的各种军事独裁。大多数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属于后一类，这种情况被称为“新殖民主义”。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专制关系在专制政治结构中得到支持，以确保资本积累，尽管世界资本主义所处的总体经济条件并不稳定。这些国家以军事为保障的统治使政治精英与新兴的本土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融合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建立了资本与政府的统一，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尽管资本主义统治的重点已从民事转向军事方面。

[image]

通过不承认美国资本主义同样是建立在剥削劳动力的基础上的——因为每个人都被假定为了获得他对社会总产品的贡献——从而与国家控制的极权主义国家共享“按劳分配”的概念，反对这种论据的理由主要是基于“自由”经济和“管制”经济的相对效率，后者据说需要极权主义的控制，从而需要独裁统治。民主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作为“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问题而被提及，但这是以资本主义的财产权为前提的。在私有产权得到维护的情况下，即使是专制政权也可能发展或回归“民主体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军事独裁政权，尤其是南美国家的军事独裁政权，并不是美国资本所反对的，而是美国资本所扶植的，他们满怀歉意地期望，这些独裁政权迟早会适应更加“民主”的程序。事实上，独裁政权本身只是在社会紧张时期假装是民主的看护人，热切地等待着被可行的民选政府和议会统治所取代的那一天。

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几乎触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民族国家依然存在，但资本主义的经济一体化是国际性的，这就加强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仅就外国资本投资而言，1977年2月的《政府当前商业调查》显示，美国公司在外国拥有多数股权的子公司的年销售额总计超过5000亿美元，而美国的出口总额仅为1200亿美元。至于美国公司在外国子公司中占不到多数股权的销售额，以及非联营公司在美国公司许可下的生产额，则没有相关数据。如果将这些数据能包括在内，外国生产相对于传统出口的巨大重要性将更加明显。当然，这意味着美国资本主义不能只等同于其在国内的民主自诩，还必须等同于在其保护下剥削越来越多外国劳动力的专制政权。因此，它应对这些政权的不民主独裁政策负有一定责任。

当然，美国资本并非是在其开展业务的国家扶植专制政权的必要条件；那些国家会自行坚持独裁原则。美国资本家很可能更愿意在与自身更相似的环境下运作。但他们也是现实主义者，接受世界的现状：民主对赚钱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他们也非常愿意在民主条件下扩大资本。只要不危及他们的投资，保护他们的政府形式就无关紧要，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使他们能够坚持不干涉他国事务的原则（如硅谷著名的“遵循本土法律”，是为传统的一部分】。推动决策者的不是对“民主世界”的渴望，而仅仅是对政府的需求——无论是否独裁政府，只要这种政府能保护资本投资并允许有利于美国资本的国际贸易。

然而，当相对繁荣和社会稳定的状态被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所取代时，投资就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均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采取不利于美国资本的措施，甚至将其国有化。如果此类事件似乎正在酝酿之中，那么政府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有必要扶持一些愿意维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的隐蔽和公开干预会以公开的专制政权取代更民主的政府，以确保美国的特殊利益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例如在巴西、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智利等国发生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以民主和捍卫“自由世界”的名义进行的。

但是，即使不进行公然干预，美国也通过其附属国对资本市场的金融依赖，主宰着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正如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通过让他永远欠地主的债来维持对他的奴役一样，各国也可以通过欠美国银行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债来被迫屈服于美国的霸权。如果这些国家无法支付贷款利息（随着全球经济萧条的加深，支付利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就会被拒绝给予新的贷款，除非它们接受一项“紧缩”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提高资本的盈利能力来提高

它们还债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成为向债务国施加经济“纪律”以维持或恢复其信用的工具。当然，这只是“好生意”，尽管它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动荡，从而导致最残酷的镇压措施。例如，最近秘鲁实施了戒严令，因为秘鲁军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因大幅提价而引发的抢劫和破坏浪潮，目的是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和提高出口率。在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时，谨慎的做法是在其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中也包括其政治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涉及独裁政府对其贫困人口实施恐怖措施。这也是美式民主的一部分，它与独裁政权沆瀣一气，甚至包括通过中央情报局的阴谋实施政治压迫的细节。

因此，美国资本不仅热衷于宣扬其自诩的经济和道德优越性（正如其民主制度所体现的），而且还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其盈利能力，这使其成为极权主义政权和专制政策在全世界的教唆者。但是，不断蔓延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止步于美国国门，在国外倡导的“紧缩”政策也必须在国内推行。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卓越的经济实力确实可以使生活水平的降低更加循序渐进，范围也更小一些；然而，强制推行的“紧缩”是否会像以往的经济萧条那样演变成普遍的苦难，这取决于危机是否会以不可预见的速度蔓延。无论如何，美国民主制度表面上的宁静正在被不断加深的危机和应对危机的努力所破坏，而这座仍然雄伟巍峨的大厦也如同矗立在流沙之上。

[image]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必要将政治措施应用于经济问题，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并没有引起任何政治反应。【编者再次提醒，本文发表于1979年】失业和通货膨胀尚未达到危及社会稳定的程度。美国的民主仍然至高无上，它为自己目前的经济困境找到了外部原因，即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石油生产国的定价政策、以及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说美国的困难还包括内部原因，那当然是指有组织的劳工工资上涨，而这又被归咎于缺乏投资激励。经济衰退的渐进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劳动人口和中产阶级在收入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冷漠。这也意味着，经济萧条的全部负担是由少数人承担的，他们的怨气不足以影响大多数人，而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己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仅仅因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然而，当今美国劳工缺乏政治意识，表现为对民主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会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而变得躁动不安。毕竟，正是这个工人阶级，虽然姗姗来迟，却以相当激进的方式

对大萧条做出了反应，并最终迫使资本及其政府通过对经济机制进行违反传统的干预来缓解工人阶级的苦难。大萧条前的“粗犷的个人主义”并未重现，美国经济也适应了一种能够减轻危机时期社会摩擦的福利制度。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道格拉斯·A·希布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1976年12月6日《纽约时报》），“劳资冲突的减少与福利国家政策的成功程度大致相关，福利国家政策使政府成为分配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工具”。这位教授没有考虑到这些做法的局限性，也没有考虑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这些做法必须在资本积累的要求中找到一个绝对的屏障，而资本积累要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明确的份额。

如果危机进一步加深，指望美国劳工改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就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了，尽管这种改变的方向仍然不明朗。新兴的民众运动很可能会将工人阶级的愿望引向与其自身目标相悖的活动轨道。另方面，美国没有资本主义方式整合的、现在已经僵化的“左翼”政党，这可能会导致工人的自我主张以及更符合他们实际需要的新形式的有组织活动。此外，美国的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其普遍的政治影响将在美国得到反映。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资本可能会再次试图通过帝国手段来解决危机，从而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抢占革命性变革的先机。

By 保罗·马蒂克，1979

[image]
[image]

冲破数字时代的性压抑 - 七夕2025：面对新法西斯世界，唤醒身体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8月29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反法西斯 心理学 性 技术 无政府主义 社会结构 解放
[image] 编辑	[image]iyp

群众并不是□辜的傻□；在某个时刻，在某种条件下，人们真心想要法西斯主义，想要大洪水和核战争。□不是幸福自在的安乐生活。
这种对群众愿望的扭曲，才是需要解释的部分。

BACK

BACK

BACK

[image]

下载杂志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1zx_PdIsjWaZezxzaPGx07_y8y3fWZW/view?usp=sharing

威廉·赖希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写于1933年，正值希特勒崛起的巅峰时期。这本书最直接的目的是试图解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传播，理论上当时的经济困境本应促使人们转向左翼的，然事实上人们转向了极右。更根本的是，这本书试图将法西斯现象诊断为“专制社会中人的基本情感态度，及其机械文明和机械论神秘主义的人生观”，而不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趋势。

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赖希将这种状况描述为“情感瘟疫”，一种大众社会中个人普遍存在的病态性格结构。他声称，其根源在于“对自然性欲的神秘化和抑制”。性压抑不仅是纳粹热情的根源，也是更普遍的社会苦难和人类奴役的根源。只有发展出新的、连贯的性经济实践形式，才能克服这种奴役。

[image]

要想把握赖希思想的激进潜力，就必须修正其基本逻辑。

对这套理论的分析建立在三个论点之上。第一，赖希从其老师弗洛伊德那里借鉴了性的经济理论。这使得赖希有可能宣称，性压抑是所有社会功能失调的根源。第二，认为社会病态本质上是意识形态问题。性压抑会诱发非理性信念，进而导致不良政治。在赖希看来，这种“非理性”被定义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科学的规范。最后是“劳动民主”假说 —— 赖希设想了一个理性地自我管理性事的社会愿景。在这里，科学-工业理性成为社会和性健康的隐含模式。

所有这些论点都在这本书的论证中。但它们都没有抓住赖希的批判项目中最重要的东西。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性的经济范畴作为性政治探索的最终参照系，赖希掩盖了自己对情感瘟疫本质的激进洞察。更深层次的灵感来自于他对身体和快乐的关注，以及大众社会对身体和快乐的摧残 —— 简而言之，就是对作为物质力量的性的关注。

[image]

“文明”的运作是对身体和快乐力量的自我禁锢。我们就像萨德在牢房里那样，只不过对我们的监禁是在日常生活的工业化网络中进行的。压抑不是通过某种神秘的心理机制，而是文明的物质系统本身施加的一种暴力。在这一体系解体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性解放。

赖希在发现“奥根 (Orgone)能量”以及对愉悦与焦虑的实验研究中瞥见了这一洞察。他的研究受到异性恋规范和男性中心主义假设的影响，且过分强调了性高潮的功能，但其将性欲视为一种可通过感官感知到的动态物质力量的观点，至今仍具重要意义。

正是通过将性视为物质力量的斗争，我们才能理解在社会秩序的各个层面上，困扰着文明生活的普遍痛苦。

“情感瘟疫”并非仅限于纳粹分子和虔诚神秘主义者的异常状态；它影响着所有生活在技术化大众社会景观中的人们。其主要表现并非对性的放弃、也不是缺乏“性高潮的能力”，而是丧失了日常具身体验的能力。

人们已与作为物理存在的基本关系之性疏离了。场域感消失了。被“去地域化”，与大地的直接联结被切断。可以说，不再感受到自身的生命力。

大多数人类关系已被抽象化、中介化，通过屏幕与电子电路折射出来。我们与他人身体的感官接触已与虚拟模拟无异。

都市街景最鲜明地展现了这种隔离 —— 在那些玻璃与混凝土构成的壮丽而冰冷的丛林中，行人如幽灵般擦肩而过，却毫无身体亲密感的痕迹。整个工业文明体系似乎运作着一个巨大的奥根能量箱，其中情欲能量被人工屏障的迷宫所隔绝和阻断。

[image]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史前的人类祖先所经历的一场危机。

性愉悦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经验的重要部分之一。对女性、儿童和自然的支配可能在人类首次爆发的暴力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互相竞争的部落间的领土冲突也可能在此期间出现。我们只能推测性愉悦何时首次成为焦虑的来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某种事件引发了早期人类之间身体关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引起的创伤从未愈合。

一种恐惧被唤醒，一种肌肤的恐惧，一种肉体的惊慌。 原本和谐共处

的身体变得疏离和分裂。

在语言使用之前，人类之间的性关系必定是由直接的共情沟通引导的。在某个时刻，共情沟通被打破了，相对短暂的文明进程由此开启。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对身体的自发肯定能力，就需要密切关注这一轨迹。

认为可以在那些导致我们被奴役的机构中实现“性自由”的想法是荒谬的。

史前人类危机中所产生的逻辑 —— 体现在亚当和夏娃隐藏裸体的形象中 —— 最终导致了技术文明的去肉身化理性。这种逻辑的破坏力直接引发了当前的性与社会的灾难。赖希认识到社会苦难与性苦难密不可分，但他错误地认为解决方案可以在劳动秩序与理性自控的框架内找到。作为一名虔诚的科学家，他以自身理想类型的标准来评判世界。

如今，问题已愈发严重，必须探索更激进的解决方案。

现代社会非但没有拒绝奴隶理性的逻辑，反而将其推向了新的极端。在恐怖主义与全球化大众媒体的时代，对身体与愉悦的暴力侵袭，通过日常生活全面技术化得以实现。

我们的感官被电子声音、数字化图像、及预先编程的大众传播信息所淹没。僵尸般的人造奇观取代了即时感官体验的丰富性，人们通过服用精神药物来麻木自己，以应对这种失落。原本自主驱动的人类身体被简化为无生命的赛博格。

耳机、手机和手持设备将所有注意力束缚在集中式虚假信息机器的渠道上，阻断了任何面对面的接触。尽管拥有成千上万的 Facebook “好友”，却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彼此。

仿佛我们的感官已无法停驻于另一个身体、另一张人类面孔之上，除非那个人与全球化大众景观中的某一热门形象相符。

我们已遗忘偶然邂逅的喜悦、共享亲密瞬间的闪光、在无声中彼此吸引擦出的火花。

愉悦 至多被仪式化与规范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 被包装好的商品 ，在高科技实验室里炮制出来，然后作为“奇异的爱情魔药”在大众市场上出售。

□

这一切的讽刺之处在于，技术越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身体体验中，社会就越发过度性化/hypersexualized - 过分强调性特征或性吸引力，将人仅仅视为性客体，而不是完整的人。

三十年前，福柯观察到，在性领域，权力更多地不是通过禁令来定义的，而是通过性行为的诱导和增殖来定义。问题不在于如何将性本能从法律和禁忌中解放出来，而在于，如何利用身体和愉悦来对抗有组织的性自我建构制度。

福柯未能预见的是，这种对抗行为不能仅仅是战术性调整 —— 即寻找能扰乱占据主导地位的性客体化模式与话语的技术手段。有关性的一切已完全融入到机器文明的物质基础设施之中，除非将其彻底瓦解，否则无法改变。

性欲是当身体的自发力量被剥夺，愉悦被投射到外部欲望对象之上的产物。它是一种物化，根植于暴力力量。性客体化表征的泛滥同时也加剧了对身体及其无法控制的愉悦能力的攻击。

在技术社会中，被物化的性欲网格让位于一个包罗万象的奇观，其中身体被转化为碎片化的图像，一个千变万化的性客体化模拟剧场。互联网色情、网络性爱、无处不在的塑料和人工躯体展示、性增强药物、医疗化的性、自慰机器 ……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共同身体存在的废墟。

我们参与着无尽的性选择考验，受制于名人文化与大众媒体的规范化图景。按照这类 被规范的形象和逻辑 打扮和塑造自己，只是为了消费一种本质上由技术必需品的外来要求所决定的“愉悦”。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性愉悦的剥夺驱使文明产生出新的、更为复杂的身体禁锢形式。鉴于性的原始本质及其驯化过程的父权根源，合乎逻辑的假设是，性愉悦的悬置在建立最初的身体分离标志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将印证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生命中存在原始断裂的假说 —— 一个象征文化战胜爱欲、现实战胜愉悦的时刻。然而，我们绝不能犯将这种断裂以无意识原则的形式转移到现代生活中的错误 —— 这种观念只会掩盖我们持续禁锢的物质条件，并使我们对始终面临的选择视而不见。

此外，承认性与文明之间存在本质联系，并不意味着认可像赖希那样试图去寻找一种普遍的性能量，然后将其作为建立新生命政治秩序的基础进行考察、分类和控制。赖希的例子的重要性不在于将性置于科学的视线之下，而在于通过实验新的身体实践来打破文明障碍的斗争。

正如斯宾诺莎所言，我们尚不清楚身体能做什么。还可以补充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尝·试。我们最大的解放潜力在于能够调动身体对抗囚禁愉悦的文明秩序。这不仅意味着追求野性的、不受驾驭的愉悦，还意味着摧毁使这些愉悦无法实现的物质结构。

而如此颠覆性的行为本身就是极度愉悦的！

反抗文明的死亡机器，在共同的电光火石中展开，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官觉醒体验。对此类体验的追求足以恢复我们身体被遗忘的力量，并唤醒共生未来的能力。

□

[image]

By 第五权#383

[image]

斩断AI法西斯主义

[image] **Publish Date**	@2025年1月26日
[image] **Category**	[image]Category 5 新的反法西斯战斗
[image] 标签	AI Antifa BigTech 中国 国家 技术 无政府主义 美国 资本主义
[image] 编辑	[image]iyp

很高兴看到公众对 deepseek 项目背后诸多技术资本和统治贵族之间阴暗且密
的揭示。我们不会反对技术进步，只要技术进步可以造福人类，让我们不再
再为了温饱而忍受剥削压榨，不再因人类肉身的局限性而不得不放弃自由的
于统治。

但是，当技术被掌握着法西斯手里时，我们所期待的一切不仅都无法实现，
我们已经熟悉的噩梦变本加厉。它绝不可持续。

帝国冷战和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是本阶段你能遇到的最愚蠢的烟雾。扫清它
看到你我的未来 - 那里不应再有它们的存在。

希望本文能为华人反抗者带来提示。

- Table of Content

  科技右翼的崛起
  特朗普与科技右翼
  了解不断变化的地形
  阻断它

[image] [image] 在这里下载大图：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QvkVc6Qp8sMClpxIXvwIpeOfs2l1a-e/view?usp=sharing

[image]

1月20日，在全球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领导人以及全球最富有的科技亿万富翁（包括苹果、谷歌、Facebook、TikTok、推特和亚马逊的掌门人）出席的仪式上，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掌权。为了换取科技精英们对其竞选和就职的资金支持，特朗普已经宣布对科技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新投资，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AI**）领域，并推动向加密货币领域扩张。

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旨在考验现有的法律制度和共和党的忠诚度，他向南部边境派遣现役部队，呼吁结束第14修正案中规定的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并要求他的极右翼忠实拥护者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特朗普希望拥有极端的行政权力，但更广泛地说，他的更大议程与科技界亿万富翁的利益直接挂钩 —— 这些亿万富翁花费数百万美元将他送入白宫。自从坐上金色扶梯以来，特朗普就利用那些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剥夺了阶级地位、遭受了巨大损失的人们的愤怒情绪，将民主党描绘成“激进左派和企业精英”，并以此为武器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机器。然而，正是这些通过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致富的亿万富翁们，才是特朗普现在努力实施的议程所服务的真正对象。

科技右翼的崛起

这种新兴的“兄弟寡头政治”的特点是许多科技精英不断转向威权主义和新反动主义思想，其中以彼得·蒂尔（**Peter Thiel**）和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等人最为突出，他们反对 “一切形式的民主”，呼吁 “某种形式的国家即公司”。雅文的笔名是“孟子·莫尔德巴格”(Mencius Moldbug)，他是一名软件工程师，曾呼吁把无家可归者变成 “生物柴油”，推崇种族主义伪科学，主张把美国变成君主制国家，当然是由首席执行官来管理。

雅文曾受到 JD万斯的影响，而万斯本人正是蒂尔的门徒。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贝宝公司（PayPal）与泰尔共事，在特朗普最近的就职典礼后的庆祝活动中，他曾多次向一群崇拜 MAGA 的粉丝

行纳粹礼，且长期致力于宣扬威权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理想和运动。

2022年收购推特后，马斯克欢迎新纳粹分子和极右翼影响者重返推特，清除了推特上的**Antifa**活动家账户，支持德国 **AfD** 等新纳粹政党（马斯克最近刚刚在 **AfD** 的竞选活动上发表了讲话），攻击工会和劳工组织，并集会支持反犹和白人民族主义阴谋论。扎克伯格等科技界亿万富翁最近也开始向极右翼思想靠拢，而亚马逊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则向特朗普示好，同时在他拥有的《华盛顿邮报》打压批评特朗普的记者。

[image] 照片由 Igor Omilaev 拍摄，发布于Unsplash

必须说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并不是科技精英对右翼政治的第一次推动。在加利福尼亚湾区，右翼大科技资本家最近也与“传统商业和房地产精英一起，帮助策划并带头发起运动，试图推翻一些最进步的领导人，并取消最进步的政策”。正如《本地使命》所报道的：

> 由亿万富翁支持的压力团体在旧金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抨击进步人士造成的城市弊病，从毒品泛滥的街道到僵化的住房建设，其中有一个团体在其他团体中鹤立鸡群。
>
> 2020年成立的“旧金山邻里促进会”（Neighbors for a Better San Francisco Advocacy），主要由房地产和科技资金支持，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旧金山政坛上资金最雄厚、支出最多的组织。
>
> 2022年，该组织为罢免时任地区检察官切萨·布丹（Chesa Boudin）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同年，该组织也是学校董事会罢免中的头号资金提供者。根据对竞选财务数据的分析，在2020年至2024年间的旧金山政治竞选活动中，每花费10美元，该组织就能占到1美元以上，在8030万美元的总支出中，“邻里”组织至少花费了870万美元。
>
> 该组织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福利”非营利组织，由两

> 名房地产经纪人游说者创立，并得到共和党巨额捐赠者的支持，几乎只在法律和秩序（社会控制）方面投入资金，对严打政策和对候选人的支持远远多于对住房、交通或其他政策问题的关注。
>
> 虽然该组织最初专注于监督选举，但后来迅速扩大，并成功将数百万资金用于罢免地区检察官、扭转刑事司法改革、打击监禁替代方案，以及加强警察局。

在旧金山，科技精英们通过武器化无家可归者的仇恨并加以制造，以推动对进步政策和民选官员的攻击，使刑事司法改革倒退，推动毒品战争时代的严打（所谓的“回归法律与秩序 ”），从而加速了湾区的仕绅化和流离失所。在加利福尼亚这个进步堡垒中推行反动政策，反映了许多科技界亿万富翁对特朗普日益增长的支持，这种支持虽然部分受意识形态驱动，但核心是共同的阶级利益。正如《绿色欧洲杂志》所写的那样：

> 与以往的美国大选相比，现在的科技右翼在政治上更加活跃和明显，这有几个原因。首先，该团体找到了政治领导层，他们渴望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问题上采纳其优先事项（2024年共和党党纲包括对这两个行业放松监管的计划）……美国科技行业正面临来自中国公司的更直接的竞争，这有助于创造一个利率更高的不同投资环境。这也导致投资重点发生变化，风险资本家现在将更多资金投入国防公司，如亿万富翁企业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支持的武器制造商安杜里尔公司（**Anduril**）。政府合同，尤其是国防和边境安全领域的合同，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随着硅谷与美国政府关系的变化，投资者阶级的优先考虑事项也在发生变化。

新兴的科技寡头集团认为拜登政府过于重视资本主义市场内的监管和竞争，而特朗普则被视为削减监管和税收的工具，用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来奖励科技公司，尤其是在马斯克削减国家开支并走向私有化的时候。特朗普推动的 “钻井，宝贝儿，钻井” 也是他们促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的核心，因为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水。

简而言之，技术官僚们花钱买来了特朗普的总统职位，他们计划从一切方面套现：从扩大人工智能生产、制定有利于其公司的法律并使其免受监管，到从大规模拘留、大规模监视和战争中获利。生意不错啊，宝贝儿。

特朗普与科技右翼

这一进程已经开始，特朗普宣布与OpenAI 签订5000亿美元的合同（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和电站），此举也导致科技精英内部关系紧张，因为马斯克已经开始抨击 OpenAI（他参与共同创建了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还有ChatGPT的创建者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在边境，像帕兰泰尔这样的公司 "由亿万富翁彼得·蒂尔联合创办，在过去四年中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并在为ICE提供技术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在五角大楼，"帕兰泰尔和安杜里尔这两家国防技术领域的大公司正在与 SpaceX、OpenAI、Scale AI 和 Saronic 谈判，以组建一个强大的财团，旨在通过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国防技术'，重塑美国政府采购军事技术的方式"。对于亿万富豪精英来说，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因为风险资本家们押注于增强国安、压制移民和太空探索方面的联邦支出"。

在战猪们吃饱喝足的同时，社交媒体公司也在努力为公众提供面包渣子和马戏团。推特（尽管在努力赚钱）仍然是右翼大规模造谣的平台，而扎克伯格旗下的Facebook和 Instagram 在特朗普就职后，在审查有关堕胎药的帖子的同时，也取消了事实核查，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压制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法西斯运动，压制亲巴勒斯坦的内容，并推崇极右阴谋论。

[image] 照片由Mika Baumeister拍摄。发布于Unsplash

需要指出的是，以劳拉·卢默（Laura Loomer）等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新法西斯主义者为代表的特朗普联盟中的另一部分人曾公开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交恶，温顺地批评科技精英们想要建立 "技术封建主义"。尽管如此，但显然这种叫嚣并没有多少效果，因为马斯克已经在推特上让卢默等极右翼诋毁者闭嘴了，并且已经在白宫开张（尽管苏西·怀尔斯似乎暂时把他拒之门外）。班农的话也很空洞，因为他曾表示，希望利用马斯克的巨额财富，为欧洲各地的新法西斯政党赢得竞选活动，并让虚假信息 "充斥

整个地区”。极右翼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抱怨他们的一些种族意识形态关切（如马斯克对**H-1B**签证的支持 —— 该签证有助于科技公司过度剥削移民工人）与技术官僚的专制阶级利益不一致，但归根结底，他们知道在支票上签字的人是谁。

在科技精英内部起作用的意识形态力量不胜枚举，但重要的是要对他们形成一致的批判，了解是什么激发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向精英圈子里的其他人兜售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与自由派一样，他们认为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对资本的所谓限制，无论是国家法规、税收，还是工会、罢工或社会运动中工人的要求。然而，与自由派不同的是，他们希望利用国家通过合同来确保资本的使用权，并积极扩大‘国安国’的镇压权力。与另类右翼一样，他们也将此视为一项精英计划，但另类右翼的目标人群是中上层大学生，他们向往的是成为美国共和党的工作人员或为塔克·卡尔森撰稿，而技术右翼则希望将自己作为一个阶层从现代多元文化民主社会的“桎梏”中 “解放”出来。虽然他们可能拥护极权主义的世界观，但他们拒绝将法西斯主义作为群众运动，只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明确支持资本主义。与白人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的项目是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平等主义的运动，但尽管像雅文和尼克·兰德这样的新反动思想家可能会接受种族主义伪科学，但归根结底，他们希望自己的独裁能够模仿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已经存在的专制结构，而不是将资本从精英手中夺走，使其为国家服务，更不用说为人民服务了—— 即使是白人。未来已来，只是跟你无关。

[image] 科技巨头乌勒·达格·查尔斯 (The Day of the Jackal 剧照)

了解不断变化的地形

我们必须明白，特朗普是在现有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时重新上台的。正如杰米·莫森特（Jamie Merchant）在《布鲁克林铁轨》（The Brooklyn Rail）上所描绘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秩序即将终结。在2020年的动荡、全球大流行病和1月6日的未遂政变之后，拜登急忙向共和党各州注入资金，希望确保社会和平，并通过各种贸易战举措来回击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各国又急于提高能源产量，为人工智能提供燃料（尽管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严重），美国与所谓的“金砖国家”之间的敌意也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科技精英们正在将旧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抛出窗外，搭上全球极右

翼的马车。踩狗屎的运气啊。

但正如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特朗普联盟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大杂烩：从希望建立红白蓝神权体制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到梦想建立技术乌托邦的后自由主义者。像斯蒂芬·米勒这样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一边幻想着大规模驱逐出境，一边与埃隆·马斯克这样的寡头为伍，后者呼吁通过H-1B签证让更多移民在美国工作，同时又在助长新纳粹分子的气焰。尽管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沼泽，但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推动力仍然是通过削减富人税收、削弱监管法规以及获得利润丰厚的企业合同来致富精英。有人发财了，但肯定不是你我。

[image] Taylor Vick 拍摄，发布在 Unsplash

但这一现实伴随着一个明显的矛盾，那就是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民粹主义者，将降低食品、能源和房租等日常用品的成本。正如已故的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所指出的，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典型的法团主义者，他向愤怒的工人们宣讲睡前故事，称他将与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金融精英。实际上，特朗普已经开始收回他将能够降低物价的说法，但他还试图在人们的头脑中巩固一种观念，即增加能源生产将为工人阶级带来更低的价格，尽管所有数据都与此相反。实际上，特朗普自己也承认，推动增加化石燃料生产只是为了给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电力，而这已经导致一些人遭受了电费上涨。根据一些研究，"由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激增，消费者的电费很快就会增加 70%"。更不用说，许多经济学家还警告说，特朗普提议的关税还可能导致物价进一步飙升，因为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的禽流感爆发导致鸡蛋成本飙升，而这一切不是肯尼迪能阻止的。

此外，人工智能泡沫也很有可能破灭。正如《福布斯》最近指出的那样：

> 人工智能/ML 专家、Technosophics 联合创始人安德烈的预测更加大胆，他指出，人工智能泡沫正处于破裂的边缘。安德烈解释说："在没有明确投资回报率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使人们的期望值膨胀到不可持续的水平。"

他援引美国亿万富翁、C3.ai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汤姆·西贝尔

（Tom Siebel）的话说，“市场对人工智能的估值过高”，“这绝对是一个泡沫”。安德烈还指出，专业人士和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抵触情绪日益高涨，这可能会让炒作进一步落空：

> “来自作家、艺术家、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等不同职业的普通人正在兴起一场反对人工智能范式的运动。他总结说：“这提高了普通民众对技术所带来的不可调和问题的认识，以及对亿万富翁及其组织将技术强加给人们这一事实的认识。”

除了不断增加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加速人工智能生产还意味着创造技术，而这些技术的创造者自己也承认，这些技术将使许多工作自动化，而不仅仅是白领工作。许多快餐连锁店已经在努力通过人工智能实现劳动力的自动化，从驾驶窗口到餐厅内部都是如此。这一现实造成了一个悖论：特朗普利用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勉强在2024年赢得了胜利；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由企业全球化和生活水平下降所决定的经济体系。但正如《福布斯》所写：“过去**40**年来，自动化技术一直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力 ...... 自1980年以来，美国人工资变化的50%至70%可归因于被自动化取代或降级的蓝领工人的工资下降”。当然，特朗普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做法只会加速这一现实。简而言之，班农式的 “美国优先”幻想不过是骗人的万灵油：让我们认清它的真面目吧，新自由主义正在得到报应。

[image] [image] https://mastodon.social/@MitteKeegi_/113870433435158385

阻断它

穷人和劳动人民面临着多重危机：财富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气候变化的威胁与日俱增，极右翼专制势力不断崛起。亿万富翁们非但不努力改善人类生活、消除系统性不平等，反而对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惊恐万分，并推动更加集中的和控制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虚假信息、选举代议制和现有政治制度武器化。这就是为什么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需要你害怕移民和变性人 —— 因为亿万富翁们希望你不会注意到他们对你的抢劫。

⇡TOP 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刻。我们应该清楚其中的矛盾，以及这为潜在的组织和干预创造的机会。我们还应该坚定地认识到，特朗普不会让美国穷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他绝不是解决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问题的"办法"，相反，他加速了推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力量。此外，我们应该努力理解并向人们解释特朗普和科技右翼正在努力完成的整体计划：提高人工智能的能力丝毫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相反，我们应该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巨大代价，以及人工智能所代表的威胁。

[image] 2010年代初，湾区爆发的反对科技巴士的抗议活动。资料来源：https://fuckoffgoogle.de/

过去的斗争和社会运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我们最好研究一下2010年代由海湾地区 Counterforce 等团体发起的反对科技巨头的干预行动，以及德国等地反对特斯拉公司扩张的大规模生态斗争。在我们努力阻止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张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向土著水资源保护者、亚特兰大的"终结警察城"运动以及阿巴拉契亚人阻止管道项目的斗争学习 —— 这些斗争已经在各地爆发。亚马逊和快餐公司工人的罢工可以用来搭建桥梁和团结运动。反法西斯运动活动家可以帮助绘制白人至上主义者、国家和科技右翼之间的联系图。废除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斗争和 BDS 运动可以为我们提供工具，让我们反击从战争、监视、边境军事化和大规模拘留中获利的科技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需要首先将这些斗争编织在一起，并向更广泛的民众解释它们之间的联系。

正如前文所述，地方社区反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斗争已经在社会上层出不穷，而且数量只会越来越多。如果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反击寡头及其技术独裁的未来，那么现在机会已经来了。**2025**年，"骄傲男孩"（**Proud Boys**）在街头游行的冲突可能会减少，而更多的是地方社区联合起来阻止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

[image] 来源 https://www.dw.com/en/protesters-halt-new-data-center/video-71397452

科技右翼是团结的，但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分散的反动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他们希望我们分裂，以为我们会为了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残羹剩饭而互相争斗，或者在他们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制造最新的愤怒。我们需要围绕共同的阶级利益来组织和建设，跨越分歧，围绕共同的目标和斗争。我们希望人人有房住。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宜居的地球。我们想要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劳

动成果。我们想要废除正在摧毁我们的制度。

20世纪90年代，在民主党总统的领导下，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反血汗工厂活动家、和环保组织，帮助动员了成千上万人参加反对企业全球化的激进抗议活动。他们利用分散的网络、独立的媒体和亲密团队，以反资本主义分析和直接行动为根基，帮助创建了一场日益壮大的运动。我们曾经做到过，我们也肯定能再次做到。

寡头们想要一个国王。我们就回敬给他们一场起义吧。

[image] [image] 这不好笑。这份共鸣应该是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抵抗的动力。

By ItsGoingDown